

近代中国之文化国家化与国家意识的形成（1890—1928）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 1890-1928

许德发
KHOR TEIK HUAT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近代中国之文化国家化与国家意识的形成（1890—1928）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 1890-1928

许德发

KHOR TEIK HUAT

(B. A. Hons. , M. A. UNIVERSITY OF MALAYA)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博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Acknowledgment

The completion of this thesis certainly requires more than my personal effort. First of all, I am truly blessed to have the guidance and teaching from my supervisor Dr. Lo Yuet Keung (劳悦强) during the course of research and writing this work, I would like to thank him for his contribution. In addition, I am also indebted to A/P Wong Sin Kiong (黄贤强) and Dr. Yan Shoucheng (严寿澂) for their patience and sharing of ideas, they have helped me to refine my work in many ways. I am also grateful for the recommendation from Prof. Wong Yoon Wah (王润华), and the privilege to receive a research scholarship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to make my study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ossible. During this time, I had visited the Shanghai Library, Library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 of Nanjing for archival and library research.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for their hospitality.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fellow research classmates Mr. Zhu Chongke and Mr. Goh Long Hoon, for their friendship and concerns throughout the last 3 years.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work to my beloved father and late mother.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 was unable to stay close and take care of my father, who is at the age of 73, but I am lucky to have my siblings who are with him all this while. I woul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my brother Teik Heong for his help during my research study in NUS. Lastly, I am particularly indebted to my wife Hooi See, and children SiZe and YiHeng, who have given me the most enduring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out this period.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1-29
	第一节：问题之提出及其背景	1-6
	第二节：相关研究梗概与检讨	6-13
	第三节：研究途径、架构与资料	13-19
	第四节：问题与范畴的界定与设限	19-22
第二章	亡国、亡天下之辩： 晚清国家意识形成中的国粹论述及其起源	30-83
	第一节：“亡国灭种”论述下之思想变迁及其问题意识	30-52
	1. 1 亡国灭种与国家意识之形成	
	1. 2 我者（国）、它者（国）与国家符号	
	1. 3 亡国与亡天下的纠葛：国家与文化之统合	
	1. 4 现代国家之精神基础：中国魂兮归来乎	
	第二节：“国粹”之初现与文化国家化的开展	53-69
	2. 1 陶铸国魂与国粹论述的内在相关性	
	2. 2 日本因素下的“国粹”观及其最初之萌现	
	2. 3 朝野共倡与国粹话语之风行	
	第三节：小结	69-71
第三章	国家再造： 辛亥革命前国粹论对国家认同及民族主体性之建构	85-144
	第一节：国家再造与文化民族主义	86-92
	1. 1 国家建构中的“实在化”过程	
	1. 2 国粹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方向	
	第二节：类种性：汉民族国家的主体追寻	92-116
	2. 1 中国人与汉满边界之构造	
	2. 2 汉民族国家建构下被定义的国粹	
	第三节：反欧化、反帝国主义与世界位置	116-133
	3. 1 欧化中的文化认同危机	
	3. 2 立国之公理：民族—国家独立与世界位置	
	3. 3 有是地故有是华：文化特殊性与主体性之追寻	

第四节：小结	133-135
第四章 国粹之所寄： 各传统文化领域以“国”命名之初步形成及其过程	146-202
第一节：阐释的焦虑：“国粹之所寄”的具体化与歧异	146-153
1.1 国学与国粹之指涉	
1.2 国粹涵盖面之繁复与争论	
第二节：中国文化的分类：国粹化、文化国家化的扩散	153-190
2.1 “国文乃一国国粹之所寄”	
2.2 “国史”、民族认同与记忆	
2.3 神州“国光”与传统美术	
2.4 尚武思潮与武术的国粹化	
2.5 中西医相遇与“国医”之出现	
第三节：小结	190-191
第五章 以国之名为盾： 革命后国粹论述之转变与国家观念(1912-1928)	204-270
第一节：民国初期的时代氛围与国粹论述的再兴	206-228
1.1 政治失序与价值重建运动	
1.2 “国粹论”的动机转变与官方介入	
1.3 意含歧出与狭隘化的国粹论述	
1.4 国家意识与“国性论”作为一种保护盾说词	
第二节：正反之间：负面的国粹与作为保护盾的国粹	228-253
2.1 五四运动中的“反国粹论述”	
2.2 1920年代“国”字前缀词族论述的兴起与稳定化	
2.3 压制与反弹：“国医”之正名	
2.4 美术革命潮中的“国画”	
第三节：小结	253-256
第六章 结论	272-281
参考书目	282-304

Abstract

Betwee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th, a family of new coinages began to emerge in China. They included “Guocui” (national essence), “Guoxue”(national learning), “Guoyi” (national medicine) and the likes. This is an entirely new phenomenon, and it suggests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tempted to “nationalize”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My thesis examines this phenomen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 It places the theme on modern China’s unique context of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Guocui” (national essence)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various new na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in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is study encompasses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year 1890 to 1928. This period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1) for 1890-1911, towards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when China suffered defeat in “Sino-Japan War (1894-95)”, my thesis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a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initial conception of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likes. 2) for 1912-1928, from the triumph of “1911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of Nanjing, my thesis focuses on the change i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essence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concepts about national culture.

第一章

导论

在我们的日常接触中，许多事物时常都会被冠以“中国”之名，比较抽象的文化领域也莫能外，例如中国学术、中国音乐、中国画、中国医药、中国戏剧等等。这些传统文化领域都以“国”字作为前缀词，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有一个个代表着国家特有的“国粹”、“国学”、“国乐”、“国术”、“国画”、“国医”以及“国剧”等名目之出现。一般而言，这些国字头词汇从来不是问题，大家也习以为常地在各自的论述里面使用这些词汇，并把“国家”作为历史与文化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但是，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曾开宗明义的对“国学”一词作了质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¹钱穆所言极中肯綮，以现代学术而言，学术确无国界之分，证诸世界各国如英国、法国等，恐怕也没有属于英国或法国之国家学术。他也道中了“国学”一词具体所指的含混性。²然而事实是，钱穆本身也使用这一“特为一个时代的名词”，此名词不仅超乎特定时代地被沿用下来，³而且其他一系列“国”字头词汇亦无不持之以故，更且已被建制化为官方或正式体制的一部分。

就“国学”一词而言，论者已经指出它其实是清末的产物。⁴以当时使用此词汇最频密的清末国粹提倡者而言，他们显然不会认同钱穆“学术本无国界”的说法，恰恰相反，如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邓实（1877—1951）所曾申言道的，一国有一国之学，“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⁵又说，“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⁶黄节则指出：“国学者，明吾国界以定吾学界也”。⁷换言之，学术是有国界的，而

且国界正是以学术为其基础。许守微也说道，“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⁸从这些引言可略知，在他们的思想里，一国自有其特有的学术与文化，而学术与文化就是立国之本。因此，“学界”与“国界”自然息息相关，“国家”尚在，“国学”当然必在，反之亦然。

之所以出现这之间的认知差距，其实钱穆在上引言论中所提及的“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已提示了我们：国字号之出现自有其时代性。它其实也是近代特有现象。从史学角度来说，一切事物其来有自，必有其历史情境。而且，这一系列词汇以“国”字开头，正如以上邓实等人所强调的“国界”与“学界”之辩证关联，至少表明“国家”（nation）意识在这些本论文称为“文化国家化”的“国字号”现象里扮演了极大的意义（此处“文化国家化”之指涉，详见本章第四节）。因此，对这个问题之来龙与去脉作出考察，求其蹊奥，是极具意义的。

第一节、问题之提出及其背景

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遭际了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体上，知识界逐渐意识到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情势很清楚的展示了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对于有识之士来说，中国正处于一个事关存亡的“关口”（crisis），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也是一股趋力（drive），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彰显出来的。在近代史上，中国“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族认同的问题可说是一项主问题，亡国忧患激起的问题意识正是以“民族主义”作为解决“亡国问题”的方案之一。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识的出现与生成可说是近代中国的新现象，⁹而且它是外发型的。也就是说，这并非发自内心的自然演化，“民族国家”之建立（nation building）自然需要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建构过程。现代国家意识的近代出现，可谓牵一发而动前身，它引发了许多观念上的变化，并对文化议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著名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

命运》第一卷里，即从“天下”和“国家”之间的对立着手，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断裂，可谓抓住了近代“中国问题”的核心。¹⁰在列氏看来，中国几代读书人面对近代化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转变可以概括为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以冀“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的胜利”。¹¹

在知识界深沉的“救亡”意识之中，文化与国家存亡的关系是知识界思辩的其中一道问题。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他们所提及。这一点本论文下一章将会加以讨论。简单的说，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这就不难索解，为何出现国粹派所说的，“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¹²这些言论实已反映了“文化/学术”反过来成了“国家”的中心，透露了知识界动员“文化”以改造危急的国势。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而来，“学术救国”之主张即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舞台。¹³实际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第一项工序往往就是文化建构，而且把固有的传统文化国家化更是题中必有之义。而当这一“文化救国”举动与“民族国家建构”相互联系，这即表明中国“文化国家化”里头的“国家”与“文化”之间纠葛具有非常复杂之意涵。清末有关“文化国家化”运动的兴起基本上与塑造新国家，以企达救亡图存之国族主义动机是一体两面的。两者环环相扣，文化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为中国近代“文化国家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背景。

有关“以国命名”或“文化国家化”的文化现象可谓牵涉多端，但亦有迹可寻，其中主要蕴含着救亡意识及现代国家意识的生成所造成的思想与观念之冲击、中西文化冲击下之文化认同与困扰等议题。因此简单的说，从本论文题目《近代文化国家化运动的兴起与国家意识之形成》当可略知，本文的基本目的，就是系统地考察“以国命名”运动与国家意识之

间的关联，尤其着重清末“国粹”思潮之发生与影响，以及它与国家之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之建构，并勾划出其概念与思想的阶段性发展。但必须加以指出，国家认同及建构涉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多层面的互动因素，¹⁴而非文化（国粹思想）之单一因素所能解释，因此本论文仅可以说是从文化与思想之脉络寻思其部分因由。而具体而言，尽管清末兴起的“文化国家化”运动与国家观念之生成系有极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它们之间并非一个自明的关系。也就是说，横亘于眼前的问题是，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是如何演化的？在这样的分析理路下，将环绕以下几个问题：这种现象从何开始？又如何发生？把这些“文化”（学术、音乐、医学等）国字化或所谓的“国粹”框进“国家”的范畴来指称意味着什么？犹有进者，诚如许地山所言，“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底，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national inheritance）或‘国家底遗产’（legacy of the nation）”。¹⁵因此，“国粹”的出现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本质性的存在物，更非凭空出现之物，而是具有一个形成与沉淀之过程的。对这个过程作揭示，其空间与意义之巨大，自不待言。

原则上，任何中国固有的事物皆可冠称“国字”，唯却又不见得样样事物皆被冠称“国”字，因此这里是否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又是那些“国字号”先行？仔细推敲，除了上文注释中曹聚仁提到的国粹、国学、国乐、国术、国剧、国医，梁启超还提过国语、国教、国俗作为“国性”的基础。¹⁶然而，为何当中的国教、国俗等名词却又不见传承，是否蕴含任何意义？然则，一直以来，学界在探讨国粹、国乐、国学、国语等名词与国家、国族之因果逻辑上显然不足。国家观念与一系列“国字号”运动的思想渊源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加以考察。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追问：到底是文化为国家建构所用，还是倒转过来，文化借用国家作为其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下之保护盾？

文化国家化既是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各领域内如中医界之专业人士与整体知识界论述之关系仍亟待钩沉。过去学界比较注重整体知识界，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如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人之思想，而忽略了各专业领域人士之看法与两者之间的关

系。实际上，以中医而言，它可说是思想史的最佳标本。20 世纪的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漩涡之中，若能从思想史意义上、文化史意义上予以清理与反思，是相当具意义的。¹⁷如此着眼，我们或将能更清楚理解“国字号”往下流传的过程，并能知悉两者之间的互动境况。另一方面，从过去的研究成果上，我们知道国粹思想在晚清时期蔚为大国，为当时人所接受，而且自有其不可忽略的脉络。本论文则将追问，国粹论述形成了怎样的一套与国家建构有关的知识生产，而其所形成的论述是否影响或至少提供了资源与示范，作为其他文化国字号出现的泉源。因是之故，我们还可以继续叩询：各“国”字头词句之间有何思想联系？而在时间及其历史场景变迁之下，它又呈现怎样的变化？

沿着上述问题丛再追问下去，不免要对“国”字作推原，即必然要具体触及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族主义之生成过程及其形态。毫无疑问，这些“国”字定词其实就是英文“national”的意思。诚如前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族建国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母题（motif），而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文化国家化”论述与此息息相关。因此，在本论文里头，现代国家观念之发生自然是本研究的一条主要脉络。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寻上，中国知识界对其在论域上的界定（discursive construct）是以欧美启蒙运动以来所创造的现代国家为范本。他们无不致力于将围绕着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论述搬移到中国来。在世界史中，以对传统文化与精神之追寻来凝聚认同与促进民族意识之觉醒是时有所见的。以德国与爱尔兰为例，他们先后都出现自身的“发现传统”的运动，以抵抗法文与拉丁文之统治。芬兰于 1917 年独立，也是得益于民族意识的提高，而这个民族醒觉正是来自对自身民间文化之养育。¹⁸传统文化确实可以作为知识分子鼓动民族意识醒觉的有效工具，但就当时的中国状况而言，“民族意识”一词的内涵尚须具体加以分析，毕竟中国与欧美语境不尽相同。

这样一来，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现代国族主义的论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变化，如果有的话，发生何种变化，其原因何在。而且，其渊源与传统关系（尤其是前面略有提及的“亡天下”之辨的影响）如何？透过了解中国国族主义的自身特殊历史内在演变

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其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构筑中所预定的位置或何以传统文化会得到关注，尤其更能同情的理解当时人对国族与国家观的理解。本论文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传统文化是如何被知识界整合进民族国家建设与追求的方案之中的？“国字号”在塑造国家认同上或是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前述传统“亡天下”这种文化救亡概念在当时还发生作用，正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处在固有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因此他们头脑中的文化概念才可能逐渐与民族国家概念统一起来。

第二节、相关研究梗概与检讨

在还未交代本论文之研究进路与范畴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及检视此课题的相关研究概况，以便有阙如者则可弥补之，有积累者则可供参照之。

2.1 有关“国字号”的相关探索

“国粹”一词可说是国字号词族的“先祖”，首先我们就其过去之研究作一概述。就个人观察所及，从现有的与过去的研究看，有关国粹运动的主要研究至少存有三种形态。其一是，研究者把国粹运动主要视为辛亥革命时期反满革命思潮的一环。比如著名史学家章开沅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也把国粹运动完全置于辛亥革命史的脉络之中加以论述。在他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粹运动则作为辛亥时期〈思想战线上的论争〉中的一节来处理。¹⁹这自然有其道理，但这样的研究取向不免忽略该思想运动独立面及其他面向与意涵，如文化上或本论文强调的对国家意识与“国字号”上的意义。其在文化上的阙失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稍微填补。这其中就是另外一种研究取向者，即将国粹运动的研究与论述放在近年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加以讨论。²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喻大华的研究为代表。²¹

第三个取向则是就“国粹”论“国粹”，那就是集中在以国粹派为中心作比较全面与通论式的考察，特别是其学术文化思想。在这一方面，学者们已经作了相当多的工作，成为国粹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这

方面的先行者当推杨天石与胡逢祥，他们先后在 1965 年与 1980 年代撰述了〈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²²与〈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²³但以此为主题深入探讨之长篇著作，最为特出的首推郑师渠于 1993 年出版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其他以单篇论文居多。郑著可说已经非常详尽论析了有关整个晚清章太炎、刘师培（1884—1919）、邓实等人为首的国粹派与《国粹学报》的各个方面，如它们的史学观、文化观、今古文观等。²⁴然而，由于本书涉猎范畴阔大，使它未能专注于把中国清末国粹主义的兴起放在整个国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因此对国粹思想源起中的有关国家意识与国粹论述之间交集的探讨自然不够深入。台湾萧琼瑶之硕士论文《清末民初国粹思想研究——以国粹学报为中心》，也是这一研究取向的佳作。²⁵此论文虽非专题式的研究国家意识与国粹思潮之相关性，但亦略有着墨。该论文指出了“国粹”并非“西学”的反命题，而民族主义才是国粹思想的主旋律，实属难得之观察。另外，1990 年代以下这方面的单篇论文还有丁伟志的〈晚清国粹主义论述〉²⁶与四川大学的王东杰先后发表的三篇相关论文。前者主要作了通论式的论析，后者其中一篇则从清代学术史发展变化的角度对国粹派“古学复新”作了初步的解析。²⁷王氏在另外一篇论述“国学保存会”和国粹运动时，则论析了“国学保存会”的活动，多少弥补了一般上从革命派角度入手的缺憾，以及单以《国粹学报》为中心之研究。²⁸在针对国粹派个人的研究方面，刘贵福于 2002 年根据未刊行的钱玄同日记著撰述了〈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²⁹另有一些稍有涉及“国粹”的相关研究如章太炎研究、刘师培研究、南社史以及晚清学术史或文化史等也值得注意。³⁰这些论析皆有助于本研究之开展，但显而易见的是，若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论述国粹运动，至今依然阙如，而且欠缺对国粹思想阶段性发展之探索，尤其至民国时期之境况。

除此之外，近年值得瞩目的发展是，罗志田与桑兵二人也分别在有关国粹或国学的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开拓了上述的研究范畴。他们把清末民初国粹或国学思潮置于较为宽阔的脉络与一个相关主题上。罗志田著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 年）专书，主要论析了清季朝野之间有关国粹与国学的争论，突破了纯粹

把目光局限于“国粹派”的研究取向，而弥补了过去对清政府推动国粹的忽视。³¹作者也从纵向的视角探索了清末国粹与五四时代国故思潮的相关性，不过作者尽管把其中一部分题旨定为“国家与学术”之关系，但并没把国粹运动专置于近代国家意识形成之脉络上，且紧扣“国”之层面作深论。罗氏还撰有单篇论文多篇，主要探索“国粹”及国学与现代学科之间的困扰与问题，如《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以及国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即《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等都有新颖的论析，这些论文后来都收于上述著作中。桑兵则著有《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999年）以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2001年）。³²从论题可知，他比较集中讨论国学与西方汉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学这个知识学科本身在清末民初的研究概况与逐渐建制化的过程。桑兵的切入点可说是从学术史的视角论述了国学研究的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涉及国家或国族这一方面的论述以及探索国字号的兴起。另外，近期台湾的黄绣媛所撰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也必须一提。³³该文视角比较广阔，其论述所关怀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所谓帝国主义强权侵略下，为了保卫国家主权、民族的生存，为坚守儒家信仰，以及复兴中国文化所作的各种努力。它是把国粹运动置放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保国、保教”的历史脉络下，看三者之间的相关联与差别，但也非以国家意识角度论析，也未见国字号现象之探索。

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见。有关这方面讨论收录于研讨会论文集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³⁴在此论文集的相关讨论中，其一为Martin Bernal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³⁵此文考察了作为国粹派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师培之国粹思想渊源，也因此稍有触及“国粹”概念的日本因素。作者分析了1907年文化保守思潮为什么会悄然出现于革命风潮之中，揭示了国粹运动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它所处着的追求现代国家建构的革命氛围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是极为深刻的观察与洞见，也引

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即看来是具有保守态势之国粹运动如何与追求现代国家建构的反对传统天下观之间并存，而且相容。这是本研究将尝试处理的问题之一。另一篇是 Laurence A. Schneider 所撰的“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³⁶作者在文中把《国粹学报》与“南社”及较后的《学衡》置放于同一脉络下，认为三者是属于同一系统下之发展，代表了近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前后代表。作者虽尝试分疏国粹思想比较长远的发展，视野宽阔，但它主要是从其所谓的保守主义思潮的角度切入，未见及晚清国粹派在国家意识与文化国家化方面的传承作用。

在考察其他各项国字号之形成方面，则有关国语运动方面相对比较可观，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首推国语运动第三代领袖黎锦熙著于 1934 年的《国语运动史纲》。³⁷这本书考察了清末 1900 年以前至 1930 年代以来的各项国语运动之进展，正好是本论文的研究年限相近。作者尝试为各时期的国语运动分期，从最初的切音运动（1892 年）、简体字运动（1900）到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运动以及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并以之一以贯之，连成了史的延绵系统。黎著可说是有关国语运动历史的重要著作。可是，黎氏在此书中并没有考溯“国语”一词在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萌现后最先被使用的史实，比较可惜。不过，在另一本其所编著之书《国语学讲义》却又提及，最早提到“国语”一词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吴于 1902 年到日本考察现代学校制度，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绩，于是回国后主张推行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³⁸思想史学者王尔敏也曾为文〈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³⁹该文主要从思想史角度切入，从追求富强以及知识普及的需要的角度探讨国语运动的形成。除此之外，由于国民党撤台之后，大力提倡国语运动，故此议题难免得到台湾学界的注意。据知，有好几位研究所学生就以此课题撰写毕业论文。⁴⁰无论如何，国语运动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充分与专门的关注。因此，此课题尚留下许多隐晦待解之处。实际上，现代国家之建构几乎必然的追求统一的教育与语言，因此国语运动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题中必然之义。故此，从国家形成的角度论析“国语”之形成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无论如何，专题性的从国家意识的立场切入研究国粹运动，以及以国字为前缀词之整体研究者可谓阙如。以个人拙见，以此角度对个别国字号作研究者似乎只有王汎森在“国史”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研究传统中国画的水天中所探索的有关“国画”一词之出现，⁴¹但两者都没有具体追索整体国字号是何时起始的，当然他们也意不在此。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王通过“新史学”研究上溯了清季国家意识之形成，对国家意识的近代文化意义与学术意义多有启发性的看法。⁴²王汎森分析了“国家”这关键词流入近代中国之后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看问题与思考的角度与方式，并因此引发了对学术与史学的观念变化。王虽只具体针对“国史”作考溯，不过其研究对分析其他“国”字头词汇之成因亦具有借鉴作用。

2.2 有关中国国族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成的研究

前面已经说过，把文化框进“国家”里，这显然说明其与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大略检讨至今为止有关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如所周知的是，民族主义可说贯穿了整个不间断的思想演进。许多辉煌与灾难、战乱与凯旋的两极都吊诡的与它相攸关。它几乎主导了中国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面向的发展趋向，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动力。然而，就如2001年时罗厚立所说的，“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专门的研究论文为数不多，而主题著作更屈指可数。”⁴³尤其是直指近代民族主义之研究则是更为贫乏，朱维铮就曾经直率的说过：“关于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领域几近空白”。⁴⁴犹有进者，首先必须立即指出的是，许多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之著作都未定义“民族主义”的学术意含，没有考虑到现代民族主义之“国家”与“民族”二而一的叠合性意义。⁴⁵中国大陆许多研究大都把民族主义相等于对族群或爱国的情操，在完全没有涉及民族主义里头的“民族与国家”（nation and state）的重叠意含之下谈民族/国族主义之发展。比如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以及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两本专著。⁴⁶

对中国现代国族 / 国家意识的起源研究或首推王尔敏。在探讨中国现代国家观念之形成方面，王尔敏之著述有开启的作用。他在 1970 年代即撰〈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以及〈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⁴⁷这两篇论文大体处理了中国国家意识最早形成的过程，并经考察后认为“保国会”的保国意识促成了近代最初始的国家意识之成熟。他认为，国家意识的生成是从外患中产生的“主权”开始的。换言之，王氏是从外在危机逼迫下激发的忧患意识作为切入点探讨国家意识的形成。王尔敏还提到一点跟本论文相关的是：清末流行之所谓“国学”、“国粹”，今日习用之“国文”、“国语”、“国故”、“国乐”、“国画”、“国术”、“国剧”等，都是随着国族意识而来的。⁴⁸唯殊为可惜的是，王氏没有进一步探研这些名词具体成因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也非王文之题旨。张汝伦的〈救国与建国——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则从地理发现为切入点，指出晚清世界地理知识之增长促使中国知识界思想格局改变，由此引发国家观念之初步萌现，而梁启超与章太炎则为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两大奠基者。⁴⁹另外，周阳山、杨肃献所编的《近代中国思想任人物论——民族主义》从近代人物的角视角剖析个人的民族主义，值得参照。⁵⁰

另一方面，一般上，论者往往都注重西方“国族主义”对中国之冲击。但在重视西方的影响之余，亦有论者已注视到中国固有思想的内在作用。如罗志田就认为，在考察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传统概念，如族类、华夏之辨时，必须注意其发展演变的内在理路，尤其是近代西方观念引入前夕士人对这些观念的时代认知。⁵¹诚然，探讨中国近代思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确是一大议题。既然中国现代国族主义是一个近代产物，自然也有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过程。孙隆基的〈从“天下”到“国家”——戊戌维新一代的世界观〉⁵²即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孙认为康梁一派仍然未能超越传统文化主义以及天下观，但已经是处于“天下”与“国家”过渡时期，而一切要到章太炎、孙中山革命派之出现才真正形成。西方学者克罗斯赖 (Pamela Kyle Crossley) 则与一般看法极为不同。她在〈混乱与文明：近代国体的清代渊源〉 (Chaos and Civilization: Imperial Sources of Post-Imperial Model of

The Polity) 中以为, 把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上溯至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的种族观念不合乎逻辑, 反之认为清朝帝国体制的影响更有牵连。

⁵³ 克罗斯赖认为, 形成于清朝时代的有关文化、认同与皇权观念影响了梁启超与章太炎一代, 尤其自乾隆即位之后所倡导的种族认同观念, 为清末的汉、蒙、藏等种族的独立运动奠下基础。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此外, 既然说现代“国族/国家”概念源自西方, 那么自然有必要探讨他在汉语世界的启始。在这方面已有积累了许多相关的探讨。集过去研究成果而涵盖所有的或许应该是方维规。据方维规的考据, “民族”一词从偶尔使用到最终成为一个概念, 从一个陌生的搭配到一句响亮的口号, 无疑与十九世纪末救亡的呼声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分不开。他认为, 1895 年至 1900 年当是“民族”这个新词得以传播的关键年代。这其实也是本论文的假设年限, 即“国字号”现象必须从当时追溯起。实际上, 也就是这段时间里, 史籍和报刊上便慢慢出现“民族”一词。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传统概念仍然占绝对多数。方认为, 从个别到普遍, 或曰“民族”这个词的真正走红, 还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 这与它是当时反帝、反清宣传中一个口号和纲领, 以及“民族主义”之勃兴有关。⁵⁴方维规也直接针对现代“民族”定义方面做了详尽的探讨。他在文中也引了上述王尔敏的论析而认为, 一系列“国”字头词汇之出现现象是体现国家意识自觉的例子。⁵⁵这里值得本研究参考的颇多。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学界发展是: 自 1980 年代以来,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 试图“解构”近代知识建构的研究进路蔚然成风。因此, 晚近在社会科学界广为流传的“国族想象”的“建构论”也被许多中国国族主义思想研究援引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域里头。其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组就先后于 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8 月之间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发明过去, 想像未来: 晚清的“国族”建构, 1895-1912” (Inventing the Past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in Late Qing China, 1895-1912) 的学术活动。⁵⁶从这一角度探索晚清国族建构著称的是沈松桥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1997 年 12 月) 与〈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建构〉(2000 年 6

月)以及孙隆基的〈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2000年)。⁵⁷沈孙二人的文章皆企图以“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尤其是在革命派之间广泛流传来探索晚清国族建构的过程,并指出“黄帝”转变成“中华民族”的始祖为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提供一个文化符号。他们亦通过革命派与维新派之争(以孔子为纪年)来论辩两派之间国族形态之不同,即种族国族主义及文化国族主义。此外,王汎森也在〈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1996)与〈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1993)中借历史记忆的理论析述国族建构与历史召唤的关系。⁵⁸其中王汎森在〈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一文中,有部分触及章太炎的国粹思想面向,并指出其对国家建构的某些意义。他也分析道,章太炎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主义倡导者之一,是借用明清之际有关夷夏之辨论述以及召唤汉族历史作为建构近代民族主义的资源。他进而言道,“被压抑历史的复返,被压抑潜流的再现,或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记忆,形成了一种记忆资源,使得不少人对“国”的定义产生了变化,朝廷与国家被区分开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揭橥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建构性”的一面,使许多问题有了追问的可能。也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资源与历史叙述对中国国族起源的可能作用。在方法上,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与启发之处。

无论如何,在本论文撰写的近年中,有关国族主义研究渐多,相关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但是还未有研究者把国粹与各国字号对国家建构与民族主义之作用作考察。

第三节、研究途径、架构与资料

就质实而言,本论文所涉及的并非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如上述,关于国字号研究尽管不是完全阙如,但以一种全局性视角对各国字号做整体探索则明显欠缺。本论文以为,只有全局性的视角,才能理解各项国字号之间的相互关联,并理解它们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同一性。从以上研究梗概可知,目前的研究最多尽从单一领域的视角追索,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尽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因此显然的,有关国家与一系列国粹与“国字号”起源之间的整体关系之探索自有其价值。

3.1 论文的基本进路与着重点

诚如前述，本论文的基本题旨既然在于追问一系列“国”字头词汇发生的原因与意含，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关“起源学”（genetic method）的探讨。因此，本论文将尝试以起源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和求证过去。所谓“起源学”可归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主要从本质与根本的角度探讨现象发生与之所以得以存在的关键因素及其过程，尤其追问现象或事物最初发生以及之后持续存在的动力。易言之，本文将尝试捕捉近代中国文化国家化的根源，以及引发这现象的背后关键动力。就如斯特龙伯格（Roland N. Stromberg）在著述《西方现代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一书中所说的：“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⁵⁹他认为，思想史应该揭示思想发生的语境，显示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我们必须具备一种发生学的意识，把最具关键意义的时代特征、事件与思想言论加以贯通，点明它们之间的逻辑与因果关系。

近代中国语境自有其时代特征，因此中国“文化国家化”现象的形成自然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开来的。因此，要追溯各项国字号之形成过程，我们必须把它置放于晚清中国的特殊格局中加以考察。因是之故，我们首先必须追问他们所对应的语境是什么，而这个语境又为他们形成怎样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乃一种对所寻求解答的意向上的引导，它总是指向一些的基本问题。对当时关怀局势者而言，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社会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他们为基本问题而感到焦虑和冲动。问题意识的养成，可说取决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而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往往必须依靠一种时刻围绕着他们的氛围。那是一种直觉、一种对应与基本问题相关的一切问题和一切事物的敏感性。⁶⁰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各自的问题意识，许多思想与思索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本论文意在通过考察当时人的问题意识，以理解他们的忧虑以及对应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方案与进路。诚如章太炎在叙述为何反满时说，“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现有其事，则以此主义

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沔；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⁶¹显而易见，当下的问题是一个决定他们如何走一步的其中一大关键。不从此处着眼，就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他们的感受与所思所想了。有时问题之所在，其实就是答案之所在。本论文将尝试揭示当时人所疏理的中国基本问题以及问题意识。有时通过这些问题意识或能彰显从资料条文中难以显现的语境，它不仅有助于解开文本语结，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文本以外的实情与氛围，从而为深入一步理解历史的真实提供了密钥。

“国家建构”可以被理解为他们当下问题意识与对应其语境下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一系列“文化国家化运动”就不能仅从“思想论思想”或“学术论学术”，而必须看到学术以外的政治、社会思潮对这项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正如孟子所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作为一种研究进路，本论文拟把一系列“文化国家化”或“以国命名叙述”置放在近代国家观念形成及其背后变动的、与之交织着的“救国保种”基调的近代脉络与语境之中。毕竟对当时知识界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一一中国的命运，他们的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来。实际上，近代中国“文化国家化”现象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许许多多历史条件凑合下之产物，其中国家意识之形成及其脉络是最主要的。但是，本研究对中国近代国家意识及思想发展的来龙与去脉进行梳理，主要将从中国具体的思想史角度切入。⁶²这样一种考察，其意义在于庶几可求得较贴近中国历史的实况，并理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史上的动力，尤其是国族主义者的作用。理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可说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背后动力的重要法门。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国家”作为晚清时期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曾起了改变当时人的思考范畴，并重新规范了中国人对许多社会与政治的看法。⁶³所以可以这么说，此处国家意识之形成既是一种研究对象，也是一种切入方法。这意即在论述的过程中，本研究将以国家意识的发展作为线索，以追寻“以国命名”运动之兴起及其演进、阶段性发展之过程。

此外，本论文在考察国字号起源时，将从国粹运动始，这除了“国粹”作为一个较早出现的“国字号”原因之外，也是因为“国粹论”确曾

成一思想氛围。实际上，国粹论述的学术思想是一个繁杂的问题，其人物亦繁杂。必须交待的是，本论文不拟就此作概括性的研究，也不想面面俱到（毕竟正如前述，这方面已有著述），而只专题性的注重于国粹与国家建构的层面，以及其对国字号的影响。国粹运动一方面借用外国，尤其是其来源地日本的资源，在另一方面又大量发掘传统文化与历史，创造了大量的知识生产，包括一套救亡的民族国家建构、反满革命与面对欧化的论述，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繁复的思想资源。本论文拟试图勾划国粹论述中的共同基调与脉络，看一系列国字号的兴起。从国粹运动到国字号词族之间，确实可以看到许多两者相通、前后影响，甚至一脉相承的思路与发展。

必须一提的是，本论文既然以探索各国字号的起因与发展为目的，自然不得不探索各“国字词”的语义，而且这基本上是一种关键词的研究。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末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keyword)和语言学、语意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⁶⁴这是因为，任何思想和观念都必须依靠特定的语言和词汇来表述、演变和传播，所以在观念史的研究中，特别重视那些表述新思想和观念的词汇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出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之意义变化，以及如何传播并成为有其相对固定含意的普遍用语。⁶⁵

作为思想历史的论文，作者在论析上，则将持守历史学的方式，夹析夹叙。本文书写必须依靠许多报刊资料，因此将以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从史料出发的归纳法，钩残补阙，对分散、片段的有关各国字号的可见史料，进行了初步梳耙清理，见其脉络。在书写顺序上，本论文基本上采取时间线索，由1890年代几件影响中国的事件所引发的激荡与思想变迁开始，由亡国灭种忧患到国粹思潮的兴起，直至各国字号的发生，并描绘了它们步入民国之后的演变。

3.2 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架构的之参照及其问题

对于中国国族主义，虽然不宜迳从近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去推论，也不必以西方定义加以界定，但国族观念之出现毕竟是近代的现象，而且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我们要完全拒绝这一外来概念似乎没有必要，而

且终究还是避免不了必须借用其相关理论论析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起源，以及厘清其与文化的关系。实质上，从中国许多国族主义的提倡者之思想中可以看出，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其国族意识及其实践中，受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学理观念的影响很大，因此可以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寻找与西方语境中有关“国族主义”概念相呼应的地方。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语境及其特殊思路，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西方国家概念有其应用的限度，而且应以实际的具体情况出发。

大体上，本论文将会尝试参照及援引当今著名的国族主义研究大家，即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以及葛尔纳（Ernest Gellner）所著的《国族与国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有关国族的论析。⁶⁶依据葛尔纳，“国族主义”基本上是一项政治原则，主张政治与国族的组成单元，两者必须等同一致。事实上，不管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国家民族（state—nation），都根据民族与国家的契合，即民族必然组建国家，国家必须创建民族。安德森与葛尔纳都认为，国族与文化有极大的联系，国族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国族运动的提倡者喜欢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葛尔纳也指出：“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⁶⁷显然的，民族主义深深地依赖于传统主义，例如对共同过去的承认与建构等，可以说两者之间有著非常深层的纠结。在他们的理论下，要“建国”（nation—building），即意味着要重建文化（culture—rebuilding）。从国家理论言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文化牵涉到统一的语言与教育。这种强调文化与国家的叠合性与纠葛对本研究有极大的意义，因为本研究正是欲呈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文化国家化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应用西方现代国家理论之必要还在于它能提供一个参照中国的近代国族主义之过渡与演变的系统。一般的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之定义有二：一是民族的，一是文化的。⁶⁸一般的说法是在接受西方有关国族主义之影响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无疑是

属于文化意含的，也就是所谓的“天下观”。中国是作为天下的中心而存在。然而，在接受现代化之挑战时，王朝中国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转化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⁶⁹学界一般都认为，这种现代式民族主义之转变先起于1890年代戊戌维新之时。因此本论文就必须以现代的国家观念与建构之定义相对于传统的文化主义，以说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如何过渡，如此方能掌握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可能存在的某些内在逻辑。

除此之外，霍布斯邦（Hobsbawm）在其所编著的一本关于民族主义著作《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些关于“民族”的内容，人们于是开始寻找定义民族的“传统”，不论是从既有中寻找，或召唤过去，还是重新建立，都是一种“传统的发明”。⁷⁰因此作者也认为，民族主义之出现要早于“民族”的建立，因为并非“民族”创造了“国家”（state）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这一理论或许可助于疏理中国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文化主义”国家，因此传统文化的作用可能会特别显著，尤其是“文化国家化运动”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地位与角色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除了事关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之外，更与传统文化认同有关。在中国近代的语境下，由于传统文化备受冲击，一种将传统文化置放于国家名誉之下作为一种防卫方式更是加重了这项国家建构工程的复杂性。因此，通过这样的理论参照，以厘清文化在国家主义建构中的意涵与地位，或许能够更深层的理解国粹运动以及文化国家化被提倡的复杂过程。

3.3 研究材料之应用

本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主要有（一）有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之文献，（二）有关当时“国字号”提倡者之言论，以及（三）有关现代国家与国族研究之理论，以作参照。大体上，前二种资料主要来自清末民初主要刊物，包括专业性杂志以及相关人物之言论，这也是本研究基本立论之基础所在。前者主要包括维新派的《新民丛刊》、国粹派的《国粹

学报》、革命派的《民报》、《警钟日报》、《浙江潮》及《政艺丛书》以及其他如《东方杂志》、《中国新报》、《游学译编》等。至于专业性刊物与文献，本论文既然也专注于个别专业领域圈子如国乐、语文、学术界之言论，那么这些领域之杂志也是另一主要资料来源。例如有关国医的文献《绍兴医学报》、《神州医药学报》等。后者则主要是国族主义提倡者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言论集，这些也是另一重要的资料来源。另外，与此课题相联系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之论著也是本论文必须考察的资料以及参照之一。这里头则又包括了一般的相关理论以及直接具体针对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论析。

在资料所涵盖的时段上，自然是以本论文所这定下的期限为界，即着重于 1890 年至 1928 年这 38 年的相关言论或活动之资料。

第四节、问题与范畴的界定与设限：

以上大约提出了本论文的主要问题与研究进路之后，为了更严谨的解答与把握所提出问题的对象、性质、分析范畴、年限及其与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保障本论文之讨论在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下展开和进行，我们还必须对所提出的问题提出明确的界定与限制。在另一方面，这样也能确定本论文结论与观点的时效性与时空性。

4.1 国族 / 国家观念之定义

为了清楚本文中心问题，其界定先从“国家”和“民族”来具体说明。事实上，诚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民族 / 国族主义是一个繁复与充满不确定的概念，时至今日基本上仍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难怪乎有人称民族主义研究为“术语密林”。⁷¹因此本论文自然必须最先面对国族与现代国家定义的问题。

追本溯源，国族或民族 (nation) 并非汉家故物，而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从外国辗转翻译而来的。因此，这种中西文化的跨语际 (translingual) 词汇无可避免导致语意上的繁复，其意义也自然蕴含了极为混杂的意蕴。事实上，“国家”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它往往

指向“朝廷”。⁷²因此在谈论“民族”或“国家”主义这些关键词之时，本论文注重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特定价值与意义的现代政治概念。

一般而言，英文的“nation”一词不仅可意指中文的“国家”（即英文的同义词state或country），也可指中文的“民族”（即英文的同义词people, tribe, 或甚至ethnicity）。因此，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所用的“nation”概念，其涵义常常是指一个民族造就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国家造就一个民族。当一个民族建立了自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并具有明确的疆域主权领土的时候，亦可被理解为“nation-state”（民族国家）。⁷³易言之，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实体，因此西方把“民族”和“国家”合为“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有人把这称为“三位一体”。⁷⁴因此，“nation”（民族国家）的定义可以指为“基于共同祖先语言、或历史的民族组成的领土国家”。而所谓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反之亦然，民族国家即现代国家。

据刘禾的说法，英文“nationalism”最早的汉译有两种，即“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⁷⁵其实，这两个译法分而言之，则有失片面，但合而言之，却能勾划出其两面性之意义。民族国家是相对于分立的地方自治政权、君主国及一切形形色色的古代的或现代的专制国家而言的。实际上，民族国家更是世界与国际秩序的基础。本研究所指陈的“国家”/“国族”（nation）即是指“民族”与“国家”之相联体。因此，这里也必须顺带强调的是，“国家”在本文的脉络里，不是纯粹指“state”（国家机关）——一种具权力的机体。

由于“nation”一词的含混，中文里头有者译之为“民族”或“国家”，本论文则尽可能将之统称为“国族”，因为它比较能表现出“nation”一词的繁复性，意即指谓“国家”与“民族”的统合性单位。但在具体文脉需要时，还是会使用“民族”与“国家”一词，而其所指涉的意含大体是一样的。

4.2 问题的界定与时限

必须言明的是，由于受限于作者个人之视野与资料，本论文只集中讨论诸如“国粹”、“国学”、“国医”、“国术”、“国文”、“国画”

以及“国语”等几个国字词汇，以窥视一系列“以国为名”的国族建构运动之来龙与去脉。本研究把这一系列的现象统称为“国家化现象”，主要是指由于国家意识之作用下，尝试以国家为单位来定义“文化”。简言之，这一过程是要使相关文化领域成为“中国的”。因此必须再作区别的是，明显的，这里的“国家化”不是指向“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器”（state）之干涉的问题。而之所以是指是“文化”的国家化乃因为“国粹”等国字词汇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涵盖了固有的传统文化，以及一切被认为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因此，本研究只专注于文化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不涉及其它如国民、国土、国旗、国花、国权、国货，甚至国耻等纯政治或经济概念的命名之研究。

从历史时段上看，本研究尝试截取的是中国现代性建制过程中一个特殊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本研究的断限起自 1890 年，尤其着重于 1895 年甲午战争前后，并基本上终于 1928 年南京政府之成立及其民族主义文化政策之揭橥之时。在所覆盖的时间起点上，那段时间恰好是民族/国家观念风行，而“国家”二字开始流行之时。依照现有的中国国族主义研究的一般的说法，“国族”或“民族”这个新词得以传播的关键年代大约起于 1895—1900 年间。⁷⁶张灏也认为，中国现代式民族主义首见于 1890 年代戊戌维新的一代。⁷⁷再根据王尔敏的研究，“保国会”的成立（1898 年）标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字认识的成熟。⁷⁸一切国字号之出现似乎是伴随着于国家意识兴盛而来的，它们之间可说是一形一影的关系。因此，1890 年代作为上限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而作为一种起源学的探讨，本论文之探讨国字号运动兴起之时，特别著重于其“从无到有”的转折期，乃至其稳定化之时，但至于比较后来的发展，则非本研究所能兼顾，尤其在 1928 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并成立南京政府以后，文化国家化更严重的涉及到政府政策以及对文化之利用，⁷⁹这已经不是思想史的范畴，而是政策之实行与党派之斗争了。这也就是说，本论文比较关注在思想史的范畴内，即知识界及相关领域人士之思想及观念演变，而不涉及实际的政治运作的追踪。这有别于一般的民族国家建构之研究，即皆著重于国家机关对文化的主动与干预。

概括的说，在此段时间之内，本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一）1890—1911，清末时期，尤其经历甲午战败之后：主要探讨亡国忧患与国家意识形成之间的纠葛，以及国粹与其他国字号的确立与形成。（二）1912—1928，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政府时期至迁都南京期间，有关国粹概念之转变与国字号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必须交待的是，尽管本论文把国粹运动与国字号的发展之研究下限定在 1928 年，却并不意味着这个发展的意涵与影响就此为止，但这已非本论文所能概括的了。

¹钱穆：《国学概论》（193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

²与钱穆一样对“国学”一词訾议者其实大有人在。晚清提倡“国粹”最力者章太炎（1869—1936）之弟子曹聚仁也曾经批评道，“‘国学’这名词，仔细考校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有人称之为‘国粹’，章太炎师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便是谈中国学术的专著。我曾称之为‘国故学’，也曾为国内学人所共许”。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局，1995（1986），页3-4。

³信手拈来，北大早在1922年成立“国学门”，清华亦于翌年创办“国学门”。至今，一些大学中文系还授“国学概论”一科，以《国学概论》命名之专书更是不胜枚举，许多称谓如“国术学会”、“国画班”等等也依旧存在。

⁴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其二，1902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据说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師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这在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1905年以后。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1903年已经成立。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1. 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本世纪初的事。2. 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变化的影响。详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刊于《历史研究》，1996年5期，页30-31。

⁵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1906年。

⁶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光绪癸卯《政艺丛书》上篇，《政学文编》卷七。

⁷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⁸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

⁹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160、294。

¹⁰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见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1, Part 2, 1965年。

¹¹同上，页100。

¹²黄节：〈国粹学报叙〉。

¹³由此引申，清末民初遂有“音乐救国”、“武术救国”、“小说救国”等以文化救国的概念与口号之涌现。此处实含有极为丰饶而深刻的意蕴，其之所以如此，背后就是国家与文化的深刻纠葛。

¹⁴例如一些学者就发现战争和冲突与国家建构的关系。维克多·李·伯克指出，推动着欧洲国家建设的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内部动因，还有这些动因与各种冲突的相互作用。由于各种冲突向内部转化，促进了国家内部制度、结构的发展。

（见氏著、王晋新译：《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局，2006年）

¹⁵许地山：《国粹与国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66年，页165。

¹⁶梁启超：〈国性篇〉，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152。

¹⁷王一方、邱鸿钟（对话）：〈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载《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20卷第3期，页47-50。

¹⁸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至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27-29。

¹⁹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33-144。

²⁰所谓“新保守主义”涵盖了“新国学运动”，许多过去被认为是持有文化保守态度的学人与学派多相继被学术界重视，如“陈寅恪热”、学衡派研究等。这方面的趋势，可参阅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²¹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²²杨天石：〈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载《新建设》，1965年2期。亦载氏著：《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上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页300-318。

²³胡逢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²⁴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页1-6。

²⁵萧琼瑶：《清末民初国粹思想研究——以国粹学报为中心》，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6月。

²⁶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论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2期，页1-15。

²⁷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有见人大书报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0年第12期。

²⁸王东杰：〈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1期。另一篇是《欧风美雨中的国学保存会》，收于《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

²⁹刘贵福：〈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1860-1880。

³⁰如章太炎研究中著称者计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1992年版），南社史研究的有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学术史的有左玉河：〈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识体系尝试〉，（收于郑大华、邹小站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页214-252）等等，此不长赘。

³¹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局，2003年。

³²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刊于《历史研究》，1996年5期，页30—45），《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³³黄绣媛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于《白沙人文社会学报》创刊号，2002年10月，Journal of Pai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1, October 2002, pp. 317-378。

³⁴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³⁵Martin Bernal, 〈刘师培与国粹运动〉，同上注。

³⁶Laurence A. Schneider,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同上。

³⁷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³⁸转引自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年，页67。

³⁹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3年。

⁴⁰如史颖君：《我国国语运动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1月）、柳明奎：《中国国语运动发展史》（台湾师大国文所硕士论文，1961年6月）以及卓文义：《民初之国语运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年）。

⁴¹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中国现代绘画评论》，山西：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页54—57。

⁴²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65-196。

⁴³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217。

⁴⁴朱维铮：〈清末的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页 200。

⁴⁵见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刊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 年 4 月号，总第 70 期，页 35。

⁴⁶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⁴⁷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均收于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 年版。）

⁴⁸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收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 227。

⁴⁹张汝伦：〈救国与建国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页 109—244。

⁵⁰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任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1980 年）

⁵¹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页 76。

⁵²孙隆基：〈从“天下”到“国家”——戊戌维新一代的世界观〉，《二十一世纪》，1998 年 4 月号，页 33-40。

⁵³Pamela Kyle Crossley, “Chaos and Civilization: Imperial Sources of Post-Imperial Model of The Polity”, 《思与言》，第 36 卷，第 1 期，1998 年 3 月，页 119-190。

⁵⁴见方维规：〈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收于陆晓光主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页 561。

⁵⁵同上。

⁵⁶有关活动论文后来分别刊于《思与言》杂志 1996 年 9 月的“文化想象与国族建构”专题，以及 1998 年 3 月的“发明过去，想象未来：清末民初的国族建构”专题。

⁵⁷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8 期，1997 年 12 月，页 1—77）、〈振大汉之天声——民族

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33期，2000年6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3期，页68-79）。

⁵⁸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刊于《当代》，第91期，1993年，页40-49）〈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1996年8月，页1-18）。

⁵⁹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翻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页5-7。

⁶⁰参阅汪丁丁：〈学术中心何处寻〉，《读书》，1997年7月，页38-42。

⁶¹章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21期，1908年。

⁶²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4-75。

⁶³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58。

⁶⁴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总第295期，2005年第5期，页90。

⁶⁵例如1958年，Raymond Williams通过对“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等五个关键词在1780至1950年这170年间意义的考察，来分析英国现代文化的变迁。又如在1973年，Steven Lukes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专题研究，讨论这个词是如何在十九世纪出现，它在英国、德国以及英美世界的不同含意，或些微的差异，由此揭示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个人和个人主义是怎样形成的。详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页89-101。

⁶⁶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中文版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年）。葛尔纳（Ernest Gellner）著、李金梅，黄俊龙译：《国族与国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台北：联经出版，2001年）。

⁶⁷葛尔纳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黄俊龙译：《国族与国族主义》。

⁶⁸罗滋 (Jessie G. Lutz)：〈中国民族主义与 1920 年代之反基督教运动〉，刊于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集，台北：联经，1981 (1990)，页 211。

⁶⁹同上。

⁷⁰Hobsbawm, E.,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Ranger, T. and Hobsbawm, E. e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 中文版见霍布斯邦编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页 17。

⁷¹Benjamin Akzin, *State and Nation*, London, 1964, pp.7-10. 引自方维规：〈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页 576。

⁷²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 3 卷，页 160。

⁷³方维规：〈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页 35。

⁷⁴同上。

⁷⁵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局，1999 年，页 214。亦见 Lydia He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⁷⁶方维规：〈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页 561。

⁷⁷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96. 不过，根据孙隆基的看法，1890 年代的所谓“民族主义”仍大半为“天下主义”阴影所笼罩。而且，传统的天下主义也并非纯净，它大半属于理论和仪礼层次，落实在现实层次时，操作的弹性颇大。然而，孙隆基此看法也仍没有否定 1890 年代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关键过渡期。见孙隆基：〈从“天下”到“国家”——戊戌维新一代的世界观〉，页 33。

⁷⁸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页 227。

⁷⁹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名民政府即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文化道统被用来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依据。蒋介石在1929年就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蒋介石的逻辑是要把国粹国有化，才能保持固有文化的现代向心力，并为国民党寻得立足合法性。实际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传统文化国家化运动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二章：

亡国、亡天下之辩： 晚清国家意识形成中的国粹论及其起源

翻开 1906 年杪的《中国新报》创刊号，先映入读者眼帘的竟是一张中国地图画。地图上描绘了众多飞禽猛兽在中国领土边界或上空盘旋，或虎视眈眈地伺机而动。一只英国狮正准备跨越中印边界，中越边境则有一只法国虎，中国北端上空则出现俄国鹰，另一只德国狼在山东胶州登岸，日本龙则出没于东海，南中国海上则是美国……总之不一而足。¹这幅画其实颇具代表性，在相当程度上活现了清末中国知识界对外敌环伺的现实紧张以及担心祖国即将被豆剖瓜分而灭亡的焦虑。

第一节：“亡国灭种”论述下之思想变迁及其问题意识

大体上，晚清末年可说是一个巨大转折的年代，对当时人而言，那是一个事关国家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翻阅当时的报刊资料与论著，讨论中国“所以自存”的言说处处散见，蔚为一股使人额外沉重的亡国灭种论述。²晚清的志士们不管是厕身于哪一个政治集团对此具有共识，都异口同声的呼唤亡国之危，希望激起人们救国图存的自觉。危亡论的压力促使他们上下而求索，为中国的出路殚思竭虑。在此种历史语境之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即：究竟如何始能维持中国于不倒，不论是政治上或文化上，或对内与对外。然而，究竟要开什么药方或要透过怎样的途径，始能解决此一“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要如何解决“中国问题”，成了知识界公共讨论之重心所在。

这种当时人心理定势是我们首先必须要加以考察与揭示的，因为就是这样的历史语境导引出往后许多促使政治与文化变迁的历史动力，包括

本论文所关注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以及“文化国家化”与国粹论述之发生。本章希望通过观察当时言论以理解这股清末兴起的亡国论述及其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以探究“国粹”概念或词句是出现在何种知识论述语境之中，并理解这个言说与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变局又存有怎样的因果关联。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个人立场之抉择，而是一个历史时代意识如何成形的问題。除了直接讨论“国粹”这宽泛宏大的问题外，我们可以跳出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即“国粹的叙述”本身。我们可以考察，国粹的叙述是如何构成的、发展的，它又与当时的各种知识界的话语系着何种关联。正如我们无法舍弃历史叙述直接研究历史一样，我们也无法不先探讨关于“国粹的叙述”去直接讨论“国粹”本身。本文将尝试证示“国粹论述”不是孤立与突地而起的现象，而是晚清知识界众多救国论述中的一部分。就是此众多论述之“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果”，而这个语境也决定了它的核心性质。

1. 1 亡国灭种与国家意识之形成

张之洞于 1898 年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曾有这样的观照，“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³梁启超则于 1902 年观察到：“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乎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⁴既然申言保国保种，其另一面无疑揭示了中国就快要“亡国灭种”了。因此，“保国保种”之论自然夹杂着“亡国灭种”之论。从他们的言论可推知，大约自 1890 年代开始，亡国之忧患意识已笼罩知识界。证诸于斑斑史实，那个年代确也危机重重，1894 至 95 年间正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跟一向被视为倭国的日本之战中败阵。这场惨败所引发的震惊与忧患之大之深，已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了，士子们的问题意识也因此而来。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的变政运动正式揭开，孙中山的反满革命起义自是开始，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自是转急。⁵据郭廷以的看法，中国近代危机虽自 1840 年代的鸦片战争始，但从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为 15 年，自英法联军之役至日军初次侵台亦为 15 年，自日军初次侵台，中经马嘉理事件、伊犁交涉以至中法战争约 9 年，自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亦为 9

年，其间中国多少尚有喘息苟延的时刻。但是中日战后，情势急转直下，外来的凶猛压力，跟踪而知，片刻未弛，真可谓危急存亡之秋。首先各国对战后巨额赔款的贷款都要争一杯羹，俄德英美各国也要求利益的分给，中国面临了“被瓜分”的危机。⁶从这个意义上讲，1895年加重了知识界的亡国意识。甲午战败不及三年，继之以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告终，随后1900年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又攻入京城。芮玛丽（Mary Wright）曾就此指出，1900年是中国二十世纪一连串革命的起点，深刻的点出了那个年代的异常氛围及其重要性。⁷孙中山也曾经说过，庚子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⁸

简言之，清朝的最后关头，由于甲午战败至庚子事变，短短几年内大事迭起，中国知识界确正如生在其时的张之洞与梁启超所言，一股漫天盖地而澎湃的亡国灭种忧思之氛围正在笼罩着。胡思敬《审国病书》第六页中曾经说，“中国不受甲午之辱，则康梁邪说不足以惑众，而戊戌之变可弭，戊戌政变不作，则德宗不至于失势，端邸不至擅权，而庚子之祸可弭，”⁹即已点出了1895年对日战败的作用。这些社会变化实已使知识界的思想超出了旧思维框架，旧思维再无法把握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与士子的需要。此一转向的终向张灏有很好的归纳，他指出，自1895年以来产生的很多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这些思潮都带着浓厚的群体意识，期望把中国自此一危机中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着一个未来的中国，并追寻通向那目标的途径”，而这种意识表现为一个三重结构上(tripartite structure)，即危机意识、瞩望目标和实现途径。¹⁰这相当深刻的概括了“亡国灭种”危机所造成的心理结果。此三重结构相互关联，而且是先后阶段顺序的。一个人面对的压力越大，动力也可能越大，一个群体同样如此。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激起他们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目标，把实现途径确立为追求一个新的国家上。

除了一系列客观危机的触发之外，在思想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90年代流通于中国，并广泛为知识界所信仰，对“亡国灭种”论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严复即着手翻译赫胥黎的

《天演论》，系统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该书于 1898 年春出版，很快就风行全中国，严复在注释中异常注重“种族”的群体建构，而没有传播达尔文的个人化观点，¹¹因此强调种族竞争的“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警语一时成为有识之士议论的中心话题，而进化论思想亦成为同一年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着的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¹²社会达尔文进化论之所以可以造成深入人心之影响，主要是因为该书所含载的问题意识与“自强保种”直接相关，¹³它所揭橥的生存斗争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当时的思想情境与心理背景。“自强保种”思想之发生还与西方人类学的传播有关。由于人类学知识的增进，当时中国知识界已经知道人种的分类，这一方面打破了他们传统的中国之外为“四夷”的观念，从中获得新的世界观。在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进化论所谓的“天演公理”的警惕下，大大加重了中国人对人种竞争的恐惧。唐才常在 1897 年发表的《各国种类考》中指出，各人种之间的差别是天生性的，而白种人是诸人种中最优秀者，那么从天演公理上讲，黄种人改进的唯一出路是与白种人“合种”、“通种”。¹⁴同时，在《天演论》风行的同一年，经学家皮锡瑞于湖南长沙“南学会”开讲时也强调道：“世界人类分为黄、白、红、黑四种，彼此争竞，而红种、黑种之人，野蛮无识，为白种人剪灭殆尽，中国黄种之人，虽有聪明才智，不遜白种，乃未能讲求开通，致为西人凌逼，‘将有灭种灭教之惧’”。¹⁵这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灭种的忧虑。

与此同时，也就在这一年，具代表性的、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一代则成立具有准政党形式的“保国会”，其宗旨明确意指“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则从“国”的角度揭示救亡之重要性。¹⁶当时梁启超个人也认为国家正处于灭亡的边沿，他在甲午战败之后所写〈京师强学会序〉中说道，“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¹⁷即便到了 1910 年的革命前夕，梁启超仍然有如此的感观：“比年以来，一种悲观论弥漫于国中，其稍有知觉之士，日惟相对歔虚欠，谓国必亡。”¹⁸他甚至为此忧虑，指陈“国所以亡者，非有他故，则举国人咸曰国必亡、国必亡之一种心理为之耳”。¹⁹由此可知，这种亡国忧患似乎是晚清知识分子心中切实的感受。最让人深深感慨的莫过于 1905 年 12 月

8 日陈天华蹈海前的“绝命书”所透露的浓烈的亡国忧思：“中国去亡之期，即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以后，曷若于今日死去，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²⁰在其时，许多有关朝鲜、波兰、印度等国的亡国史和意大利等国复兴的史迹也在晚清的各种文字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重述。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在当时人的眼中，他们是以上述的“人种竞争”（灭种）与“国家存亡”（亡国）来看待这个眼前的危机。尽管我们已经无法查证何人最早开始使用“亡国灭种”一词，但此词即已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 1895 年之后中国士子最常用以沉喻国家的危机。它甚至可能已成为当时一种社会群体性的论述与一种特殊心理。这“亡国灭种”论述下的“种族”观，根据冯客的研究显示，在 1903 年始，是一种作为“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种族”。²¹易言之，“亡国灭种”一词里的“国”、“种”并置，就说明了两者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社会进化论促进了一种种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而这个“种族”与“国家”（nation）是叠合的，这有助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主义的兴起。1895 年严复在《原强》中即说：“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²²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了。可以这么说，这股“亡国灭种”忧思其实昭示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广泛的根本性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意味着社会结构演变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如对“国家”形态的思考上。

当时序进入二十世纪初年之后，尤其在历经庚子事变之后，在各种历史因素及力量的持续交错发展下，亡国灭种之忧有增无减。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式学堂、学会和报刊之大量出现，知识分子们更具言论空间，他们的“亡国灭种”忧患顿时更易于成为一种时代叙述。到了 1903 年前后，“亡国论述”达到一个新的高潮。²³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比较具体的剖析这些“亡国论述”之内涵，以窥得其形态与意义何在。在刊于 1901 年的《中国灭亡论》一文里，一位作者特专论中国已经亡国在即，作者认为，“然吾窃闻今日之亡国者，有新例焉。向之亡人国者，必占其地，虏其君，戮其臣而后已；今之亡人国者，则有其地而弗守，即以其君若臣守之。其所以然者何也？骤占其地，其民为必服，而治之甚难，故不

如以土人守之。……”。²⁴作者进而论道，“且国之所以立赖有一定不移完全无缺之疆域。……中国则不然，不唯旅大胶威台澳香广险要之港湾，已为异族所宰割且举所谓满洲发祥之地，亦拱手而让之俄”。列强之割据已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作者因此以为，这些列强将在这些根据地进而并吞中国各区，“斯时吾国人士，殆骇然知吾国之亡；而岂知有形之亡亡于瓜分，无形之亡亡于今日。”²⁵1904年，《东方杂志》编者在面对日俄在中国本土为了东北利益而开战时写了〈辩亡篇〉，深刻显现了当时人的无奈与困顿。他在文中认为，不论日本还是俄国胜利，对中国的前途都不好，俄国胜则“中国不免于瓜分”，日本胜则“中国乃受其保护”，“夫瓜分固极惨之事，而保护尤伤心之语”，不知道四万万中国人将怎么存活，真是“悲哉悲哉！”。²⁶

在此亡国忧论述之中，其中有一本刊物以“杜鹃之啼哭声”来命名，就份外使人深沉。该刊物名为《鹃声》，于1907年为四川人所办。在〈说鹃声〉一文中，作者山河子弟说到，“我们这个报取鹃声的意思，原来是望我们四川人，听了鹃声二字，就想起了亡国的惨历史……”，并“欲效啼鹃，把以上所说这些事情（指过去被的惨痛史），及如何造成新国家，救我们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说出来。……古人有两句诗云，‘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²⁷《国民报》也出现了另一篇名为《亡国篇》的文章。顾名思义，作者也同样认为中国正面对危亡之际，所不同者则是作者更进一步认为，支那早已亡于两百年前，即满清推翻明朝始。这是立论于汉民族主义之上的，因此作者批评道，“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彼白人之视我也则曰支那。支那之国何在矣，而彼之所谓支那国者则清国也。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汉种冒之乎！吾怪夫今之所谓保国者也，腆然曰我中国我中国，又曰中国将亡我将保之，又曰中国将为印度、波兰。夫中国之为印度、波兰，二百年于兹矣。”²⁸故此，作者反而希望支那（即清国）真的灭亡，因为唯有如此，汉人之中国才有希望光复。²⁹这两篇文章除了深寓沉重的亡国忧之外，重要的是也提到“造成新国家”、“无国”、“光复”之言，这已经透露了在亡国忧之中所夹杂着的新的国家意识。但更重要的讯息是，此处显示了1903年前后的“亡国论述”之转向：它们所指之“国”乃“汉

族”之“国”，而且“国”老早已为外族“满人”所灭。也就是说，“国”与“朝廷”（清廷）已分，这客观上为“国粹论”开了契机与接榫的语境，这点下文将再论及。

所谓“汉民族国家早已亡于清兵之说”其实是属于革命派的典型论述。作为革命派喉舌报的《民报》即坚持其“光复汉人中国之政权”的排满立场。孙中山在《民报》第10期的论说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指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那里？政权在那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³⁰革命党人刘师培、陶成章亦分别于1904年鼓吹：“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人”，³¹“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谁是中国人，是汉人种。中国的历史是汉人的历史”；³²他们立志于“驱除鞑虏”、“反清复国”，不仅是在打倒一个旧王朝，而且是在恢复或建设一个新的汉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革命派从明末顾炎武等人处吸取资源，把宣传“夷夏之防”、“华戎之辨”作为提倡革命的核心。以章太炎为例，如他自己所说的：“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位先生的话，却没有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³³因此国族主义的源头确可直溯明末顾炎武、黄羲之等人的“夷夏之辨”。

顾炎武等人的政治思维是：中国历史上凡汉人当权，谓之国兴；夷族当权，谓之国亡；复兴中国，匹夫有责。这显然意在反清。革命派也认为，“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³⁴与此同时，前述的人类学知识之兴起，也为革命党人所借用，作为排满种族革命的“科学”理据。³⁵邹容于1903年为宣传革命而被捕杀之前所著述也有相同的论调，即此之故：

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近世革新家、热心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于是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神州等词，腾跃纸上。邹容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病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已为波兰、印度于满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而犹曰“将为也”。何故？请与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贼满人，贼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美等国乎？苟如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呜呼！明崇贞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³⁶

《革命军》也呼吁，“革命比剖清人种”，因为邹容认为，亚洲黄种人可分为两种，即中国人种（汉族、西藏、交趾支那人）和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而汉族属于前者，属于通古斯族种的满族则是后者。实际上，邹容的人种分类法，正是当时人类学的普遍说法。³⁷看来，“革命”经人类学知识之推衍下，已与“排满”等同起来了。综上所述，这里很清楚显示，汉种族与汉国家已经合二为一，所谓的“亡国”中的“国”已经明确指向汉种族国家了。

1.2 我者（国）、它者（国）与国家符号

无论如何，不管何时亡国，有关“亡国灭种”的论述，几乎为每个晚清志士所赞成，只是针对何时亡国则它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前面所引维新派的梁启超即认为“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对于

主张驱逐满人的革命派而言，则其亡国论述追溯自明朝的灭亡。但在维新派而言，则斯时才是面对亡国的真正时刻，因此他们提倡的是“政治改革”，而非“反满”。对于此问题，梁启超在 1906 年与《民报》论争时指出：国民、领土与主权为国家组成的三大要素，而“我中国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因此满清继明朝而起只是政权之转移，中国并未亡国。梁以为，依此标准而言，满洲于明代隶属建州卫，清太祖努尔哈赤并曾受龙虎将军之封号，则满洲族人，确为明之臣民，亦即是中国之臣民；而清之代明，只能说是国民内部政权之转移，断不可谓为以一国家踣踣一国家也。³⁸次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重复梁启超的说法，再度强调：

满洲之地，皆为明之属地，满族实为定居中国领土上之人民，其与汉族，盖属同国异种；故清之亡明，犹汉之灭秦、唐之代隋，不过一朝一姓之转移，而与中国国家之存亡毫无关系焉。³⁹

梁启超、杨度等人都是主张君主立宪制，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都尝试从历史上寻找证据，以证明满洲人向为中国国民之一部分。所谓亡国于两百多年前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了。

但不论是革命派的论述也好，维新派的叙述也好，当然都是有感而发，直接指向他们置身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急气氛，而各自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方案的根据。同时，这些说法也清楚地道出了他们对中国存在危机的基本理解。但在实际与辩证上，担心“亡国”意味着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关怀的对象，而且犹如前述，“国”与“种”在“亡国灭种”的论述中已被加以强调，这里意味着国家意识的萌芽与涌现。换句话说，亡国与保国思潮使士人们发现了自身国家的认同与生命共同体之存在。前面已提到的，康派于 1898 年 4 月在北京所办的保国会，其章程以“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之为要旨，其中便把保国定义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把保种定义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⁴⁰这基本上已经符合现代国家的组成条件，根据王尔敏的研究，“保国会”的成立即标示着晚清知识

分子对“国”字认识的成熟。⁴¹郭廷以也指出，庚子事变之后，“中国大梦将醒，已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觉悟”。⁴²实际上，研究者都注意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因此在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这种亡国与保国、亡种与保种意识之益加激烈，即鲜明的告示了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出现与强化。因此，中国的民族国家观是一种外发式的，而且是一种危机意识下激发出来的“反弹式”观念。简言之，国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因素甚多，也有诸多不同的源流，但其中首要者当归中国危机中的保国意识之作用，而这种意识在甲午战败的若干年里已蔚成大势。⁴³梁漱溟先生就曾把中国之缺乏国家意识归咎于中国长久以来受四夷所围而“缺乏国际对抗性”。⁴⁴这与王尔敏上述从主权（sovereignty）的观念之视角来探讨中国国家意识生成所的结论一致。王认为，主要就是外在的西方刺激，导致内在的保国意识之出现，进而促使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间的兴起。⁴⁵尽管每一个人在何时何地都会具有某种模糊的身份意识，但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才会形成明显的、迫切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许多社会学研究都显示，一个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往往正需要一个或多个假象或真正的敌人（反满或反西方列强）作为一个敌体为其催化剂与促进剂。

从历史角度而言，许多学者业已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国家的观念，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就认为：

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⁴⁶

国家观念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的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这种不是以民族为国家界限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充充其量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而且王朝的合法性

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⁴⁷因此，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于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曾说：

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无甯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⁴⁸

据笔者个人从当时报刊资料中所见，甚至当时一位日本人也有相同的看法：“然彼国（指中国）开港八十余年与欧美各国相接触，似不知今世国家之意义者。其醉梦沉酣无可比拟。今欲其得改革之正鹄，善邻如日本者似不能不略尽劝导之义务。”⁴⁹

诚然，就是由于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中国人才直面外面的异质世界，产生了对现代世界弱肉强食的规律的认识，国家成为一种思考对象，天下意识逐渐淡化，才产生了“国家”的自觉以及“改变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想象和知识。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中国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在列强入侵打破了中国中心观，条约制度取代朝贡体系，天朝帝国体系日益崩溃的背景下，具有平等国际法地位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形象才为敏感的士人所得见。梁启超对此有即时的观照，1899年梁启超写道：“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因此，“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⁵⁰到了1901年，梁在《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中更明确及系统的揭橥了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作为解救中国的方法之一。这种基本的立场基本上被当时的知识界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思考的定式。在当时有志之士眼中，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面临着被肢解、被摧毁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

危机所在。因此他们明确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号召为保卫中国而战。梁氏上述论文之重要性，长久以来都受到重视，并已被广为引用，但它确实重要，仍值得在此引述，即“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者，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者，国之独立”。而梁认为，中国事实上还不是“国家”，因为“凡国而未经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在梁看来，18、19世纪之交乃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中国对外不能竞争，国势阨隘的根由是在于欧美列强挟其“民族帝国主义”，竭全民族及全国民之全能力以临我，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中国苟欲抵御列强侵袭，“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一途可循。⁵¹在其1902年未完稿的《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借孔觉民的话说：“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须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袭，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⁵²

在《国粹学报》未创办之前，邓实等人主编的《政艺通报》即已响应此思潮，积极提倡民族主义与建立民族国家，作为国家富强的具体方案。它认为，欧美列强立国之本即在于民族主义，也只有如此始能立足于竞争的世界。它警告说，“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民族主义时代之竞争在政治，帝国主义时代之竞争在经济。虽然民族主义者，膨胀主义也，其实力既充于内，不得不溢于外。故其初也，愤君主之专制，人民权利之失坠，则奉此主义，与君相相争于内部；其继也，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既定，人人享平等，得自由，则奉此主义与他族相争于外部。于是有所谓殖民政略矣，有所谓工商铁路，教会政略矣”。它进而建议以中国民族主义来抵抗，“悲夫，我国正处此剧场，非竞争何以图存，非进取无以保守，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⁵³1904年，《警钟日报》的社说中有一句话足以说明1900年代民族主义之风潮正在云涌：“以今日一般志士之所苦口称述，莫不曰民族主义矣”。⁵⁴

简而言之，世纪交替的亡国灭种忧，即标示着国家意识骤然抬头，它成为一种救亡的工具。许多学者大致上都已经认可，抵抗外侮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源之一。⁵⁵当士子们意识到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与行

民族主义的西方列国在近代相遇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战”败了。人们对胜负进行各种评说，可以例举各种因素，如技术的、战略的、战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即一个天下主义的文化必然要败在民族主义文化手下。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头十年就曾被当时留日学生视为种族生存的钥匙，⁵⁶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述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中心地位。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针对西方殖民主义而建构“中华民族”。伯林曾指出，“民族主义首先是受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不过这虽然是民族主义肯定自身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⁵⁷他认为，这还需要一种新观念，即新的认同中心，以把社会各分子凝聚与重新组合一起来。⁵⁸换言之，民族主义之养成正需要诸如历史过去与民族文化作为凝聚的工具，这便是传统文化与国粹之提倡的有利背景。

既然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现代国家观念，也把国家观念作为拯救国家的主要进路之一，自然难免事事以西方国家形态来观照祖国。亡国之忧是此国家意识出现后所折射的一面，但吊诡的是其另一面相则是有些士子们蓦然发现自己的“无国”。这其实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与对比之下的发现。⁵⁹中国固有的天下观确实没有鲜明的国家色彩，比如只有朝名，没有国名即是一例。晚清以降，“无国”的伤怀与“亡国”的恐惧同为中国政治论说的基调。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去，梁启超可说是清末兴起的“无国”之叹始作俑者。这里必须指出，不管梁启超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其在客观上却对当时的言论界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他在《论国家思想》中曾言明，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及“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⁶⁰在 1900 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极具震撼性的说道：

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无不谓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也……。

一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⁶¹

梁启超三番四次疾呼：“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常言，欲救中国，当首令全国人民知国家为何物也”，1903年革命派的汉驹也感叹：“夫谁知吾聪明灵秀之黄帝民族，竟已坠落为无国之民耶”、⁶²柳亚子（1904年）也感叹“呜呼，吾民族之无国，二百六十一年前于兹”。⁶³对革命派而言，“无国”是他们所谓的“汉民族国家早已为满清所灭”的亡国叙述的自然逻辑。在梁启超等维新派而言，“无国”则是指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之谓。要言之，流行于清季民初的“无国”之论，一种是从种族主义观点就异族入主中原而言，另一种是就中国人只有“朝廷”而无“国家”而言。但两者都殊途同归，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标准，期待的是现代的国家建构。

梁启超于1902年初率先提出“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的观点时说：“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与他族。”⁶⁴诚然，对一个国家而言，主权是其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只有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主权的意义才被凸现。当西潮冲击下，他们意识到“中国”不再只是唯我独尊的“天朝”，当它必须被置于世界性的地理与观念场景之中，成为外国人眼中的“震旦”或“支那”时，以“国家”自我命名与定位的意识，遂油然而生。国家意识不是一个纯主观的产物。主权的实质是区分“我者”（我国）与“他者”（他国）的基准

线。由此就有了一系列体现主权国家的象征和符号体系，比如：国名（即国家的名称）、国旗（代表国家的旗帜）、国徽（即国家的标志）、国界（确立国家领土范围的界线）、国歌、国语（即法定为本国共同使用的语言）、国庆（即法定的对国家产生的庆典日）。这一系列国家象征都是对“我者”的确认，与“他者”的区别。塞缪尔·亨廷顿最近在其新著所指出的，即使是当今最强大的美国，也不得追寻和忧虑“我们是谁”？⁶⁵然而，在面对“万国”并立之时，什么是中国的国族象征？为此，对传统文化的不断追寻和回溯变成一种必要，只有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才能确立自身的国族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显然的，在与西方现代国家形态对比之下，没有正式国名，没有相应的现代国家象征，如没有国旗，没有国徽，没有国歌的祖国自然迫切需要重新建构。相应而起的，既有政治方面关乎“国民”意识的思辨，也有学术文化方面对“中国学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重新观照，以及围绕着这些相关议题的种种论辩。于是乎，在这种情境之下，文化传统或国粹主义适时的提供一部分知识分子建构民族国家最基本的想象。⁶⁶

1.3 亡国与亡天下的纠葛：国家与文化之统合

在清末这股铺天盖地的亡国时代论述之中，其中革命派的亡国论述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经常被提起。⁶⁷梁漱溟对此曾有所观察，他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⁶⁸我们且看顾炎武这句话之上下文：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⁶⁹

从文脉看，此处所谓的“国”指的是朝廷，“天下”则是指文化。梁漱溟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此“原文前后皆论历代风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涉朝廷皇室，而不是国家；而他所说的‘天下’，恰恰不是现代之国家观念。恰好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即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⁷⁰

历史上，顾炎武所处于的是一个异族入侵的局面，这使他忧惧华夏文明将为满人所同化，故而强调了“救天下”的重要性。西方学者列文森对此亦有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国”是一个行政单位、权力体，“天下”则是世界、一个价值体，而价值是绝对的，其含义比权力所据有的单位宽泛得多。如果人们只知保“国”，那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知道保“天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是文化价值，而不是国家才在道德上要求“匹夫”的忠诚。⁷¹

实际上，这种“天下”观是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共同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⁷²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里，“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种注重文化意义的民族意识远过于政治意义的国家的观念，直到清代都没改变。⁷³因此，中国思想是以文化定义民族为正宗，而顾炎武所代表者正是这个意思。在此观念上，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⁷⁴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重要。⁷⁵国粹派即有人认为，“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渐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⁷⁶从此可知，清末知识分子在高谈救亡保国中，由于深受到传统“亡天下”观念之影响，才会有一部分人强调文化救亡。这亡天下观念提供是思维逻辑是，文化先于国家，文化超越国家，是国家存亡的前提。这似乎也印证了林毓生所说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一元论和唯智论之近代影响。⁷⁷此传统思维模式的特征正是强调人心与道德功能在国家与社

会的作用。1898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建保国会时，亦强调“保国”和“保教”相联系的主张，这种将“国”之存亡与“教”之存亡相关联的方式应当也是亡天下观念作祟下的结果，他们甚至倾向于“保教”优先于“保国”。戊戌一代到辛亥一代这种隔代一致的“亡天下先于亡国”思路，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传统思维的作用。列文森进而言道，这种国与天下之间的联系观念既被保留下来，但同时其含义和对他们各自的影响程度则发生变化。⁷⁸此消（天下）而彼（国家）长，从当时知识界以国家而非天下为关怀中心，但文化至上（意义已不一样）仍为他们所坚持即是明证。

鉴于此，在亡国危机下，知识界开始动员“文化”以改造危急的中国。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与文化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诚然，在清末国粹倡导者之中，此特征最为明显（这方面的更多论析详后一章），在这种来自传统天下意识与当下的亡国忧，以及他们从近代世界一些国家的亡国实例之认知交相作用之下，他们才会说道：

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⁷⁹

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於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⁸⁰

由此而论，清末有关“文化国家化”运动的兴起基本上与塑造新国家，以企达救亡图存之民族主义动机是一体两面的。既然文化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文化学术救国”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舞台。辛亥以后，章太炎还在强调“国性”时追溯至上古时代，说“孔子之春秋，要在于述行事以存国性。”，“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死，……”。⁸¹这里所透露的意思是指，

国性即在，即使亡了国也会复兴，国性若失，不亡犹亡。这就是亡天下的余绪。章太炎心中自有“文化天下”观，而且“天下”先于国家。因其文化，方有其“天下”，因其“天下”，方有其国家，有其民族，有其种群。惟有文化的自觉，国虽亡将可以再起，族不灭将其永兴。他明言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乃“以国粹激动种性”，他说的“种性”，实是“民族自觉”，民族的精髓与灵魂。此一精髓与灵魂有时会麻木与沉沦，要靠一样东西去激动与惊醒，就是“国粹”。显然，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之观念千里来龙在清末知识分子身上结穴，其作用不可谓不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影响下，他们尽管注重文化，但又与传统天下意识的文化至上主义不一样。他们强调“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是指向文化的相对性，而非传统的傲视群伦的“天下”。简言之，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当时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换句话说，在此观念之下，他们尝试以“文化”来“造祖国不亡之因”（胡适语）。⁸²

从晚清报刊资料里发现，各种解救危急之论述可谓纷呈，其中文化救国之声浪是许多当时的志士所共持的立场。虽然各人动机无疑不同，但看来他们都有一种寻找支持国家立足世界的背后因素的鲜明立场。因是之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的论述也应运而生，成为另一个时常出现于知识界论述里头的常用词，而且往往与文化相随。比如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即指出：“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⁸³1906年革命派的章士钊在《国学讲习会序》中也把国学放在“国与之立”的角度思考。章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⁸⁴国粹派的邓实亦说，“学以立国，无学则何以一日国于天地”。⁸⁵这种文化至上的共同立场已把当时的民族、国家存立与文化之关系绝对化了。

1.4 现代国家之精神基础：中国魂兮归来乎

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夹杂在“亡国”与“国于天地，必有以立”论述之中亦同时出现极多有关寻找中国魂魄的思潮。正如前述，这是由于注重文化之存亡，在加以知识分子们开始以国家为本位思索问题，遂有召唤国魂之提出，因为所谓“魂”即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已经触及现代国家之精神基础问题，即什么精神与其泉源。国魂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提倡民族精神的论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现象与建构。章开沅有一篇文章谈“国魂”者就直接把其等同于“国民精神”。⁸⁶实际上，当时已有人看出“国魂”是国家观念产生之后的现象。1904年的《东方杂志》上有一片文章言道，“中国人最乏国家之观念，故从无国魂之说。至留日学生见日本有武士道为国魂者，始反索乎中国。奋翻生索而不得，乃强欲以革命当之。夫此何足以为中国魂也。”⁸⁷奋翻生就是蔡锷，他在1902年首倡“军国魂”，以填补中国精神面相之不足。其实，寻找国魂也就是寻找攸关国家立足的精神所在，以及中国亡国危急在精神上所欠缺者。这与文化救亡之传统似乎有着不可切割的因果关系。于是乎，晚清年间，到处是“中国之国魂安在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国魂乎！盍归来乎！”的呼唤。

以上引文也清楚显示，国魂说是传自东邻日本的概念。而从文献上看，或许是梁启超率先提出此词汇，而且救亡意味极浓。1899年，梁启超就明确说过：“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果……。”⁸⁸简单的说，梁是尝试在追问何种精神品质是现代国家之国民所需要的。他还在1902年编辑出版一本名为《中国魂》的书本。⁸⁹但国魂论不久之后也为革命派所使用，而且因此成为时代论述，也可能是“国字号”的前驱。直到1908年4月1日，甚至还有以国魂为名的《国魂报》之创刊。1904年，《新定学务纲要》有这样的记录，“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

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⁹⁰从这里可以窥视到，国魂一词非固有词，而且当时尚被视为“欠雅驯”之词，但它却已经在1900年代初成为流行一时的新常语了。

但何谓“国魂”呢？1903年，《国民日报》的一位作者，对所谓的“国魂”作过这样的界定：“夫国魂云者，乃国民一种固结不解之特性，……自有人以迄今之无量劫，其全数国民皆为此一特性所陶铸，薰染遗传，日益进化。一国民必有一国民特有之魂，或明显或隐伏，皆可元始要终，征之于历史”。⁹¹也在这一年初，蒋方震（飞生）在日本界定其“国魂”的含义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者，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上，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旋转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另外一位作者金一则从其作用定义，即“特殊之灵魂足以代表一群，多数之灵魂足以代表一国。……夫国而无魂，乃以陈死之人而充国民之数矣，可乎哉？”⁹²这些解释其实未免太笼统，民族的特性，养之于历史的过程，也许是产生国魂的条件，未必就是国魂。但是从此却可知，国魂论述者对国魂之定义颇有共识，而国魂是与国家、国家存立相关联的。三者的意思很清楚，“国魂”乃一个国家或国民之特性所在。⁹³他们亦不约而同的把国魂定义为民族历史的产物。有一点可以加以注意的是，金一的文字中所提到的，国家无魂则国亡。看来，精神层面被视为关键的救亡因素。

从历史角度而言，以灵魂比喻民族或国家精神，并寄托思念故国之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古老传统。屈原的《楚辞》“招魂”篇就已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⁹⁴谈论国魂，其实是相对于“国体”而谈，这是把国家“人格化”的一种表述。署名“独应”的周作人在名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试〉中即说，“今夫聚一族之民，立国大地之上，化成发达，特秉殊采，伟美庄严，历劫靡变，有别异于昏凡，得自成美大之国民（nation，义与臣民有别）者，有二要素焉：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质体言者，谓人、地、时三事。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赅世守之，素白既具，乃生文华。之数者为形成国民所有事，亦凡有国者所同具也。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之有魂

气。一人如世，本无异于微尘。林林者等犹是戴毛衔齿之伦，更于何处生其差别？徒以性灵作用，故心思言动既因之各表异于人人，而善恶因缘亦焉而附丽，智愚得丧之故可由是洞然入观火也。以言国民精神，理亦视此。故又可字曰国魂。”⁹⁵国家是由质体与魂魄所组成，唯近代中国国家质体的积弱，已无法避免，必须依赖民族精神——国魂来支撑。因此，周作人进一步认为，国人如具立国精神，“乃足自集其群，使不即于离散。且又自为表异，以无归与他宗，然后视其种里，益发挥而光大之，渐以成文化力而强也。……即不然，而国粹深长，善而匡大，益以潮风所被，为补阙之谋，斯亦足自立于两间，不至于为洪流所漂泛……”。⁹⁶从这里透露出了国魂是一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而国粹在此中正扮演要角。

因此，周作人认为，国魂之铸造对国家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质体为用，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折也。”⁹⁷在周看来，魂似乎比体还要重要，因为“神能再造”。如果把这种言说置于当时国亡论述底下细读，即可知这是一种因应亡国之道。对魂魄之重视这一点，似乎是许多晚清志士的共识。1908年的《河南》第四期，另一位作者也同样提倡立国之精神，…“兴国之命，自觉而已。惟有自觉，性灵于是乎广运，人道于是乎隆施，人间之意识于是乎启发，人类之光荣乃显焉。无自觉者必无国家，有之亦犹丧源之水，其涸固旦暮间耳。”作者旒其在〈兴国精神之史曜〉中提倡佛郎西革命精神，即“重视我之一字，张我之权能于无限尔。”⁹⁸显然的，这股亡国情绪而来的焦虑，使他们特别注重国家的精神面。这里强调的精神，实际上可说是鸦片战争以后流行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之余绪。

这种国魂论述强调民族精神层面的建构，除了上述内在的传统亡天下观念之影响之下，还有外在的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日本因素之外，依据郑师渠的看法，民族精神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代的概念。他以为，18世纪时强调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爱国者率先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问题，促进了德国的统一。20世纪初年，中国从事革命的先行者接过了西方的民族概念，提出中国也必须提出自己的民族精神。⁹⁹余英时也曾言，清末民初大家谈国魂与民族个性，那是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又受到德国

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¹⁰⁰证诸历史，德国思想家赫德（Herder，1744—1803年）发展了“人民精神”（volksgeist）的理论，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精神，¹⁰¹而“民族个性（eigentumlichkeit）确是日耳曼文化的产物。¹⁰²实际上，日本在明治中期（1880年代）开始，即开始大力鼓励“德国学术”，¹⁰³日本作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中介站，中国知识界很可能从日本那里接收德国影响。上引周作人就谈到民族国家之建构需要精神之铺垫。总体而言，对中国士人而言，呼唤国家之魂就是为了免于亡国。正如周作人所说的，“神能再造”，国魂如果尚存，国家就不会灭亡。持国魂论者认为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自立于世界，必有一灵魂以鼓舞民心，激励英雄，它对内统一群力，对外吸入文明，抵抗侵略，无此物，则必定民族亡，国家灭。既使国亡了，而魂犹在，国还是有再造的可能。这种思想逻辑其实与国粹论述的“学亡，则国亡”并无二致。总之，招国魂，同样是“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究竟如何铸造国魂呢？

少年时在时务学堂学习，并奠定了一生思想基础的蔡锷提倡军国魂。蔡锷认为，只有全体民众知生存之惟艰，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把民族素质由“尚文”转变为“尚武”，即具有军国民精神，中华民族才庶可有望，列强才不能再加侵犯。基于此，他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军国民篇》中疾呼：“军国民兮，盍归乎来！”这是将军国民主义作为应该重铸的中国国魂。¹⁰⁴前面已经有引文指出，军国魂乃日本影响下的产物。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不少士人对日本的迅速强大产生了艳羡之心，并认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其成功的关键。梁启超就曾言道：“吾闻日本人有所谓大和魂者，为尚武精神是也。呜呼！吾国民果何时始有此精神乎？”¹⁰⁵经蔡锷的倡言开始，军国民思潮得到众多知识人的响应，¹⁰⁶开启了一场维时近二十年的军国民运动。¹⁰⁷

飞生则在上引〈国魂篇〉引述日本松村介石所著《欧族四大灵魂论》而希冀中国国魂为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和平民魂。¹⁰⁸金一于1903年在《江苏》上则说，各国无不有自己的国魂，如日本“有华美高尚樱花之魂”，俄罗斯“有凌厉鸷鹫荒鹫之魂”，而英吉利则“有高掌远蹠神奇变化猛狮之魂”。他沉痛的问道，“夫国而无魂，乃以陈死之人而

充国民之数矣，可乎哉？”¹⁰⁹他进而提出，“是具五大原质，乃合吾固有，而兼采他国之粹者也”，即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及魔鬼魂。“吾国民具此五大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堇于世界”。¹¹⁰看来，国魂简直可鼓动整个世界了。另一位叫黄公者于《中国女报》创刊号中感叹于中国的危亡而言道：“斗室危坐，万籁无声，炉火既死，灯暗欲昏，漫漫长夜，神州陆沉，临风奠爵，何处招魂。望祖国之前途，予心碎矣，夫复何言！”¹¹¹他也因此寻找国魂，并指出国魂为“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故今日志士，竞言招国魂，然曷一研究国魂之由来乎？以今日已死之民心，有可以拨死灰于复燃者，是曰国魂；”但要招什么魂呢？作者要的是更为根本的“大魂”。何谓“大魂”？即：“有可以生国魂为国魂之由来者，是曰大魂。大魂为何？厥惟女权。”¹¹²他进一步解释道，“女界者，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沈沈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欲收他日之良果，必种今日之好因。唤起国魂，请自女界起。”¹¹³

统而言之，当时人谈论陶铸国魂的具体方法各异，有上述所提倡武士魂、黄帝魂、军魂、山海魂、游侠魂、宗教魂，乃至大魂等，¹¹⁴都是为了建构新的国家。借鉴之出处也各异，如斯巴大之魂、大和魂、德意志精神、佛朗斯革命精神都有，但以日本的大和魂为师的成分最浓烈。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谈国魂往往也是谈国粹主义者，顺理成章的，中国谈国魂者也有一些人谈及国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魂与国粹之间共享同一个论述前提，即都认为文化建国的重要性。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国魂”之出现在时间上比“国粹”稍早。国魂思潮在清末之出现其实早经方家论及，但其与日本之关系及国粹思潮之渊源，却尚鲜有学者详其究竟。下文尝试进一步分析陶铸国魂与国粹主张的逻辑联系，这是国魂论其中一条思想发展支线。¹¹⁵

第二节“国粹”之初现与文化国家化的开展

前面已经从亡国危机背景论述了士人们的各项救亡论述，并叙述他们如何自我（民族）意识及走上了追索现代国家建造之路。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国家意识之形成，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产生了深刻变化。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导致了以民族国家为关怀的中心思想的出现，而非之前或古代的“怀抱天下”那样。许多变化也由此而来，列文森就曾尖锐的指出道，“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有大部分是从天下变成国家的过程”。¹¹⁶但在传统亡天下之辩余绪的作用之下，又出现了把文化因素置于国家存亡关键观念。接下来，本文试图进一步钩沉与解剖上述历史背景与论述语境对国粹及文化国家化出现的影响与思想理路上的关联。

2.1 陶铸国魂与国粹论述的内在相关性

国粹派可说是其中最直接把国粹与国魂一体化的群体，¹¹⁷甚至一些国粹派成员把国粹、国学与国魂相等同之。¹¹⁸国粹派的主力邓实在最初提及古学复兴时即提及“国学”与“国魂”之相关性：“吾国之学，经历代专制君主之改变、外族朝廷之盗窃，其精意亦寔微矣。然其类族辨物之大经、内夏外彝之明训、《小戎》之赴敌、《秦风》之同仇，固发于吾一种人之心灵，演成学理绵延至今，传为种性而未尝灭也。未尝灭，则保此一息以为吾国之国魂学魂，将天地之正气犹有所系，而中国或可以亡而不亡。”¹¹⁹邓实也承认中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异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风俗民质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质，则国失其精神，而国非其国，凡百作为，举无幸焉。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¹²⁰许之微在〈读“国粹学报”感言〉有言：“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彼英人以活泼进取为国魂，美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人以武士道为国魂，各国自有其国魂。吾国之国魂，必不能与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国历史。”¹²¹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些有关国魂的论说都不约而同的把国魂相等于一种维持民族国家存立的内在精神，而此精神正源自他们所孜孜主张的国粹或国学。

除此之外，与国粹派联系密切的南社，乃第一个有明显近代性质的文学社团，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和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均在其中。它主张“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¹²²高旭在其〈南社启〉就直接的指出国粹与国魂之间的内在联系：“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¹²³南社同仁还不时吟诗召唤国魂，¹²⁴亲国粹思想的《警种日报》则出现了不少以“侠魂”、“求魂”等为名的作者群，¹²⁵由此可见“国魂”与国粹之关联。前引1904年刊于《政法学报》上的文章〈中国国学保存论之一〉在提到近来流行“国魂论”之时，在说到蔡锷提倡“革命”为“国魂”时，以为“匹夫篡夺，强有力者即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此夷齐所谓以暴易暴，以盗贼代盗贼也。”作者看来是立宪派，而反对革命，但也从国魂论角度谈国学。他进而认为，“诸君欲求中国魂乎”，只有以国学——正气“当之”，“舍正气将安属焉”。¹²⁶

与国粹学派的主张相类，前引的壮游在主张铸中国之新魂时，也认为需要“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不过其大致还能肯定“黄龙”这一民族象征。“中国魂兮归来乎？归来兮，此旧魂也，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炭，老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帝视其成。彩烟直上，纠蟠天际，天花下降，白鹤飞来，而国民乃昭然其如苏，呆然其如隔世，一跃而起，率黄帝以与他种战。国旗翻翻，黄龙飞舞，石破天惊，云垂海立，则新灵魂出现则中国强矣！”¹²⁷他提孔子、墨子、老子等诸子，其实即意味着国粹在陶铸新国魂中的角色。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前面也提过的飞生在其社说〈国魂篇〉中，在提到陶铸国魂之法时亦直接提及“国粹主义”。他说，“夫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二大主义之冲突与调和而后成。所谓二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¹²⁸他进而指出，国粹主义认为，“中国者，有历史的人种也。凡一民族立于世界，其遗传之历史甚久者，必有固定之特性。种之于数千年以前，根深蒂固，决非可以一旦拔除之者也。”因此，“其进也，有次序，有阶级。是故，贵因势利导之，若一跃而飞，则未有不蹶而扑者也”。所谓历史的人种，指的就是因文化而形成的民族。就是因为固有的民族特性使然，所

以法国人的民主制度不同与英美。¹²⁹此观点充分印证了国粹与国魂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两者是相辅成相激荡的。

研究国粹派的学者郑师渠就认为，国魂的陶铸总不能不求助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万绿沈沈昼掩门，括囊国粹道犹存；拟将一盏黄炎血，敌如洪炉铸旧魂”。所以“陶铸国魂”说与“保存国粹”说天然相通。¹³⁰这是极为有见地的观察。在内涵与形式上的理路上，从国魂论到国粹论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在“国魂”论所开拓的思想语境下，加以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相互激荡，又在日本国粹思潮的影响下，知识界相继迈开了这一步，“国粹”更加顺势而起了。张存武先生曾认为，晚清主要是以“国民”来铸造“国魂”，而至民国初年发展为学界挖掘“国性”、“国粹”、“立国精神”等。¹³¹但本文已经指明，以何铸造“国魂”是多元的，至少以“国粹”为元素的主张也有其市场。至于说“至民国初年发展为学界挖掘‘国性’、‘国粹’、‘立国精神’等”则不免把“国魂”与这些观念或词汇之间的时间顺序拉长了，因为本研究表明，上述概念已经出现于晚清，而且其意义与位置已经相当关键了。诚然，由国势危急而引至的国家意识与招国魂风潮，而又张扬保国粹以保国，这之间毕竟系存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与逻辑。

2.2 “国粹”观的最初萌现及其日本因素

出于“亡学即亡国”的担心以及上述的论述背景下，二十世纪的首十年内，民间的很多国粹论者纷纷开展“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学术救亡运动，或者组织学会，如国学保存会、国学讲习会、国文研究会等，或者出版研究国学、国文的报刊、专著，如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章太炎编著的《新方言》、梁启超编著的《国文语原解》等。¹³²这股国粹思潮之出现当以“国学保存会”之正式创立及其刊物《国粹学报》之创刊为标志。邓实在《国学保存会小集叙》曰：“粤以甲辰季冬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¹³³以此推算，前者当在1905年1月间草创，而《国粹学报》则创刊于光绪31年正月，即1905年2月。

《国粹学报》创刊时，国粹派领袖章太炎尚因“苏报案”而身陷狱中，大体上它应是邓实、黄节与刘师培两支力量的汇合，才促成该刊的创

办。¹³⁴1902年邓实主编《政艺通报》，刘师培则于隔年参与主编《俄事警闻》（1904年改名为《警钟日报》），而《政艺通报》极少刊登刘师培的文章，显示他们之间似乎未有交往。《政艺通报》甲辰第一号（1904年3月1日）上有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第十一号（1904年7月27日）有黄节《国学报叙》，可见“国学保存会”及“国粹学报”乃源自邓黄二人的设想。此后，刘师培的文章始大量出现于《政艺通报》上，这可视为两股力量结合的信号。¹³⁵刘师培最迟在1904年时已经接受国粹思想，这可从他主编的《警钟日报》时有倡言“国粹”见端倪。开始时，《国粹学报》反应良好。据1905年该刊第五号，“国粹学报第一、二、三、四号再版出版广告”，“本报初印三千册，一时将近售罄，顷已再版。”1905年第十一号“本馆广告”，“销数已达五千余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了。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们大多是“国学”根抵较深的革命党人。《国粹学报》在〈发刊辞〉中声明：“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不存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¹³⁶从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七年内总共出了82期，是革命报刊中生命最长的一种，在同传统文化联系较深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并得到一些改良派人士如郑孝胥、张謇等的赞扬，对于一些守旧而又有点反满情绪的文士也有相当的吸引力。¹³⁷除《国粹学报》外，他们还在上海设立了“国学保存会”和藏书楼，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又把大量国粹主义的文章塞进《民报》，还在《民报》社内设立“国学振起社”的事务所，主讲“国学”，发行讲义，一时声势颇盛。

凡事必有其过程，在国粹派创立之前，它自然先有一段酝酿期。美国学者傅乐诗（Charlotte Furth）认为，来自日本的“国粹”一词是在1903年左右传进中国的，其背景是：在梁启超倡言“新民说”后不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需要将之作为重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固有精华的口号。¹³⁸但是这个观点看来不符合史实，因为事实上，早在1903年已有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提倡国粹主义了。据说，在1900年12月（即清光绪二十六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等人在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

路)平和里创立国学扶轮社(翌年即盘给商务印书馆)。¹³⁹这是至今所见有关国粹思想出现的最早说法。而且从现有文献来看,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已首次提到此词,1902年7月《译书汇编》也有一文:〈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较早的向中国人传递日本国粹主义信息。文中说: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过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¹⁴⁰

但是要至1902年12月,黄节在《政艺通报》才发表一篇被公认为第一次正面向国人推介国粹概念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正式为国粹论述张目: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¹⁴¹

如果依据《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与黄节一文的日期推论,加之梁启超在这一年秋亦曾私下提及有意倡导国粹思想,创办《国学报》,以为欲养成其所主张的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¹⁴²可以断定国粹观至迟已经在1902年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散播

了，而且看来不少人不约而同的有提倡之念头。这股“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主张，从此点算起，至1905年国粹学报之创刊，则大致是应该在1902到1905年间形成一种文化流派与群体。

从1902年至《国粹学报》成立之间的几年，可说是一个重要的酝酿与凝聚期。除了前面提到的相关人物与叙述，在1903年左右，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时，他在狱中即言，“上天以国粹付予，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¹⁴³这可见当时章太炎已有强烈的以光大“国粹”为己任的“使命”。实际上，在国粹派还未凝聚成一派时，就有一些人对国内的国粹提倡的趋势作批评。张继煦于1903年1月的《湖北学生界叙论》一文中以日本为例，批评国人的国粹运动。作者指出，“日本维新之初，燔毁旧书，并力西学，其于汉学摈斥不遗余力矣。乃未几而汉学不可废之问题，笔于书而宣于纸。彼之汉学本非其国所固有，犹以为国粹而保存之；而吾国固有之学，反忧其不保，有是理也？惟日本有欧化主义乃继以国粹主义，岂不以国粹主义存于先，适足为新学之敌，而阻维新之进步哉？世有排斥新学以保中学者乎？则吾惜其太早计矣。”¹⁴⁴看来，作者对当时就提倡国粹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过早之事。无论如何，此评语又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国粹论早在国粹派立社前已逐渐在传播中了。笔者发现，在1904年4月10日《警钟日报》的“事件”栏中刊有一则“东江国民学校简章”，从此简单的启事中亦可窥视当时的国粹潮澜。该校建于苏州周庄，校旨为“保存国粹，阐发旧学，养成武健之风。”它的课程是“本校高等课程以国文、法文、历史、地理、体操为专注，而佐之以理科、算学。”署名是后来也参与国粹学报的陈去病与吴敖，日期是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二月。¹⁴⁵此外，创刊于1904年的《医学报》即以“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为宗旨。¹⁴⁶由这些蛛丝马迹推测，1904年以“国粹”为宗旨之学校也出现了，这表明它在当时已开始广泛流传并成为时代词，而且最重要的是其概念已经清晰，提倡者也深具自觉性，更证明此思潮非“国粹派”提倡之故。我们要知道，国学保存会是在隔年（1905年）1月才正式成立的。

在此之间，即 1903 年 9 月，在日本出版的《游学译编》中，亦有一篇名为〈民族主义之教育〉的文章，它是根据日本作者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撰就的，也触及国粹论，并申明国粹与民族国家界限的关系。¹⁴⁷从文章的日本出处可知日本国粹论的影响，日本因素是显而易见的。¹⁴⁸实际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出于同文同种的认知，近代中国许多新词汇都是从日本引译过来的。¹⁴⁹对“国粹”起源的追究，乃至其发展自然不能不理解日本国粹思潮的来龙去脉。既然国粹论是来自日本的影响，以当时广泛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留日学生之众的情况之下，“国粹”概念遂能于中国内外知识界的意识中发酵。

实际上，以当时日本国粹论蔚为风气，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氛围而言，加以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之众，其影响自然是超越一派一私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佐藤丰即认为，“国粹”一词是由 20 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输入中国的。¹⁵⁰这是有其根据的。一般认为，前引 1902 年 7 月最早介绍日本欧化与国粹思潮相抗衡的那篇文章作者，也并没有证据证明作者是属于国粹派的成员。即使隶属制宪派的杨度也在不久之后，即 1902 年 11 月《游学译编》创刊号的〈叙〉中提及说，“日本由汉学一变而为欧化主义，再变而为国粹保存主义，其方针虽变，其进步未已也”。¹⁵¹这几篇引文发表日期都在 1902 年左右，我们或可推论日本国粹论影响大概是在当时出现的。国粹思想已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许多留学或滞留日本者，都受到影响。经由他们的挪移转嫁，遂被嫁接于中国亡国与救国论述之上。一时间，“保存国粹”这一口号流行于当时各种派别的舆论工具上，成为时髦。以下即稍微剖析日本影响的层面究竟为何，而其中各中介者又如何发挥其影响力。

一开始，近代日本其实与中国一样，也面对西力冲击。它尽管在学习西方上比中国稍迟，但成就却在中国之上。1868 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推行“脱亚入欧”运动，在国内施行所谓“欧化政策”，决定将西方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样式逐次引入日本。1883 年东京日比谷设“鹿鸣馆”，每日由政府高官招待绅士淑女，举行西洋舞蹈会。这就是近代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鹿鸣馆时代”（1883—1887 年）。“鹿鸣馆时代”的出现，反映了日本朝野上下欧化的决心及其欧化

的程度之深。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的欧化浪潮于 1880 年代渐趋巅峰。由此而来，日本具有国粹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此欧化思潮提出种种批评与责难，国粹派应运而生。就在欧化运动趋向高潮的 1888 年之际，有两个团体、一个报社应运而生。这两个团体是：1、“哲学馆”团体，其成员有井上圆了、三宅雪岭、棚桥一郎等人；2、“东京英语学校”团体，其成员有志贺重昂等人。两团体结合，组织“政教社”的最初队伍，并于同年 4 月发行《日本人》杂志。该杂志发刊日为“神武天皇祭”，以示此刊物宗旨为“保持国粹”，这与中国国粹派的《国粹学报》使用黄帝历，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报社是《日本》报社。政教社建立后，主编《日本》的陆羯南等人于《日本人》杂志合组《日本与日本人》，《日本》报纸同人也加入政教社。该组织一直存在到 1923 年才结束。

从 1888 年到 1923 年为止在日本国内流行的“国粹思潮”，正是中国面对亡国忧患之时。既然中日两国在近代都面临西方的冲击，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审察会引起反省与仿效。¹⁵²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制度在内皆领先于中国，这使得天平是愈往日本倾斜。由于“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士人如梦初醒，震惊之余，随之兴起了席卷全国的学习日本的浪潮。周作人曾叙述说，“我们往日本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¹⁵³学习日本的仿西经验固然是一点，但另一点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1904 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日俄战争。该场战事日方取得胜利，不仅引出了日本仿西成功之印象，同时大大加强了中国士子们对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信心，也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而事实上，1904 年左右正是中国国粹运动的高潮期。根据记录，留日学生 1896 年时仅 13 人，而在 1906 年竟达 17860 余人。¹⁵⁴留学日本的人数自 1900 年以后稳定增长，似乎说明了它是与中国的危急成正比的。其结果就是，连中国近代的军阀四分之三都出自日本军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文人也有不少留学日本。¹⁵⁵

由于这样，日本与中国在那个时候的知识界交往之中异常频繁，国粹言论散布于在日本创办的刊物或国内刊物，自然不难想象。

其中可以《云南》编辑方针之转变即可大概窥知。笔者从〈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的报道中得知，1907年《云南》杂志原以“输入文明，鼓舞国民精神”为目的，但在翌年的周年会上则强调“此后论文中所当注意之事（一）竭力发恢我国固有之文化，如典当法制、文学、历史等，使国民爱国心愈增进不已，庶不致偏重欧化而遗忘国粹。”，并增加“地理历史上之文字”。¹⁵⁶这种从看似亲改良派的“鼓舞国民精神”转变至“发挥国粹”颇能看出国粹的时代风潮正在留日学生界风起云涌。此外，山西留学生主办的《晋乘》，居然把宣传国粹列入他们的“六大主义”之首、《云南》杂志也曾专出《滇粹》（效法“国粹”一词）以表重视。¹⁵⁷章太炎自编的《民报》也连篇累牍刊出论述国粹的文章，并声明“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另外，在日本出版、亲改良派的《中国新报》也时有“国粹”一词的出现。如署名胡茂如的作者在〈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一文中也稍有提及此词，其云：“日本人艳谈武士道，每及之则眉飞色舞，以为是其国之粹也。吾向究吾之国粹而不得，今华人之同化力非吾之国粹而何耶”。¹⁵⁸

以国粹派宗师章太炎的际遇可说明日本国粹论对中国士子的影响。1902年章太炎旅日，而当时《日本人》杂志仍在发行，可能因此受到政教社言论的吸引与影响。¹⁵⁹政教社诸君子亦尊礼在日本的章太炎，他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日本办的《学林》杂志受到《日本人》杂志的重视，该杂志曾第362至366号上刊登过《访章太炎》的文章。另一位提倡国粹者宋恕（1862—1910年），则从1903年6月到1904年初对日本作了半年的私费访学旅游。宋在东京时访问了有贺长雄、三宅雪岭、南条文雄三位日本著名学者，作了笔谈。还参加了日本兴亚会成员的招待会。¹⁶⁰宋恕在日本访学时，就写过“莫将国粹攻欧化，正论端须合力持”。¹⁶¹从日本回国后隔年9月，他应老友山东学务处总理张士珩之邀，赴山东学务处任职，在青岛渡过了晚岁三年薪奉优厚，规划文教，并向清政府提出建立文化变化研究院——粹化学堂的设计。¹⁶²实际上，宋恕在1890年代已经

大力提倡向日本学习。周予同曾经指出，探究晚清的文化史就不得不知宋恕，因此他的地位应该得到我们的注意，以为学术界补阙。¹⁶³

然而实际上，我们必须意识到，日本国粹概念输入中国存在着一个刘禾所谓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过程。¹⁶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互翻性”的问题，即原来的词语经由“翻译”发生变化。“国粹”从日本“理论旅行”至中国，自然难免脱离了固有历史语境之制约，而且中国国粹提倡者也自觉的作出必要的调整。但是，到底中国国粹者是怎样理解与接受日本国粹概念呢？1904年黄节于《政艺通报》刊载《国粹学社发起辞》中即指出，“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¹⁶⁵“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¹⁶⁶这已经清楚昭示了两者之间不会尽是相同。从文化接受角度而言，任何接受都会有其相契的语境，才有接榫的可能空间。把他们提出的国粹观及其核心重点置放于中国亡国忧与建国尝试的脉络中考察，中间确有资源可借鉴之处。日本的国粹主义与反对“全盘欧化”声浪中诞生，这决定其主要思想目标乃是宣传文化民族主义，以恢复日本人的民族自信，这也与后来的中国国粹派的动机一致。实际上，欧化同样流行于中国，尽管程度未必一致。再者，日本政教社派建立的“国粹”文本话语乃是由英文“nationality”一词转译而来，它含有“民族性”、“民族精神”诸含义。尽管日本国粹运动是针对“明治维新”时期的过度欧化的一种反弹，但其思考框架仍然是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理念所提供的。¹⁶⁷这也符合了中国思想界当时正在接收民族国家观念脉络以及因应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当政教社派将“nationality”转译成“国粹”加以使用时，曾对之作过一般的界定，意指：

1. 一种无形的精神，
2. 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
3. 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¹⁶⁸

志贺重昂在 1888 年的“日本人”刊物上进一步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国粹，就是顺应日本国土中万物自然的感化及化学反应，因此受胎、

出生、成长、发达，于大和民族中千古遗传、醇化下来保存至今的东西。”¹⁶⁹志贺这里所谓的国粹，指的是“民族国家的性格”，乃日本所特具者，由传统所累集的文化精华，犹如国性，于西化或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保存者；国性不存，则国无以自存。另一位国粹派人物菊池熊太郎则说，国粹是一个国家所特有的精神，非任何国家所能模仿。他认为日本特有的精神体现在天皇制度上。¹⁷⁰日本国粹主义上述的三义，即抽象的精神、本国特殊的财富与外国无从复制的本土文化皆与章太炎等国粹派成员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即中国的历史、语言、风俗乃中国所特有而必须维护以延续国性，甚是契合。对于西方文化，政教社派主张应以“民族和国家的特色为媒介”、“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之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政教社派在日本追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运动中凸显了“民族精神”的立国根本地位，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主义”一种展现。但是在西方原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文本话语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其在政治层面的最终归趋是建立以自由、民主为权力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自由、民主等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本为日本文化所疏缺，这样他们似乎只有通过“民族精神”认同为其提供历史动力，以达致建立现代国家的鹄的，因而将“民族精神”凸显至立国根本的地位。根据王柯的研究，日本正是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民族”概念在日语中才得以普及，日本社会也得以完成“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建构。¹⁷¹中国国粹论者正因为如此，接受了这一套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也异常注重民族精神，而不是其他民族形式。

大致而言，以上日本国粹观所定义的各项原则都围绕着民族特性而言，这均为中国国粹派所坚持。但所异者，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国粹主义者显然是在自身的“前识”上接受这些影响，如前述的传统亡国与亡天下之辩的作用，即把国粹主义推到更绝对的境况，而把国粹视为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所在，甚至是在国家的前端。这是日本国粹主义所没有的，毕竟日本本土没有如此传统，也没有如此深沉的亡国忧患。毋庸置疑，他们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中，吸收了来自日本国粹范式的符号，以在他们自身国土上进行运作。

2.3 朝野共倡与国粹话语之风行

以上所论析多为最初散见于民间刊物的国粹提倡言论与活动。接下来，本文把焦距转移至在朝的国粹活动与提倡，乃至其体制化与其风行的情境。事实上，在野人士流行“国粹”论的同时，朝廷中认同并使用“国粹”一词者大有人在。¹⁷²由于是官员的身份，他们多把此概念贯彻于制度层面上，如1903年左右（光绪29年），张之洞即首度言“国粹”，并随后创办“存古学堂”于1907年。Martin Bernal认为，张之洞此举可能是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¹⁷³但这一说法根据不足，至少必须受到检验，因为《国粹学报》显然创刊于后。陈志让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清末国粹运动是由官方学者大约于1903年前后所率先提倡，随后1904年始为民间的章太炎等人所继承领导。¹⁷⁴本文则以为，两者并没有谁先影响或领导谁的问题，而是两者都是当时时代思潮的产儿，都在时代氛围中不约而同地受到影响。其实上文已经指出，在1902年间，民间刊物已经开始提扬国粹思想。从时间上看，朝野两边几乎都在同个时候加入了这一时髦的“国粹”范式的“大合唱”。

从资料上看，至迟在1903年之后，随着清廷教育改革开始实施之后，其对现代“国粹”的兴趣，开始显露于朝廷上谕、官员奏疏等之中。首先是在张之洞、罗振玉和其他主管新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现出来。他们想要在新学校制度中限制对全部课程的西方影响，并把中国的伦理学规定为一个调整了的研究的科系。¹⁷⁵与民间的提倡国粹之反满与建立民族国家之动机不同，张之洞曾明言道，其提倡国粹是因为“道微文敝，世变愈危”，因而要“存国粹”以“息乱源”，¹⁷⁶其目的主要是维护君主制的统治秩序。诚然，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服务于帝国正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儒学的替代物。1905年，当科举制度被废弃、新式学堂方兴之际，张之洞电示荣庆：“私衷忧惧非止一日、非止一端，危险已到七、八分，补救已甚不易”，从此可知他开始对旧学面临的生存危机充满忧虑。¹⁷⁷这也就不难索解，他于1907年7月9日上呈《创立存古学堂折》，以保存国粹、造就中文中学师资、维护国本消弭乱源为由，正式请求试办他鼓吹已久的湖北存古学堂。他在折中申诉道，“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对“各

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深感悲哀，惊呼：“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因而“请旨敕下兴办，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以延正学而固邦基。¹⁷⁸张之洞入主清廷学部之后，在其倡导与主持下，湖北存古学堂于1907年8月正式开学，各地也闻风而起，江苏、山西、安徽、福建、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省纷纷仿建，蔚为一股“存古”风潮，直到张之洞于1909年9月病逝为止。¹⁷⁹

与此同时，除了科举废除后各种新学堂纷纷成立之外，酝酿已久的新式图书馆运动至此亦开始初露端倪。1904年，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公共图书馆是正式创办于长沙的湖南图书馆。从当时的图书馆官方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已经尝试通过图书馆以保存国粹，国粹可说已经由存古学堂与图书馆之创立而被纳入官方体系之中。湖南图书馆之建立也脱离不了救亡的社会脉络，初由梁焕奎等12位忧国爱民、思想解放的青年志士创办。在《创设图书馆教育博物馆募捐启》中，他们写道：“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痛心种族之前途，中夜旁皇，揽衣屑涕，信乎图书馆之不可一日缓也”。该馆以“输入文明，开通知识”为宗旨，面向社会开放，“凡有志于学者”都可以按规定“入馆参阅”。¹⁸⁰湖南图书馆开办时有两件重要文献值得注意，一件是1904年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规则》，一件是1906年的《湖南图书馆章程》。前者称“本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到了后者时则已见国粹观的嵌入，“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及旅居未曾携带书籍者，得资博览，学校教员学生得所考证为主义”。¹⁸¹在1904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公立新式图书馆约有20余所，鉴于各省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迫使清政府于1909年12月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并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图书管理与流通的方法等均作了详明的规定，这是

中国图书馆的第一次立法。¹⁸²当时人已从藏书楼观念转变至现代的图书馆经营方式。¹⁸³

另外，在《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颁布的同一年（1909年），山东图书馆创建于济南大明湖畔。它是根据《抚部院奏山东省创建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等而设，从此折可看出保国粹在其中的意义。依据《山东创建图书馆记》与《山东图书馆章程》等文献记载：“宣统元年，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奉学部命令建设图书馆，并于馆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正月十三日抚宪袁据详入奏，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学部知道钦此，三月二十日兴工，十二月十六日落成”。¹⁸⁴当时的官员宋恕曾力主建立“海岱大图书馆”，就是省级规模的图书馆，“以库平银十万两为图书馆建筑费，以二十万两为图书购置开办费，以后每年添加图书费二万两。”宋恕特别注重图书收藏的质量：“海内外宋元槧本、家藏抄本及近世通人著述之槧已毁而印本亦极难得者，皆出重金设法购取，或派员至其家录副以来。”可见宋恕收藏旧书遗存国粹的雄略，但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其建议一时没有得以实施，直到1909年宋恕离开山东后一年，才有上任的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请举办。然而，宋恕是创设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首倡者是没有疑问的。¹⁸⁵实际上，宋恕是官员里头对国粹观思考最周密者，在这里值得加以指陈。1905年，宋恕就很具体的提出创建山东“粹化学堂”。这里所谓的“粹化”，就是“国粹、欧化”的缩写。从宋恕的“粹化学堂”的建议书看来，他对“粹化”的思考相当全面。¹⁸⁶

当时朝野政治上处于激烈对持之中，但这股“国粹热”竟然得到来自朝野一致的推行，其流行度以此可以想见。我们也可以从一些不满意与反国粹思潮者的反应中，窥视其流行的程度。1908年，一位署名“反”（吴稚晖）的作者于《新世纪》上发表〈国粹之处分〉。该作者在文中提到，“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药救。”¹⁸⁷由此又可侧见，国粹之提倡可说相当盛行，海内外都有人张扬。作者批评国粹运动道，“昔德哲尼采有言曰‘社会之进化，恒取准于历史，则犹如人欲急行，而以巨石自系者。’”而国粹盛行“此岂

好现象乎！吾敢一言以断之曰：是受历史之毒，而不齿于尼采者也。夫中国之历史，绵延四千余载，国之精华，焉敢云无。”但是，“……当万事以进化为衡之世，是种种者当在淘汰之列。其补助于社会文明之功，已属过去之陈迹。”作者是以进化论来否定国粹的作用，并指出“中国之国粹，若世人之所谓种种者，尤当早于今日陈诸博物馆”，并甚至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决于对“国粹”之“处分”问题上。¹⁸⁸作为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作者也针对国粹派提倡的“以种性分界”批评道，“然若专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标异于人，而以助国界之愈严明，梦想草昧，而使人群之日退化，则其祸群之罪，不啻应加以大辟之刑也。”¹⁸⁹《新世纪》乃无政府主义者杂志，他们主张的是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自然难免要对国粹的“助国界之严明”作批评了。不过从中也可窥视国粹派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纠葛。作者后来还提出“公粹”一词，以代替他认为不正确的“国粹”一词。¹⁹⁰

其实，《新世纪》与《国粹学派》同时是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但它对国粹思潮之批判却相当犀利。¹⁹¹比如一位署名“民”的作者就批判道，“中国人最富有好古思想，老大帝国之本来面目也”，“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受新理新学也。”¹⁹²从资料中得知对国粹作批评的还有：1907年，《中国新报》的刘显志〈论中国教育之主义〉中提出，中国政治竞争之失败在于国民教育。他以为，“吾闻国家之前途，实国民唯一的共通精神有以造之。”然而，他认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之分子，欲构成等何之国家，不可不造成何等之国民；欲造成何等之国民，不可不具唯一之主义。”因为，“非有唯一的教育主义，而欲作新其唯一共通精神，犹缘木而求鱼也。”他谈到“国粹”作为国民教育之主义，又以“吾虽欲兢兢焉守吾先哲之教育主义，不敢有所增损于其间，而其势有所不能。盖吾先哲亦不克预料今日之国家现象，持定一方针以贻后人也。”“然则，吾将一一排斥世界教育家之主义，唾弃吾古圣贤之教育，更创一新奇主义，以遗吾之新国民而后快乎？”¹⁹³从以上对国粹的批评之中，我们颇可见这股国粹思潮之热度。

至此，我们或可对国粹思潮的发展曲线稍作结论。若以上述 1902 年《译书汇编》上的那篇有关日本国粹主义的介绍开始，到 1905 年间国粹派的出现临界线，之间呈现了第一个高峰，这自然有其时代制约的缘由。这期间，因为日俄战争带来巨大的思想震撼。清廷和广大士大夫心目中，日本战胜俄国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张灏曾言，起初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帝国主义，约在 1905 年前的二三年里，中国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反帝方向，转向反清。¹⁹⁴诚然的，那段时期正是庚子事变发生之后、革命派的革命浪潮猛吹的时期，所谓“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反帝方向，转向反清”指的就是革命派。革命派们之所以热衷于从反帝到排满的民族革命，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满清政府积弱至已无法抵禦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若不将之推翻，则中国将与之偕亡。故此，反满与反帝国主义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甚至是同义的。对国粹派而言，国粹运动是与反满民族革命相关连的。

实质上，从革命思潮的进程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国粹运动的进展。金观涛曾指出，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意味着改革的失败，从此“革命”一词的频度不断上升，1903 年出现第一个高峰；到了 1906 年，“革命”一词在政治文献中出现频度高达一千多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但自 1908 年后，“革命”一词使用却又日趋减少，1911 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但这一段时期“革命”一词在这一年反而很少使用。¹⁹⁵作者进而言道，1903 年之所以成为革命观念普及的关键年代，是和俄国在庚子事变中占领东北并拒不撤兵直接相关。1903 年拒俄运动在留日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中风起云涌，而 1906 年呈现的第二个空前高峰，则是因为日俄战争带来巨大的思想震撼。其实以此相对来看“国粹”一词的进度，我们也隐隐然发现两者的相倚依。国粹一词之出现正是于 1903 年间，而高潮期亦接近于 1906 年。大约 1909 年，章太炎致书《国粹学报》，认为《国粹学报》逐渐失去“市场”，这可以被视为清末国粹思潮渐入低潮的临界点。¹⁹⁶这同样接近于 1908 年之后“革命”一次逐渐淡化的时期。我们可以从“革命”一词之流行状况此侧面窥视国粹思想的发展曲线。

从实际数据来看，我们更可知悉它的影响层面。以《国粹学报》的销量而言，这份由“国学保存会”发行的民间刊物，代理发行处遍布各地。最初有 32 个城市 46 个代销处，最后有 24 个城市 41 个代销处。该刊现在在各大学校很容易找到，意味着当年发行数量的可观。在第 5 期有一重印广告，说第 1 期“印 3000 册已罄”，正在加印。1906 年 4 月 2 日，当时只有十余岁、后来是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的钱玄同读了《国粹学报》后，在日记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此诚极大之事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有味也。”¹⁹⁷钱玄同的经历说明了国粹运动的影响，尤其对追求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年轻人而言。

第三节：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面临西力东渐之下，中国人逐渐抛弃了以前的那种自我的“天下”观念，尤其是浓抑的“亡国灭种”忧患更激化了知识界之间的国家意识，如何挽救“国家”是他们的思考中心。

从文化天下主义到一切以国家为关怀点之后，中国人在面对或解释世界时，也相应的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中国知识界不得不摸索另一套语言话语与资源、设定新的价值取向。但他们一时总得凭籍一些固有的符号来思考，传统“亡天下”之辩自然为他们所资用，以面对新世界的变迁。当民族、国家救亡成为各种举止与思想的最基本原动力，也是最高的价值准绳与信念之时，又因传统“亡天下之辩”于此自然的发生作用，士子们终究摆脱不了“文化救亡”的观念，文化功能因而被绝对化了。这在客观上，使得“国家”与“文化”之间取得统合，两者紧紧相扣。加以他们整个文化传统正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他们正在对中国以至它的一切文化传统在世界上的地位重作考虑与定位之时，自然逼迫出了中国化或国家化固有传统文化的思维。“国粹”概念之被提出，本身亦透露了一个讯息，即清末提出的“中体西用”，即把中国文化视为普遍主义之“体”被逐步分解掉了。换言之，作为“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文明的本质，具有绝对的价值。但当它成为“国粹”时，它仅是相对世界中的一个价值。¹⁹⁸

简言之，我们可以概括的说，国粹运动是一个把中国固有文化国家化的现象，其出现与国家意识之形成过程系着极大的关联。“中国”这个名词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形容词或修辞——对她的人民或是文化——文化国家化于焉产生。从“国魂论”的提倡到“国粹论”的提出，都是这一思路的显现。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这之间“国魂”又与“国粹”论述相纠葛，历史甚至说明：国粹与国魂论述是相辅成与相互激荡的。质言之，中国国粹论是出现在国亡灭种与陶铸国魂被提倡的语境之中的，它是在强烈而急迫的救亡意识下推展出来的。作为一种回应“亡国灭种”问题意识的论说，国魂论或国粹论自然深刻烙印着列强势力入侵对中国所造成的思想与心理冲击。它直接针对民族建国进行言说。“国魂”、“国粹”以及“国家”（国家主义）可说是同一组概念与相关的论述。这几个以国家命名的词汇之出现，把“国家”作为修辞置于固有文化与民族精神层面之前，此种命名方式，可说是近代文化国家化——“以国为名”现象的开端。

在此当中，国粹论者共同构成了一套时代叙述，我们姑且称之为“国粹叙述”。在此必须注意的是，以上所述也证示国粹论是当时一个借自日本的一个时代词汇、观念与民族主义范式，因此不限于一派所拥有。它散见于各个刊物，准此而言，它更像是已形成中的一个时代氛围，而不是局限于一小圈子。从上文所述也可看出，“国粹”一词及其概念之应用，应产生于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接下来的其他国字号论述，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是这套论述里的小叙述、或受其影响而养成的。但最重要的是国粹论述参与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叙述（narrative）与建构的发展，提供与完整了以文化建构以及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正如社会学家安德森（Anderson）所说的，任一民族国家之出现，势必要伴随着一套有关其民族之同一与同质性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¹⁹⁹有了一套“叙述”，然后其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才会有所认同。从这角度而言，“民族国家”的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型塑与发展，也有赖于“文化国家化”与“国粹”叙述之推波助澜，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的。晚清国粹派将政治上的排满革命和文化上的国粹运动及文化认同结合起来，共同进一步促成了现代中国国族主义的建构。已有学者指出，“民族/国族”概念之普遍

或走红是与它被作为反帝、排满宣传中一个口号和纲领有关，²⁰⁰其中正有国粹论述的作用在。但是要如何描述这套特殊历史语境下所铸造出来的思想论述？文化国家化或国粹叙述这方面的具体言说、作用或实践又如何？这些将是下一章的重点。

¹见《中国新报》，创刊号，1906年12月，页3。实际上，在1903年12月出版的《俄事警闻》第1号中，也有近似的图画，即有黑熊、白狗、青蛙、黑鹰在中国上空或边界盘旋，但没有《中国新报》的具体。见《俄事警闻》第1号，1903年12月15号（癸卯十月二十七日）。

²此乃杨昌济在甲午战败之后所言：“国人乃一挫其妄自尊大之见，而惶惶然谋所以自存”。引自杨际开：〈章炳麟为什么要“反满”〉，刊于《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页58。

³张之洞：《劝学篇·同心》，《张文襄公全集》（4），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页456-457。

⁴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香港/北京：三联书局，1962-1977年，页163。

⁵见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374。

⁶同上，页287-288。

⁷Mary Wright,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63.

⁸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235。

⁹胡思敬：〈审国病书〉，见《退庐全书》，癸亥南昌刻本，第6页。引自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开放时代》，2001年1月。

¹⁰张灏：《再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载《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页55-62。

¹¹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96-98。原文见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 Hurst and Co. Ltd., 1992.

¹²见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91。

¹³同上，页92。

¹⁴有关人类学的兴起与中国种族主义的关系，详见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998-1020。

¹⁵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六次讲义·论保种保教均先必開民智》，《湘报类纂》，光绪28年刊本，台北：大通书局影印本，1969年，册1，页370-374。

¹⁶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233。

¹⁷梁启超：〈京师强学会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页65-66。

¹⁸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于《国风报》，时评，第一年第念八号，1910年。

¹⁹梁启超：〈国家命运论〉，于《国风报》，论说，第一年第八号，1910年。

²⁰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82年，页235-236。

²¹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页90-116。

²²严复著、王栻编：《原强》，《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5-15。

²³本研究接近尾声之际，阅及许小青之论文，在这一点上也有述及。可参阅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份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988。

²⁴〈中国灭亡论〉，刊于《国民报》，第2-4期，1901年6月10号、7月10号、8月10号，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页78-81。

²⁵同上。

²⁶见想灵：〈辨亡篇〉，《东方杂志》，第12期，1904年12月25日，页287。另一作者自新也在《觉民》上发表日俄战争将置中国灭亡的论调，见〈日俄战争之结局即中国灭亡之末途〉，《觉民》第6期，1904年（甲辰三月二十五日）。

²⁷山河子弟：〈说鹃声〉，刊于《鹃声》，第一期，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页563—567。

²⁸〈亡国篇〉，刊于《国民报》，第4期，1901年8月10日，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页91。

²⁹同上。

³⁰孙中山：〈“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民报》，第10期，1906年12月。

³¹申叔（刘师培）：〈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原载《苏报》，1903年6月22日，页1。亦见李妙根编选、刘师培著：《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页5。

³²会稽（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刊于《警钟日报》，1904年7月14号（甲辰六月初二日）。亦收于汤志钧编：《陶成章集》（1904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³³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6号，1906年7月。

³⁴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见《民报》，第8期，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309。

³⁵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页1008—1015。

³⁶邹容：《革命军》（1903年），见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册，页653—654。

³⁷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页1009。

³⁸饮冰（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1906年8月4日，页2—4。亦参见饮冰：〈中国不亡论〉，《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页53—71。

³⁹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第2号，1907年2月20日，页27-29。

⁴⁰见〈保国会章程〉，于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页233。

⁴¹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收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页227。

⁴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350。

⁴³有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国家建构之思想起源及其西方现代资源极为复杂，可参阅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页215-23）、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任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1980年）及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1994年，页103-113）。

⁴⁴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页160。

⁴⁵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页209-232。

⁴⁶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页160。

⁴⁷同上，页294。

⁴⁸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页19。

⁴⁹〈论中国政府之改革〉（译自《中央公论》，湖北董玉墀译述），《新译界》，第2号：“时事界”，1906年（光绪32年11月1日），页193。

⁵⁰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页69-73。

⁵¹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原载《清议报》，第94、95号，1901年。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上，页32-33。

⁵²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卷2号，1902年。

⁵³邓实：〈通论四·帝国主义〉，《壬寅政艺通报》，“政治通论外篇”，第1年，第5期，1902年。

⁵⁴〈论中国各社会对于民族主义之影响〉，《警钟日报》，1904年8月17号（甲辰七月初七日）。

⁵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⁵⁶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页99—100。

⁵⁷柏林（Isaiah Berlin）著、冯克利译：〈民族主义〉，《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页416。

⁵⁸同上，页416—417。

⁵⁹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67—175。

⁶⁰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四·论国家思想〉，《新民丛报》第4期，页8—11。

⁶¹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3、74期。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二），页25—26。

⁶²汉驹：〈新政府之建设〉，原载《江苏》，第5—6期，1903年8、11月，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册，页579。

⁶³原见柳亚子：〈清秘史序〉，引自《南社史长编》，页29。

⁶⁴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四·论国家思想〉。

⁶⁵详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⁶⁶有关国粹主义者如何对民族国家进行言说与建构，这一点将在第三章作具体阐述。

⁶⁷详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刊于《历史研究》，1996年5期，页31—32。

⁶⁸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页160。

⁶⁹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⁷⁰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页160。亦参见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页21。

-
- ⁷¹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84—92。
- ⁷²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刊于《历史研究》，1996年5期，页31。
- ⁷³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页20-21。
- ⁷⁴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页160。
- ⁷⁵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页31。
- ⁷⁶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 ⁷⁷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 ⁷⁸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页84。
- ⁷⁹〈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第4期，1908年。
- ⁸⁰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
- ⁸¹章太炎：〈经学略说〉（下），《国故论衡》（1910年），页307。
- ⁸²胡适：〈胡适致许怡荪〉，1916年1月25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49—350。
- ⁸³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第1期，1902年2月。
- ⁸⁴国学讲习会序发起人（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期，1906年9月，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上册，页501—502。
- ⁸⁵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号，1905年。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上册，页58。
- ⁸⁶章开沅：〈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章开沅学术论文集》，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49—163。也见章开沅：〈论辛亥国魂之陶铸——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二〉，《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6。
- ⁸⁷春水：〈中国国学保存论之一〉（录自《政法学报》），于《东方杂志》，第三期，1904年5月10日。

⁸⁸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页38-39。

⁸⁹饮冰室主人编：《中国魂》，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此书主要收集了梁启超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所刊在之文章，如〈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

⁹⁰《新定学务纲要》，载《东方杂志》，第1年，第3期，1904年3月，页99-100。

⁹¹见《国民日报汇编》，1903年，第1期，页69。

⁹²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页572。

⁹³飞生（蒋方震）：〈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1903年1月，页6。

⁹⁴见章开沅，〈论辛亥国魂之陶铸——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二〉，页25。

⁹⁵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试〉，《河南》，第4、5期，1908年5、6月出版，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三，页306。

⁹⁶同上。

⁹⁷同上，页307。

⁹⁸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第4期，1908年5月，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三，页300-301。

⁹⁹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页270。

¹⁰⁰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页21-22。

¹⁰¹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精神〉，页28。

¹⁰²许章润：〈民族的自然言说〉，刊于《读书》，2001年12月，页139。

¹⁰³卞崇道：〈日本现代化与日本哲学〉，刊于《文化：中国与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页234-235。

¹⁰⁴奋翻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1号，页80。

¹⁰⁵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页 25-26。

¹⁰⁶如笔者在桂林出版的《南风报》中所见，偏处南陲的广西也有人演讲，宣导“军国民教育”。见病武：〈军国民教育之草案〉，《南风报》，“讲演”，第 2 期，1910 年（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

¹⁰⁷详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2000 年，页 56—107。

¹⁰⁸飞生（蒋方震）：〈国魂篇〉，页 7—10。

¹⁰⁹壮游（金一）：《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 年第 5 期，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页 572。

¹¹⁰同上，页 573—576。

¹¹¹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一期，1908 年一月出版，于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册，页 840。

¹¹²同上，页 842。

¹¹³同上。

¹¹⁴章开沅就此有详尽的解释，见〈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 75 周年〉，《章开沅学术论文集》，页 152—155。另见章开沅，〈论辛亥国魂之陶铸——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二〉，页 31—32。

¹¹⁵由于“国魂论”歧异多变，它也引出了“国民精神”批判至民国时期“国民性”批判的思潮。前引章开沅〈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 75 周年〉一文即从此脉络论析。

¹¹⁶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页 87。

¹¹⁷此处的“国粹派”是指以 1905 年创刊的《国粹学报》为中心的学术组织，其主要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陈去病等人。

¹¹⁸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4 年出版，页 109—117。

¹¹⁹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 3 号。

¹²⁰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页 175。

¹²¹许之微：〈读“国粹学报”感言〉。

¹²²“南社”的许多社员也是《国粹学报》之作者或支持者。它正式成立于 1909 年，主要发起人维高旭、陈去病及柳亚子等人。它同样是尝试以“国学”来鼓动种族革命。有关其发展前后，见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¹²³同上注，页 129-131。

¹²⁴如朱锡梁、包笑天等在苏州狮子山招“国魂”，并赋诗〈共和纪元第四十六癸卯是月薪还朔，狮子山赋〉及〈题招魂幡〉（1903 年 11 月 19 日，原刊于《江苏》第 9、10 期合本），宁调元狱中遥和高旭诗作，发表于《神州日报》（1908 年 4 月 21 日）的“哀蝉音文革决一年，顷于报端见所作〈神州六绝〉，慨然和之，即为〈神州日报〉周年纪念，未审哀蝉见之”等。分见于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页 17、108。

¹²⁵如 1904 年 8 月 4 号的“求魂”写的〈秦淮书所见〉等诗，1904 年 11 月 9 号的“侠魂”撰就的“哀同胞之将亡”等。

¹²⁶纯水：〈中国国学保存论之一〉（录自《政法学报》）。

¹²⁷壮游《国民新灵魂》，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册，页 572-573。

¹²⁸飞生：〈国魂篇〉，页 12-13。

¹²⁹同上。

¹³⁰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页 116-117。

¹³¹张存武：〈魂归何处？——梁启超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在思考〉，于郑大华、邹小站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页 98-99。

¹³²同上，页 151-152。

¹³³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1 期，1905 年。

¹³⁴见王凤：〈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 1。

¹³⁵同上。

¹³⁶见〈发刊辞〉，《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1 期，1905 年。

¹³⁷详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

¹³⁸傅乐诗著、廖仁义译：〈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页50。

¹³⁹这个说法还未能证实。见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页277。引自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5月。

¹⁴⁰见〈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译书汇编》，1902年7月。

¹⁴¹黄节：《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篇卷五”，1902年12月。

¹⁴²这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时下通信所透露的讯息，但梁之意见为黄所劝阻。见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1902年，即光绪28年8月），见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93。

¹⁴³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88。亦见〈癸卯日中漫笔〉，《国粹学报》，第1年，第8期，1905年。

¹⁴⁴张继煦：〈湖北学生界叙论〉，第1期，1903年1月出版，于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页434。

¹⁴⁵〈东江国民学校简章〉，《警钟日报》，“事件”栏，1904年4月10日。

¹⁴⁶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62-65。

¹⁴⁷见〈民族主义之教育〉，刊于《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于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上，页404-410。

¹⁴⁸实际上，许多对“国粹派”研究者都已经指出日本国粹运动的影响，如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桑兵《晚清民初的国学研究》等。

¹⁴⁹王泛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49-164。

¹⁵⁰见狩野直喜：《支那近世の国粹主义》，みすず书房1973年版；佐藤丰：《〈国粹学报〉誌上に於ける“国粹”主义と“国学”の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4集，1982年。引自《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辛亥革命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文化自新意义》，“近代中国网”，见<http://www.china1840-1949.com>。

-
- ¹⁵¹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1902年11月创刊号，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页247—248。
- ¹⁵²马里乌斯·詹森：〈第六章：日本与中国革命〉，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383。有关日本对中国政治改革运动之影响，可参阅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¹⁵³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06。
- ¹⁵⁴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页838。
- ¹⁵⁵刘理想：〈试论清末民初留学运动对中医发展的影响〉，原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2期，2004年6月。
- ¹⁵⁶李复：〈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云南》，第13期，1908年4月28日，页119—127。
- ¹⁵⁷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22。
- ¹⁵⁸胡茂如：〈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中国新报》，第3号，1907年3月20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七），页91。
- ¹⁵⁹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
- ¹⁶⁰杨际开：《宋恕与儒学范式的近代演近》，2004年。
- ¹⁶¹宋恕著、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616。
- ¹⁶²详杨际开：〈宋恕与儒学范式的近代演近〉，《温州社会科学》，2001年7月号，页56—64。
- ¹⁶³见朱维铮：〈神州张夜谁之咎〉，《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261。
- ¹⁶⁴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局，1999年。

¹⁶⁵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甲辰1号。（1904年）

¹⁶⁶同上。

¹⁶⁷罗岗：〈从“晚清”到“当代”——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几则笔记〉，于 <http://dvscn.net/0205/02052016.htm>。

¹⁶⁸伯纳尔（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页460。原收于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ed. Charlotte Fur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57-89。

¹⁶⁹引自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年6月号，总77期，页77。

¹⁷⁰阅菊池熊太郎：〈国粹主义 no 本据如何〉，载《日本人》杂志，1888年11月18日号，页96。引自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

¹⁷¹引自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页77。

¹⁷²此可详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页107-142。

¹⁷³伯纳尔（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页465。

¹⁷⁴见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之“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395。

¹⁷⁵同上。

¹⁷⁶许同莘：《张文襄年谱》，上海：商务印书局，1947年，页208。

¹⁷⁷《致京学部荣尚书》，《张文襄公全集》，卷195，电牍74，页443。

¹⁷⁸《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68，奏议68，页26—32。张之洞在1907年至1909年间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在他的主持下，学部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亦提倡保存国粹，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此中的错综复杂关

系，可参阅关晓红的《张之洞与晚清学部》（见《历史研究》，2000年3月，页80-91）。

¹⁷⁹张之洞的特殊作用可在其以军机大臣主管学部之后对存古学堂的倡导看出。实际上，张之洞管部之前（1907年），学部对设立存古学堂基本持否定态度。1906年，湘抚申请设置四所存古学堂，学部认为现行学堂章程和课程“仍寓保存国粹之意……自无原奏中学日微、中师渐绝之虑”，仅同意设一所，且规定须“兼以地理、数学、商学、政法”等课程（《学部奏湘省学堂不合定章拟令改正折》，《东方杂志》，第3年6期，1906年7月。）这一方面可详见关晓红的《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¹⁸⁰李建军：《晚清至“五四”的中国“图书馆”与“启蒙”话语传播》，于“对话网”，<http://www.dialognet.net/Article/HTML/388.html>。

¹⁸¹同上。

¹⁸²同上。

¹⁸³引自谢灼华：〈序〉，《湖南图书馆百年志略》，“湖南图书馆”网页，见http://www.library.hn.cn/bngq/bnzl/bnzn_x.htm。

¹⁸⁴甘英：〈宋恕与山东省图书馆的创建〉，刊于《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年第4期，页85-87。

¹⁸⁵详见同上注。

¹⁸⁶宋恕著，胡珠生编：〈编者的话〉，《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2。

¹⁸⁷反（吴稚晖）：〈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期，1908年4月25日，亦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三，页192。

¹⁸⁸同上。

¹⁸⁹同上，页193。

¹⁹⁰夷（吴稚晖）：〈致爱新觉罗载沣君书〉，《新世纪》，第99期，1909年5月29日。

¹⁹¹可详见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154-171。

¹⁹²民（褚民谊）：〈好古〉，《新世纪》，第24期，1907年11月30日。

¹⁹³刘显志：〈论中国教育之主义〉，《中国新报》，第6期，1907年7月出版，亦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册，页885-886。

¹⁹⁴Hao Z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1971, p. 261.

¹⁹⁵洋金观涛：〈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于台北《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13期，2005年6月，页1-51。

¹⁹⁶这一点请详见下一章。

¹⁹⁷见至今未刊之《钱玄同日记》，1906年4月2日。引自刘贵福：〈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1861。

¹⁹⁸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页160-161。

¹⁹⁹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²⁰⁰方维规：〈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页561。

第三章

国家再造： 辛亥革命前国粹论对国家认同及民族主体性之建构

上一章已经缕析了国粹论出现的历史背景与语境。诚然，我们必须循沿历史之径，来观照当时的脉络与语境，以求得对于国粹论更为深刻的理解。任何一项运动与思潮，必定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为之助力。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优势而来，把空前的民族危机带给了中国人。尤其是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所遭遇之惨败以及接踵而至的 1900 年庚子事变，则制造了另一个转捩点，进一步把民族危机推向高峰，中国志士们的亡国之忧也因此得以酝酿至顶点。对于当时的有识之士而言，思索中国“所以自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主旋律，而晚清出现的国粹思潮基本上就是伴随着这“救亡图存”及其反面“亡国之忧”的基调而来的。如何保国或重造国家以自存是这个基调下的思考中心。

清末的国粹论，正是在这股国家再造的思想大潮中产生的，它与中国当时转折中的政治、文化变局系着因果的关联，更离不开富国强民、国祚民命救亡思想关联。他们本身既然是此保国与国家再造过程中的一部分，其论述自然不脱有关国家意识与建构的言论与相关性。此章即就此议题作进一步探析。但在此之前，我们必要沿着上一章的论析，再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再造之来龙去脉作相关面相的深层解释，才能理解国粹论相关言论的理路与深层原因。

第一节、国家再造与文化民族主义

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从西方帝国列强打开中华帝国的门户，并将大一统的清帝国压缩成众多的列国之一开始，此一演变的过程即非内在的发展结果，而是充满着掠夺与屈辱。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必然有所反应——如何在外力挑战下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进而保国、保种。这开始了中国人近代漫长而曲折的再造国家历程。

1.1 国家建构中的“实在化”过程

但是他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需要“再造”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实际上，他们相信，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是力保国家立足于世界的不二法门，因此致力于对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摹倣与追寻。诚如杜赞奇(Prasenji Duara)所说的，在整个上一个世纪中，民族国家被视为唯一合法的政体形式，由于它在其明确的、虽不无争议的领土界限内宣布自己拥有主权，¹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侵犯其主权。这对当时处于挨打状况的中国而言，自然深具吸引力。如上所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出于共同的命运与威胁，才会对因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而联结在一起的群体产生“我体”之感，因此逐渐有了自我共同体之确认与国家意识之萌生。然而，对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质朴的认同，却只是国族主义的原生形态，它依靠的只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成分。如果要把这原生形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国家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作进一步的建构。这也就是说，原生形态的情感认同仅仅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形式性的外壳。更重要的国家建构工序是如何使这样一个外壳“实在化”起来，在其内部拥有实在性的内含。²易言之，使认同民族主义的外壳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只要通过国际间的交往和对抗，即可实现。但如何确立其独特的内涵，则是一件相当复杂、延宕得多的过程。这一内涵之建立，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国家建构的过程。霍布斯邦(Hobsbawm)在其所编著的一本关于民族主义著作《传统的发明》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些关于“民族”的内容，人们于是开始寻找定义民族的“传统”，不论是从既有中寻找，或召唤过去，还是重新建立，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发明”。³因此霍布斯邦也认为，

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在他的看法中，并非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故此，我们可以把对国家再造持有不同取向的维新派与革命派视为两个竞相尝试“实在化”他们各自理想中不同模式的民族国家之流别。

在清末的国家建构阶段中，牵涉面极广，其中关系到到底国家是否等同清廷的问题，而不同建构模式就有不同的视度。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较清楚的分析。他认为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国家观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清王朝的态度。⁴维新派的戊戌一代将清王朝等同于国家，因此保国也就成了保清廷，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对他们而言，保国最重要的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所要建构的国家可说是“传统王朝国家”。但是，革命派则将国家界定为汉民族的天下，而清朝的灭亡正好是保国的必要条件。在国家的建构过程上，国粹学派则显然是属于后者，追求的是排满的民族革命模式。从当时的报刊切入，我们看到提倡各种国粹主张的文章灿然杂陈，但必须立即指出的是，大致而言，尤其以《国粹学派》为中心的国粹派而论，国粹论的提出与革命派提出“排满”是相联系的，他们也毫不讳言自身的亲革命性。易言之，作为一个“国家再造”的过程与目的，他们希望对翻腐朽的清朝帝制，以建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共和国。这股国粹思潮，与其说是保卫传统而发的，不如说是应乎革命派国家再造大工程中“排满”的实际需要而起的。再来，才是回应“醉心欧化”时流的挑战。章太炎所说的“激励种性”基本上就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因此排满是国粹派主张的“第一义”。然而，列强威胁却又是激起排满革命的直接导因，因而两者之间是相互倚附的。章太炎的“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讎不可得也”，⁵与黄节的“爱国之士，辄欲辨种性族，而先行于域内”⁶在在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先后关联。既然国粹论者认为中国正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以及祖国已经亡于清朝之建立时，其目的方面自然是以反列强侵略为鹄的，而在另一方面，又以排斥他们以为腐朽的清廷为依据的。换言之，他们面对的是如何回应这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国族建构之需要。

但无论如何，一般论者对国粹派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仍未有比较深入的探究，因此还未能从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发展这个脉络

与角度来理解国粹观的出现与其发展脉络。如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近代国家思想是深受西方的影响下之产物。这里有必要稍作追溯，以更清晰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选择。在欧洲，作为近代现象出现的“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国民（volk）；“nation state”，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国民国家。这是有其西欧、甚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作为其发生语境的。实际上，在定义民族这个概念时，研究者往往或者强调其政治特征，或者偏重其文化特征。然而在英语和法语中，民族(nation)这个词本身反映不出其定义上的偏向，“nation”可能是指侧重政治意义的“民族”，也可能是指侧重文化意义的“民族”。按照仲维光的研究，只有在德语中，始有“政治(国家)民族”(Politiksnation)和“文化民族”(Kultur-nation)这样的两个不同的词句，它们清晰的区别了民族的两层意思。⁷德国民族基本上是源自一个“语言共同体”，但由于德国特有的历史情境，它一直未能在语言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取得精确的一致性。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因此提出上述两种概念，试图将德意志民族国家缔造上的民族与国家两要素之整合的困难和谐化。他把这两个概念诠释为“国家民族就是现实政治上可能存在的，文化民族乃是客观上感受已存在的”。⁸他认为，“政治民族”这一民族概念是建立在一个确定的、历史上形成的领土上生活的民众之上，它可以理解为民族—国家(Nation)，它等同于国籍。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否最终要取决于个体的意志，政治(国家)民族指的就是出于个体或集体的自由意志和主观信仰而形成的民族。然而，所谓的“文化民族—国家”则是以客观的预先给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为依据来区别不同的族群，这些条件包括共同的群体起源和语言、既定的居住区域、宗教、习俗及历史。由于对民族国家的想望，致使人们认为自己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因此国家、民族、文化是三者一体的。易言之，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海涅克提出这两概念的名著《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Der Weltburgertum und der Nationalstaat)广为留传于1908年，但最早的概念提出与区分可追溯至Fr. J. Neumann著于1888年的《人民与民族》(Volk und Nation)。⁹这段时间恰好

适逢中国近代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知识界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是极为可能的。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

其实，大体上，依据一般政治学界的研究，在西方近代国族主义思潮中，它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源头。以上所述，强调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乃“文化民族主义”之形态，它起源自德国。与此相对应的是源头来自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民族主义”形态。它强调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国族主义，按照人民（国民）主权原则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著名社会学政治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对民族的定义就接近“文化民族主义”。他认为，形成一个民族的前提是，某一人群在其他的人群面前必须具有特殊的团结一致的感觉，即所谓的“共同意识”（其实就是民族精神之意）。¹⁰这乍看起来是十分粗糙的论述，它似乎也适用于宗教社团、工会和政党。但是，韦伯在他的概念中使用了“特殊的”这个关键词，它涉及的要素构成民族的功能，这样的要素有语言、文化、历史意识、风俗、交往、宗教、政治目的等。一个民族通常借助这些要素来建立本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并划清与其他民族的界限。例如，十九世纪之前，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个世纪之久，但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信奉正统的基督教，土耳其人则信仰穆斯林，他们之间就始终无法建立民族认同，因此未能凝聚为一国。¹¹正如论文第一章已提过的，在西方国族主义思潮中，不管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国家民族（state-nation）都相信民族与国家的融合，即民族必然组建国家，国家必须创建民族。

另一方面，实际上，民族国家与现代化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从理论上，现代国家都以民族国家为追求目标，现代世界体系也视民族国家为合法的政治形式。现代国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凭藉，需要实实在在的建构和再创造。这之中文化认同自然成为了这建构中极为重要的象征符号。因而，我们可以从许多有关近代的民族国家论述里，看到许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与历史的记忆之上的。这里要著重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是民族国家“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是。

1.2 国粹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上一章已经指出，在近代中国，梁启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他的论点与主张成为 1900 年代思潮，包括国族主义思潮的重要启点。但是，它所倡言的“国族主义”理论是哪一形态呢？实际上，在 1899 年，梁启超即翻译了德国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的《国家论》，可以说，这是他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方面开了先河之论著。¹²在此文中，伯伦知理企图分清什么是分享文化遗产的群体——“nation”与什么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团体——“volk”。但他不赞成维系国民的契约论，而认为国家的起源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本能需要。换句话说，近代史上第一次向中国国内推介民族主义理论著作是以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上一章已稍微提到清末知识界对“国魂”论述与对民族精神之强调，是经日本为中介的德国影响，而民族精神正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源流所特别注重的要素之一。

然而，尽管梁启超译著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时，其民族主义较倾向“文化民族主义”，他往后有关国家观念之论述却似乎更倾向前述的“政治民族国家”，因为梁的论述把民族国家与人民主权观相关的“国民”相联系。¹³相对于革命派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历史民族”这一概念，这更符合“文化民族主义”的精神，即坚信文化是形成民族的要素。在他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言说中，当谈论如何塑造民族国家时，作者们时常提及的是民族历史特性作为现代国家存立的必然基础。章太炎的民族观更是如此，其梗概可见于 1902 年重订的《馗书》。在书中，他指出：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性”，¹⁴说明现代民族国家有两种，即政治民族国家与文化民族国家，而中国属于后者。在倾革命的《浙江潮》杂志中，余一发表了著名的《民族主义论》也值得注意，我们可以此窥视革命派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文化性。该文提到：“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

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¹⁵从此可知，作者的民族是建立在相同历史、语言文化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历史民族”。然而，又该如何建构一个民族国家呢？作者认为，“今既述民族之所以建国之原，则请就民族的国家而解剖之。盖有二大原资也：其一曰发扬固有之特性，其一曰统一全体之群力。”¹⁶换句话说，作者认为其中一项方式是必须激发固有的特性，或以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种性”，这样即能凝聚一国了。在作者看来，“是故种不能统一，则不能成国，则此种亡；国不能统一则不复成国，则国亡，而种随之”，¹⁷“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¹⁸

至于国粹派，诚如罗志田引邓实在《国粹学报发刊词》说的，该刊之宗旨在于“保种、爱国、存学”时所揭示的，国粹学报中人视“种”（民族）、“国”（国家）、“学”（文化）三位为一体，¹⁹凡此诸端，在在表明“文化族国主义”确实是贯穿于革命派与国粹思想之间的。郑师渠曾指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²⁰他进而言道，“民族主义所塑造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形象，一般都诉诸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弘扬民族的优越、尊严和进步，并强调神圣的民族历史使命。”²¹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来说，文化民族主义必然是其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他们深受清初“亡天下之辨”之沾溉。以此而言，革命派以及国粹派的中国民族主义性质比较倾向于德国式的国族主义，他们选择以此方式“实在化”他们的民族国家建构。

即便梁启超主要提倡的是政治或国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主义，然而在其 1902 年〈新民说〉中却已明确的指出民族精神与特质对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性：

凡一国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²²

梁启超的意思很清楚，民族主义源自国民的特性，而这特性是起自一种世代相传的精神特质的。犹如他接着所说的，“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齟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无失堕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惟其日新，正所以全也。”依照梁启超的意思，以人权为基础的国民亦离不开民族特质与文化历史背景。以现在的词语来说，在梁看来，民族特质其实就是民族的边界，使其从区别他族中得以确立。实际上，就在这一年秋，梁启超曾有意创办《国学报》，以为欲养成其所主张的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²³但为黄遵宪所劝阻。²⁴这与国粹学派诸人后来所主张的国粹思想异常注重民族特质在国家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近似。这暗示了对“种性—民族国家”逻辑之思维已几乎成为维新派或革命派中人的超党派共识，而非一派所独具。

总而言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国亡灭种、国家再造、民族主义以及爱国情操几乎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志士思想中最特出的表征。民族、国家成为各种举止与思想的最基本原动力，也是最高的价值准绳与信念。与此同时，就是由于上述国家再造的追求下，许多被认为对于国家再造有意义的概念，如“进化的”、“科学的”、“革命的”字眼与理论、价值应时涌现，并时时左右士人的举动与思维角度，因此自然影响了整个文化的发展与趋向。²⁵在这样的政治动机下，在文化上也就开始显示出一个新的历史动向。

第二节、类种性：汉民族国家的主体追寻

承上所述，清末的社会心理大体即被如何再造国家的困扰所围绕着。国粹提倡者面对的生活氛围，或藉以思索的思想凭借就是如此。既然说国粹论的出现是基于排满与回应西方列强及其携带而来的欧化侵袭之双重国家建构需要，那其对二者自有不同的态势与主张，这包括对民族国家之意识与实在化的构造上。就以国粹派以及《国粹学报》而言，在论及“国学”之意含时，即有相对于满洲人的“国学”的意涵——针对“胡学”而言的“国学”，另是针对世界的“西学”而言之“国学”。前者可

称作“国学”的内界含义，后者可称作“国学”的外界含义。因而同样的，国粹论者的国家或民族意识观亦可分开叙述，即相对于满洲人的“汉民族国家”与相对于世界“万国”的“民族国家”。首先，这里先就其排满需要的国粹论的民族国家观而谈。

2.1 中国人与汉满边界之构造

革命派对清王朝的民族仇恨，按照几乎为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奉作真理的民族国家的理论，正好可以被解释成建设近代国家的必要步骤而被正当化了。因为按照这个理论：近代的民族和近代的国家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近代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换言之，“驱除鞑虏”，不仅是为了打倒一个旧王朝，而且是在建设一个新国家（nation state），一个“国家再造”——对翻清王朝以建立汉民族国家的过程。所以正如上一章稍有提及的，他们敢于堂而皇之地鼓吹：“中国者，就是中国人的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其他诸族之与汉族有关系者，附入焉。”²⁶国粹派健将刘师培亦作如是观，他于〈论留学生之非叛逆〉一文中明白昌言：“同种者何？即吾汉族是也；祖国者何？即吾中国是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²⁷他们在呼唤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之时，也着眼于国家与清廷的区分，“哀哉，吾同胞之无国家观念。…无国家之观念，则其视中国，恒不以我之中国视中国，而以君主之中国视中国之…”²⁸他们的动机很清楚，即尝试在种族上区分夷夏与它我以及汉人国家与清廷二者的根本不同，并把中国直接与汉人相挂钩。因此“中国不是满洲人的中国”，他们汲汲乎致力于宣扬“满洲人非中国之人”的思想。在此，汉族与中国的关系被本质化了，它自当占据支配地位，而且是中国国族独一无二之主体。

1902年4月，章太炎诸人在日本横滨曾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尝试以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象汉族，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汉人“亡国”的变递，而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那”直接当着本国名称。章氏在会上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模仿他们。²⁹在

“亡国纪念会”之后，留日学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后春笋，接踵而至的刊物有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云南》等。³⁰作为呼应“支那建国”的一部分，〈新广东〉一文明确说明：“今所谓朝廷者，乃韃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应以土地还之中国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³¹曾是南社成员的宋教仁在其撰述的〈汉族侵略史·叙例〉中更有具体的论析。他说道：“满洲人则更以其打牲游牧野蛮兇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横噬之惯技，以与吾族难，一遇而国弱，再遇而国亡，……今之忧时之士，亟亟焉唱为民族主义，与夫复仇主义之说，以冀恢我势力，完我国家。”³²这里显示了他们以“血统论”来区分满汉，以企达他们光复汉国的国族主义终极目标。

被推誉为国粹派领袖的章太炎在 1906 年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一文中把“国粹”在排满民族建国范畴中之重要性明确标举出来。他对自己主张国粹思想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他明言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乃是“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³³明确将国粹与“种性”、“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国粹”作为判断汉满民族边界之所在，以达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排满革命”由此自然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章氏因此疾呼道：

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³⁴

但在各有关民族主义叙述的国粹书写中，据本论文的发现，或许 1903 年 9 月发表于《游学译编》中的〈民族主义的教育〉为最早者。此文是依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撰就的，它非常鲜明的揭示国粹与民族国家界限的关系。作者指出，当今中国存亡关键在于民族主义，“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着，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着，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³⁵然而如何才能致之呢？该文进而言道：

夫所贵于国民教育者，为其保存固有之国粹，维持自古在昔特殊之种性、风习、能力、道德、发扬历史之光荣，而完全其独立之位置者也。顾国民云者，以国家为民族之范围；以国家为民族之范围，则在一方以护持本民族之权力为主义，在一方以吸集他民族之权力为主义。³⁶

作者显然认为，通过国粹使能保留自身自古以来的特性，汉民族国家才显现它的独立性，揭示了国粹论者心目中国粹对民族国家的功用。尽管其见解未见深入，但其实比国粹派大师章太炎所谓的“类种性”的说法更直指其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关联。

实际上，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除了血统因素之外，文化性质的边界之建立则更具有关键作用。³⁷何况国粹派众人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同时试图区分种族之夷夏以及文化之夷夏，更何况中国向以文化来定义种族。因此，国粹论是完全适合时宜的。

作为国粹论者，刘师培自然也是以国粹——文化标准区分种族殊异的，因此主张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做为团结国民的纽带，进而建立民族国家——汉人的国家——是最自然不过的。他强调文字，语言和宗教都有团结人民，发挥民族特性的功用，汉族四百馀州言语虽殊文字实统一，加上汉族人民多奉儒教，因此最容易团结起来，成为一民族国家。相对的，满族、蒙古、回族、苗族在文字与宗教上各自殊异，皆与汉族不同，且文化程度逊於汉族，在这种各民族文化特性殊异的情形下，他认为汉族应该自觉到自己民族独优的文化特色，脱离满族统治而独立建国。总而言之，刘师培强调有共同语言和高度文明的汉族，就有权利去建造一独立的国家和政府。但在，他的民族国家构想当中，是把满族、蒙古、回族、苗族都排除在外的。因此，可说建立单一汉族民族国家是他的基本宗旨。³⁸这一点与其盟友章太炎的观点近似。章太炎在 1907 年设想其心目中的中国现代国家中，甚至有这样的想象：“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之；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

也。”³⁹这明显是以这些社群之汉化程度——文化标准——来划分与定义国家。

从历史的眼光看去，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基于文化差异的大汉族主义之“夷夏之辨”，它的区分标准主要不是基于血缘或和地域关系，而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但是，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初步形成的语境下，尽管“夷夏之辨”仍为时人，尤其是国粹派等人所使用，其实际内涵都已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所代替。⁴⁰无论如何，国粹派所说的“夏”与“夷”，其实已经不仅是“中”与“西”，而是“汉”与“满”。⁴¹既然夷夏之辨贵乎于文化，在论述满—汉之间的夷夏之辨时，自然不得不提文化以区分之。国粹其实被等同于汉族的文化传统。他们倡兴国粹，背后隐寓借春秋大义夷夏大防以驱满复汉的远志。笔者从刘师培在1904年的一篇题为〈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一文中即明确发现他们这方面的深意。他指出，“世之称中国者，孰不曰‘守旧之国’哉！虽然，守旧者，必有旧可守者也，必能保存国粹者也。乃吾即今日之中国观之，觉一物一事之微，无一与古代相同者。吾得以一语而断之曰：中国并不保存国粹。”⁴²从此可知，对国粹论者而言，提倡国粹之需要也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国粹的环境可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它的守旧与保存汉族国粹，但当时的中国却已国粹尽失。文章背后其实隐寓着作者的弦外之音，即指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本质，以此尝试瓦解清政府的正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力乃来自文化，并深切感到一个国家需要文化认同。汉族国家的构造必须自文化认同之再构造始，文化的发现几乎是通向民族认同的道路。国粹主义的崛起，可说是民族建构中的一种文化表现。邓实说：“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⁴³而他们严夷夏之防，显然是为了排满民族主义的生成。正因此，国粹主义文化观，一时受到革命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把国粹主义和爱国精神，是看成同一件事的。

大体而言，建构汉族国家“共同”的认同需要许多复杂的因素来维系，其中重要的包括汉族的共同起源、历史记忆等等。⁴⁴章太炎在谈到印度人之国粹时说，“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究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

为主”，并说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且人类所以异于鸟兽者，惟其能识往事，有过去之念耳。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辄，无一字；无以自立；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辄，无以自存。”因此章氏从印度的经验中得到了有关国粹观的鼓舞，“余固致命于国粹者，闻释迦氏言，知梵、汉之情不异，窃沾沾自欣幸，常以语人”。⁴⁵在章看来，历史记忆在民族建构上最重要，他的所谓“国粹”也自然以历史为最核心。章太炎也曾直接的说道，“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⁴⁶显然的，章知道，通过共同的历史想象以及文化召唤，才能使汉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经验的信心。因此诚如王汎森所言，国粹运动可说是一个认同（identification）的过程，⁴⁷因为汉人与满人在这样的论述中逐渐被区分了。

在此必须一提的是，既然国粹中人强调汉族历史对建构汉人认同的作用，这自然说明了当时汉人历史记忆已经消退，所以才有召唤的必要。确实，至少在清末时期，记忆中的满汉边界之间已经模糊，许多士人接受满人的统治地位，清统治者亦放宽许多满汉分离的政策，例如一些汉人也得以为居高位。但实际上，清代历史上曾对汉族历史有过压抑，这包括文字狱、禁书运动、《四库全书》中对书籍的删改等，以及上述行动所引起的士大夫及民间的“自我压抑”。⁴⁸因此，我们看到的“国粹”论述里，许多“被压抑历史的复返，被压抑潜流的再现，或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记忆大量出现，形成了一种记忆资源，使得不少人对“国”的定义产生了变化，也使朝廷与国家、汉族与满族被区分开了。⁴⁹国粹中人希望通过这些记忆的复现以及唤起国人的耻辱感的方式，激起人们对满人的“非我族类”之心。许多历史记忆，即使是遗失了而与当下格格不入者，也不断被召唤出来，以建构他们所谓的汉族形象，这可说是有一个选择性过程的。

首先，《国粹学报》“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刊物前面常有精致的人物肖像画。它非常注重复现人们对过去汉族具有鲜明人格形象之人物的记忆，人物排列如下：

附录（一）《国粹学报》各期封面主题人物表彰一览表⁵⁰

年	期	号	编号	人物	朝代	历史地位与重要贡献
1	1	1	1	孔子	春秋	删诗书定礼乐，为后世师表，至圣先师
			2	老子	春秋	智慧精密堪为后世圣人典范
1	2	2	3	孟子	战国	主性善、作育英才、宏扬孔道
			4	墨子	战国	主张兼爱、非攻、节爱
1	3	3	5	神农氏	上古	教民播穀耕作、尝百草发明医药
			6	黄帝	上古	尊之为“华夏始祖”
1	4	4	7	堯帝	上古	统一四方蛮族
			8	舜帝	上古	受堯帝位之贤君
			9	夏禹	夏	大禹治水
			10	商汤	商	贤君
1	5	5	11	周武王	周	推翻纣王
			12	周公	周	制礼作乐
1	6	6	13	仓颉	上古	整理文字
			14	周文王	周	撰写六十四卦卦词
1	7	7	15	许慎	东汉	说文解字
			16	郑玄	东汉	精通五经六艺，为五经博士
1	8	8	17	伏生	秦汉	功在藏书传经（传授 29 篇今文尚书）
			18	董子（董仲舒）	汉	六艺公羊派
1	9	9	19	朱熹	宋	理学家，倡格物致知学说，发扬光大周张二程之学说
			20	陸子（九淵）	宋	文化名人、哲学家、理学大儒
1	10	10	21	王阳明	明	定论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性道事功

			22	陈白沙 (陈献章)	明	正统举人荐翰林检讨不仕，归里讲学，门人稱白沙先生，《白沙子》传世
1	11	11	23	黃梨洲	明	反清大儒，发扬民本思想
			24	顾亭林	明	反清大儒，倡经世致用学说，开清代朴学之风
1	12	12	25	王船山	明	反清复明志士、民族史家、发春秋攘夷大义
			26	颜习斋	清	文化名人、反清志士
2	13	1	27	文信国	宋	文天祥，民族英雄，抗元殉国
			28	方正学 (孝孺)	明	文人义举，忠于建文帝，不为成祖起登基诏，遂遇害
2	14	2	29	夏彝仲父子	明	殉国义士，父：夏彝仲，子：夏存古
2	15	3	30	岳武穆及墨跡	宋	民族英雄，抗金，力图中兴
2	16	4	31	傅青主	明	反清义士，偕顾炎武抗清，书法家，行医救世
2	17	5	32	文信国墨跡	宋	文天祥墨跡
2	18	6	33	孔子	春秋	影响中国最大的教育家、思想家
			34	吴长兴	清	大臣
2	19	7	35	陈巖野	明	抗清殉国英雄
			36	黎美周	明	书法家
2	20	8	37	黃道周	明	天启进士、仕福王、唐王，率师抗清，兵败被执而死
			38	张家玉	明	抗清殉国志士，粵三忠之一
2	21	9	39	史可法	明	死守扬州，民族英雄

				遗墨		
2	22	10	40	周忠介 (順昌)	明	东林士人，天启朝吏部主事，被魏忠贤杀害
2	23	11	41	陈子龙	明	复古派人物、爱国作家，仕福王
			42	沈郵龙	明	兵部侍郎总督，死守松江，被乱箭射死
2	24	12	43	吴嘉允	南明	南明福王的戶部主事，抗清殉国自縊
			44	徐孚远	明	闯王入侵抗于潮州与陈子龙其余为前后七子，隱逸不仕
2	25	13	45	张国维	明	撰吳中水利全书，以兵部尚书抗清，兵败赴水死
			46	祁彪佳	明	大剧评家，抗清殉国
3	26	1	47	杨漣 (忠烈公)	明	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遭诬陷死
			48	凌驹	明	烈士死守睢阳
3	27	2	49	刘蕺山	明	殉国忠烈之士
			50	倪鸿宾	明	不仕清朝
3	28	3	51	海忠介公	明	海瑞，为官清廉、正直，斗严嵩
			52	邱文莊	明	理学名臣
3	29	4	53	于忠肃	明	忠贞之士
			54	黄淳耀	明	爱国守节之士 陶庵公
3	30	5	55	陆放翁	宋	爱国文学家、诗人
			56	姜白石	宋	逸民，白石先生
3	31	6	57	钱罄室	明	艺术家、藏书家
3	32	7	58	王山史	明	高节之士

			59	江止庵 (天一)	明	与金声为友，忠烈之士，与母同殉明而死
3	33	8	60	侯纳言	明	父子兄弟同为反清殉国，一门忠烈
			61	徐俟斋	明	痛父为明殉国，守节隱居不仕，靠卖书画为生
3	34	9	62	陈文忠	明	忠臣，打击阉党失败入狱而死
			63	陈元孝	明	明遗民，父严野先生国殉，遂避世
3	35	10	64	张溥 (天如)	明	大儒，号西銘，结东林复社，主张改良政治
			65	陈言夏	明	明遗民，与陆世仪同为明末清初讲求经世之学者
			66	孙夏峰	明	隱逸遗民，曾率族人抗清，明亡后隱居夏峰讲学 25 年，有问学者，诚意待之，故名满天下
3	36	11	67	刘静修	宋	隱逸遗民
			68	瞿稼轩	明	民族英雄，抗清死守不屈，曾做浩气
3	37	12	69	叶天寥	明	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爱国文人，工诗
			70	归玄恭	清	擅工笔之将军，清初文学家，归有光之曾孙
4	38	1	71	文文山 (天祥)	宋	民族英雄，爱国文人，著〈正气歌〉 〈过零丁洋〉
			72	高季迪	明	高启，明初文人，擅诗
			73	沈石田	明	沈周，明文人擅山水、花卉、鸟兽
			74	文征明	明	书画家，擅画，著有明日歌
			75	祝枝山	明	书画家，与唐伯虎等四人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稱

			76	王烟客	清	画家，王时敏、王鑑、王原祁、王翬有清初四王之稱
			77	王念孙 (怀祖)	清	文字学家，究心治河之道，人稱石臞先生，曾弹核和珅，著有《导河议》
4	39	2	78	郑所南 (思肖)	宋	爱国诗人、史家，著《心史》
			79	倪云林	元	画家，山则荒曠，水则寒瘦
4	40	3	80	周尧峰	清	散文之骈文家，隱居于尧峰山，以书画闻名
			81	范文正	宋	范仲淹，爱国文人，抗西夏入侵
			82	范忠宣	宋	爱国文人、儒家、范仲淹長子
4	41	4	83	王荊公 (安石)	宋	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家、史学家
			84	史公道 (德威)	明	史可法之副将，著有维扬殉节纪略，殉国名将
4	42	5	85	王宾	明	深于医，著《盛寅学》奉母至孝
			86	夏昶	明	进士、大臣
			87	程鱼门	清	进士，治经之书 200 种
			88	魏仲雪	明	进士，善诗文
4	43	6	89	任子由 (大椿)	清	文学家，乾隆时代进士
			90	周书昌	清	藏书家，乾隆时代进士
4	44	7	91	杨忠愍 (继盛)	明	豪俠之遗，弹劾严嵩，被诬谤死

			92	王船山	明	王夫之，豪侠之遗，民族史家
4	45	8	93	程孟阳	明	诗画家，工花卉，与陈像齐名
			94	朱九江	清	今文经大儒，志在经世，重气节
4	46	9	95	邓文度	明	文学家，精于古文
			96	徐贞卿	清	文学家，唐寅之友
			97	柳仙期	清	画家，精生物，善工笔、人物画
			98	屈翁山	明	爱国画诗人，书画家
4	47	10	99	杨梦羽	明	杨仪，藏书家
4	48	11	100	桑悦	明	贤明之官、柳州先生
			101	杜琼	明	文学家，醇雅善画，东原先生、沈周之师
4	49	12	102	顾梦麟	明	文学家，诗经约说
			103	朱舜水	明	经学大家，反清复明事败后，往日本传授儒学
			104	陆秀夫	宋	抗元丞相，负宋少帝投海自杀殉国
5	50	1	105	阮云台	清	书法家
5	51	2	106	刘伯温	明	即刘基，明朝开国功臣，书画传世
			107	宋景濂	明	即宋濂，明朝开国功臣，书画传世
			108	归有光	明	古文学家
			109	归文休	明	诗文家，古雅秀致
5	52	3	110	徐子仁	宋	书画词家，善小令
			111	李文忠	明	武靖公，明朝开国名将
			112	邓逾	明	明朝开国功臣
			113	冒辟疆	明	四大书法家、善草书、词曲
5	53	4	114	吴野人	明	文学家、善诗作
			115	陆懸圃	明	文学家
			116	程云家	明	文学家、社会诗人

			117	张苍水	明	书法家、抗清义士
			118	袁老竹	清	文学家
5	54	5	119	建文帝	明	逊国之帝，喜诗
			120	蒋文忠	明	明代名臣
			121	徐达	明	明朝开国名将
			122	薛剑	明	诗人，善五言古诗
5	55	6	123	蔡清	明	明朝名臣
			124	商辂	明	明朝名臣
			125	毛奇龄 (西河)	清	长于考证学，经学
5	56	7	126	杨士奇	明	明朝名臣
			127	郑晓 (淡泉公)	明	明朝名臣，通古博今，作日知录叙
			128	谢葵丘	周	晚周道家隐士，汉书艺文志注，其为老子之弟子
5	56	7	129	严思菴	清	文学家，气度雅醇
5	57	8	130	周忱	明	明朝名臣、理财家、官徙江南
			131	汤和	明	明朝名臣、开国名将
			132	周濂溪	宋	宋朝理学大家，著天道论
			133	缪尚质	明	缪朴，字尚质，进士入刑部，精六书
5	58	9	134	章溢	明	明朝武将、开国元老
			135	沐英	明	明朝名臣、民族融合、武将
			136	吴莲洋	明	吴雯，字天章，隐逸之士，不仕清朝
5	59	10	137	黄大癡	元	黄公望，字子六，晚唐画家，画秋山图，号大癡
			138	邝海云	明	明朝烈士、抗清名士，曾著赤雅一书，字湛若

5	60	11	139	张宁公	明	明朝名臣、诗人，曾作翠堤春晓
			140	胡大海	明	明朝将、开国元勋
			141	仇实父	明	仇英、仕女书画家
			142	文寿丞	明	文彭，国子学博士、经学家
5	61	12	143	周忠武公	明	明朝烈士
			144	归易民	明	考证学家，国亡后杜门不出
			145	杨维斗	明	明朝忠臣
5	62	13	146	高文义	明	明阁臣
			147	袁啸竹	清	书画家擅行书
6	63	1	148	黄山谷 (庭堅)	宋	江西学派画家，诗书画皆精
			149	海忠介	明	海瑞，明朝忠烈之士，严惩贪官严嵩，平反冤狱
6	64	2	150	娄子柔	明	明朝书法家
			151	李长蘅	明	明代举人，以挡案方张，遂绝仕途
			152	严永思	清	精于经史，补撰资治通鉴
6	65	3	153	牧仲	宋	宋朝，诗人，好玉石之器
6	66	4	155	陈清澜	明	明朝，象山发起人
			156	袁崇焕	明	明末抗清名将，殉国
6	67	5	157	朱竹垞 (彝尊)	明	经学家、文字学家
			158	王渔洋	清	著名学者
6	68	6	159	钱竹汀 (大昕)	清	考证学家，长于经史

			160	洪北江 (亮吉)	清	清初名臣，经世学家，文学家，著《北江诗集》
6	70	8	161	宗方城	明	明大臣
			162	季大來	明	大儒学者
6	71	9	163	季大來	明	明代大儒
			164	朱柏庐	明	朱子家训后继者，痛父殉难，隱居不仕清，授徒以终
			165	陈老蓮	明	人文画家、明末权威
6	72	10	166	彭尺木	清	具佛家思想的居士
6	73	11	167	丁敬身	清	清代名人画家、浙派印学大師
			168	奚铁生	清	天生逸材、难写胸中不平
6	74	12	169	张得天	清	书法家
			170	沈得潛	清	字确土，号归愚，礼部侍郎，善短诗
7	75	1	171	王梦楼	明	“玉茗之功臣”书法词曲家
			172	刘旭堂	清	书法家、诗人
			173	陈百生	明	江苏（怀才不遇，工诗词）
7	76	2	174	李东阳	明	文人、工诗文，曾重修明会典
			175	沈顥	清	诗书画畫兼通，喜画山水
7	77	3	176	王俊民	明	贡生，造福一方，赈济贫民
7	78	4	177	王文正公	宋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
			178	李武靖	明	明初功将、卒封歧阳王
7	79	5	179	周逊之	明	曾助史可法抗清，明亡后，隱居授经书以终

从列表中长长的人物名单及其背景稍作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所选择的人物可分为两大类，即一、以最早创造汉人基业的帝王、圣贤、文化人物及藏书家为主，似乎要昭示汉民族文化的渊源流长，代代相传。

二、则以抵抗异族的爱国（汉人之国）烈士、遗民，尤其多为明清时人与一部分宋人为主，因为那时正是汉族面对异族侵略最严重之时。他们一并成为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合了国粹派反满建国的企图。从人物排列看来，诚如徐迅所说，“民族认同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其文化建构非常复杂，因为树立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与价值、伦理、道德的重构是相关的。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一个民族的品格。”⁵¹他们还特地胪列与表彰了历史上许许多多著名的反清或反外族的志士，如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人，显见国粹学派排满攘夷的动机。（见附录之列表如下）

附录二：《国粹学报》表彰抗元抗清志士举隅一览表⁵²

编号	年号期	朝代	人 物	历史地位	重要贡献和评赞
1	2. 1. 13 2. 5. 17 2. 6. 18	宋	文天祥	抗元民族英雄	抗元不屈，临死作《正气歌》传世。
2	2. 3. 15 2. 4. 16	宋	岳飞	抗金民族英雄	力任中兴外攘强敌，作〈满江红〉表明救山河之志。惜为秦檜所陷害。
3	2. 9. 21	宋末	陆秀夫	殉国义士	抗元义士，偕宋帝投海殉国
4	2. 2. 14	明	夏彝仲夏存古父子	殉国义士	忠臣孝子，力图中兴，以身殉国，无愧忠贞。
5	2. 8. 20	明	张家玉(文烈公)	抗清忠烈义士	起义师抗清不屈而死为岭南三忠之一

6	2.10.2 2	明	史可法	抗清殉国 忠臣	福王朝大學士，不为清廷招降所动，死守扬州而遭死难，正气浩然。
7	2.11.2 3	明	沈犹龙	抗清殉国 忠臣	兵部侍郎，抗清阵亡。
8	2.12.2 4	南明	吴嘉允	殉国忠臣	事南明福王，南都陷落，诣方正学祠自缢死
9	2.13.2 5	明末	张国维	抗清殉国 忠臣	天启进士，撰吴中水利全书。鲁王监国为兵部尚书，抗清兵败赴水死
10	2.13.2 5	明	祁彪佳	殉國忠臣	抗清不屈，从容就义“首不墮冠，足不遗履。
11	3.1.26	明	凌駟	抗清烈士	死守睢阳。
12	3.2.27	明	刘戡山 (宗周)	殉明忠烈 大儒	万历朝进士，崇祯朝以直谏忤时遭罢官，讲学证人书院，明亡绝食死。
13	3.7.32	明	江止庵	殉明烈士	与母同为明朝殉死。
14	3.11.3 6	明	瞿稼轩	抗清义士	抗清不屈，作浩气吟。
15	4.4.41	明	史公道	抗清名将	史可法之副将，著《维扬殉节纪略》。
16	5.10.5 9	明	邝海雪 (湛若)	抗清烈士	著《赤亞》。画像自赞：不偃不倚，…面嶽峙文慚皇坟，书溯韵史，生乎今而古道是起。
17	6.4.66	明	袁崇焕	抗清名将	守边关抵抗清兵。
18	1.2.2	明末	左懋第	抗清烈士	抗李自成、反清，被俘

					不降而死。
19	1.5.5	明末	张煌言	抗清文臣	明崇祯壬午 23 举于乡，抗清文臣，最后被清廷俘杀。
20	1.6.6	明末	王征	殉国忠臣	李自成陷西安，威胁王征为其效力，征佩刀自矢不肯赴。闻京师失守、思陵殉社稷，哭于家七日不食而死。
21	2.8.20	明末	陈子壯	抗清烈士	法策刺魏阉，坐诽谤，与父同削籍。明末抗清而死(为粤三忠之一)。
22	2.8.20	明末	陈邦彦	殉国忠臣	明末抗李成栋而战死。(粤三忠之一)
23	1.12.1 2	清	王船山	反清大儒 史学家	进行反清复明，为民族主义史家，惓怀故国心不渝。

在这里，夷夏之防的传统信念在《国粹学报》所宣传的汉民族主义中被凸现出来，抗清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他们力图从历史事件中发挥种族思想，散播排满学说。此外，邓实亦特地将宋明以来反抗异族入侵的忠臣节士、遗民故老的诗文，编辑成一本《正气集》，并在“识语”中称颂这是“神州国粹之林”，并不加掩饰地问道：自古以来，夷狄乱华，中原涂炭国破家亡何代蔑有？而就是因为历代“忠臣义士，节妇烈夫，杀身成仁至死不悔”的一息之正气，才使神州得以维系。因此，所谓“正气者，天地之精，日星之灵，而神州五千年所以立国之魂也”。⁵³

附录三、邓实《正气集》表彰人物⁵⁴

表彰人物 (合 11 人)	资料出处：《国粹学报》
岳武穆（岳飞）	第二年第一号，第 13 期，光绪 32 年 3 月 20 日。
文信国（文天祥）	第二年第六号，第 18 期，光绪 32 年 5 月 20 日。
陆秀夫	第二年第九号，第 21 期，光绪 32 年 8 月 20 日。
谢叠山	第二年第十号，第 22 期，光绪 32 年 9 月 20 日。
王炎午	第二年第十二号，第 24 期，光绪 32 年 11 月 20 日。
林德旸、白石樵	第三年第一号，第 26 期，光绪 33 年正月 20 日。
梁栋、方凤	第三年第二号，第 27 期，光绪 33 年二月 20 日。
郑思肖（郑所南）	第三年第三号，第 28 期，光绪 33 年 3 月 20 日。
邓牧心	第四年第三号，第 40 期，光绪 34 年 3 月 20 日。

显然的，出版《正气集》即是为了“于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庶几天地之正气犹有所系，天命民彝不至终绝，而汉祚藉为一线之延，顾不重哉。”⁵⁵所谓“汉祚藉为一线之延”透露了他们汉族国家建构的系谱正待延续。邓实还特著《明末四先生学说》，即介绍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习斋等人的“夷夏之辨”。⁵⁶《国粹学报》亦刊登征求明朝被禁文献的通告。南社陈去病又仿例续编《明遗民录》，称颂“朱明建国三百载，德泽滂沛，洽给民心”，号召人

们“类族辨物”，判别“人兽”⁵⁷。陈还借清军征服江南时发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件以及编撰《烦恼丝》（1906年）唤起汉人有关清初推行的“髡发令”对汉人的“毁伤之罪”，以鼓荡汉人的仇恨记忆。⁵⁸黄节则借着尊崇黄帝为汉族始祖而著《黄史》，直斥清朝统治是“塞外杂种，盗窃神器，临制中夏”。⁵⁹他为抗清或抗元烈士立传，这包括左懋第传（明末反清）、郑思肖传（宋人，刚介有志操）、张煌言传（明末抗清臣士）、王征传（明末节士）、廖燕传（明末遗民）、唐王玉谢翱合传（助宋抗元）、徐光启传、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合传（明末抗清而死）、徐孚远传（明末节士）、刘因传、李用张斐传（宋遗民）、王通传（隋人）、金履祥传（元隐士）、李世熊传（明人抗清遗民）以及胡安国传（宋人），先后刊于《国粹学报》第一年至第四年间。

此处也透露一个现象，即整个清末时期，黄帝崇拜与叙述异常流行，黄帝成为汉族的共同始祖，昭示了汉族国家建构的想象性。⁶⁰章炳麟的《诂书》、刘师培的《攘书》和黄节的《黄史》都在1901年至1906年间出版，构成了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学术上的抨击。所有这些著作都以种族神话的说法来给中华民族下定义：假定中华民族是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7年）时起的中国人的共同后裔。言外之意是根据种族理由，满族应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章和刘为了对古代中国和其他发源地的文明以及所谓野蛮民族作比较有根据的评价，吸收了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他们一度甚至被比利时汉学家德·拉·科帕瑞的想法深深打动，他断定中国和中东古代具有一个共同发源地。⁶¹然而，对这些著作的最强烈的、无比的影响仍然是17世纪的明朝效忠者、史学家王夫之的《黄书》。作为“民族历史”，这些著作都超出了它们反满争论的目的。它们对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以共同的地域、血缘、风俗和文化联系为基础的有机集体。这表明国粹派实也促进了近代文化国族主义之想象与建构。⁶²他们对国族的表述（representation），几乎指向一个渺远，而且神圣的源头，印证了许多社会学者所说的国族建构性一面。刘师培自己在写《黄帝纪年论》中也说，“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⁶³他们的所

有“类族辨物”作法，极具煽动性，其实意在为满汉之间划下界限，并共同编织汉族可以一以贯之的悠久绵长的氏族谱系，而且是以血缘作为纽带，将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国族之同质性建构发挥到了极致。

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而言，民族国家是以一个文化显现的体系而存在，民族国家仰赖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身份。他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为了集体身份的建构，透过具体的文字和语言形成的叙事，并藉“大规模印刷企业”（print-capitalism）把之传达至散布的社群，再经过一定时日的累积和不断的传播，便形成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⁶⁴这种现象也确实发生在国粹中人的有关建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粹中人及革命派把他们的上述论述著之于书，刊之于报刊，也进行构造广大的宣传网络，各类期刊报纸如下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藉此大加宣传他们的理念。当时革命派刊物几乎没有不刊载有关国粹文章的，⁶⁵对于“国粹”的提倡与编制显然成为革命派的代任务。他们尝试揭示的国粹内涵均以汉族为中心：除了寻求汉族的起源（origin）、歌颂汉族的始祖与贡献者之外，还宣扬汉族与其他异族的辉煌斗争史、涌现的英雄豪杰、以及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等等。显然的，国粹派直接承接戊戌时代“保国、保种、保教”的余绪，只不过他们的“国、种、教”，专指汉族的而已。他们需要借此来激扬民族精神，以资革命。

2.2 汉民族国家建构下被定义的国粹

在 19 世纪的动荡时代之前，由于传统天下观尚未瓦解，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自己的文化传统视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整体，而不是仅仅只属于一个国家所有。然而实际上，“国粹”这一个词汇之创造，即意味着文化遗产已被“国家化”了。但问题是，如何界定与选择这个国粹—国家文化？这首先牵涉及谁来界定的问题。考虑到建立汉民族国家为国粹派的政治立场，并成了他们提出“国粹论”的主要动机之一，那么他们所谓的“国粹”自然是他们汉民族国家的想象继承物。故此，国粹中人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在过去悠长的文化传统中挑选他们所谓的国家之精粹，而且筛选

所谓纯粹的汉民族文化，以为“汉民族国家”划出自己国家界限与疆域。现在且让我们一窥国粹中人如何定义汉人的国粹。

在国粹派宣告出现之前，在第一篇（即 1902 年）向国人正面推介国粹思想的，而且最早阐释“国粹”定义的文章〈国粹保存主义〉中，黄节认为，国粹“非执于一名、一论、一事、一法、一命”而界别之，而是“发现于团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糙，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始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留良。”⁶⁶在黄节等人看来，国粹是民族特质，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而且是优良的民族品质。但这样的定义是非常宏观与抽象的。在另一方面，邓实于同年的〈国学保存论〉中则比较明确的从汉民族国家角度提出国粹的具体内容。邓实说，国粹是指“先秦文化”。他认为，先秦时代是一个学术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的时期，但由于后来出现了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才失去其原有特色。在后来，因为外族的入侵使然，使到“异国异学充塞吾神州之土”，民族—国家特质因此失落了。他进而言道，“登高以望，中原万里，巍巍昆仑，累累五岳，悠悠大江，滔滔黄河，吾祖国之文学，光华美丽，照耀大地者，迄今而安在乎？盖国之不国，而学之不学也久矣”。⁶⁷这已经清楚是以汉人文化来定义国粹，它一方面反对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欲建立汉民族国家。此外，前引刘师培在 1904 年所作〈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一中亦有提出近似的观点。他论证了中国音乐、衣服、宫室器具与礼俗言文早已为历代夷族所污染，纯汉族国粹已不复存在。比如关于礼俗，他认为丧礼七七之制，始于胡魏；火葬之制始于天竺。又如，十二生肖之说，虽相沿已久，不过亦起于北俗等等。⁶⁸由此可知，所谓国粹的定义是在于找出民族的“共同特质”——一个未经异族统治或污染前的民族共同意识与文化，并经由此予以认定与保存。

到了《国粹学报》创刊之后，国粹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05 年，黄节撰《国粹学报叙》，则比较接近邓实以上所言了。他开篇即如邓实所说的，曰中国已经不国不学于异族了。他说道：

吾国得谓之国矣乎？曰不国也。社会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者也。吾学得谓之学矣乎？曰不学也。万汇莫不统于逻辑，阐为心理，而致诸物质者也。……四彝交侵，异族入主，然则吾国犹图腾也；科学不明，域于元知，然则吾学犹未至于逻辑也。奚以国？奚以学？⁶⁹

黄节进而言道，“对于外族则言国，对于君主则言国，此国之界也。国界不明，诸夏乃衰。……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学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学，而非吾民族之学也。而吾之国之学之亡也，殆久矣乎。”⁷⁰这比之前所言清楚得多了。在这里，国界之分有二，一为相对于外族的，另一是相对于专制的朝廷。这种论述在学理上虽然牵强，但与前述邓实一样，政治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提倡国学或国粹，不仅和民族主义，而且和民权主义都联系起来，说明它对于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可以为国学当时被批为与专制相系之说解脱，另一方面则可质疑历代专制政体，包括清廷的合法性，即它并非在“国学”的范畴之内。邓实在不久之后亦发表“君学与国学”之辨，更具体的把清廷与国学相分离。他又特意引进民主的观念，把国学解释为和“君学”相对立的学问，说“君学”不过是“伪儒之学”，国学才是“真儒之学”。说“国学”是“帝王不喜”的学问，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本其爱国热忱所创造者。⁷¹

邓实也指出：“自汉立五经博士，而君学之统开；隋唐以科举取士，而君学之统固；及至宋明，士之所读者，功令之书，所学者，功令之学，遥遥两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学之天下而已。”他又称：“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为真儒之学。若夫伪儒学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苟以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取媚时君，固宠富贵而已。”⁷²可以看出，这里已有从“君主”导向“国家”为主体的意识变换。邓实是想按照所接受的现代民主观点，对中国固有文化做一些分析，避免把国学变成不辨良莠的一味复古。但是吊诡的是，他所推崇的国学大家顾炎武、黄

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就很难说全然和“君学”相对立。至于他所奉之为代表着“神州国粹”之“正气”的代表如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诸人的言行，自然更未能与“君学”相背。国粹派的这种文化观念，使自己陷入了既想光复“皇汉文明文物”，又想实行民主革命的两难中。⁷³

看来，炽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国粹主义文化观无法以严密的逻辑自圆其说。但是，如果把这个说法放在清末的时代环境下考量，我们也许就不觉得有何唐突之处了。在国粹主义者的论著中，像“庶几复古，无愧先民”，“魂兮归来，光我祖国”之类语言，俯拾皆是。他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汉族固有文化传统，亦把先秦文化奉为完美的“道统”论，说中国的国学就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从而皈依于正宗的“道统”论，而这道国学正统已经沦失。邓实说，经史诸子，“礼乐其大经、人伦其大本、夷夏其大防，夫是之谓中国，夫是之谓中国之学”，但中国“学之亡也，亡于秦火之焚，而专制之政体出；国之亡也，亡于五胡之乱，而外族之朝廷兴。专制出，则学其所学，而非吾之所谓学矣；外族兴，则国其所国，而非吾之所谓国矣。非吾学，则谓之异学；非吾国，则谓之异国。异学异国，充塞吾神州之土”，是则“国之不国、学之不学也久矣”。⁷⁴在这里，邓认为国学是灭亡于秦火与专制，与黄节所说灭于异族有所不同，但他亦以为国则灭于外族，即五胡，而中国人种亦因此大为衰弱。邓实认为，中国人本轩辕贵种，但“晋氏失计，首召五胡以乱华，坐使神州陆沉，宗社邱墟，而中国之人种一弱。石晋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使北方衣冠久沦草莽，而中国之人种再弱。宋室偷安南渡，三镇不守，两河不固，终至一丹正朔，沉埋碧海，而中国之人种三弱”。⁷⁵

就是这种“国不国而学不学”的状况最终造成了外族入侵。外族不仅“窃吾之国，并窃吾之学；阳袭其崇儒重道之名，阴行其压制芟锄之实”。邓实观察到从属于夷族的石勒、元魏、北周到女真，都有类三代明王临雍劝学之盛举，历代史臣多称颂之；但他本人却不承认其“曰国曰学”，盖“吾国有吾国之界，吾学有吾学之界，不可得而乱也。乱其国界学界，则礼乐之大经废、人伦之大本淆、彝夏之大防溃，而人道泯绝，天地亦几乎息矣”。⁷⁶换言之，不是历代异族皇室不接受中国之“学”，而是邓实等人不承认其“窃学”的行为。故他主张“不罪窃国窃学之大盗，

而罪卖国卖学之伪儒”。如张宾、许衡一流立身伪朝而推行汉仪者，应“大书特书曰卖学贼”，且“其罪浮于卖国”。⁷⁷黄节亦认为，“吾中国之亡，殆久矣乎。栖栖千年间，五胡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⁷⁸但他接着论述中国之学也久已亡时，则以为“学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学，而非吾民族之学也”。⁷⁹这种论述之动机似乎在于赋予国粹运动以正当性：既然中国之国之学俱已亡于外族，“庶几复古”，才“无愧先民”。是职之故，重新建立汉民族国家，亦是应行之路了。

简言之，我们可以从国粹中人的论述中找到更多这样的叙述。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我们看到，保存文化传统以建构汉民族国家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传统文化的定义，中国学术与文化只限于先秦之前，被认为具有异族影响的文化传统都被否定了，即使它是历史中自然发展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文本，过去的历史经他们搜集裁剪之后，成为一篇篇具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社会记忆。诚如宇文所安所言，在二十世纪，许多人常常考虑的是如何“保存”传统文化，然而当它变成一个被“保存”的东西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文化常常成为怀念的对象，“保存”本身改变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本、实体和具体实践。⁸⁰其实在现代之前，每一个伟大的非西方文化，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一个多元的、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媒体，人们通过这个媒介思想与行动。但是，当它被保存起来的时候，一个原本活跃的媒介僵化了，成了一个固定的思考对象。⁸¹然而，此种选材、裁剪到保存的过程中，具体蕴含与表现了他们在其时代与社会背景中的认同、区分与相关情感。

第三节、反欧化、反帝国主义与世界位置

前面已经说过，甲午战败以及接踵而至的庚子事变以后，亡国之忧日炽，举国风气为之剧变，“废科举弃旧学”的呼声也几乎成为朝野上下救亡图存的共识。当时的人们认为“旧学”之弊主要就是科举八股之弊，其要害是“虚”而无用的，“新学”才是“实”而可致用的学问。⁸²所以，“改科举，兴学校”，“轻帖括，重格致，贱词华，贵物理，兔园狗

曲易为经济之林”，成为废旧学兴新学的社会共识，而科举八股被认为是“天下最无补最无用”的当废之旧学。连带的，各个传统领域都深受冲击。因此，所谓的“西力东渐”不只体现于西方的军力威胁，当时所谓的“欧化”之宰制力亦是当时中国人的亲身体会。

3.1 欧化中的文化认同危机

前面已探讨国粹派在内在的反满课题上的反应与论述，接着我们再来缕析国粹中人如何回应上述欧化潮流所带来的一系列认同危机与文化融合的议题。实际上，所谓的欧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个全球后进国家必须面对的所谓现代化问题。现代化发端于西方，所以现代性问题对于西方而言，虽然也是与中世纪的断裂，但依然称得上是一种逻辑性的顺延，但是对于中国人以及其它的后发国家人民而言，则意味着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基于一种军事和经济强势的逼迫，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是外在的，而非内发的，这导致了制度层面的巨大断层。⁸³自 1895 年至 1920 年之间，这种断层使中国发生了一种“取向的危机”。⁸⁴据张灏的研究，“取向危机”是指文化思想危机深化到某一程度以后，构成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随著动摇，因此人的基本文化取向感到失落与迷乱。张并指出，这所谓的“取向危机”之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认同危机”。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与西方接触以来就逐渐发现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与从前中国自认为是“天下”或华夏中国的世界很不同的新天地。他们蓦然发觉，中国实际上仅仅是“万国”中的一员，而且传统上被视为“化外”的“夷夏”——西方文化——竟然如此“先进”，因此中国人在认知上很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一种对这新世界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藉此帮助他们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相对于世界其他文化与国家作文化自我定位。⁸⁵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就存在于在原先背景下比较一致的形象在新的背景下被多元化了。⁸⁶

如此说来，国粹中人所作的思想挣扎与摸索一部分是发源于上述一种文化自我认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认同感是一种强烈的情绪成分或心理深层需要。由于转型时代的中国传统思想核心发生动摇，而就在同时，中国进入一个以新的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因而，中国顿时由一个世

界中心的地位降为文化边缘与落后的国度，自然产生文化失重感，群体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受损伤。章太炎就有类似之观察，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必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⁸⁷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呈现的一种正相交关系，但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而现代化在当时又无异为西化，于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正是这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自然造成中国人内心思想的困境与心理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这也是美国学者列文森于1950年代提出的问题。⁸⁸列文森也许夸大了这情意结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中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是转型时代出现的认同危机的一个基本环节。以国粹派中人的背景而言，他们的生命大多植根于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中，而面临这一种与过去的“断裂”的局面下，自然会引发他们内在文化认同的焦虑。如果说国粹运动是一种寻找文化认同的过程，那么他们对国粹的讨论实意味着他们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认同出现混扰。

在此，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国粹中人眼中当时的欧化程度，唯此我们才能理解他们对欧化的反应。有些学者以为，1900年代的欧化趋势未至于严重的境地。⁸⁹但是在国粹学派众人的笔下，则显然与此相反。据邓实在1908年回顾当初创办《政艺通报》的现身说法，是由于“欧风东渐，国学几灭，著者抱亡学亡国之惧”，才起而著文，以图止横流、维学风、救国家。⁹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迭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为尤酷”。过去国亡而尚有传经之儒，“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致富强，遂谓国学而无用”。当时的情形已是“户肄大秦之书，家习佉卢之字；宿儒抱经以行，博士依席不讲”。一切学术典籍，“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⁹¹

实际上，西力包括文化力之侵入确实无所不在，许多人都被其所震慑。黄节也有近似的发现：

此近今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丁无学之世可也。海警迭起，风潮颺忽，中原四至，御侮无人，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谓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于是而求西学，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方言之学堂，翻译之会社如云而起，盖不待秦火，而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之文不及十年，吾知其必尽归烟灭矣。⁹²

这种“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而认为国学不足取，以崇尚西学为救国之本的现象，在他看来，如此必将导致中国自取灭亡。甚至于，竟有人发现在各大城市书肆中，旧籍已十分鲜见。张南即云：“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中学，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⁹³除了国粹学派众口一词认为当时正兴起欧化主义风潮之外，支持革命的《神州日报》也描述道，“今欧美风潮卷地东下，万马齐驱，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吾之所重者，又在彼而不在此，时趋所尚，久且视为固然，数十年后，必致人人以服从为义务，不知祖国为何物，爱国为何事，其害不忍言者。”⁹⁴这样的论述在国粹中人的言论中俯拾即是。他们这种来自时代现场的感知提供了我们一个讯息，即至少对国粹论者而言，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西力入侵及其激起的欧化思潮实已成为当时一种思想权势，认同危机确实发生。

然而，既然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与国家，文化认同自然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而文化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密切相关。因此，文化认同危机就是民族认同危机。他们以为，作为一种共同体，身份与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也是如此。故大体上，所谓的认同危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么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又如何立足于世界？

3.2 立国之公理：民族—国家独立与世界位置

认同其实是一种识别，因为每一种文化总是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而实际上，以现在的术语来形容当时西方文化强势性东来之局面，应可谓之为“文化之全球化”。在这个现代化或全球化的过程，对于那些后发的国家而言，是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他需要重新识别自己。

面对这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的局面，作为中国人该如何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以避免被此大潮席卷而去？所谓“主体”（subject）、“主体性”（subjectivity），是在文化论述中通常会出现的概念，这里有必要略作交待。具体地说，所谓“主体”是一种“自我意识”，而“主体性”是指具备成为“主体”的条件、特性、品质。从所谓“现代国家”的根本精神说起，那就是“认同”（identity）的问题。在政治学意义上，中国及其文化是否够格成为被认同的终极对象与目标，在于“中国”自身是不是一个被认同的“主体”。实际上，发掘种种文化资源有利于中国人的精神依托，以凝聚身份认同。假若共同体成员不认同这种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向民族“文化”认同的链条被打断，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该共同体的解体。此时，虽然该共同体的物质形式，诸如领地、人口、制度都还存在，但却因丧失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言、习俗、信仰和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共同体已经实际上消失和死亡了，或为外来文化所“化”了。对国粹派而言，在近代一种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中追求富强与现代化，导致以内在精神——国粹——为代价而依赖外部情况是危险的。而且，如果中国文化不依靠它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更新，它就将消亡。⁹⁵更重要的是，国粹运动也引进了一种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把它看成一种绝对，一个价值的宝库，处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却又是必须据以估量这一进程的评价标准。⁹⁶

为了回应这“被化”的挑战，他们对应的方式是，号召所谓的“学战”，因为：“吾不暇悲吾学之亡也，而吾所大惧者则惧吾学亡而吾国即亡也，盖未有学界乱而国界不乱者也，国界乱则吾将恐其始而慕欧美之学者，继而慕欧美之政，终且有愿以欧美之种族。君吾之士，而不以为怪

者！悲乎！使吾言而信，则吾黄帝之子孙，遂长为白人之奴隶以没世矣。”⁹⁷他们所担心的是，一旦“学亡”，也会跟着“国亡”，国人追逐欧化，而连自身的民族认同也遗失了，进而永久成为白人之奴隶。另一方面，犹如前述，在他们看来，学界就是区分国界之所在。邓实即言，“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⁹⁸国学一一决定了国家独有之特质，因此必须加以保护，才不会在欧化趋势中失落。当时有人说，“凡国于地球上能历久而不敝者，非无故也，……国粹主义为之也”；⁹⁹这其实分明又是一种以文化定义国家的另一显证。在他们的思想中，民族身份是一个文化范畴的问题。一个人的民族性特点，即深深地植根于文化结构里。

当时的士人，也相当热衷于翻译与介绍其他后进国家人民被殖民与亡国史。¹⁰⁰从世界各国殖民史中，他们似乎也从中领略到文化与民族一国家存亡的相依连。此处拟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比如邓实就曾如此总结道，“亡人之国，必先灭其学；堙人之种、覆人之宗、去人之人伦，必先灭其学”。黄节也观察到英俄等国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因此他认为，保国就当保学、保存国粹，因为“立乎地寰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有人干脆认为，正因为欧美重古，又善取他人之长，故特别重视灭人语言文字：“彼号称学术渊薮之欧美强国，事事不苟安于其故，善能取他人之长以为我用，故新理新法日出不穷；而于古人图书制作，网罗搜讨，好之也乃弥挚。斯其国之独立精神与人民之爱国心深固盛大而不可摇者，盖有由矣。至转而灭人家国也，则并取其语言文字而灭之，使汨焉无复有所维系，神离其舍而徒躯壳，乃惟我所欲。”盖“文者，治学之器也。无其器则工不治。是故学之将丧，文必先之”。而学术典籍更是所谓“国学”之载体，“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特”。所以“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全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¹⁰¹由此可见，当时人已经从各国的亡国史中，他们领悟到“存学”以“保种”、“保国”的重要性。面对

被西方列强即刻瓜分的危机，他们尝试以保存国粹来激励民族主义及凸显国人的认同，并以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罗素的一句话：“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与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在 19 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¹⁰²在这种全球化或者也可以称作是霸权主义的威逼下，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大多只能以本国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在他们看来，与中国危机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化的危机之解决，在于中国能否真正建立起拥有中国人共同指认的文化特性（identity），以在它们之间培育起新的、经得起现实压力和未来考验的文化向心力。

王淄尘在 1930 年代的《国学讲话》中对“国学”、“国粹”二词与国家意识及民族认同的关联有极为透彻的观察。他指出，“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成为国学。”¹⁰³确实，中国过去都以天下自视，如果没有国家观念之出现，“国学”与“国粹”即无从出现了。此处作者深刻的点出了国粹与国家意识的关联，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淄尘进一步谈到：

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简称‘国学’。¹⁰⁴

把国学、国粹的出现归因于不满意“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点出了国粹中人已经摆脱了“进步线式”的文化观，认为传统文化不能以“旧”字来概括与形容。联系及郑师渠先生的观察：“国粹派”的中西文化观在 1904

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进化程度上判分中国文化总体上落后于西方，转变为从类文化的观念上判分中西文化为独立、平行的两大文化体系，¹⁰⁵——这表明了国粹中人已发现文化差异与传统的相对性，而不能动辄以落后视之。

在面对欧化主义的挑战方面，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人为例，他们无一例外于此，一方面他们虽有运用“以西证中”的方法来阐明国粹的一面，但同时还有抵抗整个以欧化为社会潮流的趋势，坚持国粹的相对独特性的一面。当时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寻找中国及其文化在世界的位置。但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突显国粹的相对性，以竖立国家的位置呢？显然的，这种位置感确实需要，而且必须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源流作勘定，以及辨别民族身份始能达致。一个民族国家正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身份独立地面对其他民族国家，民族认同是国家独立完整的表现。¹⁰⁶通过民族认同的追寻，人们才知道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定位置，并能归属一个有力的集体。也只有通过国粹，才有爱国心与认同感，邓实说：“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¹⁰⁷一篇名为〈论保存国粹与爱国心之关系〉的文章也说道，“……夫所谓爱国者，以其国有可爱者也。吾国近年昌言变法，朝野上下咸醉心欧美表面之文明，求其学能会通中西者，白不一二，遭利禄所在，如蚁附膻。自今以往，更数十年，人人不知国学为何物，……夫既以弃国粹如牟髦，以致割地而不知痛，赔款而不知羞，为奴而不知耻，爱国心之缺乏，其祸一至于此。”¹⁰⁸故此，作者认为，“欲求爱国，必自保存国粹始。”如中国固有语言、文字、礼俗、特别是“疆宇”、“武功”、“文教”，“至于尼山著春秋，为民族主义之权舆，邹峰成七篇，有共和政治之思想，是尤为我国粹中之至粹者。”¹⁰⁹

国粹论者以为有国粹才知有国，因此他们进而言道，没有学，国就不成国，也就没有国了。早在编辑《政艺通报》时，邓实即提出，“国必有学而始立，学必以粹为有用，国不学则不国，学非粹则不学，非学不

国，其将何以自存矣！”，“一国之学，即一国兴亡之本，而一种人心灵之所开也。”¹¹⁰黄节则在〈国粹保存主义〉中指出，“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哪又是何种精神呢？这精神起于“析六洲黄色、白色、黑色、铜色、棕色人种而成一社会，一社会之独立而成一国家，一国家有一国家之土地、之人民、之宗教政治，于是其风俗、气质习实遂各有特别之精神也焉。”¹¹¹显然的，他们坚持以文化建立民族边界，也以文化建立自身的独立性与世界位置。民族文化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借以展示自己独特身份、拒绝被融入全球文化系统的一种抵抗模式。¹¹²实际上，晚近许多人类学者已经一再指出，一个群体只有在被逼到自身文化的边界(boundary)时，才会“发现”本身的文化传统，并对此一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掘及重估。晚清的志士们便是基于这样的威胁与对比之下，尤其是来自西方这异质文化正以绝对的强势挥军而来，自然不得不对自身的传统展开重构。

显然的，“一国有一国存立的基本因素”以及“学界决定国界”为他们反复强调，可说是他们论述的基本立场。但何以“国粹”或“国学”可起此功效呢？之所以如此，其实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国粹”承载着他们所反复强调的“种性”。邓实也说过，“吾国之学，经历代专制君主之改变、外族朝廷之盗窃，其精意亦寢微矣。然其类族辨物之大经、内夏外彝之明训、《小戎》之赴敌、《秦风》之同仇，固发于吾一种人之心灵，演成学理绵延至今，传为种性而未尝灭也。未尝灭，则保此一息以为吾国之国魂学魂，将天地之正气犹有所系，而中国或可以亡而不亡。”¹¹³邓实在 1904 年论保存国学时亦说：“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者。盖学者，所以代表其种人材之性而为一国之精神也。”¹¹⁴1910 年，陶成章在东京创办的“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为旨的《教育今语杂志》¹¹⁵中也说道：“环球诸邦，兴灭无常，其能屹立数千载而永存者，必有特异之学术，足以发扬其种种性，维护其民德者在焉。”¹¹⁶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只要“种性”在，汉人的特质才能传承，而且是决定中国存亡与否的前提。章太炎偶尔也会使用“国性”一词，其意思大体上都指向汉人特质。章在民国后最著名的说法是：“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¹¹⁷在这里，国与种并列，显然说明两者之间没有差异，只是“种

性”是为种族革命之需，“国性”则是建立汉民族国家时所使用的词句。大体上，国粹派所指涉的汉人“种性”或“国性”——“中国之所以中国”的基本因素——成为国粹派中人所谓的“主体”特性、品质、条件。因此，这个主体性之建立，是建立在中国汉族过去的种种“事物”（thing）之上。为此，他们必须发掘种种文化象征与资源，以塑造、创造或定义合乎中国当时生态、历史条件与社会期望的象征物，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重大工程。这些“事物”除了必须是理想盼望的、具有历史依据的表征，而且还要是中国所独特的。

马叙伦亦提出，“国之立也，有大宝焉，是名曰国粹。国粹存则国存，国粹亡则国亡，国粹盛则国盛，国粹衰则国衰”。而“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毋论政治、学术、技艺三者具备，其国固必大强，即三者能得其一，国家亦必能小治。……泰西诸邦，皆各守其特性、各崇其国粹，莫有弃其国粹而盲从他人者。如东邦日本，维新以来，几尽弃其旧学而从泰西矣，然近日彼邦士大夫亦斤斤以复汉学为务矣”，可知尊崇本国特有的国粹是“立国之公理”。¹¹⁸许之衡的见解与马叙伦略同，他也认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许氏注意到，世界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印度，“皆以失其国粹，或亡或灭，或弱或微；而我中国犹岿然独著于天下，不可谓非天择之独厚也。毋亦我古先哲贤抱守维持，而得系千钧一发以至于斯乎？以群古国之文明而独竞胜于我国，其必适于天演之例可知也。其优胜适存如是，其光明俊伟如是，此正爱国保群之士所宜自雄而壮往者也”。¹¹⁹

当时一般言及波兰、印度等亡国史，多以之为例而警戒国人，许氏独见各大古文明中惟中国能竞存而“适于天演”，故中国之往昔完全可以“自雄而壮”之。章太炎也认同这样的“立国之公理”，说：“外人所慕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¹²⁰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¹²¹国粹

中人显然觉察到文化的特殊性格，以为文化是由特殊的环境与历史所构成。他们这些观点其实表明，他们的文化观建立于“文化相对论”之上。所以，他们才坚信中国文化必须保留，才能显示中国在宇宙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不然，即使国家未亡而国粹亡，中国一样“无国”。

简而言之，这些国粹中人深信，国家可以通过文化保存，而得以存在。也就是说，民族—国家随着其文化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其文化的壮大而壮大，最后亦随着其民族特性的丧失而消失。此种联系沉积于历史，但是否同样展现于时代中，以及民族的当下生活，是否是民族历史的进行时态呈现，国粹学派中人似乎没有就此多作深论。然而无可否认，面对中国的积弱，以及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现代化需求，他们也知道不能无视西学的存在作用。但两者关系应该如何？实际上，国粹思潮尽管是与欧化主义相对应的一种学术及社会思潮，但却未必就是绝然的对立面，国粹主义者也并不一味地反对西方学术。黄节早在1902年《政艺通报》上就指出：

一国家有一国家之土地、之人民、之宗教政治，于是其风俗、气质、习惯遂各有特别之精神焉。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其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¹²²

易言之，他并不反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为别国的优点而符合本民族特点的，都可以融合与吸收，但不合国家特质者则应该摈弃。明显的，他的接纳外国文化的限度与前提就是必须符合民族本质，不然民族特质就会受到压抑，导致亡国灭种。

在《国粹学报》上，也出现许多接受西方文化的声音，如：“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这也就是说：“国粹”与“欧化”不仅可以不相妨碍，而且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所以说，“是故国粹以精神而存，服左衽之服，无害其国粹也；欧化以物质而昌，行曾史之行，无害其欧化也”。¹²³也有人更

进一步解释道，提倡国学之举，“于欧学无新旧抵牾之虑。世衰道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达变之士方议沟通释耶，合炉熔铸，岂犹谬袭成见，阻塞新机。”¹²⁴“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¹²⁵从这里可知，国粹中人在追求中国民族的特质与其文化在世界的位置之时，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在接收西方现代性时，不会遗落自身的特质。实际上，认同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传统遗产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但当欧化主义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他们提倡国粹的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对欧化主义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从《国粹学报》内涵来看，他们似乎忽视了介绍所谓的欧化，而一味提倡与叙述有关国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欧化过程将带来的是中西文化如何融合的过程，以及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以及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但国粹中人欠缺这方面较具体的论述。

宋恕也有近似的看法，尽管他不是“国粹学报”的一员。他指出，“何以彼（指日本）多真者而我多伪者乎？此之问题，所关非一，而即教育言之，则岂非由于彼当维新之前素有特别之教育，而我则无之之故欤！然彼维新前之特别教育，如昌平黉及诸藩学等，要皆但有国粹而无欧化。乃其后调和欧化之杰，皆其前传习国粹之豪。则岂非欧化与国粹同源，而欲求能调和欧化者之多，必先求能传习国粹者之多之明证欤？”。“故本国之粹若微，则外国之粹自然亦格格而不相入；本国之粹若盛，则外国之粹自然亦息息而遥相通。苟其所坚守者皆非本国之粹，则其所欢迎者自然亦非外国之粹”。从其日本的经验出发，宋恕比国粹派更进一步肯定国粹，因为国粹不只无阻于欧化，反而是欧化的有利基础。宋甚至断言，亚洲各国“不能如日本之全不受外侮，即由于国粹不能如日本之盛”，¹²⁶国粹反而是国家强盛的要件。这种一方面强调国粹，一方面强调不阻欧化的思想其实说明了他们明确理解到固有文化不足以成为一种得以解决国家所面对危机的资源。梁启超其实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曾很清楚地指出：“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遽

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青年劝也。”¹²⁷

3.3 有是地故有是华：文化特殊性与主体性之追寻

无论如何，在面对中西文化的关系上，他们不免都要思索“民族性”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张力与“限度”的问题，这也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探的中心议题。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发的类型，中国知识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现代化之际，也能保留传统。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生存于世”以及“必有于立”的问题。在繁杂交错的经纬线中，简单的说，国粹论述的其中最大目的是在于追求“必有于立”。当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从社会与政治层面说，它必须是“民族”的，必须做到民族独立、民族自觉，而且必须拥有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国粹派的反清革命所具有的史之意义，即在于在这个革命的目的上，从最初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族化”。从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打点它的精神行装，这种“精神”也必须是“民族”的。国粹论述几乎极度的强调民族精神的一面，这同样具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我的“精神”，确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一个“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将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被排斥于世界之林。国粹派可说基本上就是意识到“全盘欧化”的危害，就责成中国人认识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并作了许多切实的努力。

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士人不管是国粹派中的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人都有相同的共识，即：“一国自有一国之学”。他们近乎一致的认为，一国皆有自身的特殊性，而且这正是一国之所以存立的前提条件。这也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眼光。章太炎说，“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枝，唯国粹则为特别。”¹²⁸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章氏认为，民族独立是建立在国粹的基础上的，国粹可以彰显一个民族，因为它是特别的。国粹中人处在西方冲击的大环境中，之所以坚持“种性”的重要性，其目的是在于寻求中国及其文化在现代大潮流中得以延续、独立与

自主。但他们在寻求本国文化之自主之际，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也呈现了一种多元的文化思惟。这种多元思维则又建立在他们的“文化相对性”的认知上。

章氏可说是最好讲文化的相对性观念。¹²⁹由于在西学冲击中国时，是夹着其船坚炮利之优势战胜式微的老大中华帝国，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西方现代文明就等同文明，很自然的将现代等同欧化，这是一种文化一元论的看法。在加以受到“天演论”有关人类进化论的影响，很多时人不认为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人类共同文明的现代发展，并加以追求欧化。这就不禁激其章氏痛纠其偏的念头，所谓：“四裔诚可效，然不足一切画以自鄙。”¹³⁰他认为中西文化本各有特色，不可以西方为座标来度量中国，所谓：“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¹³¹又说，“世之以不类远西耻，余以不类方便为荣”。¹³²汪荣祖在〈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指出，尽管章太炎也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但正因其洞察本国文化的环境与特性，他一开始就不曾以西方等同现代，而想要建立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在章氏心目中，现代国家绝不是欧美民族国家的翻版，而必须具备中华特性。¹³³章氏的文化差异认知由此可略窥一斑。

具体而言，章氏的个性化思想反映于他的《齐物论释》，¹³⁴他对此书亦自视甚高。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中年以后，著纂渐成，虽兼综古籍，得诸精思者多。……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又说：“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¹³⁵有人认为此书直是相对主义的代表作。¹³⁶出于此种对人之个性的讲求，他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也特别注意讲求中国文化的个性。他反对时人“偏心”于“别国的学说”，甚至拿别国的中国学来衡量中国的作法，认为：“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象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¹³⁷这对当时动辄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风气，不啻为一项当头棒喝。其实，他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长处，但他同时对中西文化间的“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分得很清楚，所谓：“至于别国所有

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但）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¹³⁸

正是由于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将彼此分得很清楚，所以他对中西文化间的会通作法总持持重态度。也正是出于此种持重，他常常批评中西文化间的任意比附作法，所谓：“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即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¹³⁹在他看来，中国人追求进步的最稳妥办法是向后看，汲取古人的经验，所谓：“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象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¹⁴⁰因为民族性是有其传承一面的。他又讲：“贷金尊于市，不如己之有苍璧小玕，况自有九曲珠，足以照夜。”¹⁴¹但是，学习古代经验必与当今“人事”相结合，方才有效。否则，“方策虽具”，如“不能与人事比合”，学犹未学。所谓：“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侯；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¹⁴²

其弟子黄侃回忆章氏当年在日讲授国学之旨趣时，曾指出：“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¹⁴³正是出于此种目的，章氏特别注重讲“中国独有之学”，如《章太炎答问》所揭——“问：‘先生讲何种学？’答：‘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¹⁴⁴在章氏看来，在国学中与他国之学有交叉的领域，或可与他学互通有无，惟独小学、历史不可这样做，因为只有这二者，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如果连这二者也失去了，中国也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如其在述其编次《新方言》宗旨时所言：“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¹⁴⁵

大体上，在论证文化特殊性时，国粹中人假定文化发展由于地方性或地理因素，而产生歧出。章太炎在论析“万国新语”不可行时，曾指出其欧洲地方性局限，并说道：“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

有。……在彼则以便俗为功，在此则以戾匡从事。既远人情，亦自相牴牾甚矣”即是一例。¹⁴⁶然而，或许黄节的“有是地而有是华”最能概括其等之立场。¹⁴⁷黄节认为，一个民族因其土地、人种、宗教、政治之不同，于是其风俗、气质、习惯遂各有特别之精神。“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¹⁴⁸黄节的意思是，国粹是向适合于本地因素的外国之宗教、政治、风俗、气质、习惯开放的，因为土地因素自会发生作用。黄节认为，“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譬如土地甚荒，人开垦之而树以嘉木，即可葱茏。“夫地之宜于植也，其生是嘉木，犹其生是棘榛也。是宜于植者，地之粹也。因其宜于植而移嘉木以植之”，其能“焕然秀发者，虽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地然后有是华，不得谓非是地之华也”。¹⁴⁹

邓实给“国学”定义时谈道：“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因此“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¹⁵⁰这一界定指出了国学“本乎地理”这一重要原则。邓实在此之前也指出，“国之有土地、人种，则其质干也，其学术则其神经也，其风俗政教则其貌也”。而风俗政教又“同出于学术”。¹⁵¹学术与土地人种合，则其学行、其学传，反之亦然。“学术者，以之造风俗政教；而土地人种者，又以之造学术。是故欲改变其风俗政教，则必改变其学术而后可；欲改变其学术，则必改变其土地人种而后可”。这就是说，土地、人种之不同，文化亦异。因而，一国自有其特殊的文化，不能以他族文化为自身的文化。如果要如此，必须把文化繁殖的前提，即土地与人种更换，但这是不可能的。“欲易吾学以为泰西之学，则必先易吾土地人种以为泰西之土地人种”。因为前提一旦更换，实际上就是亡国亡族了，既使“学术虽甚灿烂，其已非吾物矣”。这里，邓实是要辩正当时一些人一味追求欧化的错误偏颇。他认为，如果真的吸收异国文化，只能在固有文化之上移植。故邓实所建议的先光复固

有旧道德然后接收欧美新道德的提法与黄节“有是地故有是华”的观念是相应的。¹⁵²

实际上，黄节所谓“后有是地然后有是华”的主张经邓实如此补充论证后，才更全面地体现了国粹学派的特色。这是理解国粹学派的一大关键，在新的“国家”观念传入后，他们最注重的是土地，其次才是人种以及程度稍减的风俗等，惟于学术则既知不能不吸收，干脆正面接受之，并融会各种新旧观念以强调其正当性。¹⁵³总之，国粹中人注重土地与环境对文化与民族的意义，他们强调以国土来确定国学与国粹。一位国粹中人田北湖即明确指出，“东西文字，各有短长，本其土俗、人理、习惯使然”，“国家之建造与其成立，所以显明之者，土地也，人民也，文字也。沟画内外，宰执始终，苟缺一端，则名实之间离矣。失其依据，将安存焉。”¹⁵⁴他也强调土地为民族特性的其中一大端，若失其一端，民族性岂将安在。1903年，章士钊也强调：“凡立国，必有其天然之国粹，不与人同”，既使因时世之逼不得不有所变，“而其所席之旧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之，吾未见其能自立国者也”。¹⁵⁵

一言以蔽之，国粹中人强调的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必须彼为客观，我为主观，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忘自身文化本位。邓实主张对异学不必排斥，而应“罗列古今五洲万国之学术于吾前，以吾为主观，以他人客观，而研究之，而取舍之。轩文轶野，去绣发莹，以扶植吾中土之正气、振发吾汉种之天声”，最终“树立我泰东吾千年之学术于太平洋中央，结为文明花，张以五色幢，以与彼美人兮结婚于西方，芬然大吉祥也。岂不懿哉”！¹⁵⁶黄节也言道，“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¹⁵⁷可以说，这些论述都非常强调面对异文化时，应该持守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持守主体性。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兼具历史（民族文化）和天下（世界）情怀和视野，强调基于民族文化本位裁判并择善而容纳西方文化。

总的来说，对他们而言，民族化与现代化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许守微所谓“国粹无阻于欧化”就已明确说明了这层意思。¹⁵⁸在文化建设方面，他们强调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兼采西方文化之长，中西互补，创造

近代新文化。章士钊指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¹⁵⁹章太炎也多次强调，文化多元性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无矛盾之处，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其国家尊严，应该并行不悖。¹⁶⁰邓实在《东西洋二大文明》中指出：中国文化属精神文明，西方文化属物质文明，主张“以我之精神而用彼之物质，合炉同冶，以造成一特色之文明，成一特色之国家”。¹⁶¹

第四节：小结

简单的说，大约起自 1900 年代初，中国遭遇了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携带而来的欧化主义之威胁，中国之存亡以至其世界观与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挑战，于是乎一种对中国文化特性/认同的焦虑于焉出现，而且起初主要是由国粹中人表现出来的。因此，国粹运动可说是中国人追求文化与民族认同历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大致是围绕着诸如“国粹”、“国学”、“国性”、“民族”以及“欧化主义”等关键词展开的。这些关键词提供了中国人一种理论，用以讨论或建设种族、文明以及民族认同，并用以建构民族国家国家，与解决在现代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矛盾与困扰。¹⁶²晚清国粹派是要寻找民族的独特性和本原性，并以此作为中国融入世界，让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一个拥有自我而独立的一个现代国家—民族国家。

在亡国忧思与欧化之风狂热吹起的势头上，以再造国家和倡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旗帜的“国粹”主张经开始潜滋暗长，并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成为 20 世纪之初中国文化发展与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展开的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二方面的观点。即一，大力提倡国粹、种性（国性）之间的关联，鼓吹保存国粹，以为国家的前提在于文化的保存，而且这个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中心。二，由当时世界性的欧化主义的全面扩张所引起的传统人文文化的危机，联系到中国人文文化的危机。国粹中人坚持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相对性，并超越了当时因“天演论”而盛行的直线式进步观，认为一民族文化不能以落后、先进来区分。毫无疑问，国粹派众人试图通过提倡国粹的方式为中国人寻找一个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以解决当时的中国文化特性/认同的焦虑。实际上，我们

可以看到，他们的认同焦虑比起他们同时代人更深层，也更困扰，这才使他们一跃而起，大力提倡国粹运动。

当然，由上述几方面的观点，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争论。当时他们可说相当正视中国存亡的危机与中国文化特性/认同焦虑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它们正面、直接地从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去思考问题。但是，他们却未处理有关他们对中国汉民族文化特性/认同之强调与中国本身客观存在着的多民族性特点之间的矛盾，尤其对满洲人的排斥。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一套国粹论述，一方面使得汉民族意识苏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与朝廷逐渐分开，客观上促使更多人响应排满革命建国。

由于国粹主义者相当注重民族国家建构，而且建构了自身一套“国粹论述”。傅科在论及论述实践的知识建构作用时，指出：“论述实践的特质在于其厘画出知识对象的范围，界定了知识主体的正当视野，确立了概念与理论阐述的固定规范。因此，每一项论述实践都涵蕴着一套规诫的游戏，标明了其拒斥与选择的界线”。¹⁶³国粹论者其实同样也为当时及此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设下了一套知识生产的轨范与标准，国粹主义者在清末奠定了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不仅提供了文化民族主义关注的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语言和价值取向，如“主体性”、“只有文化可以彰显民族之存在”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中国传统主义者当中散播一种强烈的汉民族意识，激发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和捍卫传统的冲动。但以当时传统文化因国家衰弱而成为负面的箭靶时，他们提倡国粹的客观条件是相当不利的。他们的坚持其实需要非常难得的勇气。

随着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国粹派宣称民族革命已大功告成，所谓的汉族国家与认同也已经建立了起来，从而国粹论述大有呈缓和之势。然而实际上，革命之成功是否意味着汉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这是一大疑问。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基于现实考量及兼顾中国多元族群的实况，而改称“五族共和”，¹⁶⁴这显然与国粹派的汉民族国家目标不同。但排满的目标确已达致，而从国粹思潮自身的演进历程与排满革命运动相关联的角度来看，革命之后，它确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1910 年，即辛亥革命之前夜，章太炎初刊《国故论衡》（“论衡”义本王充，尤有商榷批评之意）时，已取较中性的“国

故”而舍“国粹”一词了，这似乎透露了国粹思潮的逐渐转折。¹⁶⁵实际上，于1909年，章太炎给“国粹学报社”写信，已经觉察到《国粹学报》逐渐失去“市场”，他在信中说：“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绝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¹⁶⁶章太炎的确看出了国粹主义笃守旧说而没有生气的病症。更重要的是章氏指出了《国粹学报》从“存亡继绝为宗”（其实即指着重从“国”的角度思辩传统学术）转变至“笃守旧说”（意指着重存学术研究）的情况。南社的姚光也指出国粹派此倾向，即似乎远离群众，往学术研究倾斜。他指出，“《国粹学报》近日流于干燥无味，不合报章体裁，使后生小子见之，益觉望洋兴叹，殊非提倡之道。弟尝思作书辩论，碌碌未果。”¹⁶⁷然而，《国粹学报》编辑群似乎不为所动，它在不久后，宣布其录取稿件的准则是“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使文有其质，博而皆要，非关于学术源流、有资考古者不录”。¹⁶⁸这其实预示了国粹思想即将步向另一阶段。

无论如何，国粹理念凭藉诸种理论建构以及种种“革命话语”而得以勃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粹论述”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逻辑与预设，影响了之后发生的国字号造词现象。其他国字号如何出现，或它在国粹论中是如何被谈论的，这些问题将在下文再详细论之。

¹杜赞奇(Prasenji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59。

²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原发表于台湾大学主办“中国现代性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2004年5月22日。现见“思与文网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641>。

³Hobsbawm, E.,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14.

⁴沟口雄三，〈近代中国思想的再检讨〉，见氏著、林右崇译：《做为方法的中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页52—56。

⁵章太炎著、徐复编：《廛书详注》（19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9。

⁶黄节：〈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国粹学报》，第3年，第6期，1907年。

⁷仲维光：《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见“当代中国研究”，<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70207&total=57>。

⁸洪丁福：《德国的分裂与统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6—7。

⁹同上，页7。

¹⁰仲维光：《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见“当代中国研究”。

¹¹同上。

¹²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页221—232。

¹³梁启超在民初之后，逐步转向文化民族主义，这方面的分析可详：许纪霖的〈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有关梁启超的人权国家主义思想，已有多方面的叙述。如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12月，页685—733。

¹⁴章太炎：《廛书》，页224。章太炎在此书中，详细的阐述了中国民族与文化起源，这方面的研究可见李朝津：〈论清末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的交替——章太炎民族史学的形成〉，刊于《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页31—37。

¹⁵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一、二期，1903年2、3月，页487。

¹⁶同上，页488。

¹⁷同上，页489。

¹⁸同上，页490。

¹⁹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2003年，页223。

²⁰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载《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页 260-261。

²¹同上，页 261。

²²梁启超：〈新民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卷 1，上，页 122。

²³见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1902 年，即光绪 28 年 8 月），见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293。不过到了 1910 年，梁启超又复返，他在这一年创办了《国风报》，对“举国不悦学”，“动弃吾之所固有以为不足齿录，而数千年所赖以立国之道遂不复维系人心”感到担忧而致力“国性”和“国民性”的宣扬。见杨天石：〈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氏著：《寻找历史的谜底》（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页 302-303。

²⁴周佳荣：〈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教育图书出版社，1999 年，页 156-157。

²⁵这些概念不只对国家再造具有意义，也包括了超国家的意含，唯其复杂性此处未能尽述。比如“科学观”，它也对个人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等形成了冲击，可详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²⁶会稽（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刊于《警钟日报》，1904 年 7 月 14 号（甲辰六月初二日）。亦收于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1904 年），页 212-316。

²⁷申叔：〈论留学生之非叛逆〉，《苏报》，1903 年（光绪 29 年 5 月 27 日）。亦见

²⁸〈哀同胞之将亡〉，《警钟日报》，1904 年 11 月 10 号（甲辰十月初四日）。

²⁹章太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章太炎全集》，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页 189。

³⁰1913 年的〈中国政治通览〉之“教育篇”有这样的记录：“庚辛之交，中外日报及清议报，亦能独抒说论。是时日本留学界，竞出杂志，各以同乡会名义出版，颇主张民族主义，如浙江、江苏、湖北、四川、湖南、广东诸杂志”。

见《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页86。

³¹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卷，页273。

³²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³³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272。

³⁴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民报》，1906年。

³⁵见《民族主义之教育》，刊于《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³⁶同上。

³⁷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出版社，1997。

³⁸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页742-746。参阅黄秀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页347-348。

³⁹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

⁴⁰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刊于《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页101。

⁴¹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论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页1-15。

⁴²刘师培：〈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载于《警钟日报》，1904年6月24-25日。亦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三联书局，1998年版。

⁴³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4-5期，1905年。

⁴⁴见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页83-87。

⁴⁵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民报》，第20号，1908年4月。

⁴⁶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06年7月。

⁴⁷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页85。

⁴⁸同上，页72。

⁴⁹同上，页85。

⁵⁰黄秀媛在这方面有全面地整理，谨此引用之。见黄秀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页370-376。

⁵¹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载《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28。

⁵²见黄秀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页376-377。

⁵³邓实：〈《正气集》实识〉，《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附录，1906年。

⁵⁴黄秀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页368-369。

⁵⁵邓实：〈《正气集》实识〉。

⁵⁶有关顾炎武见《国粹学报》第2年，第3、4、5期；第2年，第13期。黄宗羲见于《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第2年，第8期。王夫之见于《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颜习斋见《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⁵⁷陈去病：《明遗民录叙》，《国粹学报》，第3年，第3期，1907年。

⁵⁸详见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刊于《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页474-477。

⁵⁹黄节：《黄史·种族书》，《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⁶⁰有关清末时期的黄帝崇拜，可详见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页1-77。〈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刊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页68-79。以及详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2003年，页54-5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Patricia Ebrey 在研究“姓”与“汉人认同”之关系时指出，早在在唐宋时期，一些家族历史最后都溯及炎帝与黄帝。因此她认为，“追溯黄帝为始祖”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是起始于国粹派，而是有很久的历史了。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她指出国粹派国族建构自有其古代的基础。见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⁶¹陈至让：〈第七章：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之“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页395。

⁶²同上。

⁶³刘师培：〈黄帝纪年论〉（1903年7月11日），见李妙根编选：《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页7-8。

⁶⁴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或中文版，由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年。

⁶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页22。

⁶⁶黄节：〈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学编》卷5。

⁶⁷邓实：〈国学保存论〉《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学编》，卷5。

⁶⁸刘师培：〈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

⁶⁹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⁷⁰同上。

⁷¹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3年，第5期，1907年。

⁷²邓实：〈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3年，第2期。

⁷³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

⁷⁴邓实：〈国学保存论〉。

⁷⁵同上。

⁷⁶同上。

⁷⁷同上。

⁷⁸但邓实强调，中国学术尚有“一线之传”，因为“草野之间”的社会风俗长期持续不变是“种性”未灭的主要象征。他认为中国自五胡乱华，虽数次异族入主，“挟其战胜之力，威棱横厉，亦尝涣大号、易服色、异器械，其制度文物，亦稍稍改变矣”，但民间，从正人君子到贩夫愚妇，皆能自保其类，即因“其含生之种性，受成于天地，越五千年而未尝变也。且不独不变而已，及其久焉，其力反足以征服异种，而使异种与之同化。质不能胜而文胜之，国威不能服而社会风俗服之。茫茫禹域，其性情其习惯，犹是吾黄帝之子孙所尸宰；

而异族之元首不过中原之一客帝”，虽“盗居吾广土，窥窃吾神器，终不能改灭我神明之种性”。见邓实：〈国学保存论〉。

⁷⁹同上。

⁸⁰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出版社，2003年，页336。

⁸¹同上，页366。

⁸²王先明：〈关于晚清的“旧学”与“新学”〉，载于《天津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

⁸³干春松：〈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

⁸⁴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刊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第52期。

⁸⁵同上。

⁸⁶干春松：〈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

⁸⁷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年7月15日。

⁸⁸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⁸⁹王春霞，〈“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0月31日。

⁹⁰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政艺通报》，第7年，第1期，1908年（戊申）。

⁹¹〈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1907年。

⁹²黄节：〈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上篇（一），“政学文编卷五”。

⁹³〈张南辑印佚丛自序〉，《国学萃编》第6、7期，统元年春三月，1908年。

⁹⁴〈论保存国粹宜自礼俗言文始〉，《神州日报》，1908年5月5日。

⁹⁵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之“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页403。

⁹⁶同上。

⁹⁷黄节：〈国粹保存主义〉。

⁹⁸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癸卯政艺丛书》上篇，“政学文编卷七”。

⁹⁹〈论保存国粹宜自礼俗言文始〉，载《神州日报》，1908年5月5日。

-
- ¹⁰⁰可参阅周佳荣：〈梁启超与越南亡国史〉，《新民与复兴》，页82—96。
- ¹⁰¹〈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1907年。
- ¹⁰²引自盛邦和：〈复兴与国粹〉，见“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old/pingtai/021211300/0212113017.htm>。
- ¹⁰³王淄尘：《国学讲话》，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1935年），页1—3。
- ¹⁰⁴同上。
- ¹⁰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页151—152。
- ¹⁰⁶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页26。
- ¹⁰⁷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4、5期，1905年。
- ¹⁰⁸〈论保存国粹与爱国心之关系〉，载《神州日报》，1907年7月7日。
- ¹⁰⁹同上。
- ¹¹⁰分见邓实：〈国粹学〉、〈国学保存论〉，《甲辰政艺丛书》，“政学文编”。
- ¹¹¹黄节：〈国粹保存主义〉。
- ¹¹²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页346。
- ¹¹³邓实：〈国学保存论〉。
- ¹¹⁴邓实：〈国学保存论〉。
- ¹¹⁵陶成章：〈《教育今语杂志》章程〉，《陶成章集》，页451。
- ¹¹⁶陶成章：〈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陶成章集》，页451。
- ¹¹⁷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章氏丛书》，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页750。
- ¹¹⁸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9期，光绪28年12月，页81—82。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页103。
- ¹¹⁹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
- ¹²⁰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475。

-
- ¹²¹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 ¹²²同上。
- ¹²³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 ¹²⁴李世由：〈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词〉，《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1908年。
- ¹²⁵〈国学讲习会序〉，《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1907年。
- ¹²⁶宋恕著，胡珠生编：〈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宋恕集》（上册），页372-373。
- ¹²⁷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
- ¹²⁸章太炎：〈印度人的国粹〉，《章太炎全集》，第4卷，页203、366。
- ¹²⁹有关研究详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 ¹³⁰章太炎：〈原学〉，原载《国粹学报》，第6年，第4期，1910年5月28日，亦见《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页363。
- ¹³¹同上。
- ¹³²同上。
- ¹³³汪荣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10月初出版。
- ¹³⁴见汪荣祖在其所著《康章合论》之“乙篇：康章思想之异趣”中，对章氏的“齐物”世界观释之甚详（见《康章合论》，页59-66）。
- ¹³⁵参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页346。另见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6卷，页4。
- ¹³⁶何成轩：〈章太炎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探索〉，于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局，1988年，页448。
- ¹³⁷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原载《教育今语杂志》，第3期，1910年5月8日，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509。
- ¹³⁸同上，页517。
- ¹³⁹同上，页516。
- ¹⁴⁰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
- ¹⁴¹章太炎：〈原学〉，《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页 362。
- ¹⁴²同上。
- ¹⁴³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原载《神州丛报》一卷一期），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页 295。
- ¹⁴⁴《章太炎先生答问》，同上书，页 295。
- ¹⁴⁵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页 345。
- ¹⁴⁶章绛（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国粹学报》，第 4 年，第 4、5 期，1908 年。
- ¹⁴⁷黄节：《国粹保存主义》。
- ¹⁴⁸同上。
- ¹⁴⁹同上。
- ¹⁵⁰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 2 年，第 7 期，1906 年。
- ¹⁵¹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
- ¹⁵²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 80。
- ¹⁵³详同上，页 80-81。
- ¹⁵⁴田北湖：〈国定文字私议〉，《国粹学报》，第 5 年，第 10 期，1909 年。
- ¹⁵⁵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议〉，《章士钊全集》，页 166-167。
- ¹⁵⁶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并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论争》，页 76-78。
- ¹⁵⁷黄节：〈国粹学报叙〉。
- ¹⁵⁸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 ¹⁵⁹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
- ¹⁶⁰参阅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联经，页 130-132。
- ¹⁶¹邓实：〈鸡鸣风雨楼·政治小言——东西洋二大文明〉，《壬寅政艺丛书》上篇（一），“政学文编卷五”。
- ¹⁶²刘禾：〈反思文化与国粹〉，《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北京：三联书局，2002 年，页 344。
- ¹⁶³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by Donald Bouchard,

tr. by Donald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pp.52-53.

¹⁶⁴此中演变可详见朱浚源：〈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册），第22期，1993年6月，页325-339。

¹⁶⁵朱维铮指出：章太炎多年“提倡国粹”，已刊文章也全都发表在《国粹学报》上，而后结集出版时却命名为《国故论衡》，或许正是考虑到其一直钦佩的好友宋恕对“国粹论”的评击。1909年，宋恕特创“国糠”一词，批评“国粹说”犯了逻辑错误，因为有粹就有糠。宋恕指出，“茫茫世界，既尚未有纯乐无苦之社会，自尚未有纯粹无糠之社会，学者方寸中，固不可不悬国粹之名词，然岂可不兼选国粹之反对之国糠至一名词欤”。（可见宋恕著，胡珠生编：〈国粹论〉，《宋恕集》，页458）平生笃信“名者实之宾”的章太炎因此为自己“正名”，改“国粹”为“国故”。因为“国故”一词不像“国粹”那样凸显传统文化的优越价值，似乎暗示他不再那么绝对的坚持传统的存在价值。见朱维铮：〈《国故论衡》校本引言〉，《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292-293。

¹⁶⁶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1909年11月2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497。

¹⁶⁷原见《复周仲穆书》，刊于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页187。

¹⁶⁸〈报告〉（第39号），《国粹学报》，第5年，第13期，1910年。

第四章

国粹之所寄： 各传统文化领域以“国”命名之初步形成及其过程

正如上一章所阐述那样，清末国粹运动尝试通过一套民族文化论述与建构，以抵抗欧化以及激起当时中国人所欠缺的汉民族国家意识，以最终可以达致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族国家之标的。但在具体上，所谓“国粹”所指及其外延为何，这仍旧是清末国粹论者必须思索与诠释的问题。这意味着，何谓中国（汉民族）文化已非“当然尔”的自明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已经以“国粹”为中介被对象化、客体化为他们集体思考的对象了。沿着上述分析路径，下文所关注的是在国粹论述底下，他们如何看待国粹的具体内容？哪些中国文化领域最能彰显其所强调的国粹/民族精神与主体性？易言之，“国粹”究由何种基本要素所界定，而“国粹”以国为名的范式及其论述中所着重的“民族国家”意含是否促进了其他国字号之出现？实际上，国粹派中人亦曾就“国粹”所寄于那一方面做过讨论，尽管呈众说纷纭之状态，但仍可见及一可循之脉络。以下，将就此议题加以分析。

第一节：阐释的焦虑：“国粹之所寄”之具体化及其歧异

大体上，国粹论者把“国粹”定义为汉民族文化整体之精华——特定的国家民族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但是显然的，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¹实际上，“国粹”在其来源地日本也面对如何界定的问题，国粹论者志贺重昂等人同样面对阐释的困难。²尽管清末国粹派已对“国粹”鉴定了种种前提，如“国粹”乃“一国所特有”、“一国之精神”、“种性之所在”等，然而这仍然需要一个具体化的阐释过程。

1.1 国学与国粹之具体指涉

前面曾引了 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的一段话：“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³这里的意思是指每一国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领域中贯穿了一独立或特有之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民国之后，梁氏更具体的提到“国语”、“国俗”、“国教”三者为最能构成国家特性与独立精神之事物。⁴他认为，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种见于此三者中的无形特质。实际上，本研究发发现，国粹论者也在具体阐释“国粹”的过程中，显现了他们所重视的一些领域，其他国字号词汇也因此出现。

有学者认为国粹派众人把国粹具体化（所谓具体化即当时所说的“国粹之所寄”）为“国学”，但实质上从国粹派的言论与活动来看，国粹派所提倡的“过去事物”不为“国学”（传统学术）所囿，因为他们所倡言的还有“非学术性”的活动，诸如武术、医药等实践性“事物”。这一点下文将加以阐述之。然则，从 1905 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通过创办《国粹学报》宣传其等之理念来看，“国学”这一名称确实最为普遍，但对之理解却也不尽相同。唯有一点相当清楚的是，国粹论者确实时常以“国学”联系“国粹”而谈，隐隐然把“国学”作为“国粹”之所系，郑师渠就指出说，“国粹”、“国学”、“国魂”是国粹派以文化运思最基本的概念。⁵罗志田也注意到，到 1908 年，章太炎在其《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⁶由于“国学”是国粹派论述的基本词汇，使用频密，“国学”此一国字号在清末之走红，大体是因为国粹派提倡之故。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其实最早的确切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所谓的“国学”，亦为来自日本的舶来品。⁷桑兵指出“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但是大致上，有其特定的指称对象和范畴，即“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

术。”⁸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⁹在此，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另一位《国粹学报》作者潘博则指出：“昔顾亭林先生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夫等是亡矣，何以有国与天下之分？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渐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然则学顾不重耶？”这段话则从另一侧面证明国学是其他礼俗政教的所源，所以国学是中国文化之核心。¹⁰

简言之，“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但是其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不过对国粹派而言，他们或凸显诸子学，或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概括了经、史、子、集为其基本内容。就此点而言，国粹派已不同于以往，即不再视儒学为中国文化的全部，也不再以恢复和发扬儒学为最高理想，而是把注意中心从儒家经典的传统转移到了中国文化整体。如邓实就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¹¹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粹派成员重视“儒学”。他们认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而国学又出孔子者也。……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他们还一再强调儒学的本义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只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了而已。所以他们呼吁要恢复儒学的本来面貌，重新建立中国的“国粹”：“保全国学，……然尤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情势，而使必不可灭。”也就是说，“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犹足以长存。”¹²许之微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中针对“国魂”应该如何塑造时则指出，“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起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然黄帝之政治，犹有可寻，黄帝之道德，则书阙有间矣。今之际民族主义者，有重要于道德者乎？愚谓黄帝而外，宜并揭孔子，而国魂始全。”许氏显然是针对当时革命派流行的黄帝论述而忽略孔子而言，故他

进而言道，“今之所歉于孔子者，以其无尚武主义也，无国家主义也。夫尚武主义，著于儒行；国家主义，著于春秋。穷而绎之，皆有理论可寻，安在其不足为国魂乎？匪直此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而国学又出孔子者也。孔子以前，虽有国学，孔子以后，国学尤繁。然皆汇源于孔子，沿流于孔子，孔子诚国学之大成也。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¹³但对章太炎、黄节等国粹派主流而言，则他们心目中的国学比之大得多，许之看法不被国粹学派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这里，也可见国粹派是一个人物、思想繁复的集合体。然而，把国粹等同于“孔学”却在较后的民初时期所广泛认同。个中变换，下章将会再加以讨论。

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他所说的“国学”比儒学的范围更大些，包含儒学以外的诸子学、佛学等。章太炎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首先于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于是年9月，他在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章氏讲授内容即“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其“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¹⁴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这跟他最著名的国粹定义：“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一致。¹⁵两者相对比，此时章太炎的“国学”、“国粹”概念基本上是相同、共通的。他也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民国后，即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报纸都广为宣传，其讲学内容后经由曹聚仁记录，并整理成著名的《国学概论》一书。所涉及的范畴含经、史、子、集，但又以经、子为主。¹⁶到了南京政府时期，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则有进一步的发展，即比之前更为丰富与系统性，可说体现了他晚年的学术总结。这部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比《国故论衡》与《国学概论》的篇幅更多。全稿约有16万余字，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个部分。从讲稿看，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

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的中心内容。总之,国学的内容一直在改变,但经史子集的含概面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此外,在从其他国粹刊物窥视,如陶成章于1910年所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来看,含义也相同。该杂志以传授“国学”为主,在内容上,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这包括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和中国教育学等等。¹⁷

1.2 国粹涵盖面之繁复与争论

如果从《国粹学报》及其活动来看,则他们心目中的“国粹”意蕴也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邓实说:“综百家之长,以观学术之会通……月出一编,颜曰国粹”。¹⁸从《国粹学报》内容含有“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说”、“撰录”等七栏,显见国粹包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具有比较大的涵盖性。黄节说,所谓国粹不能拘泥于“一名、一论、一物、一法、一命”,主张由本质了解国粹本意,总之“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公民之原质,是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¹⁹他不将国粹定位于一定是本国之所有,这把国粹说得更为广泛了。他说:“虽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地然后有是华,不得谓非是地之华也。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²⁰这又把国粹限制于必须已经根植并适用于本土为准。马叙伦则提出,“国之立也,有大宝焉,是名曰国粹。而“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毋论政治、学术、技艺三者具备,其国固必大强,即三者能得其一,国家亦必能小治”。²¹看来,马叙伦以政治、学术、技艺三者为重,这又是一个不同的范畴。在朝的张之洞则说过,“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²²这说明个人对“国粹”之界定都不一致。

此外,在《国粹学报》创刊号的《略例》中,有一条是讲栏目的。除了上述的“本报共分七门”,另有值得注意的是“撰录”和“附录”。所谓“撰录”不是指该刊各执笔人的文字,主要是历代前贤的未刊稿。如第1年第6期,刊《阮芸台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那

是一篇在《掣经室》各集辑集之后所作。在这些逸文后，再附编者跋语。在“附录”中有一固定栏目“正气集”，前后刊载过《文信国指南》、《郑所南所辑古今正统大论》等，发扬古人正气的文字。²³本文上一章申论过国粹中人大力表扬反抗元清异族的烈士，这里国粹含概了一种正气，属于一种精神。此外，1904年5月，春水的《中国国学保存编之一》一文也指出，最值得保存的“国学”就是“正气”，即文天祥《正气歌》里所说的“正气”。²⁴他认为，“今日中国青年之大患莫甚于借新道德之影响之皮毛，以破坏旧道德”，“吾国之道德，有为神州特别之产物，西洋所未曾发明”，而“正气”正是“大适于今日之实用者”。²⁵另外，国学保存会还准备创办“国粹学堂”，唯因经费不足而罢。国粹派在清末年间公布的“拟设国粹学堂启”颇能说明他们心目中具体的国粹内涵。从所拟定的学科看，显示出其等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輿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²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概念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书画、武事、音乐等科，往后这些领域以“国”字自我称谓自然不足为奇了。下文将进一步加以探究。

总而言之，“国粹”一词大体相当广泛，以致引来一些评语，认为《国粹学报》所揭橥的“国粹”过于繁杂。比如宋恕虽一方面主张保存国粹，但对于当时的国粹派却大加贬斥。他指责“顷上海书肆出有《国粹学报》，惜择焉不精，玉石并列，且间登逆说，致反碍及‘国粹’字样。”²⁷宋恕也特创“国糠”一词，批评“国粹说”犯了逻辑错误，因为有粹就有糠。²⁸前面已说过，论者认为，或许正是由于宋恕之批评，致使章太炎也在同一年采用了“国故”一词来取代“国粹”。²⁹但实质上，笔者从资料中窥视，在更早之时，即1907年当《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在与《民报》争论汉字革命时也曾质疑过说，“粹之字意即良也。若国粹名果符其实，则必存，便无所用其保矣。若其名不符实，即不良，则必当革。不能因其为国而保也。”³⁰但宋恕在前引文章中有一点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第一次似乎意有所指地针对“国粹派”以汉族为中心的“国粹”概念指陈。

他认为，“如我大清之为敌过夜，非合满、蒙、汉、回、苗、藏六族而成者乎，故如有一粹焉而为六族之所有，则真我大清帝国之国粹矣。”³¹他进而认为，若只是一族之粹，只能称为“族粹”。即使是六族之中，只是五族共有之粹，另一族没有此粹，也不是“国粹”。³²强调大清帝国为六族所组成，这里透露宋恕其实是站在清廷立场立论，可惜未见国粹派对此反应，不然将是极为精彩的论争了。³³

另外，清末提倡国粹者似乎也存在着不同的动机与含义。本身是属于国粹派的刘师培就批评当时一些以“国粹”为挡箭牌的守旧者。他在1904年10月17日的《警钟日报》社说中批评道，当时许多“旧党”喜欢使用“新名词”作为其“新事业之障碍”的说词。作者列举了许多例子，比如“仇洋仇教”者以“排外思想”作为其挡箭牌、“诵经念佛吃斋烧香，日逞淫祀，不稍解悟”者，则以“信教自由”为由，其中作者也提到“保存国粹”为被利用的新名词。他指出，一些对现代学校教育的态度是“以四书五经为善本，日奉古籍，拒新书新报而不观，即至一切形式之事，亦惟力守旧制，不求改良，苟有责之，则曰保存国粹也”。³⁴这里透露了两个意思，即“保存国粹”是一个新名词，以及“保存国粹”当时已为一些反对“改良”者所使用。借新名词是为自己的举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刘文虽没举出具体人士，但这足以说明当时使用国粹一词不是单一取向的，提倡者庞杂，见解歧异。

在1912年，有一篇文章讨论了何谓“国粹”，也值得在此一提。³⁵作者认为，“且夫学术之可以有益于国，有益于人者，谓之国粹。反乎此，则非国粹也。国粹当保存，非国粹，当排斥，不待言矣。故彼经义、辞赋、性理三者，不可部分别其如何为国粹，如何为非国粹。必非国粹之误认去，而国粹始成立”。³⁶国粹并非都是好，这与1910年宋恕所谓的国粹与国糠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处，国粹似乎有人定义为经义、辞赋、性理三者，由此又可见国粹定义的莫衷一是。作者甚至认为，国粹只是时代过渡而出现的。他认为，

大凡一国之学术，必有过去的。必有现在的。著之于学术史，现在的定之为学术书，而学术书之变为学术史，近或数年，远或数十

年。新旧代谢，则学术之所以有进步也。今吾国之学术书，取三千年前之旧物，在学术史上尊为太古时代者，而一字一句为之解释，为之辩难，为之摹仿，为之践行，不敢有进一步之出入，而后免离经畔之，呵则区区方寸间，既为旧思想所盘据焉。有新思想之萌生哉。是即以学术史为学术书之缪也。然则，经义、辞赋、性理置诸学术史中，国粹也，无可訾也。若置诸学术书中，则非国粹，而不可不排斥矣。

……要之，国粹焉者，因过渡而有者也。缩三千年古人所经之阶级。以学术史之支配，而介绍之于后。人之以更上一层，为其目的者也。不见夫栽树者乎，培壅本根，冈或伤害乃翦其旧枝条，接以新枝条，则佳卉名果，进种可期焉。余所恶者，苦守旧枝条而不知变耳，或乃并其根本而芟刈之恐。虽有新枝条，非复为此树所有矣。斯则余国粹保存之义也。³⁷

在作者看来，国粹作为历史存在尚可，但作为现实的模仿对象与资源，则不行。

总而言之，当国粹论者强调民族之自我与特质之重要性之时，并以“国家”或“国粹”这些词汇作为定语，来修饰传统文化之时，他们必须描述与指出在那一点、那一方面、那一领域上最能深刻显现这个精神、自我与特色呢？诚如前述，这无疑是一到难题，诚然是一个论述困境。但无论如何，尽管国粹之所寄，言人人殊，但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共识，只是轻重之不同而已，至少“历史”与“文字”是两大公认的重要领域，下文将加以阐述。而且，在国粹运动一连串的文化设限以及张扬国粹在国家存立的关键作用下，已逐渐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收束成一在现代文化处境中不可或缺的“必要之物”。

第二节：中国文化的分类：国粹化、文化国家化的扩散

诚如前述，1900年代初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渐成为气候，这折射在具有西方观念背景的一系列以“国”字为词根的

同族词的最初出现。除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国粹”、“国学”、“国魂”、“国性”之外，最迟在 1903 年也已经出现了“国歌”、³⁸“国花”³⁹等词。可以这么说，大体上从 1900 年之后的那几年，以国命名的现象已经在神州萌生。这一系列以“国”字为前缀的名称可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命运起伏，亦与这一思潮的多歧性质有着直接关联。但是本文想指出的是，这与国粹运动及其揭示的“文化国家化”范式与民族存在之前提系有着难解之缘。在此，我们先就至今仍未被考察的“国乐”之起源为例，来观察个中的内在联系。

至目前为止，以本研究对有限资料的观察所得，或可推测“国乐”一词最早出现于 1903 年。这是因为在该年 6 月的《浙江潮》杂志上，⁴⁰一位留日学生匪石（原名陈世宣，1884—1959）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音乐改良说〉的文章，提到此名词。大体上，该文倡言音乐改良，认为音乐可以鼓挥国民的进取精神，以“宣扬国魂，振刷末俗”。⁴¹作者匪石批判了传统音乐的落后与保守，认为“古乐者，其性质为朝乐的，而非‘国乐’的”，“其取精不弘，其致用不广，凡民与之无感情，何以知其然也”，、“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等，而如此下去，能“斫我良民，灭绝我种性”。⁴²从匪石的文字看来，他的“朝乐”与“国乐”之分显然受到国粹论述的影响。在时间上，匪石成文是在国粹思潮流行之际。我们不妨将它对照邓实的一段话即能洞察他们之间的联系。邓实于 1902 年 8、9 月撰写了〈史学通论〉中说：

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也，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⁴³

从上引文字可知，邓实即以“朝史”对比“国史”，而朝史不是历史。邓实这样的区分方式影响可能相当大，笔者在《觉民》杂志上也看到这样的观念痕迹。一位叫重光的作者在其意在提倡汉种观念的文章〈人种史〉中说，“返观我国之历史则何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书等，皆呶呶于

太祖太宗之丰功伟绩，与及享年之久暂，故但可称为朝史，不可称为国史”。⁴⁴明显的，这是一种对“国家”认知之后的新观念。朝代之史不是史，只有“有国”之后才有史，这明显袭用梁启超的“新史学”论述。⁴⁵实际上，两者之间渊源关系颇为明显，邓实本身也承认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之后才写下前引文章的。⁴⁶因此，不仅是国粹派的邓实，匪石提出的“国乐”论都显然是在“国家意识”被激发下的产物。而匪石的传统音乐能“灭绝种性”之说，则可能与国粹思潮有关，或受到另一国粹派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励种性”启发而来的。以上的考察显示，从梁启超的国家中心史观，到邓实的“国史”与“朝史”，再到匪石的“国乐”，一条思想系谱与轨迹隐然可循。翌年，即1904年，也正是国粹思潮正在云涌之际，曾志忞这位中国新音乐的积极提倡者在《乐典教科书》序文中也从国粹保存的立场提出保存传统音乐。他一方面主张中国音乐必须摆脱“泥古，自恃的性质”，并采纳西洋的新乐，方能“为中国造一新音乐”，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粹很有保存之必要，“一方面提倡中国之古乐，藉以保存固有的国粹”。他认为“输入文明，而不制造文明，此文明乃非我家物。”⁴⁷这又透露了国粹思潮对各领域的作用。

简言之，此处似乎透露某种讯息，即“国粹论述”对“国字号”兴起的关联。尤其是在“国粹”的命名以及宣传运动之后，其所蕴含的意义是，属于国家的文化是“精粹”的，而且是“国家所不能或缺”的。国粹论者所主张的民族精神之不可废，及其寄于传统文化（已经其定义），促成了一种观念，即传统文化各领域都必须保留，即使主张引进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之核心也不可废，以延续民族之精神——国粹。这造成了许多传统领域，也出现了以“国字”重新命名的势况。国字号现象内在地倚赖于这一“国粹论述”提供与建构出来的理论前提，并又再生产出新的国字号。国家主体性或国粹的具体化，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各领域再命名的开始。如果说，国粹是外来词，但接下来的其他命名则是在地词了。接下来，本论文将就一些国字号之出现与国粹派论述之相关性作揭示，以进一步说明国粹运动对文化国家化现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从中也一窥各国字号的最初起源。下面我们且进一步看国粹论述者在诠释“国粹之所寄”时，个别领域的传统文化如何被他们国粹化与合理化，以及他们所鼓动的

国粹思潮如何开始影响一些专业领域，如武术与中医界。事实上，国粹派在界定“历史”与“文字”作为“国粹”基本要素方面，自有定见，这是何以一些特定的国字号（如“国史”与“国文”）在他们叙述中即已出现的原因。章太炎所说的，“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⁴⁸ 其实即已显见他们对文字与历史重要性的共识。

2.1 “国文乃一国国粹之所寄”

依据罗志田的研究，到清季的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⁴⁹ 罗志田之研究实有所见，在此段时间内，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尤其是自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共同语（the common language）正系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当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自然陡增。⁵⁰ 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中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黄节在其〈国粹学报叙〉中重申此意说：

昔者欧洲十字军东征，弛贵族之权，削封建之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於时义大利文学复兴，达泰氏以国文著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⁵¹

从这里即可知，黄节已经使用“国文”一词，而且其中透露更重要的讯息是：国粹派认为通过“国文”的著述，可以进达文明之阶。这里也表明了国粹中人很早就使用“国文”一词了。然而，何以“国文”书写具此意涵？联系到引文中所提及“义大利文学复兴”，我们就可知道，对他们而言，“国文”正蕴含文明之因——国粹。国粹学派多视语言文字为国粹或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1903年邓实也说：“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翹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⁵²

前已说过，国粹学派对于中国文字的重要性基本持有共识，认为“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⁵³当 1908 年，以吴稚晖等人为主的巴黎《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直指汉字象形/表意的形式为“未开化人”之用语，而主张废汉字而用万国新语的作法，国粹派即从保持中国文化特色的角度下手，对之加以驳斥。⁵⁴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及〈规新世纪〉等文批评了同属革命派同志的非历史的与欧洲中心的观点，并对他一向持守的文化相对论表达得尤为淋漓尽致。他认为，《新世纪》派“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这一观点实是“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所致。他从其“吹万不同，使其自己”的“齐物”世界观出发，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各地有各地的民情风俗，不能把欧洲的标准凌驾于他洲之上，如果生搬硬套，只会弄巧成拙。所谓：“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⁵⁵章太炎分析了汉字的特点与语言的关系，指出汉民族几千年来已经运用习惯，而欲改用拼音文字世界语来代替，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必要的。章太炎始终认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⁵⁶章太炎深信小学（文字）是具体的国粹之本，也是国性赖以延续，民族与国家赖以生存的三大因素之一，尤其是“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⁵⁷

这是从世界文化本非一途的角度来立论，但就一些人指斥汉字有碍于教育普及时，他认为：“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知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了。是知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⁵⁸当然，他对汉字的繁密难识也非视而不见，对此，他提出使人“易能易知”的办法：“一、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二、若欲易于察识，则当略知小篆，稍见本原。”⁵⁹他也深知使用汉字在对外交流上的困难，在此前提下，他认为国人如求“行远”，在对外交流上可用万国新语，但他同时坚持认为中国人绝不能放弃汉字，汉字作为本民族与生俱来的东西，不可

“更易”，只能“缮治”，所谓：“欲求行远，用万国新语以省象译可也；至于汉字，更易既无术，从而缮治，则教授疏写，皆易为功，盖亦反其本矣。”⁶⁰他引用庄子的话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⁶¹此种说法其实是章太炎“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思路另一次体现，反映出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一以贯之的文化多元论思想。⁶²

在客观上，吴稚晖等世纪派大致认为语言仅是工具，可以万国统一。但国粹派与此不同，若与其他提倡国文者的动机，如团结国民、促进教育普及等功利目的相比，国粹派是真正认为国文乃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之根本关键。章太炎正基于相反的观念反对文字“定于一”。他认为语言文字与“人事”相关，代表着“国性”。世界各民族“人事”本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必齐一。章太炎反驳说：“科学固不能齐万有，而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万物之受人宰制者，纵为科学所能齐，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可不齐”。所谓“品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就器物言，固有此土所无而彼土所有者，则比字属名，亦定其号，终不可题号者，不妨从其主称。”而社会既“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与“人事”相关的不同语言各含国性，自“不容以他方言语乱之”

⁶³

邓实则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立国之久而文学相传不绝者，亦以中华为第一”；故“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⁶⁴邓实自信的认为中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异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风俗民质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质，则国失其精神，而国非其国，凡百作为，举无幸焉。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⁶⁵此处的“国文”以文学为重。与国粹派

关系密切的“南社”同仁也同样把国粹寄予国文。从他们的创社宣言可知，文字与文学被抬高至关键的地位上。这篇由高旭所发表的《南社启》曰：“……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之尤可贵者，端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化者，乃奴此而主彼……。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忧，正不知伊于胡底矣。”⁶⁶对他们而言，语文是区分族类，标识种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章士钊起草的《国学讲习会序》也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词，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词；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中国立国已二千年，可得谓无独优之治法乎？言治法犹晦，中国之文字，于地球为特殊，可得谓无独至之文词乎？必曰无之，非欺人之言，则固未之学也。”⁶⁷总而言之，反对废除汉字，是国粹派同仁的基本共识。语言文字既然是一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他们着意于汉语汉字的研究，目的即在发扬国粹，突显中国文字的特色与价值，并且凝聚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除了国粹派驳斥新世纪派之外，于1907年，梁启超特地发表了〈国文语原解〉。梁氏认为，

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揉合种种异分子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今者各省方言，以千百计。其能维系之使为一国民而不分裂者，以其不同言语而犹同文字也。且国民之所以能成为国民以独立于世界者，持其国民之特性。而国民之特性，实受自历史上之感化，与夫先代伟人哲士之鼓铸焉。而我文字起于数千年前，一国历史及无数伟人之精神所攸托也。一旦而易之，吾未知其利害之果足以相偿否也……。若我国文，则受诸吾祖，国家之所以统一，国民特性之所以发挥继续，胥是赖也，夫安可以废也。⁶⁸

梁启超显然着眼于国家统一与国民特性，而主张汉字的继续使用。他同样认为国文是一国的历史精神之所托，与国粹派的认知没有二致。

自西力东侵的危亡之秋，国粹派中人就认识到古今灭人之国方式已不同，古以杀伐，今则先灭其文字，因此对文字之功用更为强调。章太炎曾举例说，俄罗斯灭波兰后要灭波兰的语言、土耳其灭东罗马后要变更东罗马的风俗、满清征服中国后要禁毁中国的历史，可为殷鉴。⁶⁹邓实则说道“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圯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⁷⁰我们其实可从《国粹学报》上看到许多类似的意见。黄节即观察到英俄等国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⁷¹

不惟《国粹学报》如此，这也可说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在亡国忧中从他国历史得来的普遍认识。例如《神州日报》也有近似的看法。其说是，“自十九世纪以来，亚欧既通，而灭国之法一变。凡亡人之国，夷人之宗，墟人之祐者，必先革其习惯，易其风俗，变更其语言文字。其为害也，以视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其祸为尤烈。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法兰西灭越南而学校禁用本国文字。其族为不知谁何之族，其民为无可归宿之民，其所据为观念者既失，虽欲发愤自立而亦有所不能。⁷²该报进而言道，“今吾国亦渐有人以保存国粹相号召矣，然而其力不巨，其道不光，其所守之秩序，或不必要尽有合也。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之亡，当先吾学之厄，欲救吾学又不可不以礼俗言文三者为始基，而后一切学术乃有所附属”。作者也认为“一国之翘然立于大地之上，不为他族所侵袭者，则必赖有一特别之性质，以为之藩。是何也？夫血气心知之属，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兴种族。其条例所系者，曰言语、曰文字、曰礼俗。是三者，一国民之精神之所寄”。

“茫茫宇宙芸芸众生于虚空之中，而有世界于世界之中，而有国土于诸国之中。而此一国能翘然立于大地之上不为他族所侵袭者，则必赖有一特别之性质。是何也？……曰言语、曰文字、曰礼俗。是三者，一国之民精神之所寄也者。苟丧其一其萌卉不能植。不守礼俗，不能抵陵夷；不自知其文字，不能爱种类。”⁷³

另一方面，据罗志田指出，在朝的张之洞也是“国文乃国粹之所寄”这一观念的共识者。⁷⁴张在当时约略的说过：“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湮灭”。⁷⁵由此可知，当时随着与西方进一步的接触，许多人已经知道“国文”在世界各国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但不仅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剧增，就是“国文”的指谓也变得非常广泛，甚至包括所有文字印刷品——书籍。这部分可能因为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已实际变为西学馆，结果“国文”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学”的近义词。⁷⁶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张之洞等人看来，国文是主要的国粹承载者，至少“国文”涵概了“文字”与“历史”，而且“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湮灭”说明了它的传承作用，不可废弃。清廷大体上也持有相同的立场。宣统元年，即1909年，关于学部的一则报道说，“张相国未管学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订小学章程之稿，废读经讲经，初等更纳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于国文中。张相国不以为然，迄未发布”。后因摄政王催促，又“草草订定，率行入奏”。⁷⁷这里的意思表明，在建立新式学堂制度之下，国文已经被赋予寄载历史、地理、格致三科，这跟现代国家强调的国文科目的重要性是一致的。这是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方式，只是所谓的道已经转换而已。⁷⁸

此外，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则说：“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中国以文教立国，政治、学术、风俗、道德见于经传记载、足以匡扶世教、范围事理者，甲于五州，实由国文之优美，迥绝于五洲。”他一方面认为，国家立足于世界根本在于国文，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国文之特殊性。他进而指出，自废科举之后，“广设学堂，采东西各国科学，期于取长补短，宏济时艰。而风会趋新，后生厌[旧]，故学校虽逐渐推广，国粹反日就湮微。加以数十年来，负笈出洋之士既多，其间卓绝坚定者不可谓无人；至于浅中弱植之徒，无旧学以培其根柢，而浸淫于彼国之文化，归国以后，辗转灌输，于是吾国文学愈有日即于萎缩之势”。⁷⁹这里所谓国粹湮灭、国文萎缩两者看似一个相通的概念。1903年，清廷在颁布《学务纲要》中实已

规定，各级学堂必须“重国文，以存国粹”。⁸⁰这就明确的指出，在朝廷中许多人的认知中，“国文”是“国粹之所寄”。

实际上，在 1902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学制“壬寅学制”，在没有实行之下，此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并正式产生了“癸卯学制”，语文也随之开始正式单独设科。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清廷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的教授科目中只有国文科，而无读经科。从此，“国文”科的名称见于法令。“语文”也在这一大潮中渐渐走出混沌，但之前的学科设置并未使用“语文”这个概念。出现在小学及中学学堂章程中的，与现在语文有关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这两个科目，后来语文课程的发展及针对语文的讨论也多从此而来。语文教研界一般将其看作是语文单独设科的起点。⁸¹总的而言，在近代语言教育的历史长流中，语文学科曾以读经、词章、字课、习字、作文、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国文字等名词来称谓。有一种说法指出：其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提议将这一学科定名为“国文”。据说，蔡元培等人于 1902 年创办爱国学社，梁启超则在 1906 年前后创办长沙女子学堂，就将这一学科定名为“国文”，而至民国临时政府于 1912 年颁布了《中学校令实行规则》后，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因此，“国文”于焉定型。⁸²但实际上，至少针对梁启超一点而言，这个说法不太确实，因为诚如上文所引资料，至少 1903 年，不论是在朝的文件，或在野的邓实即开始使用“国文”词句，绝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之事。刘师培甚至已经在这一年撰文探讨“国文”教学与编撰课本的问题了。⁸³以笔者在《警钟日报》的资料看来，至迟于 1904 年，许多学堂已经设有“国文”课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 1904 年 4 月 10 日，《警钟日报》的“事件”栏中所刊出“东江国民学校简章”中即指出，它的课程是“本校高等课程以国文、法文、历史、地理、体操为专注，而佐之以理科、算学。”⁸⁴

在其他资料中，笔者也发现类似的例子。如也在 1904 年，在上海南市竹行弄的“城东女学社”，其初级课程设有修身、国文、笔算、心算、谈话（或讲古事或讲粗浅地理）、书法、图画、理科、唱歌、体操；第二级则设有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笔算、珠算、理科、家

政、书法、图画、手工、唱歌、体操。⁸⁵它们也已经以“国文”称谓。不过，也有不同的例子。如温州的“明伦学塾”（蒙学）的课程，它规定寻常级第一学期课程是解字、伦理、字课、唱歌与体操。到了第二学期，则是造句、伦理、字课、唱歌、体操、官话、史学、算学、舆地与图画。至及高等级课程时，第一学期同寻常级第二学期课，惟教授略有深浅。第二学期则是作文、物理、官话、字课、史学、经学、算学、舆地、体操、图画。第三学期是作文、物理、官话、史学、经学、算学、舆地、体操、图画。从这学校课程安排看来，“国文”还未出现，“国语”也仍称为“官话”，而“图画”则还未被称为“国画”。⁸⁶此外，在“国立普通中学堂”，甲乙班课程则是修身、历史、舆地、测绘、文学、文法、方言与体操。丙班则是讲授、历史、算学、文法、舆地、方言、背诵与考试。⁸⁷也未见“国文”之设立。大体上，从这几所学校之课程相比较看来，“国文”一词已开始被使用，但还未见一致与普及，而其他的国字号如“国画”、“国乐”也未见在教育上被正式使用。但无论如何，以国粹派来说，他们重视语言作为国粹之所寄的中心所在，而且已经迳称中国语言文字为“国文”。从资料看来，“国文”或许也是国粹派使用“国粹”、“国学”、“国魂”等以外最早的国字号词汇。

此外，中国文字在清末之所以被特意强调，清末时期日本与西方翻译词汇等“新名词”大量输入中国也是另一重因。对一些国粹派中人而言，这是一种文字被污染的现象，而中国文字承载着国家特性，如何可以被接受。只是吊诡的是，国粹与国文本身皆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新词。王国维曾明确指出这一点：“十年以前（指 1895 年）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⁸⁸事实确如王国维所言，外来新名词在中国近代的被引入，以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为界分可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即伴随着被王氏称为“形而下学”的西方科学技术引进中国而输入的科技新词语时代；而当近代改良主义者把向西方学习的视角从“技术”转向文化与政治制度方面时，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等著作，以此为契机，西方作为“形上之

学”的社会学说方面的新名词也随之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⁸⁹办过《杭州白话报》与《中国白话报》的“白话道人”（林獬）就对从日本引进“新名词”的做法表示反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故虽国势盛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乞于汉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仿文章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丘》、《索》，此真可异者矣！”⁹⁰高旭发表其《愿无尽斋诗话》，以阐述其文学主张时，则认为作诗应该基于“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但指“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⁹¹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也从保存国粹的民族情绪出发批判“新名词”，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时，即宣称：“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⁹²《国粹学报》明确将“东瀛文体”作为该刊打击的对象，此后这一宗旨成为该刊一个特色，类似的言论时常可见。在朝的张之洞也有相同的识见，他在1908年指示学部各司道：“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⁹³由此可见，他们的国文是根植于固有的传统文字，并追求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文字。四川总督锡良和学政郑沅也用样若有所感，“风会所趋，少年学子，本原未裕，竞思捷获，掇拾一二外国名词，自命新学，蔑视经史；而有识之徒，或发愤为保存国粹之说。昔也汉宋，今也新旧，叠成聚讼”。⁹⁴

一位作者高凤谦对此现象也观察到而言道，“今之言保存国粹者，大抵有积极消极二主义。其持消极主义者，曰禁用新名词以绝莠言也；其持积极主义者，曰设立存古学堂以保旧学。”⁹⁵然而根据高凤谦的看法，“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⁹⁶看来新名词之使用在当时已成风，实无法禁。

总的来说，国粹论者强调保存国粹必需通过国文，以及国文最为立国之本；另一方面，由于深受救亡心态的影响，也有时人以为，“国文”

也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吴彝珠在 1909 年时指出，“栋梁之木生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此万物之本也。邦国之广皆由寸土所积，江河之大亦由涓滴所成。此事理之本也。”而教育就是“栋梁之木也，垂天之鹏也”。⁹⁷ 作者认为，教育必须注重“国文”，唯有人人懂得“国文”才有知识，如此国势始能“随之而长”。作者又言道，“历观露人之灭波兰，佛人之灭越南，英人之灭印度，皆由灭其文字始。盖其国之文字存，则人民之观念易以起。有观念则将发其爱国之心，而徐谋光复之举。灭其文字，则人人自愚，而不啻灭其种族也。”因此，国文是国家之本。她进而言道，近来有人以远涉重洋，讲求各国科学为强国之道，是“皮之不存，毛将安附？”⁹⁸

至于“国语”方面，其所显现的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局面。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语、文是两相分开的，而且长久以来，与读书人关系密切的是文，不是语。清末年间，有识之士就提出了“统一国语”、“言文一致”的口号。“统一国语”，指全国语音统一，切音为字，字话一律；“言文一致”，指“说”的“话”与“写”的“文”统一。“统一国语”、“言文一致”的目的是使普通公民能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章太炎认为，中国传统的统一性主要是在文字，不在语言。所以，相较之下，国文在清末比国语更受注目。但是，以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是国语作为建构的工具，而非国文，甚至没有国文这样的词汇。根据安德森的论点，随着书籍与报纸的机械生产与商品化，即“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让方言可以标准化与散播，提供了创造国族意识的条件。因此，“发明国族主义的是印刷的语言，而非特定语言本身”。⁹⁹ 从此以后，特定国家里的大量人民，首度可以透过共同的印刷语言而理解彼此。印刷资本主义的过程因而将某种方言“固定”成为“国语”，使新的想像国族社群成为可能。

在晚清，且丁使用方言（邓实所谓的国文）的事件更是广为人知。但这样的论述似乎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特殊情境，因为中国文言相分的事实使得拉丁文与且丁使用的其他国家语言（方言）不一样。所以中国士子面对的问题是除了提倡国文（文言文）之外，还要思索如何塑造国语（各地方言统一及文字与语言统一）的问题，而民族国家之建构主要正在于全民族共用一致的语文。为了创造现代的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言文一致的普遍

性的共同国语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1840—1903)奉命去日本考察学制，他在《东游丛录》中引用日本伊泽修二的话说“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国语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妨，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亟亟也。”¹⁰⁰据黎锦熙的说法，这是“国语”一词首次出现，当时吴汝纶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绩，于是回国后主张推行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¹⁰¹这揭示了创造现代的同质化民族国家这一个过程最先显现在统一国语的工序上。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师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等六人上书给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呈文标题即为“请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今世界之教育，为多数之人，合群策群力以捍卫国家而设，非为求译才而已也。夫吾国不欲自强、不欲开民智而已，如欲开民智以自强，非使人人能读书，人人能识字，人人能阅报章，人人能解诏书示谕不可。虽然时至今日，谈何容易，非有言文合一、字母简便之法不可。彼欧美诸邦，所以致强之源，固非一端，而其言文合一，字母简便，实其本也。”¹⁰²换句话说，国语的提出除了是基于凝聚国人认同之外，也是为了普及教育以兴国，而不是为了它是一个国粹与国家特性之载体。这种言文一致的呼声看来相当大，《新闻报》也有人发出相同的论调，以为中国教育之不普及，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言文分”。一位作者指出，“欧美各国，无地无校，无人不学，赖有此言文合一之习惯。中国言与文分，寻常之人，能通之于语言，不能达之于文字。此识字者之所以少，而教育之所以不普及也”。¹⁰³有趣的是，作者一方面主张把“国文”改为“国语”，但又顾虑到“国粹”之流失。该作者因此建议仿效日本，一方面“参用口语文语两种，著成国语，为小学课本”，“将文语改为京语”，又列“文学一科，又复列入专门，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夫著国语以求实用，设文科以保国粹，所以教育一途，无所偏失”。¹⁰⁴同年的《东方杂志》还录用了《汉口日报》的〈语言文字宜合为一说〉。¹⁰⁵顾名思义，也是强调“文言合”，目的自然离不开教育普及的动机。

实际上，当时中国已有官方之间沟通的“官话”，但它不普及至下层民众。1910年，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最后一年，从“官话”到“国语”的概念更加明确了，资政院议员江谦等32人曾联名就清政府的学部在奏折中所提到的“国语教育事项”的说法提出质询，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他们在奏折中指出，“凡百创作，正名为先，官话之称，名义无当，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习，非所以示普及之义，正统一之名，将来奏请颁布此项课本时，是否须改为国语课本以定名称”。¹⁰⁶这种“正名”其实也揭示了“国家意识”的抬头。

在1910年的《东方杂志》上，又有人认为，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作者认为，“我国数千年来，言种族，则并包满蒙回藏之殊。言宗教，则极之释老回耶之异。言风俗，则东西南北，山川原隰，各自有其特殊之习惯。然尝统一为一大国者，则语言文字统一之故耳。”¹⁰⁷对作者而言，语言文字是一国结合之基本，如果各地不同方言可以加以统一，则由于中国国语可望成为世界语。¹⁰⁸作者提倡通俗文，其实即白话文为国语，以促成语文之统一。提倡通俗文自然会引来一些国文，即文言文维护者或国粹派的反对。作者因此指出，“或谓一国之文字，为一国国粹之所寄。今若此，是举一国之人，皆仅通浅近之俗语，而无一人能知高尚之文学者，是不啻文字亡，文字亡即国粹亡。国粹亡，国亦无以自立矣”，但他因为这是不足为虑的。¹⁰⁹因为在作者看来，在初等小学受通俗文教育只是一个初阶，这并无阻士族子弟继续于高等小学、高等学堂与大学堂接受古文教育，何况更多人接受基础教育，使得更多人可以继续深造而获得修读古文的机会。再者，作者认为，国文或古文之所以高尚，是在于“特数千年以来，学士大夫之思想，皆习以古文达之”，因此“今若使一国人仅通通俗文之人，其思想学识，皆日渐增高，而亦积以通俗文达之。则通俗文之意义，亦必日渐精深，浸假而亦可以为国粹之所寄矣”。¹¹⁰

换句话说，作者以为国文之高尚不在于其语言本身，而是在于其所承载的事物理想。从此可知，作者尽管强调通俗文的重要性，但他的思想逻辑还是与国粹派一样，即文字可以承载事物。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说明了国语运动与国文之间存在着吊诡的张力关系。此外，这位作者也观察

到，国语统一与教育普及的关系，他指出，“近年以来，感外界风潮之刺激，知非国民团结之力加厚，不足以御外侮也。又因政体之变更，发见国民参与政务之必要，而非国民之智识进步，又不足以举参与政治之实也。于是，教育普及与国语统一之两大问题，同时发生”。¹¹¹易言之，在国家外患的压力下，国语运动更加成为急务。另外一位作者也有相同的意见，即认为官话既不普及，又不易了解，而提出了“国文”与“通俗文”统一的要求。¹¹²

或许在这些思潮的催逼下，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¹¹³这个提案为统一国语提出了很具体的措施，开了最终在民国正式使用国语（通俗文）的前奏。¹¹⁴然而实质上，在民国之初，临时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学校令实行规则》，仍旧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但基本上，文言相分的“国文”却一直引起知识界的质疑。尤其自民国肇建之后，现代国家体制已经出现，语文作为民族国家统一的利器，书面语不同口头语之解决又被迫提到议程上了。最初将白话和国语运动的关系结合起来是1917年1月设立的“国语研究会”。这个组织的出现，《国语运动史纲》的作者黎锦熙（1890—1978）有充分的描述。¹¹⁵他指出，在洪宪帝制失败后，他便与教育部的友人“有感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希望透过教育来改革。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是：

……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便相约各人做文章，来极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¹¹⁶

黎后来便结合了有志之士组织“国语研究会”。在这里，黎锦熙的论述值得注意是“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据黎的说法，1914—1915年间，教育部小学教科书主编主每每想改“国文”改“国语”，但反应是“闻者但微笑”原因是守旧者的反对。何以守旧者如此反对，原因是国文改成国语有其深刻意涵：它不仅涉及教育的步骤，以及文章的表达方式，

而且也有力的为通俗文 / 白话文提供了有力的媒介。后来教育部在 1920 年命令，国民学校“国文”正式改为“国语”，这与“国语研究会”的努力有著极其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西方许多研究新兴国家兴起的讨论里，不约而同的都指涉单一语言文字的建立，对“现代国家”之建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语文的单一化不仅有益于提升普及广大人民识字率的理想，并且促成共同意识与共同情感、认同的滋生。¹¹⁷因此，如果说，“国文”一词流行于清末，但到了民国之后，提倡言同文的“国语运动”有取而代之的发展。因为“国语”云者，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全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方言固然不可能消灭，但共同语一旦建立合法性，它是具有强制作用的，能把地方习惯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1917 年，国语研究会之成立，国语运动正式发动，同时布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并附“征求会员书”，其中说道：

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¹¹⁸

这份文件应该代表着研究会的一般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提到“国语”需要“近文”。也就是说，必须以某种书写语言作为基础，否则根本无从“统一”。这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思路已经有了根本不同，晚清白话文作为知识阶层开启民智的工具，一般来说多是采用尽可能接近口语的白话语体。¹¹⁹此时提出国语“近文”的要求，是要用书写语言规范口头语言。不过问题在于，“国语”的范本从何而来？白话尽管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历代变迁，方言渗透，文体的惯性影响了语言表达的扩展；再加上近代以来社会转型，新事物、新的表达需求不断出现，根本就不敷使用。除此之外，当时正式的书写语言都是文言，尽管已经有非常松动的文言，但其性质显然是不基于口语的。¹²⁰

在政府方面，延续前清的立场，国语统一的基本方针仍旧为民国政府所推行。1912年，民国建元，作为新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临时政府教育部即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负责筹划统一了的“国语”之发音（国音）、音素、字母的审查决定。¹²¹这一会议也可看做持续整整二十年的晚清拼音化运动的大检阅，最后选定了章太炎所拟的“纽文”与“韵文”，略作改动后成了“注音字母”。¹²²同时，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了几千个汉字的标准读音。然而，注音字母在1916年以前，学术界仍不重视，主要原因是教育中语言和文字的使用，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改“国文”为“国语”之发展方向，是清末拼音化运动，尤其民初“国音”制定之后的合理思路。1913年5月13日，“读音统一会”议决“国音推行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¹²³其实这不过是对清廷的“旧案”的“重提”。读音统一与注音字母的普及对于建立与规范一种标准的国语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正因为如此，在国语教育中采用民间一般交谈的用语——白话文，实践了言文一致才有了可能。

据王尔敏，在这个所谓国语运动第三代之时（即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国语”这概念开始被广泛应用。王认为，最根本之“国语”概念启导自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进入民国之后，国语运动之“以富强为动机”逐渐消退，而知识普及化观念则日益趋扩张。¹²⁴所以从动机来看，“国语”之流通与使用，与“国粹论”关系不大。民国之后，汉语尽管还面对一些所谓推广“世界万国语”之威胁，但这远远不足以抵消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与实际需要。1919年五四运动虽以反传统著称，并激起其他传统领域的自保意识，但五四运动在对待中国语言上，确是呼唤白话文或国语之出现。¹²⁵五四之后，白话文之使用已成大势所趋，因此自1921—1922年，教育部颁布一系列法律，中小学课程由国文改为国语。

1920年，即民国九年一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这是一个在语文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训令，全文如下：

案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该会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请予采择施行；又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迅予议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届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厅局校转令所属各校，遵照办理可也。此令。¹²⁶

紧接这个训令，教育部又连续下发了第七、八号令，对当时的《国民学校令》和《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进行修正。除了把其中的“国文”改成“语体文”之外，还有这样几点重要的变动。第一，在施行细则第四条里，原来的“首宜正其发音”，改为“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第二，原来的“并使练习语言”改为“并采用表演，问答，谈话，辩论诸法，使练习语言”。第三，对原来的“读本文章，宜取平易切用可为模范者”改为“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序。”另外，每学年的具体要求从原来的“简单文字及日用文章之读法、书法、作法、语法”改为“语词语句及短篇语体文之读法、书法、作法”。修正的最终结果是，四年制的国民学校全都教学语体文，其科目名称为《国语》。另外，同年四月，教育部又通告，将国民学校的国文教科书分期作废。“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秋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年夏季为止；春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年冬季为止；第四学年用书，秋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一年夏季为止，春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一年冬季为止。”至此，四年制的国民学校的国语教学在教育法令方面就这样全部确定下来了。¹²⁷

五四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也带来了具体的白话文学示范，胡适后来就此认为“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

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决不是教育部的公告定得出来的”，¹²⁸直接指出了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之间的联系。此后，开始出现新式白话文章，文言文逐步撤离，书店也来争夺白话书（特别是教材）的市场。国语（白话）通过官方的力量，被明令推行，对文学新旧的影响极大，对旧派更是致命的打击。

总之，清廷在推行新政时，建立了新的教育体制，出现了“国文”和“国语”并用的局面。辛亥革命后，1920年改革教育制度时，国文科改称国语科。从此以后，“国语”逐渐取代了“国文”，晚清时代作为“国粹之所居寄”的“国文”也逐渐淡出。因此我们可以说，体制化的“国语”取代“国文”的过程是从1900年代初开始到1920年完成。概括来看，当时国文（文言文）与国语之使用可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况中，两者的冲突很像是“民族主体性”与“国民素质”的冲突。但在五四时代，正如前述，国家“现代化”重要于“民族主体性”，而“国语”对他们而言，具有普及国民教育的作用，“国文”这曾经被认为承载“国粹”的国字号处于“消”的那一边了。但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按照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和“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叶圣陶对此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2.2 “国史”、民族认同与记忆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有两个具有导向作用并互有影响的潮流，一为中西交融，一为经史易位，或说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中心化。¹²⁹而上文也已经几次提到，章太炎很早注意到了历史对保存国粹之重要性，他可说是其中一位较早注意史学的人物。在章氏看来，历史与文字同样最能寄托国粹——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他的“历史”是广义的，可涵盖汉族古代的优秀文化，从先秦诸子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论著、从音韵小学旁及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学文学等等。他曾批评当时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所差甚远，他认为若他们晓得中国的长处，晓得中国的历史，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情，也必定风发泉涌。他建言，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中国历史上一切功

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若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州，却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他曾说：“国无史，则人离本”，“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¹³⁰

他又说：“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¹³¹但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有久远的历史，要消灭它是很难的。“国之有史久远，则灭亡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搢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在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今国性不堕。”¹³²简言之，在国粹派看来，学习历史就是要人们增强民族自尊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章太炎后来还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载之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¹³³以历史建构国家认同，这完全符合当代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民族国家建构之原则。

章太炎对经学延续与发展没有说太多的话，恰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史学的进步，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了国粹史学。总之，章太炎在建立民族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他以国粹思想作指针，打造中国 20 世纪民族史学思想基盘，为民族史学的精神发展制定了路标。20 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最初形成，与章太炎发端的国粹史学关系密切。尔后中国民族史学逐成壮阔之势，国粹史学恰为其源头之水。在清末时期，他们已经径称中国历史为“国史”，比如邓实就曾疾呼“史界革命”：“悲乎，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¹³⁴这与晚清以降，“无国”的伤怀与“亡国”的恐惧基调相同。就像“国文”之提倡所根植的背景一样，他们所提倡的“历史”认同自然是以当时他们所持守的国家观念为准则。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导致了国家史学的勃兴。¹³⁵或许梁启超是第一个开始使用此词者，但国粹派却也有推动作用，这一点常为学者们所忽略。可以说几乎在同个时刻，国粹派与梁启超一起提倡新史学革命。¹³⁶与 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

学》一样，1905年之后在《国粹学报》上陆续刊载的史学论文，都代表了这一新的国家意识抬头下的史学的兴起。

在“国粹学派”追寻中国这一国家的起源及其特质时，历史学也是他们重要的工具之一。他们从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来衡量，邓实写道：

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也，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¹³⁷

邓实像梁启超一样，以民族主义史学为基准来检验中国传统史学，由此才发出中国“无史”的呜呼。更有甚者，他认为没有史，便没有学，而没有学就没有国，于是将史学研究，将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种以国家观念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脉络。尔后史坛流派纷陈，但都不脱此藩篱。¹³⁸以此脉络发展，“国史”之出现就不使人难以索解了。

综合而论，国粹派基本拥有一个共识，即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就是其“认同”所在。这其实有其传统的因素，龚自珍不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显示，通过记忆，人们拥有共同记忆，而可以结成一体。于是，历史研究就带上了功利性的眼光，即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能服务于当代的史实，提出新的历史解释。这一功利性的考察角度与作法，在世界各地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实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国的民族史学，呈现特别活跃的局面。如“国粹学派”对中国民族历史的构造，就力图从远古的时代入手。毋庸赘言，“国粹学派”的复兴古学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现代中国。这种出自现代的关怀而回顾、“发现”过去的作法，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标志。

2.3 神州“国光”与传统美术

在国粹派的论述语脉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另一个词汇是“神州国光”，它可说是与“国粹”、“国魂”、“国学”、“国性”、“国文”与“国史”构成了一组国粹派常用的国字词族。早在1901年，邓实与黄节即已在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出版《神州国光集》、《国光画刊》、《美术丛书》等。依据国粹派的使用法，“国光”所指涉的是传统美术范畴，包括传统画作与书法。《国粹学报》自第20期开始，就出现征购各种美术、博物品的广告，这透露了《国粹学报》风格的转变。¹³⁹直至1907年3月第24期，在“国学保存会”上有言道：

……所增之门凡二。一曰博物篇：吾国地大物博，菁华所蕴甲全球，惜无人发表疏录之，坐使精光旧闷，今撰博物篇分为植物、动物、矿物三科，以搜求内国物产，明析辨章，使人由爱国土物之心而知爱国。一曰美术篇：东方文明发生，独早雕刻、印刷、练染、刺绣、绘画之术，皆先泰西而精巧。至若诗歌文学之优美，尤为吾国之特长，今撰美术篇凡金石、音乐、刻缕、图画、书法、歌词，莫不阐其精微详为论列，以其吾国先民高尚优美之风，以上二端拾其微茫，无非神州光彩之至可宝者，吾愿爱国之士之共宝此国光也。¹⁴⁰

从那一期开始，《国粹学报》开设了新的“美术”栏目。与许多近代词汇从日本输入一样，“美术”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从“fine/art”意译过来的“新学语”。至于它何时开始被使用，已难于考证，但康有为在1898年撰写的《日本书目志》中即出现“美术门”一词。随后，它就屡次出现于梁启超的文字中。所以，到了《国粹学报》创设“美术篇”之时，这个极具西方概念的词汇时，它已经是当时读书界所熟知了。¹⁴¹在此引言中可见，“国光”一词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提出、阐释，内涵也被确定下来它，即是指可以激励爱国思想的“国家光荣者”——美术。其实章太炎在1906年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曾对为什么主张国粹思想有一涉及“国光”的说明：

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¹⁴²

章氏在这里也提到“国光”，意思似乎指向笼统的“值得光荣”的过去。或许可以这么说，《国粹学报》的上述言说已进一步解释了章氏的“值得光荣的过去”是何物。章太炎宣传“国光”，是为要“同心戮力”，以达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革命”激励种性有关。

在国粹派中人看来，保存美术、国宝与提倡美术的欣赏，与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建立在其国民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有关。国粹派学人认为，中国美术独步寰宇，精微而保有民族特有的气质风貌，让国人认识自身国家重要的美术国粹，当是提升国人对自我文化价值认可的最佳途径。而历代名家创作的书法、绘画和金石铭刻，是他们眼中珍贵的文化国宝。为了维护国家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的薪火相传，又为了涵养国人的艺术气质，以及珍爱文化遗产的观念，因而他们从全力保存美术国宝与提倡美术欣赏著手。

诚然，艺术创作是人类对自然景物有感而发的一种心灵表现。一个民族的艺术作品，高度体现了该民族的生命活力、心灵气质与文化的创造力。所以，民族群体留下的艺术瑰宝，特别值得保存和留给下一代子孙。对国粹派而言，传统书画不只做为艺术欣赏的教材，更是民族的荣光，以资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泉源，尤可藉之以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因为它蕴藏一种民族精神。雷南（Ernest Renan）就曾指出，“辉煌的历史、伟人、荣耀种种皆是形成国家的社会资本”。¹⁴³而且，中国传统文人在书画艺术的创作上，往往表现天人合一，人与物合的特色，呈现山水、人物、诗画互为交会、互为烘托的意境，或展现著实景与想像交融的特有雅趣。因此，书画艺术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与人文精神所在。观赏起来，特别让人感到亲切与自然。然而，却有无数珍贵的艺术国宝流落海外，成为西方国家的座上客和囊中物，这种情形让国粹派学人备

感痛心与忧心。于是，他们致力于蒐罗国内名家书画珍品，将之整理、摄影和刊印，以供国人欣赏，以传之後代。¹⁴⁴

国粹派在实际推广美术研究的工作上，自增加“美术篇”专栏之后，开始对中国历来之雕刻、绘画、书法各类艺术详为论列。同时，在《国粹学报》每期首页刊载数幅名家书画作品，以扼要的解说引导国人欣赏美术国粹。而〈美术研究书目志〉的撰写也成为美术篇的撰文重点，此类书目无疑为国人的美术研究提供更充分的资讯，故而具有相当的意义与贡献。实际上，近代中国为了救亡，汲汲于追求西方国家的科学与科技应用，但却只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是“器用”之学，而未注意到西方科学文明发展背后的人文精神动力。同时，亦多未认识到人类知识与心智的健全发展，实有赖于科学与艺术领域的相辅相成，而人类文明的精进，亦往往成就于艺术与科学的携手合作。这些观念在晚清时代是多数国人体认不到的。而国粹派学人能在国人一片追逐西方科技的浪潮中，致力于中国民族艺术文物的收集，刊布和流传，实属难能可贵。在拟定的国粹学堂课程中，美术亦得到相当的重视。“国粹学堂启·图画学”一科的课程表中，他们设计了六个学期的课程：第一学期：图画史，毛笔画法，实习；第二学期：历代画家派别，毛笔画法，实习；第三学期：毛笔及铅笔画法，实习；第四学期：铅笔；第五学期：用器；第六学期：绘影。

除了《国粹学报》的刊法改变之外，国学保存会将收集到的历代名家美术珍品，于1908年（即光绪34年3月）汇编而成《神州国光集》，两个月出版一册，由邓实主编。它“以发扬国光，提倡美术”为宗旨，连载历代金石书画及题跋，铜版影印。据其出版的旨趣，充分体现国粹派保存国家艺术珍宝和提倡美术的用心所在。摘文如下：

神州开化最早，以优美之民族，夙工美术，专门名家代有传人，其妙品精工久腾海宇，念古代至可宝贵之物，多为国外收藏家珍藏，甚觉可惜。欲使国宝传之久远，众人可欣赏，乃特访求海内各收藏家珍本，或借或购，用日本最新玻璃法精摄影印，希海内共赏。¹⁴⁵

他们强调，汇编美术珍品主要的目的在于：“为提倡美术，表扬国光，使国人群知吾国所可爱之实，而感发其精神意义，以竞胜寰区。近世世界愈进化，则世人愈知宝爱古物，中国立国久，岂可落人於后。”¹⁴⁶自第 21 期起，改名《神州大观》，出至 16 期后刚好与《国粹学报》同时停刊。另外，还有“神州国光集外”。

除了邓实，黄宾虹（1865—1955）也参与创立《神州国光集》。黄宾虹是画家，邓实也精通画论，他们于 1911 年搜罗唐、宋、元、明、清和日本人画论 300 余种，辑编《美术丛书》40 辑。《美术丛书》1911 年出版线装排印 120 册。它专收古今书画及雕刻陶塑艺术，该编可说是集艺术书籍之大成，是至今搜罗最富的历代画论。¹⁴⁷黄宾虹在民初之后还活跃于画坛，其对后来画坛的国粹化作用，下一章还会谈到。邓实在《美术丛书叙》中也言道：自欧学东渐，吾国旧有之学，遂以不振。盖时会既变，趋向遂殊，六经成糟粕，义理属空言。而惟美术之学，则环球所推为独学，言美术者，必曰东方，盖神州立国最古其民族又具优秀之性，故技巧之精，丹青之美，文艺篇章之富，代有名家以成绝诣。故非白黑红梭谄民可与伦比。此则吾黄民之特长而可以翘然示异于他国者也。¹⁴⁸照邓实看来，传统美术是中国独学，既使其他传统学问遭遇了西方冲击，但唯有美术仍旧可以无与伦比，可资为激起国民引以为豪之所在。

“发扬国光”的口号后来一直被美术界所引用，后来的“艺观学会”就以“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研究艺术，启人雅尚之心”为宗旨。在 1932 年至 1934 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报刊就以“发扬国光”来报道消息时的用语。¹⁴⁹甚至中医界在 1929 年遭遇存废问题时，请愿代表在返沪后的报告中亦指出：“政府社会既一致认为中国医药有保存之必要，更望我侪同志努力研讨改进，以期发吾国光。”¹⁵⁰总的来说，“国光”所含概的领域相当广泛，大者而言是指可荣光国家者，但具体上是指美术方面。国粹派众人独到的见解是把它提高到攸关国家意识的层面上，这大大提升了这些领域的地位，有助于它们往后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发展。尽管他们还没有直接使用“国字号”来加以形容各个文化领域，但从此可知，他们的国粹是涵盖了传统画这领域的。实际上，许多后来提倡国粹画家们都

具有国学基础，也参与了国粹学派的活动。比如黄宾虹，这似乎有助于后来有关传统画国家化的趋势。“国光”可说是各种美术国字号的起源，即国光并发成“国画”等词句。

2.4 尚武思潮与武术的国粹化

在各种国粹论述中，也时时出现尚武的言说。“武术”一词追溯起来最早见于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所编的《文选》。该文提到，“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意即停止武距，发扬文治。此词后来逐渐演化为强身之术的专门用语，尤其是随着清末“亡国”之忧以及建国强民思潮之兴起之后，武术被广泛应用。

在晚清时期，所谓的“尚武精神”首先是在招国魂的思潮中出现的。梁启超的“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读陆放翁集》），就是这个意思下的最好显示。而所谓铸造“兵魂”，其实就是高倡“尚武精神”。其实从根源上说，尚武思潮同样是经过日本的中介作用下才开始为士子们所接受的。本论文第二章有关国魂潮一节中，即有相关的引文，其中蔡锷那具有首开风气之功的《军国民》召唤及其日本因素，这里不再赘述。梁启超也曾言道：“吾闻日本人有所谓大和魂者，为尚武精神是也。呜呼！吾国民果何时始有此精神乎？”¹⁵¹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提道，“为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为国民者不可以无勇”，因此呼唤尚武精神之“中国魂”。¹⁵²梁启超甚至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从此之后，尚武精神迹近成了许多晚清志士的兴国共识。¹⁵³其中，强调国族本质的国粹派也在这个思潮中扮演了重要的提倡作用。

对国粹学派而言，尚武精神也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邓实即说过：“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¹⁵⁴尚武精神原本也是汉族中国固有的本质，但已经随着异族专制统治下流失了。在1904年5月13号的《警钟日报》社说中，国粹派刘师培在〈我国武士道之提倡〉一文中指出，“我国武士道有专长，而无专书。其教育皆墨守一师之所传授。稍有一得，辄矜秘之。往往其人老死，则其道失传。”他进而指出，“从未闻有欲普及其道于社

会，而以为国民教育之根本者。”作者也认为，由于历代专制政府由于恐惧“侠武之才干犯法禁”，所以选择“儒家尊君抑民之义以为教育界之重心”，“乃能以一天子监率少数贵族，而统治多数。”他说，就出于政府的不鼓励与压抑，武士道长期受社会歧视，“彼固受政府所干涉之教育，而演之为风俗、为舆论。政府之所贱，即教育家之所贱。”但是，也由于武士道之不发达，其结果是“国民不能自图保存，而为外侮之所制。”然而，“瓜分之祸，期在眉睫”，作者认为“惟有一意尚武。”如此，“御侮之策、除异族以保己族之图，或可期诸十年以后。”最后，作者说，“吾愿吾民勿再为专制政府所恫惕、专制教育所愚弄，自贱其国粹之武士道，以自速鱼烂之祸也。”¹⁵⁵这里说得很清楚，作者把武术视为“国粹”，并且排满的企图相当清楚。隔年，刘师培也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其中，他主要从古代造字的角度的角度，对“我”、“族”、“师”、“国”等四个字之原义来说明，古代炎黄之前中国人不论是个人、家族、社会或国家，都以尚武为本。¹⁵⁶最后指出，古代先王都以尚武为“立国之本”，而“黄帝继兴，遂能屏斥苗黎，扩恢疆土，宅国神州，四夷八蛮，罔不率服，以振大汉之天声”。¹⁵⁷这隐隐然在提倡“尚武”来攘夷——排满。

大体由革命派与国粹派主持的《警钟日报》上，还有多篇主催武术的社说，如在前引〈哀同胞之将亡〉中，作者即认为中国人之将亡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无尚武之精神”。¹⁵⁸该文追述了日本三岛凭借“武士道大和魂之国粹，养成独立、自由、强壮、伟大之国民”，而返观中国，“吾中国自黄帝开国，尚武精神初见萌芽，战蚩尤，平大陆，北尽幽燕，南底荆阳，西流川陕，东渐于海，造成一巍然大帝国”，但由于自大、无进取之思想，又无保守之能力，以至“畴昔悍然之气，一扫而尽，举国上下，不论新旧志士乡愚无知。其容戚戚，其貌忧忧，均若有大难临头之气象。告以‘军国民’三字，莫不缩首而逃”。¹⁵⁹另外，还有一篇“社说”题为〈论中国之败原于游侠消乏〉，从题目可知，它倡言历史上著名的游侠之武士精神。¹⁶⁰《东方杂志》也录用了《时报》的〈采王船山成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一文。该文作者则以王船山的〈黄书宰制篇〉指出中国其实具有尚武精神，而以王船山这位国粹派所重视的人物来立论，个中饶有意

味。¹⁶¹而上述尚武精神之提倡，都从救亡角度论析，这与国粹论述的救亡成分没有差池。在同年，由国粹派中人陈去病等创办的东江国民学校，校旨为“保存国粹，阐发旧学，养成武健之风。”¹⁶²这又再证说国粹派基本上把“国粹”与“培养武健之风”当着同样事情来看。许之微也曾言道，“今之所歉于孔子者，以其无尚武主义也，无国家主义也。夫尚武主义，著于儒行；国家主义，著于春秋。穷而绎之，皆有理论可寻，安在其不足为国魂乎？”¹⁶³这是他在论述孔学对国魂塑造的作用时所说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及尚武主义在其时正有人把之作为批判孔学缺失的标准之一，但也让我们知悉对许氏而言，尚武主义乃儒家所推崇的价值之一，也自是国粹之一，因为他认为儒家就是国粹的核心。

同一年的11月30号《警钟日报》有报道：江西熊氏学塾，现在渐见改良，学生皆一律札绉纱包矣，且制造木枪以备兵式体操之用，旁观者咸谓颇有尚武精神云。¹⁶⁴这透露了尚武之风已然兴起。在浙江平湖县新仓镇运动会宗旨中，亦有“研究体育，养成军国民之资格”的宗旨。但综观其运动项目，竟是“体操、步伐、踢球、掷球、秋千、盘杠、跳跃、竞走、拉绳、角力十门”，而竟无一项传统武术。¹⁶⁵这说明以传统或新式体育为军国民之培养方式，仍存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尚武主义之所以需要提倡，已从另一角度显示其当下的被冷遇处境。对一些人而言，他们更为提倡西式的体操。1908年《神州日报》在一篇题为〈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一文中也提到，“近吾国震于枪炮火功之烈，遂至邯郸学步，日乞求于人。至薄固有之武术，为不当事，嗤其无用，而任其存沫”。¹⁶⁶他进而言道，“近年所颁学堂章程亦不复齿及，于是，虽有陆军水师诸校，亦但有形式上之体操，极其功能仅于手足之训练而已。”¹⁶⁷他追述其原因，认为“迨至本朝则宗奉渐歇，然犹未似今日之绝响也。盖此术之绝响，系因西来之物有以夺之。一则枪炮，二则鸦片烟也。窃谓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尤非崇为普通学科不为功。盖使吾国，苟能有数十万人精此术者，而更益以今日战术之科学，则一旦有事，使之捍卫疆圉，此数十万人能力所至，当有数百万胜兵之用。斯为强国要务，故今日主持国是者与教育家，皆不可不栖神营心于此也。”¹⁶⁸作者一方面建议把武术教育列为普通科，以达致国家富强的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国人

之不重视旧有武术，作者以为“足以见吾国人顽固不悟，轻视旧有之国粹，而稗贩于外，以惊他人之皮毛，宜乎受祸之至如此极也。”¹⁶⁹在此可见，武术在此已经被“国粹化”了，而这也透露了“国粹化”文化传统的趋向正在扩大中。但无论如何，从这个时期的报刊资料中检视之，则似乎还未见“国术”一词，但在国粹派众人的武术国粹化之倡导下，这已开启了“国术”一词出现的论述语境。当然，“国术”之正式命名，还要等到民国以后在其他因素之相互作用下才宣告成立。

尽管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形势已变，但有关尚武精神仍旧时为时人所提起。这是因为革命虽已成功，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了，但是这只是对内革了满清朝之命，外在的威机犹在。因此，亡国忧患在民国之后仍然贯之，武术也就依然被视为在保国强民方面有其作用。比如从资料看来，1915 年，南社成员王蕴曾就写了《论尚武为吾国国粹》。¹⁷⁰文中作者一仍清末的尚武思潮余绪，把“武术”国粹化。他提出道，“不欲保存吾国则已，苟欲保存，则惟有尚武；不欲保存吾国国粹则已，苟欲保存，则首宜尚武。盖武之为道，大可卫国，小可卫身，为吾先民遗传之天性，不可一日缺者也。”作者认为，中国之弱，是从兵农分离开始，从人民害怕当兵开始的。人民之弱，则是从重文轻武，社会贱视勇夫开始。他最后指出，“海牙平和之会，当今徒论空谈”，因此人们应该“誓当报国，志在从戎”。¹⁷¹

但是，尽管民初军国民尚武思潮还见流传，但由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春况下，武术从组织形式到功能及活动方式，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实际上，自清末建立新式军队之后，通过传统武术以求升迁之路，基本上被堵塞了。此外，1903 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新式学堂代替传统的官学和私学，而科举制度不复存在，这也对武术领域造成影响。首先，各级学校必修新式体育。自光绪以来，就有不少人认为传统拳术是“中国式体育”，而提倡把武术“带入”正式的学校中。¹⁷²如在民国时期，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为宗旨、成立于民国元年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就于 1915 年 4 月第一次向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提案，提案中提出了一些

建议：请于学校体育课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请编定武术讲义及请将旧有武术列为师范学校主课。¹⁷³该组织于 1917 年组建了“北京体育研究社附设体育讲习所”，1920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北京体育学校，社务改为“纯粹研究体育”，章程则改为“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

174

面对新式教育制度中的新式体育课程之推介，武术界似乎也兴起把武术“正名”为“新武术”，或“中国式体操”，以对应西方现代体育的所谓“新”。鲁迅当时的观察可为佐证：“近来很有许多人，在哪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打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现在那般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 ”¹⁷⁵与此同时，国粹思想也逐渐在武术界发酵，把“武术”国粹化的趋势仍见持续，武术界中人甚至把武术面对的威胁当着“国粹”沦丧的问题。如当北京议员王讷提议推行“中华新武术”（改革中国武术使之成为中国式体操），以“强国强种”。而一些传统武术者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武术这一国粹的特色丢失。因此，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般“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王讷“抑制暴弃祖性相传的国粹”。¹⁷⁶无论如何，在所谓“强国强种”之有力论述下，1918 年教育部通令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大、中学堂正式体育的内容，1919 年经国会辩论通过，成为全国学校正式体育。这对武术教学的改进、对传统拳法的整理、武术教材的编撰、武术理论的研究阐发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4 年，时人讨论评论此事称：“吾国向来重文轻武，又兼庚子之变，对于旧有武术无人改习。虽间有习者，然不过为个人身体之活动，教授方法既乏研究，施诸团体教练，或加入学校课程，倍觉困难。……厥后北京教育会通过小学校授国技为随意科，标名为练身法。民国四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入体育科，其教员由师范学校养成之。教育界能注意于体育，实自此始；吾国旧有武术得加入学校课程，亦自此始。”¹⁷⁷这里值得注意：引文中对武术是称为“国技”（这也是另一个国字号）。

个人从同一年的一则官方文件中，也看到武术界这样的自我称谓。我们且看“余培丞等设立中国武术研究联合会致教育部备案呈（1924年8月23日）”。

呈为设立中国武术研究联合会，以资联合专家而便发扬国技，恳请准予立案事：窃同人等慨念吾国武术，虽有专家肄习，向系不欲轻于授人，以致国粹每多失传，殊为可惜。而执事为业者又系为个人生活计，图一己之利，对于习者之如何获益，亦未遑顾及。其能具有保存国粹，补益教育，为人民造健康幸福之最大旨趣者，未尝多觐焉。

一则由于武术专家不知将我国固有之体育方法贡献于教育家，以改良体育方法之教授；一则在施行教育者，对于体育方法之采择，纯系图取形式上的新颖，乃弃旧以从新，于国粹中固有武术，盖未能有以保持之，提倡之，此皆为我国武术不能进展之原因也。

若不设法改善，则吾国粹之皇皇武术，必将消灭于无形矣。同人等不忍坐观，爰本公德之心，为共同之企图，发起斯会，拟去短补长，俾各门技术精粹，得以同治一炉，进而为公共之事业。其国家教育，增进人民健康，不徒具保存国粹、空名已也。¹⁷⁸

余培丞等人显然把“保存国粹”作为发扬固有武术的基本理由，他们也视其为“国粹”组成重要部分。¹⁷⁹从这个例子推测，至到1924年为止，至少“国术”仍未见普及。依据资料，满族武术家佟忠义（1879—1963）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了“忠义国术社”，或者这可以看作是国粹概念沿袭至武术界之始。但似乎也没有迹象显示它已经普遍被使用。¹⁸⁰这则呈教育部的备案亦透露另一讯息，即固有武术往往为学校体育教育者所忽略，这表明武术亦面对来自西方新式体育的冲击。另外，1924年的《中国精武体育会章程》规定，该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¹⁸¹尽管把武术与国家兴盛相联系，但也不称“国术”。

从有限的资料管窥之，要到 1927 年始，中国武术才正式称为“国术”。民国时期沧州人张之江，可算得上是一位现代武术事业的开拓者。¹⁸²当时张着手筹建中央国术馆，是年国术馆即成立于南京，张之江亲任馆长。同年，南京政府亦成立了“国术学会”，并下令“国术”列为学校科目之一。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处于政治考量，把国术作为强兵健民的策略。这可说是第一次把自清末以来的尚武理念体制化，也是国家机关主动伸入文化领域，与中医界力争成立“国医馆”有很大的不同。从“国术”亦被制度化于 1920 年代末期来看，这似乎证明了 1920 年代是“国字号”兴起的一个年代，这一点下一章将会加以阐述。

2.5 中西医相遇与“国医”之出现

从明末清初开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学。起初，西医在许多疾病的临床疗效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但是自 19 世纪初，西方的牛痘接种法、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传入中国，西医开始对中医产生较大的影响。新的医学技术传入中国，逐步造成了中医与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两种学说孰优孰劣？中医何去何从？人们当然免不了担忧、揣测、评说、窥测方向、筹划前途。

183

在开始的阶段，中国人还没有惟我独尊、抗拒西医的态度，只是考虑中西医如何共存的问题。1890 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1894 年，唐宗海作《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亦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是为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之第一人。另一方面，张锡钝则充分吸取前人见解，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立足中国传统医学之根基，“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确立“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恽铁樵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通晓外语，广泛地接触中西文化，对中西医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指出：

“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¹⁸⁴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¹⁸⁵我们目前从文献资料上所能看到的争论，似乎都是两种学说之间比较平等的争论。

中医学可说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那何为支撑其理论的传统中国文化呢？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¹⁸⁶但自1900年庚子事件前后始，文化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都有这方面言论。¹⁸⁷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了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一大批学成归国的学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多主张向西方学习使中国国富民强。在文化学术上，他们利用在国外所学的知识，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力提倡科学和民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空前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进而逐渐为西医所替代。

比如极为推崇西方科学的严复就认为，西方科学“公例即立之余，随时随地可以实验。如水至热表四度而结冰，空气于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压力，此人人可以亲试者也。又如内肾主清血出溺而非藏精，肺不主皮毛，肝不藏魂魄，虽其事稍难，然亦可以察验者也。是故此种学科，并无主张，只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目耳，在在得实验其不诬。”¹⁸⁸而对于中国原有之学术，其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所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¹⁸⁹1909年，倾向西医的何炳元在《医学丛

编》刊载《论中国急宜开医智》一文，极力倡导西医科学为保种之根本：“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讲卫生；欲讲卫生，必先明生理；欲明生理，必先兴医学；欲兴医学，必先开医智。”¹⁹⁰对这些相信西医者而言，在医学方面上则只有学习日本对待汉方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才能摆脱被外国辱称“东亚病夫”的境地。换句话说，中医的威胁是西方的入侵与东亚病夫之亡国忧成正比的。综观整个中医史，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地位是随着近代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此长彼消之势以及中国亡国灭种忧患越深沉而益加低下的。清末介绍日本医学书籍最有成绩的功臣的丁福保（1873—1950）在《历代医学书目序》里就有这样的观察：

……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而骏稚之医，以通行陋本，坊间歌括，盈脑塞口，瞶瞶如豕羊，酣卧于厝火积薪之上，而坐弃他人之长，推之天演公例，数十年后，医学国粹亦不复保存矣！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医术科上他说，西人全体之学，至晚近而益明者，解剖精也。自血管脑筋之理发现，据以推察官骸脏府维系之用，同不密合。常者安之，变者探其原而去其害。夫唯了然于心，于能善然于手。斯学不明，而囂囂以方伎自雄，直妄人而已矣！还有吴挚甫，在他《答萧敬甫书》里写道：……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绝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愿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¹⁹¹

中医界面对着“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下，亦思回应。大概随着国粹思潮在 1900 年代初期的笼罩性影响下，医师周雪樵创刊于 1904 年的《医学报》即开始以“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为宗旨，力倡中国医学改良，这透露了“国医”一词的渊源所在。这是中国人

自办医学社团及报刊之始，并且该报于 1904 至 1908 年间是中国唯一的中文医学报刊（包括西医）。¹⁹²它一方面提倡医学改良，沟通中西医，以引进西医知识以提高中医的医疗实践，达至解救中医之目的。另一方面则把中医国粹化——这大概是第一家医药刊物提出中医国粹化——以保卫中医。从时间来看，把中医国粹化几乎是与国粹派崛起相同时的。就如何引进西医，周雪樵曾结合自己经验谈到：

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病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¹⁹³

根据《中国医学通史》，周氏“积极倡导引进西医，对当时的中医弊病痛下针砭”，他可说是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先驱者。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化”运动都与其提倡直接有关。至 1931 年“中医科学化”已“成一时髦名词”。¹⁹⁴1906 年 6 月，周氏皆同上海医界 30 余人发起组织上海医务总会。宗旨在于保存传统医药这一国粹。¹⁹⁵他们多是正统中医，在面对西医学之冲击后，意识到中医学的不足，而提出整顿中医的主张。但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持保存国粹的中医界并不排斥西医，而是主张吸取西医长处，以补中医之不足。¹⁹⁶只是他们民族意识比较强烈，更强调中医学之主体性，这与国粹派之立场一致。

1909 年（宣统元年），根据一位作者在致给“绍兴医药学会”的来函中提到，当时中医是各领域未见革新者。“独我医界年复一年，未闻有人焉大声疾呼，而为之唤醒。有之，上海为医林之藪，周君雪樵逝世而后，无锡丁君仲祐，是中国医会之首创者也。又有我绍兴医学会，何君廉臣，为之领袖也”。¹⁹⁷由此可见，周雪樵在中医界的贡献是当时人所公认的。另一位引文所提及的何廉臣（1861—1919）是上述《绍兴医药学报》的创办者之一。他在自己于 1908 年参与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发刊词上说，“物理不解，化学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凭诊脉以断症，徒汤头之歌诀”，表达其对中医不了解科学的不满。¹⁹⁸在 1909 年（宣统元年 4 月）绍兴医药学会举办常会上，会长何廉臣的演讲中已经预示中医即将面临的困境。他说道，

中西医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尤不可偏执。处今学术竞争之时代，总以容贯中西，力求进步为第一要义。况现在政府及各社会，渐有扬西抑中之概，故东西医接踵而至。留学欧美日本医科之学生，源源回国。将来新旧激战，必然之势。政府已有整顿太医院改用西医之说，中医汲汲可危，已可概见。¹⁹⁹

何之言实已点出了中医所处着的“学术竞争之时代”以及留学国外学生回归之后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当今之势，不得不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这说明他们也提倡中西医互补的，可以接受西医之优而改良中医。但他有指出，“果能新学了，必须比较抉择，揭彼之短，显我之长，以保国粹，为炎黄子孙吐气。”此又说明了他视中医为国粹。他进而批评“近今一班老成医士，尝曰保国粹、保国粹，特不谋保存之法，而徒托空言，于事终归无济。”²⁰⁰这或许就是他创办《绍兴医药学报》的初衷罢。

笔者个人从翻阅《绍兴医药学报》中所刊载的内容所得，它可说是时时以维护中医国粹为己任。它从探索西医与中医之弊端，来揭窳两者的优缺点，一方面促进中医之改进，另一方面则揭示西医同样得失参半，说明中医未必事事不如西医。一位作者陶芝兰就写了〈中西医学互有得失论〉。文中，作者分析了西医得失参半，而中医的被排斥问题在于“中医之失，失在古学之不讲求，非尽在中医之真劣。奈何喜新者，鄙夷旧学，欲尽弃之，不知未有国粹之不保存，而能改良进化者”。从论者所言，这可佐证中医之命运确实系于传统文化命运之上。另一点可以注意的是，作者的中医保存之道借用自国粹论述之处很多。国粹中人不是已经说过，欧化必须建立在国粹基础上才能事半功倍吗？作者进而指出，西医未必适合中国人的体质与习惯，因为“一国有一国之住民，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宜于西国者，未必宜于中国，宜于日人者，岂尽宜于华人”，²⁰¹这似乎有透露了国粹论述所强调的“一国自有一国之特质”之影响。此外，从倾向西医的何炳元在《绍兴医药学报》通讯栏中，针对一位署名杞忧子在《上海医学报》的看法驳斥可知，接受国粹思想的中医学报不止一家。在通讯中透露，即杞忧子认为，欲“养成国医之人格，首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

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苟能是是以足以争存矣。”²⁰²杞忧子以为国粹足以争存的看法，已足以证明中医学界受到国粹思潮之深刻影响。

总的来说，根据资料显示，在此《绍兴中医报》上，已经大量出现“国医”字眼，而且通观整本刊物，传统中医几乎被视为相等于国粹。这似乎显示，在国粹思想运动之笼罩与影响下，中医界也接受国粹概念。中医可说与国粹论相随，是最早被国家化的传统领域之一。但其广泛运用，还待民国时期。

第三节：小结

甲午惨败以后，随着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国人对“国”字之认识亦渐次成熟。这个对“国”字的自觉，在晚清酝酿成熟，除了诚如王尔敏所指陈的，在保国会有重要的表达之外，“国粹”一词的兴起也是另外一个显例。但是，国粹一词的兴起，则还要具备文化上的自觉始可。也就是说，在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两者之相互作用下，国粹于焉产生。尽管国粹论者立场迥异，我们看到各种国粹主张的文章灿然杂陈，从一开始，国粹就对不同层面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它还是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民族国家本位——作为考核国家在现代化中的标准。它也形成以国粹——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的象征符号。本章也证明，正是在1902年以后直到革命前夕，随着国粹观念之深入，清末国粹派之立论与所形成之叙述，提供了理藉与示范，使得其他文化领域在面对自身处境之需要时，把自身国粹化与国家化，比如中医、音乐与武术。对一些人而言，国粹既然涵盖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的，传统医学、戏剧、书画、武术、音乐等等当然也属于国粹范畴，也可以说是其外延了。这自然导出其他国字号。

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似乎涉及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即那些被认为最能界定国粹意含的领域，如国史（历史）、国文（文字）都最早被“国家化”。这两个国字号虽未必是由国粹论者所率先使用，但他们的着重也显示了当时知识界普遍对此二领域之重视，国粹派之论述亦促进了“国史”与“国文”的兴起，一系列国字号也由此先始。因此，至清季为止，

已经出现“国学”、“国文”、“国医”、“国光”、“国乐”等等，自成一个词族。而且这些称谓也一部分是国粹论者所开始或较早使用的。

总之，清末国粹中人所揭示的“一国一族自有其不可或缺的特性”，这一论式可说已经形成一种“论述规则”（discursive regularity），导使许多领域的人士都尝试把各自领域“国粹化”，如中医界最明显，因此文化国字号提倡者其实可说大都是国粹主义者。从这个角度而言，国粹论者看来不仅仅为知识界所坚持，亦为各专业领域人士所持有，这之间或有从上而下的传播。客观的说，通过国粹论述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字号”现象，它似乎更能比张之洞时代所提出的中体西用作为维护中国传统的范式更具有说服力。它毋宁说是中国近代追求富强的大论述架构过程中的一部分，但又脱离了他们前辈的上述论述。国粹派的理念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国家化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可见于辛亥革命民初之后，“国字号”也在现代历史演变中成为日常用语。“国粹”之使用法一一以“国”为名亦陆续被使用于其他被认为是国家特有的各个领域之上。但必须指出的是，它的广泛运用还要待至民初，尤其是1920年之后，在其他因素之发生催化作用下，才拚发出来。但客观上，清季之国字号使用却无疑为民国广泛的国字号运动留下了系谱。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张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结编织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国粹”、“国光”、“国学”、“国医”等国字头词汇都可作如是观，这“国”字词族后面其实同样跟着一些思想脉络与概念。从上文看来，它背后系着一个国家意识与民族本位相维系、相纠葛的思潮，但更长远而论，也开创了现代中国“民族文化本位”的叙述模式。因此，要理解近代以来的所谓保守思潮恐怕不能不从此作为开端。

¹同上，页397。

²伯纳尔（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页461-462。

³梁启超：〈新民说〉，页122。

-
- ⁴梁启超，王德峰编选：〈国性篇〉，《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152。
- 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页111。
- ⁶罗志田：〈学术与国家：清季民初3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5。
- ⁷详见本论文第一章注4。
- ⁸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以及王先明：《关于晚清的“旧学”与“新学”》。
- ⁹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1906年。
- ¹⁰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 ¹¹邓实：〈古学复兴论〉。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上册，页59。
- ¹²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页43。
- ¹³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页49。
- ¹⁴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上册，页501-502。
- ¹⁵见〈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 ¹⁶章太炎著、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
- ¹⁷蔡乐苏：〈教育今语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630。
- ¹⁸《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 ¹⁹《国粹保存主义》。
- ²⁰同上。
- ²¹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9期，光绪28年12月，页81-82。
- ²²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疏〉，《张文襄公全集》，第2卷，页145。
- ²³汪家熔：〈辛亥革命前国粹派的出版活动〉，湖北编辑学会主办：《出版科学杂志》，2004年第6期，见“出版科学网”，于http://www.cbkx.com/2004-6/685_2.shtml。

²⁴春水：〈中国国学保存论之一〉（录自《政法学报》），于《东方杂志》，第3期，1904年5月10日。

²⁵同上。

²⁶《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1907年。

²⁷宋恕：《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374。

²⁸详见宋恕〈国粹论〉（1909年9月），《宋恕集》，页458-461。

²⁹见上一章，注164。详阅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页292。

³⁰真：〈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20号，1907年11月2日。

³¹宋恕在〈国粹论〉，页459。

³²同上。

³³其实这里宋恕对“国粹”概念之质疑，或许说明他国粹思想已转变。为这里未能赘述。

³⁴〈论今日旧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社说”栏，1904年10月17日。

³⁵韶海：〈何谓国粹〉，《进步杂志》，第3卷，第1号，1912年11月。

³⁶同上。

³⁷同上。

³⁸见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66。

³⁹在《政艺通报》癸卯第二十号，就有这样的诗句：

“众生无良太顽痴，三界焚如力不支。璎珞华鬢殊胜地，香床金网独来时。世间种种悉能现，愿力团团无尽奇。笔墨收功在何日？国花普照洵瑰奇。”见同上注，页17。

⁴⁰《浙江潮》创刊于1903年2月的日本东京，由浙江的留日学生生孙翼中、蒋方震（百里，1882—1938）、马君武（1881—1940）、蒋智由（1865—1929）等人主编。

⁴¹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浙江潮》杂志，1903年6月。

⁴²同上。

⁴³邓实：〈史学通论〉，《壬寅政艺丛书》，上篇，1902年。

⁴⁴重光：〈人种史〉，《觉民》，第8期，1904年（甲辰年五月二十五日）

⁴⁵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认为，虽然中国史学汗牛充栋，但中国的“正史”只是专制帝王的家谱，而未记载多少中国民众的事迹。所谓中国的“旧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旧史仅为“君史”，而新的历史应是“国家”及“国民”的历史。（见梁启超：《新史学》，于《饮冰室》之九，页3。）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想将“国家”作为历史著述的中心。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他一方面将高扬民族主义视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样板，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有关梁启超与新史学的关系之研究，硕果丰富。如黄克武的《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页181-214）、黄进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1997），页263-285。）、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1900-》（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等。）

⁴⁶可详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页181-189。

⁴⁷见曾志忝：《乐典教科书·序》，载《江苏》，1903年，第6期。引自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437-438。

⁴⁸《章太炎先生答问》，页295。

⁴⁹罗志田：《学术与国家：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146。

⁵⁰同上，页145。

⁵¹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⁵²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

⁵³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

⁵⁴有关争论之讨论，可详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中“种界与学理：抵制东瀛文体与万国新语之争”章节。

-
- ⁵⁵章绛（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粹学报》，第4年，第4、5期，1908年。
- ⁵⁶同上。
- ⁵⁷汤志钧编：〈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页276。
- ⁵⁸章绛（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 ⁵⁹同上。
- ⁶⁰同上。
- ⁶¹同上。
- ⁶²见叶瑞昕：〈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辛亥革命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文化自新意义〉。
- ⁶³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
- ⁶⁴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
- ⁶⁵同上。
- ⁶⁶高旭：〈南社启〉，原载于《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见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页129-131。
- ⁶⁷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
- ⁶⁸梁启超：〈国文语原解〉，《饮冰室合集》，卷20，页31。
- ⁶⁹见《廛书详注》，页831-832。
- ⁷⁰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
- ⁷¹黄节：〈国粹学报叙〉。
- ⁷²〈论保存国粹宜自礼俗言文始〉（录自《神州日报》，戊申四月初六），《东方杂志》，1908年5月24日，页68-70。
- ⁷³同上。
- ⁷⁴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147。
- ⁷⁵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页145-148。亦见于《东方杂志》（题为〈两湖总督张札设存古学堂文〉），第2年，第1期，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页10-14。
- ⁷⁶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147。

⁷⁷〈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教育杂志》，第1年7期，1909年（宣统元年六月）。

⁷⁸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3月。

⁷⁹见《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约1910年），第72期，收于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517。

⁸⁰引自杨天石：〈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运动〉，《寻求历史的谜底》，页301。

⁸¹〈语文教育百年大事记〉，原载《资料卡片杂志》，2004年，第11期。

⁸²见《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http://online.btvu.org/media_file/rm/ip3/zhangxh/2003_11_25/1_zjjj/ch_01/htm/02.htm。

⁸³刘师培：〈国文典问答〉附录（1903年），收于《刘师培辛亥前文选》（题目改为〈国文杂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页184-191。

⁸⁴〈东江国民学校简章〉，《警钟日报》，“事件”栏，1904年4月10日。

⁸⁵〈城东女学社简章〉，《警钟日报》，“专件”栏，1904年7月24日。

⁸⁶〈温州明伦学塾简章〉，《警钟日报》，“专件”栏，1904年8月9日。

⁸⁷〈国立普通中学堂简便章程〉，《警钟日报》，“专件”栏，1904年9月16日。

⁸⁸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页40-41。

⁸⁹《警钟日报》的一篇社说可以证之。在〈论食古不化与食新不化〉一文中指出，第一期新名词如化学诸名目，第二期则是诸如“维新”等新名词。见《警钟日报》，1904年7月27号（甲辰六月十五日）。

⁹⁰林獬：《致高旭书》（1904年7月），原刊于《南社》第1集，见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页30-31。

⁹¹高旭：《愿无尽斋诗话》（节录），1910年1月，见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页153-155。

⁹²〈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⁹³〈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盛京时报》，1908年2月1日。

⁹⁴四川总督锡良、学政郑沅：“添设致用学堂以广儒效而豫师资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四，《光绪朝朱批奏折》105辑，中华书局，1985年，731页。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157。

⁹⁵见高凤谦，《论保存国粹》，载《教育杂志》，第1年7期，1909年（宣统元年六月），页547-548。

⁹⁶同上。

⁹⁷吴彝珠：《强国之本系于国文一科论》，《女报》第一号，1909年2-3月（宣统元年元月）。

⁹⁸同上。

⁹⁹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122.)

¹⁰⁰引自吴汝纶：《东游丛录》，《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¹⁰¹黎锦熙著：《国语学讲义》，引自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年，页67。

¹⁰²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香港：中国语文学社，1967年，页100。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页36-37。

¹⁰³见〈论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学及变通语言文字〉（节录乙巳正月十九日新闻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1905年（光绪31年3月25日），页32-33。

¹⁰⁴同上，页33。

¹⁰⁵见〈语言文字宜合为一说〉（录乙巳三月十一日汉口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1905年（光绪31年6月25日），页95-97。

¹⁰⁶见黎锦熙著：《国语学讲义》，引自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年，页67。

¹⁰⁷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0年（宣统3年4月25日），页1。

¹⁰⁸同上，页6。

¹⁰⁹同上，页7。

¹¹⁰同上。

¹¹¹同上，页 2。

¹¹²〈祝京津各日报〉，《大公报》，1910 年 5 月 9 日。引自李孝悌：《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于《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0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页 283。

¹¹³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页 67。

¹¹⁴有关清末通俗文的提倡也下开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两者之间的承传关系，李孝悌有详尽的论析。见氏著：《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于《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011》，页 251—290。

¹¹⁵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年。此书记述了自清末以来改革汉字、推行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提倡大众语的始末，说明了有关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一部重要著作。

¹¹⁶同上。

¹¹⁷林志宏：《社会和情感的交互作用：清末民初文言与白话地位的逆转》，“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http://202.76.36.61/conference_publication/rs_3/42.htm。

¹¹⁸《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见《新青年》第 3 卷，第 1 号，1917 年 3 月。

¹¹⁹详见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 年第 3 期。亦收于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页 597。

¹²⁰同上。

¹²¹有关“读音统一会”，详见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

¹²²章太炎〈规新世纪〉中讨论了地方方言如何统一的问题时说：“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见〈规新世纪〉）他用古文篆籀经省的字形，制定了 58 个注音符号，纽文（声母）为 36，韵文（韵母）为 22，上纽下韵，相切成音。注音符号，从儿童入学时便学习，这样逐步达到语音的统一和标准化。这里所提的、由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中，多有其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等。因

此，会议建议采用他制定的注音符号，并得到全会一致赞同，注音符号在中国运用了几十年，为语音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¹²³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四，时代出版社，1950年6月版。

¹²⁴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36-37。

¹²⁵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之间的关联，可参阅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页594-615。

¹²⁶引自郑国民：《小学国语教学方法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基础教育网”，http://bpzx.com/subject/chinese/html/010604/2000_12/20001229_261.html。

¹²⁷同上注。

¹²⁸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引自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页609。

¹²⁹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02-341。

¹³⁰《春秋故言·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2。

¹³¹《哀焚书·廌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页323。

¹³²《原经》，《国故论衡》卷中，页71。

¹³³见〈答铁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页60。

¹³⁴见〈史学通论〉，《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一”。

¹³⁵参阅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¹³⁶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页170。有关国粹派的史学观，可详此书第五章。

¹³⁷邓实：〈国学微论〉，于《国粹学报》，第2期，1905年。

¹³⁸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1902-1950〉，收于《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00年。

¹³⁹萧琼瑶：《清末民初国粹思想研究——以国粹学报为中心》，页130。作者认为《国粹学报》这时从“精神的相竞”转向以美术、金石等古董之夸耀，乃守旧的开始。这是极有见地的。见同书，页131。

¹⁴⁰见邓实：〈神州国光集序〉，亦见于“《国粹学报》增广门类”，〈国学保存会报告〉，第5号，《国粹学报》，第3年，第24期，1907年。

¹⁴¹王凤：〈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争论背景〉，见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页21。

¹⁴²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

¹⁴³雷南（Ernest Renan）著、李纪舍译：〈何谓国家？〉，《中外文学》，第24卷，第6期，1995年11月，页16。

¹⁴⁴详见黄绣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页358。

¹⁴⁵见《国粹学报》，广告版面，第4年，第1期，1908年。

¹⁴⁶同上。

¹⁴⁷汪家熔：〈辛亥革命前国粹派的出版活动〉。

¹⁴⁸邓实：〈美术丛书叙〉，《美术丛书初集》，第一辑，页2。

¹⁴⁹《大晚报》，1934年5月28日。引自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

¹⁵⁰〈中医药代表团请愿〉，《申报》，1929年3月24日。

¹⁵¹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页25—26。

¹⁵²同上，页25。

¹⁵³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83—288。有关尚武思潮之论析，可参阅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2000年。

¹⁵⁴邓实：〈国学今论〉。

¹⁵⁵耿（刘师培）：〈我国武士道之提倡〉，《警钟日报》，1904年5月13号。

¹⁵⁶刘光汉（刘师培）：〈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1905年。

¹⁵⁷同上。

¹⁵⁸〈哀同胞之将亡〉。

¹⁵⁹同上。

¹⁶⁰〈论中国之败原于游侠消乏〉，《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甲辰六月十四日）。

¹⁶¹〈采王船山成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1904年（光绪七月二十五日），页237-239。

¹⁶²〈东江国民学校简章〉，《警钟日报》，“事件”栏，1904年4月10号。

¹⁶³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第1年第2期，1905年。

¹⁶⁴〈逐渐改良〉，《警钟日报》，“学界纪闻”，1904年11月30号。

¹⁶⁵“专件”，《警钟日报》，1904年8月4日。

¹⁶⁶〈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录自《神州日报》，1908年，戊申六月初四），见《东方杂志》，第5年，第6期，1908年7月23日（光绪34年6月25日），页99-100。

¹⁶⁷同上。

¹⁶⁸同上，页101。

¹⁶⁹同上，页100。

¹⁷⁰王蕴曾：〈论尚武为吾国国粹〉，《国学杂志》，第2期，1915年5月14日，页3-8。

¹⁷¹同上。

¹⁷²另一变化是：“社会人民凡欲以武取功名者，因科举已废，遂多改事他业。故各省各处之武学馆，亦入天演之淘汰。”这里所说的“他业”，大抵有经商（如霍元甲）、当武术教师或充当私人保镖，（如五四前后孙派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的孙子孙务滋，在太仓中学任武术教员，应前清江苏巡抚陈夔龙的聘请，业余时间作陈家的私人内家拳教师）、到军中任武术教官、到城市办武术会等。1920年代，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成都等许多城市中武术组织蜂起，其为首者大多是武术世家传人。如形意拳和八势拳名家姜容樵（1891-19?）幼年丧父，随叔父、前清武进士姜德泰生活，学习祖传武功，1920年代在上海组织了“尚武进德会”；常州人刘德生（1875-1869）祖辈以镖局为业，他本人1914年到上海沪南体育场任武术教练，1920年代在沪上各校任教。（详见谭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武术的进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页116-127）这里要说明的是：随着

科举的废弃，造成学武者不再可能“以武取功名”，这无意间促使武术地位的降落。

¹⁷³详见同上注。

¹⁷⁴伊见思：〈体育研究社略史〉，《体育丛刊》（北京）创刊号，1924。

¹⁷⁵鲁迅：〈随笔录 37〉（1918 年），《鲁迅全集》卷一，页 385。

¹⁷⁶鲁迅：〈随笔录 53〉（1919 年），《鲁迅全集》卷一，页 413。

¹⁷⁷伊见思：〈体育研究社略史〉。

¹⁷⁸“余培丞等设立中国武术研究联合会致教育部备案”呈（1924 年 8 月 23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页 666-667。

¹⁷⁹直到 1930 年代，“国粹”仍为提倡“国术”的凭借之一。有人在提到国术之世界价值时，即言“国术者乃体育之上乘也，吾国昔日，未尝不重视之，降至后世，武备废弛，重文轻武之习，日深一日，遂使数千年来泰西未曾有吾国国粹，而不得复现于世。”见《国术周刊》，第 11、12、13 期合刊，1935 年。

¹⁸⁰佟忠义，祖居沧州，世代习武，在奉天以保镖为业，后任军中武术、摔角教官。1930 年代，任教于上海国术馆等处。见谭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武术的进步〉。

¹⁸¹见同上注。

¹⁸²张之江（1882-1969），张之江曾任冯玉祥国民军旅长和代总司令等职，1927 年脱离军界。

¹⁸³引自〈西医传入与中医废止的背景问题〉，见 <http://www.clinixoft.com/lunwen/sjsx3.htm>。

¹⁸⁴同上。

¹⁸⁵同上。

¹⁸⁶〈在反思中振兴中医〉，见 <http://www.hnst.gov.cn/115/show.asp?idp=224>。

¹⁸⁷见邓铁涛编：《中医近代史》，页 257。

¹⁸⁸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页 457。

¹⁸⁹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70。引自刘理想，〈试论清末民初留学运动对中医发展的影响〉。

¹⁹⁰何炳元：《论中国急宜开医智》，刊载《医学丛编》，1909年。

¹⁹¹引自李敖：《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原登在《文星》，第61号，1962年11月1日。

¹⁹²邓铁涛、程之范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

¹⁹³同上，页178。

¹⁹⁴同上，页184。

¹⁹⁵见邓铁涛编：《中医近代史》，页65-67。

¹⁹⁶同上，页66。

¹⁹⁷秦云章：〈致本会书〉，《绍兴医药学报》，第30期，1909年（宣统元年8月），页8。

¹⁹⁸见邓铁涛、程之范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页177。

¹⁹⁹〈杂录·常会提议之要素〉，《绍兴医药学报》，1909年（宣统元年5月15日），页10。

²⁰⁰同上。

²⁰¹陶芝兰：〈中西医学互有得失论〉，《绍兴医药学报》，第9期，1909年（宣统元年二月一日），页4。

²⁰²何炳元：〈敬告杞忧子先生书〉，“通讯”，《绍兴医药学报》，第10期，1909年（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五日），页13。

第五章

以国之名为盾： 革命后国粹论述之转变与国家观念(1912-1928)

1911年的辛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大势已去，不得不宣布逊位。正如前章已经提过的，民族与国家主义是清末时期知识圈炽热流行着的核心思潮，也是他们藉以救亡图存的良方之一。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是与排满革命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民国草肇之后，不少人即认为，以汉民族及其文化为主体的民族主义与建国意识已算完成其历史任务。革命以后，汉、满对立色彩已经明显退隐，革命党人也宣布以“五族共和”立国，排满主义变得没有用处了。印记着浓厚排满思绪的清末国粹派及其所引起的思潮自然要逐渐不适合时代需求了。辛亥后翌年初，《国粹学报》反满“功成名就”，宣布“满清退位，汉德中兴”而将第8至13期合为1册出版以终刊，并从此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与《国粹学报》关系密切的“南社”创办人陈去病对此也说，“南社之目的已达”，建议“组织共和政党”。¹另一南社成员姚光则认为，“今光复功成，民国建立，未始非提倡国学之结果；而明季诸先生之流风余韵所致也”。²从此可知，对国粹派而言，革命与国粹思想之提倡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国粹学派”基本上也宣告解体。

实际上，除了章太炎在1910年刊行《国故论衡》时，取较中性的“国故”而舍“国粹”一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弟子黄侃与刘师培等人在1919年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创办了《国故》月刊。他们标举的是“国故”（不是“国粹”），也以此为刊名，宗旨是“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因为自“慨然于国家论夷，发起学报，以图挽救”。³显而易见，“国粹”一词至此基本已被其主要的倡导者所弃用。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且国粹学派正是

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并开始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⁴更重要的是，辛亥后的国粹派其他健将诸如黄节、邓实等人亦不再着眼于“国无学则不立”的言说。国粹派众人在民国时期所从事的是一些比较属于一种知识层面上的活动，如章太炎在民国至 20 年代仍旧到处演讲，还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国学，并先后在东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授国学有关“经史子集”的“国学”等，因为在他看来，“国故”可以激发民族精神，不管革命如何剧变，文化传统必须保存，⁵惟其所重显然在于“学”的一面。邓实、黄节也淡出言论中心，他们或出版《古学丛刊》以“广罗旧闻”，或在北京大学授课，直接投身研究传统学问之领域。⁶所谓“古学”，其实已点出他们离社会问题更远。此外，1912 年 6 月，南社众成员高燮、高旭、姚光及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了“国学商兑会”，宗旨为“扶持国故，交换旧闻”。⁷有两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从他们的用词来看，“国粹”同样为“国故”所代。第二点是，他们与前述邓实等人一样，似乎更重视对国学的实际研究，而非对“国无学则不立”作思辨。国学商兑会主席姚光即称，民国后，“现在旧邦重健，凡百更新，而国学万端，亦皆待理，发挥光大，愈不容缓，此国学商兑会之所以结也。”⁸换句话说，他们所重已从“国”转移至“学”之层面，不在高谈“国家意识”之建构，也不再是从国家存立与文化认同等联系一起来谈国粹了。显然的，辛亥之后知识界的问题意识已经改变了，种族革命与文化救亡似乎不再是他们主要的视野或考虑范畴。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提倡国粹者及其论述就此消失？

实际上，“国粹”概念仍以其他的表现形式重新进入中国思想言说的中心，“国粹论”还是被延续下来。它的持续并不以《国粹学报》之结束为转移，相反的，各式各样的国字号词汇夹杂着“国粹”一词出现于各种言说之中。所不同的是，民国以后这股国粹论述却发生捩转，主要叙述者群也发生变化，并以另一种动机与目的风行，当然这股风向自有左右其运行的时代情境。对于“国粹论”动机与目的的转变，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上的观察值得我们加以注意。他说道：“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

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藏著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著什么意思了。”⁹鲁迅对清末国粹论的评语，基本符合本文第三章所分析的，接下来本文则要探讨民初国粹论的兴起、背景脉络以及追问其“背后藏著什么意思”。

第一节：民国初期的时代氛围与国粹论述的再兴

辛亥革命是一个分界线。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作为正统史学界的共论，辛亥革命划开了帝制和共和两个时代，而在有些人的眼里，它却标志着无序和动荡的开始。¹⁰尽管文化的起落并不一定与政治的兴衰成正比，但历史上一些政治失序的时期，却往往为文化的变化提供某种必要的背景。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就民初的政治概况作探寻，以理解“国粹论”在政治情境变化下的变化。

1.1 政治失序与价值重建运动

虽然 1911 年武昌革命一役已告功成，革命思潮亦随之淡退，但是辛亥之后的中国政治并没有因为革命之成功而走上正轨，相反的，其结果是军阀擅权、武人专制境况的陆续登场（事实上，从 1911 年至 1927 年这十六年间，中国经历两次复辟帝制、十三次更换总统、四十六届重组内阁，可见政治形势之混乱）。这其实说明，当时的中国在清廷覆灭之后，除了汉民族建国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胜利之外，政府的权威却陡然丧失殆尽，中华民国在事实上遭遇了严重的政治权威真空危机，国家建构可说并未取得实质的成功，尤其在现代制度建构与秩序都与主观期待和努力有巨大落差。革命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实质并无改变，但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造成了盘据各方的军阀割据为政，内战不已，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民初的中国社会，可说是处于一个迷失方向的特殊时期。革命虽给中国带来了急剧的政治变动，维持数千年的帝制瓦解了，但社会经济的状况并不可能相应的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

举国上下对此前所未有的新情势，既不相习，亦不了了，大都以为不过是满洲皇帝换了汉人总统。¹¹旧的皇权倒台了，新的政治权威却不见得就此建立起来。革命派孜孜以求的“自由民主”价值在民国初年尚不足以成为中国人社会体系的参照，因此当时的中国顿时陷入社会混乱的局面之中。一般人们因此开始怀疑革命是否必要，进而思考如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中国的社会秩序，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但问题远不仅于此。实际上，中国人在辛亥之后意义世界的丢失并不仅仅表现在君主政体被推翻这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中国人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溃。林毓生在其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曾指陈道，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是高度统合在一起的，因此当辛亥革命瓦解了政治体系——以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为象征——之时，随之而来的是价值权威瓦解与空阙的危机。¹²因此简而言之，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秩序混乱，不独表现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上。社会整合松弛，各种振荡、失衡、重组等现象纷至沓来。¹³从思想的角度看，民国成立后，也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知识论危机，在这样的大语境下，它与政治一样，思想界在心理上亦处于一个“失序”的状态中。

因此，如何尽快地整合社会，统一观念，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便成为当时思想领域中的迫切问题。正因此，1912年至1919年之间，基本上即是行进着一个价值重建的运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一个系统调整或重建价值的时期。¹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尽管共和原则下的新观念与新道德在新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来说，新道德与新观念毕竟影响甚小，民权、自由等学说，不过为最近数十年留学生所倡导，尚不足以成为社会道德的主流。由于道德失范导致的社会混乱日甚一日，出于最现实的考虑，昔日一些西化派的健将也纷纷转向儒学寻求药方，传统思潮在此时陡然勃兴。我们可以注意到，当时各种传统论各有其不同的取向，各自张扬着自己的旗帜。尊孔者主张，“今欲存中国，必先救人心，善风俗，拒邪行，放淫辞”，¹⁵而欲做到这些，舍传统则无从下手，也不可能成功。因此，在民

初政治与价值紊乱中，兴起了一股传统道德的风气。易言之，辛亥发生使整个舆论界的倾向迅速发生了改变。一段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欧化主张开始受到严厉抨击。

1912年初，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甫成立后不久，即依据民主共和的原则颁布一系列法令，要求各地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之礼，同时禁止使用前清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并要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与共和宗旨不合者，可随时修改，禁止讲授。南京临时政府的这项命令，在社会上引起强大的反响，首先起来反对的当然是来自旧的营垒。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宣称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因此他们创设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希望以此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倡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同年，王锡蕃、刘宗国等在济南发起成立“孔道会”，推康有为为会长。翌年4月27日，徐世昌、徐棋在北京成立“孔社”，以阐扬孔学，讲求实用，巩固国基为宗旨。同年10月3日，沈维礼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环球尊孔总会”。几乎与此同时，严复、马其郝、夏曾佑、林纾、吴芝英、梁启超等学界名流二百余人发起成立“孔教公会”。一时间，尊孔的呼声甚嚣尘上，尊孔思潮强势的遍及中国。¹⁶

1.2 “国粹论”的动机转变与官方介入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清王朝，但最终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匆匆就任民国总统。尔后，他残酷镇压革命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统治。迨至1913年之后的几年里，袁世凯在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尝试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来达到政治权威的重构。坐享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也出于有意称帝的野心，开始提倡祭孔与读经。1913年10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他为总统。随后，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袁废除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其《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5年二月，袁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强调“各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遵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实行读经教育。¹⁷1915年12月，他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袁

世凯相信祭孔仪式的政治作用，为了称帝的目的，借用儒家资源，大力提倡祭孔与读经活动。¹⁸

然而，两者各取所需，民间的孔教会也乘机借用袁的“借用”，他们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亦上书袁世凯、教育部和内务部，请求准予立案施行等等。这深得袁世凯政府的“嘉许”，言其“力挽狂澜”、“苦心孤诣”云云。其结果是，民间的守旧心理、知识界的复古思潮与政府的统治需要在某些方面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性。¹⁹诚如前面所说，袁世凯之所以大力鼓吹宣扬孔孟之道，当然不是单纯出于弘扬传统文化，而无非是想利用传统的“伦理纲常”来维系人心，从思想心理上来控制和阻止民主共和意识的深入传播，从而达到其在政治上专制独裁的目的。孙中山指袁之“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实乃“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即是对此动机而言。民间与官方的共同尊儒风潮予当时人感觉尊孔运动与政治上的帝制运动完全联姻感觉。风潮所向，各方纷纷效法，一些舆论把辛亥革命后社会不稳定的根源错误地归咎于不尊孔教，要求定孔学为一尊。有的声称：“孔教之于吾国，不特为数千年教育之宗，而政治、道德、人心、习俗，实无一不于孔教是赖，非定为国教，使之如日中天，则道德之败坏，人心之牾亡，政治之堕落，风俗之偷窳，将有不堪设想者。”²⁰在民间的提倡与官方的介入下，这更造成传统复归思潮更为兴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往往又以“国粹”来表述他们所谓的“传统”、“儒教”或“儒家”，使得“国粹论”大有再兴之势。官方也同样使用“国粹”一词，如袁世凯在1915年1月1日颁发的《教育宗旨令》中“法孔孟”一则，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对国家秩序的作用，其中即提到：“吾国民诵习孔孟之言，苟于其所谓居仁由义而求得共和法，治国为人之真谛，将见朝野一心，共图上理。由是扬国粹而跻富强，其道又奚待外求哉。”²¹换而言之，国粹概念之汇流与主要使用者，已由清末国粹派之手上转移至儒教、道德及帝制论者。吊诡的是，这与清末国粹派迥异，尤其国粹派是提倡共和与民主的。这也透露了“国粹”一词的含混性，在不同的形势与使用者之间，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与理解。

但是，袁称帝失败，他不久即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并在同年6月6日骤死去。然而，帝制之失败，并没有减少传统复归主张者提倡儒家传统

思想以解决政治问题的动力。1916年9月11日，也就是在袁暴死之后仅一个月孔教会的领袖陈焕章再次上书参众两院，重提请定孔教为国教的事。11月12日，尊孔议员百余人在京成立“国教维持会”并掀起声势浩大的“国教请愿”运动。²²然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恢复旧有的伦常观念为主要目的的尊孔运动在本质上并不能独立进行。在此后不久，这股思潮似乎又与“清室复辟”联系上。康有为即是张勋复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²³张勋便不止一次地联合地方军阀通电全国强行要求国会速定孔教为国教，甚至声称如再不通过“国教案”，他们就要以武力解散国会，并再三表示“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他们显然是以尊孔为幌子，以进行政治复辟的舆论准备。

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政治变迁，一些原以传播西方思想著称的个别知识分子也遭遇思想的转变。对他们的理解，或能进一步理解民初传统思想复归的境况。其中，严复的思想轨迹即为一例。进入民国之后，严复先后发表了《读经当积极提倡》（1913）、《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1913）、《孔教公会序》（1913）、《民约平议》（1914）等文，倡导尊孔读经。严复这时在重新反省中国历史之后，认为中国的五大民族之所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而不像世界上其它一些古国如罗马、希腊、波斯，很快“云散烟消”，这主要是靠“孔子之教化”，所以说“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²⁴再如梁启超，此时也承认孔子是中国文明的代表，也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之所以能“以博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纽”。²⁵总之，民国初年，思想界对道德失范的原因众说不一，如有人认为是法律不完备，有人认为是政体欠稳定。然而，不管怎样，这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感觉到应该借鉴一些现成的行为标准，如此传统道德规范便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²⁶

要更深刻的索解传统文化在民初政治与社会秩序上所占据重要位置，我们或许可从梁济的自杀遗书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画面。梁济（1858-1918），一个思想并不迂腐，甚至对现实保持高度敏感、曾支持改革、反对复辟的文人，在清王朝垮台之后的七年（1918年11月10日），竟声言“殉清”而自沉于北京城北的积水潭，个中原因很值得我们加以探究。梁济本人在遗书中对他的“殉清”做出这样的解释：

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²⁷

由此可见，梁济所说的殉命对象——清朝——只是一个代名词，一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象征。实际上，清王朝本身也并不足以担当道德模式的重任，但梁济以为，他要通过为旧主自沉的行动表明一种道德的选择，用超常的忠义行为对抗忠义观念的流失，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捍卫传统道德精神的尊严。²⁸从梁济的实例可知，当时道德之败坏与传统思想对维持社会秩序之作用在一些知识人心目中的鲜明地位。

民国以后的政局混乱，也使到一些反共和制度者发声，康有为即是一例。前面已经说过，它是孔教会的领导人物。他再次提出其在戊戌变法维新年间的“孔教立国”之旧议题，但不同的是，他竟也以“国粹”来含盖他的孔教与旧道德。此时，康有为开始讲“国粹”，这在他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提倡孔教时不一样，他那时并没有使用这些词汇。因此之故，一方面“国粹论”由此多了一份流通之动力，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粹运动动机的不同和繁复。1913年他撰写《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一文说：

今自共和以来，民主之政既师法美，议院政党，蓬勃并出，官制改于朝，律师编于地，西衣满于道，西食满于堂，鞠躬握手接于室。……凡中国数千年所留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分是非，扫之弃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²⁹

在康有为看来，所谓“国粹”就是“凡中国数千年所留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这看来似乎与前清的“国粹论”没有差别。但是，实际上，康的“国粹”指谓主要是指向孔教。返观晚清的国粹论者，他们只把儒家视为诸子之一，完全没有尊孔的意思。1913年3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

志，发表了《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建议国会将孔教认作国教，并在全国各地孔庙作每周性的宗教仪式。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孔教人士彼此呼应，发表文章，宣扬“孔教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孔子受命立教论”，探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等，寻求新形势下孔教与社会发展、政治变革的适应性。³⁰

其实，清廷之覆灭，不仅意味着传统王权政治秩序的解体，而且也使得儒家失却了制度上的支撑而成为孤魂，文化的认同也发生了问题：在新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是否要有民族文化的主体？中国的公共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民国初年，当帝国秩序和儒家文化秩序解体之后，这一问题表现得格外的尖锐。根据许纪霖指出，康有为力图将孔子的道德学说改造成为儒教，试图通过政治权力的认可，将儒教定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国教。然而，这种儒教民族主义不但没有缓和民初的政治和精神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危机本身，因为它很快地蜕变为官方民族主义，种种政治化的祭孔和读经都成为军阀威权主义的工具。儒教民族主义无法在民主的基础上提供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制度外壳。³¹

作为孔教会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可说很早即发现价值重建的问题。他始终坚信道德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一致性，虽然他在戊戌时期所提出的变法方案中，已充分关注到西方的议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等价值观，但他依然坚持从儒学的意义中去寻求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他从小康、大同的理论出发，认为超越君主立宪而直接走向共和，是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即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依然坚持改良而不相信革命能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在民国推翻清朝的君主制之后，他马上提出了一个“虚君共和”的设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托。康有为认为，任何一种政治设计如果脱离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政治设计都足以导致社会的崩溃。他继续以君主立宪的立场来攻击共和政体，同时针对民国初年制度未及完备的状况，提出“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³²康有为的“孔教救国论”还直接产生于他对时局与国民心态的看法以及对民族出路的思考。他对民初政局混乱、世风浇漓的现状是深为忧虑的，不过他不是将这诸多流弊归结于民主共和思想不深不广所造成，而视其为“纪风尽废，法典皆无”之故。同时他还特意批驳共和制并不适于

中国，在他看来，在中国就像“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一样，中国人既“习于专制太久”，也“不能骤改”。他更为担心的是中国立国教数千年来，“皆奉孔子之经”，一旦弃之，就会造成“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的严重后果，此乃“大乱之道”。只有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孔子之道才“合于国情，宜于民俗”，“欲治人心，定风俗”，他断言“教亡而国从之。”³³因此必须大力宣传孔子之道，遍立孔教会。对他而言，“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而拯救之道“有待于教化”，故而大声疾呼：“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³⁴

列文森对此曾指出：“康有为比那些仅仅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历史关系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关系。由于他相信法律和哲学不足以约束那些任性的民众，因此，他真正的希望通过定国教来增进人们的美德。”³⁵确实，对孔教论者而言，“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³⁶康有为的门徒陈焕章也秉持一脉相承的逻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³⁷陈多次强调，孔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之所以立国教，是因为“此所以固定国本，保守国性，发扬国粹，维持国俗，顺合国情者也。”³⁸这种国家存亡论与清末国粹论的辩证逻辑看来如出一辙，但实际内容却相左。比如清末当年提倡国粹论始作俑者——章太炎却仍以宗教角度批驳当时的“国粹论”——孔教论，而其他革命派则从意识形态方面发起舆论反击。³⁹这里引一则顾颉刚的记载足以说明现象。民国 2 年冬天，章太炎在北京开国学会。顾颉刚去听讲时，看到壁上粘着一张通告云：

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者而愿复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薰莸杂糅之病。 章炳麟白。⁴⁰

此段文字可见，尽管两方都坚持“国性论”，但立场却可谓南辕北辙。

此外，有趣的是，当 1912 年陈焕章等组织孔教会时，不仅李提摩太、李佳白、狄考文、花之安等外国传教士成为孔教会的支持者，许多外

国在华官员都表示支持和赞助。英国威海卫行政官员庄士敦（B. F. Johnston，又译约翰斯顿）听说“外国人可以入孔教会”，感到“不胜庆幸”。他表示“完全赞成孔教会之宗旨”，马上捐款入会。他说中国人如果“不崇敬孔子”，“不诵习孔教之奇经伟典”，就会成为“中国人之祸害”。⁴¹他还写文章论证了孔教应定为国教，说：“中国两千年来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归依，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他认为，“欲保孔教之地位，救孔教于衰微，舍定国教外无他法”。否则，“大教就湮，道德沦丧，中国四万万人民，将随其先圣先贤相传之国粹而并尽，其不可寒心哉。”⁴²1913年2月，这位英国官员甚至还提倡成立一个叫“圣山同盟会”（The League of Sacred Hills）的所谓“万国之协会”组织，宗旨在于“知识上、道德上、美术上之种种事物，使东西方人的自由交换思想，且融洽国民之交谊，而尤注重于华英两国。”庄士敦有此概念，是由于他认为中国新一代“爱国少年，热心革新，将以古国之国粹，一一摈弃无余。中国今日，恐将以数千年遗传之文物，一一束诸高阁，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在他看来，中西都面对“今均陷入于物质文明之潮流，遂致有丧失精神文明一层之可虑。”⁴³由此颇可见，民初传统思想复归之盛，必须再次指出的是，这里的传统皆不约而同的以“国粹”形容之，国粹派的国粹论述似乎已为他们所接收。

梁启超在〈国民浅训〉中说的一些话或可资佐证民初社会状况对国粹论再兴之作用：

吾国历来有一种不健全之爱国论，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者，其说曰，我国为文明最古之国，我民为德性最美之民，泰西学术，多为吾先哲所见及，其大本大源，远不逮我；若夫形而下之技术，则采之易易耳；至其礼教风俗，则更一无足取。吾但保存吾国粹而发挥之，斯足以为治矣。此种议论，自前清同治光绪间诸老辈已盛倡之，中间稍衰熄，近二三年来，受革命之反动，其说复大昌。⁴⁴

梁启超这里的“国粹”是指“礼教风俗”，但他说“近二三年来，受革命之反动，其说复大昌”显然指出了民初的传统复归之思想风气。

1.3 意含歧出与狭隘化的国粹论述

由于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氛围，国粹论之提倡已经出现了动机上的转折。动机的转折，往往也跟随着实质内涵上的变化。许多传统思想之宣扬都在“国粹论”旗号下进行，以上所述及的官方国粹论述、孔教会以及康有为等就是显例，而他们大体是以儒教或儒家为本。

另外，梁启超此时也比较频密使用“国粹”一词。其实，民初国粹论兴起的另一背景是1916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使一些知识人对西方文化产生质疑，而对传统复归。他们之中也时以“国粹”作为他们对传统思想的一种表述，梁启超、张君迈等人即是这些人的代表。诚如本论文第三章所言，梁启超在清末时，对“国粹”、“国学”的提用是比较克制的，但梁在这时已经转变了。一战使梁启超对西方为代表的普世文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相信西方文明仅仅是一种有缺陷的特殊文明，即科学为主导的物质文明而已。这种特殊的文明缺乏精神文明的平衡，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恰恰是丰富的道德精神资源。这样，他提出了一个超越两种文明的新文明方案：我们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中国文明也好，西洋文明也好，如今在梁启超看来，都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特殊性的文明，在这一点上，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但中国思想中普遍价值追求的天下理想，使得他不会仅仅停留在文化特殊主义的立场，他试图将这两种文明传统加以调适，整合为一个新的普世化文明：即西洋的物质文明加上中国的精神文明。⁴⁵一战显然是个转捩点，使许多原本倾向于视西方文化为一种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纷纷改道，以为中国文化亦有其价值，而认可文化的多元性。这加重了民初传统文化归复之势，也是国粹论再行其道的有利语境之一。

但是在1915年，梁启超本身却尝试对自己的“国粹论”与时下流行的作区隔。“然吾观当世之尊孔者不尔尔，最喜将孔子所谈之名理所述之改制，刺取其片词单语与今世之名理政制相类似者，而引申附会

之……”，“若专以此为尊孔之涂术，则有两种流弊，最易发生，不可不察也。其一，尚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则诚可以扬国粹而浚民慧；若稍有所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如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词相近，就以为这是中国所固有。梁启超认为，这将导致一些人以为，所谓立宪与共和不过如是，而不再追求其真义。⁴⁶另外一个问题是，“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这将导致一些人以为中国所未有者，就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的现象来。⁴⁷因此，梁启超说：

是故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若爱桃李也，吾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⁴⁸

梁启超这里似乎是尝试与当时风靡一时的孔教或尊孔、把西方现代概念与传统相附会的国粹主义者作区隔。他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深厚根源，不在于先圣先贤的“片词单语”乃至全部经典，而在于从“庸德庸言”中体现出来的国民性的总和即“国性”。

在另一方面，面对“孔教式”的“国粹论”之大盛之下，与梁启超私交甚笃的进步党人蓝公武，也对孔教“国粹”大加鞭笞，并认为中国想在世界上生存下去，“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表率，而欲奉世界伟人为导师。”⁴⁹蓝公武写了《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从历史进化观念来论证孔教就是礼教，把矛头直指“体制儒教”：

时代迁移则古今易辙，文化相接则优劣立判。居今之世，而欲复古之治，以与近世列强之科学智识国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中国之礼教，所谓忠孝节义者，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违背。设中国自安于固陋之一习，不欲进于近世国家之文

化则已，苟尚不长处于危亡之境，而欲图其文化之发展，则凡足以
为今日进步之阻者，不可以不廓清而更新之。⁵⁰

蓝公武之言，“海内人士读之，多骇汗谯诃”，也谈“国粹”的梁
启超见了也“不免失色相诧”，⁵¹他立即写了一文纠正之。梁认为，这虽
偏激，但发生于当时，还是值得省思。他认为，为了反对复古，连“忠义
道德”也不要，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但他认为蓝公武“其钻仰孔
子之论著，且尝传诵于世，今曷为忽有此诡激愆谬之论？”，是“一年以
来，则其极端反动力之表现时代也”。“吾济以为道德无时而可以蔑弃，
且无中外新旧之分；正惟倾心于新学新政，而愈感旧道德之可贵，亦正惟
实践旧道德，而愈感新学新政之不容己。今之言旧道德者不然，彼赌目前
社会泯焚之象，曾不探求其所以然，不知其为种种复杂原因之所以和合酝
酿，而一切以府罪于其所不喜之新学新政。”⁵²这足以说明，民初的“国
粹论”已经往保守与封闭的路走了。

从资料窥及，当时还有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叫“希社”的组织，其社
旨是“翼卫圣教，昌明国学”。其所进行的活动主要为“主复读经，以端
蒙养”、“主崇正论，以定众心”、“主重彝伦，以挽末俗”等，由此可
见民初道德重建与孔教的风气之盛。⁵³在 1912 年时，一位署名韶海的作
者，在〈何谓国粹〉一文中的若干批评其实也可见一些“守旧”的“国粹
论”现象。他说，“今吾国之学术书，取三千年前之旧物，在学术史上尊
为太古时代者，而一字一句为之解释，为之辩难，为之摹仿，为之践行，
不敢有进一步之出入，而后免离经畔道之呵，则区区方寸间，既为旧思想
所盘据。焉有新思想之萌生哉”，“斯国粹而适成为障碍物，不足以称国
粹矣”。⁵⁴他申论道，国粹也是一种积累，“缩三千年古人所经之阶级。
以学术史之支配，而介绍之于后人，以更上一层为其目的者也”，但假如
“苦守旧枝条而不知变耳，或乃并其根本而芟荆之，恐虽有新枝条，非复
为此树所有矣。斯则余国粹保存之义也。”⁵⁵韶海似乎是一个相当开放的
国粹主义者，他反对“寸步不移的摹仿”、“不知变”的国粹论。此处似
乎透露民初的“国粹论”之狭隘化，韶海才为文批评之。

无论如何，一些人虽然表示要尊孔，或趋向守旧，但也有一些人延续晚清“国粹派”的思路，既不主张单纯的立儒教为国教，或把传统思想定于一尊，也不明确反对欧化，而是力求兼融中西。他们认为，在欧西文明大量输入之时，“求欧化而兼国粹可也，弃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若“数典而忘祖”，无异于“舍田而耘，立见其败”。⁵⁶一位名为董东苏者在演讲中则认为，“国粹”并非被轻视，而是当时“社会需用人才所致”。但他仍坚持，“既习他国学术文字，尤不可不备国学之基础。假使专骛新学，抛弃国粹，则在商界仅足以供洋行之职……”。最后，他呼吁“学生于新学之外，注意国粹之研究，以期为智识完全之国民云云”。⁵⁷而且，即使国粹论的背景已经置换，但对于“以学救国”的理念仍旧维持下来，可见国粹思想继承性的一面。如当时有人说道，“种不患人灭，而患自灭。国不患人亡，而患自亡。一国之文字、文学，一国之国性攸关，而不容轻忽。……忽其文字文学而道德知识日渐榛芜者，种族未有不渐灭”，“此国粹之所以必保存。”这犹如清末国粹学派立场的翻版。文章进一步提到，自从“万国交通以后”，中国遭遇了“隔第丧师”等等“不可缕数”的耻辱，但一般的人民却“嬉嬉酣酣”，“沉溺于醉生梦死，槃乐怠傲而不知”，或人心惰逸，或苟泥于积习而不知忧患。作者认为“非提倡国学不能使发扬国辉也。非湔洗国耻不足知忠爱国家也。非人人习耐劳苦，又何能养成体魄强毅之国民哉。”因此提出教育界应该注重三大主义之役（另二者为国耻、劳动主义）。⁵⁸在翻阅由“国学昌明社”出版的《文星杂志》时，发现另一题为〈论国学名义及其重要〉的文章。该文由章奎森所撰，全文主要在于辨析国学与国家之辩证关联，这样的思路无疑是国粹派的余绪。该文虽认为，“学无界”但以“国为界”。作者认为，“世未有无学而能立国者也。国各为国，学亦各为学。学倚国为根据，国视学为精神，无国即无学，无学即无国”。⁵⁹作者也论证“学”的特殊性与“国”的关系。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政治、风教、制度与习尚，而此四者正是“学所从出”。若一国之政治、风教、制度与习尚不同，“学亦因之而异”。⁶⁰作者章奎森也从国家存亡角度论析国学之重要性。他在感叹当时国家“疆宇日蹙，受制强邻…吾国诚不国矣。国者，学所附丽，不国安有学。然学有左右世界之能力，我之不国，由于我之不知有我国之

学。果知有我国之学，发扬而振励之，继长而增高之，以学维国莫……”。在他看来，当时人心醉欧风而“国学陵夷”，因此他疾呼“中国岂遂不可救乎？曰未也。国与学相维系，欲雪国耻，先雪学耻”。⁶¹

1915年3月，也是由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的《国学杂志》主编倪中轸在〈国学杂志序〉中也说，“自海禁开，中夏与诸国往来，其输入之新学，实不乏。吾国先圣昔贤之留遗，因是而泯没者，岂少哉！今大者远者，不佞未尝知，即其易知而习见者，哀集为书。其不足者，谘佞于世之有道，由是而讨论商榷，以不佞为众讥之敌，待发明而光大焉。”⁶²倪中轸曾是反清革命组织的南社中人，因此这一点论述与南社及《国粹学报》中人的论述相似。显然的，其目的在于由于新学输入，而国学淹灭，必须因此提倡国学。⁶³《国学杂志》有不少宣传爱国思想的文章，如〈爱国论〉、〈论爱国为研究国学之本〉、〈东忧记〉、〈论尚武为吾国国粹〉、〈中国国学博大优美有益于人类说〉等。⁶⁴倪羲抱在第二期中论述“爱国为研究国学之本”中认为，中国“疆域则与敌共之矣，政教则不能自持矣，国之未亡，悬于一发”。⁶⁵作者以为，在祖国出于生死存亡之际，只学正心修身之学，为抱残守阙，不流于清谈误国，就是以‘曲说’害人。而应该学习古圣救国救天下之心，和古圣贤救国救天下之学。因此，他主张以研究国学为爱国之本。但是于1915年，当袁世凯明令尊孔读经之际，《国学杂志》也有明显的回响。⁶⁶在第二期中，有一文〈拟各校配置读经讲经议〉认为，经学乃中国国粹的源泉，六经之源出自古史，古史又是孔子所写，所以能立“万世人道之极”。作者也认为，没有经学，国文就无根底。⁶⁷因此，现在的各学校应该配置读经与讲经课，每天一课时。第七期则刊有〈曲阜经学会改订章程〉，称赞孔子为“人伦道德之标准”，规定“以阐明孔子之微言大义，发挥国学，并研究诸经之理解及其教授方法”。⁶⁸另外，以创刊于1912年、以“保存国粹，瀹发新知”为宗旨的《中国学报》为例，它也已经没有“排满革命”的动机，而同样是以提倡孔学为中心，甚至逐步走向为恢复帝制制造舆论的道路。⁶⁹这说明自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主要叙述群之转变，国学或国粹之定义狭隘化了，不若清末之强调诸子思想、整体中国文化与“不阻欧化”的思路，而只限于孔子与道德。但这些主张其目的是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挽救国民

“人心”，与袁世凯明令全国中小学讲经读经以配合帝制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只是该主张不该倡导于此时，而被袁利用为达到政治野心之手段。这大概也与民初的特殊背景与少了汉民族建构作为其论述前提有关。

除了上述精英阶层弘扬“国粹论”之外，于民国初期的动乱也使到湖南长沙等地方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地方知识分子。湖南自来学风鼎盛，⁷⁰戊戌变革成果也最为显著的区域，同时又以新旧冲突最烈而称著，⁷¹其文化势况值得我们注意。他们以刘人熙为代表，⁷²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⁷³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祠、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

犹如前述，民初的“道德救国”思维亦是一些持“国粹论”者的论述重点所在。大体上，船山学社诸人就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⁷⁴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⁷⁵《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稷，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其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他们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换句话说，他们即是在寻找传统权威。他们以为，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中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

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⁷⁶

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 1915 年 7 月的一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的一些尊孔复古者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甚至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喋血长江，未六旬而速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不过，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此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⁷⁷从船山学社的例子，再综观孔教会以及官方的尊孔举动，再一次透露了民初的所谓“国粹论”似乎是以“儒家”或孔子为中心，而且也把“国粹”内涵倾向于道德化。

以上的勾勒，足以说明：辛亥政治道德进一步败坏与尊孔思潮的出现，引起以国粹、国学为挽道德于既倒的提倡。而且这个运动到了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愈见国家机关的介入。这种一方面由一些知识人提倡，一方面因为国家机关与政党的介入，使这运动逐渐官方化，而逐渐染上政治色彩，而具有政治宣传的动机与目的。与清末在朝的国粹论一样，民初的官方尊孔论述也处于维护纲常秩序的动机，但民初民间的国粹论述却已与清末的国粹派所蕴含的反政府动机有很大的不同，立场也繁复得多。此时

的国粹论述中的孔教论与道德败坏论总不免有意或无意、或多或少与官方相同调，至少已经较少见到以“国粹”来反体制或清末所谓“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⁷⁸这样比较开放的论述了。换句话说，此时的国粹论述已有愈往守旧与狭隘的取向走去，而许多宣扬“旧传统”都在“国粹”旗号下进行。

1.4 国家意识与“国性论”作为一种保护盾说词

与此同时，传统思想复归问题与狭隘化以及其与政治（帝制）的关联的另一面是：作为一种回应，五四运动以还，反传统思想则相应的在一些新知识分子之间进一步发展。当然追溯起来，自辛亥革命以来，随着普遍王权的瓦解，整个传统权威也近乎荡然无存。随着王权的崩解、传统权威的减去、科学主义与反传统主义的高涨，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成为一个不可否定的时代价值，也成了评断传统文化的唯一准则。⁷⁹“国粹”运动的本质也因而产生了变化。由于传统权威之瓦解，以及因保守风而引起的反传统思潮，如何维护传统自然是国粹论者所关心的中心议题。由此而来，民初“国性论”之说骤然大为流行，“国家”俨然成了他们借以维护传统的保护盾。它不再那么极具现代文化认同或国族建构意蕴，而比较是一种借国家之名以“反”反传统与维护传统的举措。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稍为追溯“国性”一词的源起。“国性论”实际上是章太炎最先使用的。⁸⁰在章的《自定年谱》中，即于1901年时，由于立志于反清，他为其老师俞越所责备，他对曰：“弟子以治经待先生。今之经学，渊源于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⁸¹到了1908年，在与“新世纪”派论辩万国新语与汉字之使用之时，章太炎亦曾认为：语言文字与“人事”相关，代表着“国性”。世界各民族“人事”本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必齐一。章太炎论述道：“科学固不能齐万有，而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万物之受人宰制者，纵为科学所能齐，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可不齐”。所谓“品

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就器物言，固有此土所无而彼土所有者，则比字属名，亦定其号，终不可题号者，不妨从其主称。”而社会既“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与“人事”相关的不同“语言各含国性”，自“不容以他方言语乱之”。⁸²强调“种界”与“历史”的关联其实是章太炎的一贯看法，与其言民族不全据血统而侧重“历史民族”的观念相通。在这里，“国性”之意思在于它是国家经过历史作用之后产生的特有精神与气质，是一个民族国家绝续的关键。但“国性”一词在章太炎那里似乎还未成为他论著中的关键词，比较起来，国粹派更加频繁使用“种姓/种性”一词。或许种性之使用，与种族革命之提倡有关。

但进入民国以后，梁启超在 1912 年发表了著名的《国性论》，比较直接、具体而系统的阐述了“国性”的定义及其意义。在文中，他写道：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人性不同，乃如其面，虽极相近而终不能以相易也。失其本性，斯失其所以为人矣。惟国亦然，缘性之殊，乃各自为国以立于大地。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则国亡矣。能合国性相近之数国，治一炉而铸之，吻合无间，以成一大国性，则合群小国而为大国也。⁸³

能以己国之国性加于他国，使与我同化，则灭人国以增益吾国也。国性分裂，则国亦随以分裂。一地域或一部分之人失其国性，则国家丧其一地域，或一部分之人，而国以削焉。地球开辟以来，生人恒河沙数，而以国名传于史乘者，不过千百。其他或仅成一部落之形焉，或并部落而未能至焉，彼自始无国性以为之结合也。⁸⁴

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光归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

入人之身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⁸⁵

所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实际上与清末国粹论者的流行说法“一国自有一国特有精神”一脉相传，因此梁的“国性论”可说是经过清末以来的有关种性/国性、国魂论述之基础上而成的。“国魂”一词在民国之后已逐渐消失，以清末频密吟诗呼唤“国魂”的南社中人为例，他们即不再呼唤国魂。从《南社史长编》所披露的南社活动来看，所显现的现象则是他们注重的是，反对南北议和、反袁世凯、反称帝复辟，并对革命失败的苦闷。⁸⁶我们或许可以说，“国性”多少是代“国魂”而起的。不同的是，清末国粹派认为，国魂或种性是维系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之前提，所以种性不易改变。但梁则以为，“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譬犹贲获虽勇，曾不能自举其躯也。”⁸⁷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中国国性的分析仍旧依循其改良的立场。

在同一年，梁启超也发表〈中国道德之大原〉又提到“国性”问题。⁸⁸他认为，“吾以为吾国人之种性，其不如人之处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为讳也。然而，人各有长短，人性有然，国性亦然。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这里梁主要是欲为其保存国性主张作辩解，他认为中国之国性并非全不可取，因为中国国性果真的那么恶劣，中国早就不存在了，“然数千年前与我并建之国，至今无一存者。”“而吾独自义轩肇构以来，继继绳绳，不失旧物，以迄于兹，自非有一种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国人之心，而主宰之纲维之者，其安能结集之坚强若彼，而持续之经久若此乎？”“夫既已有此精神，以为国家过去继续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为国家将来滋长发荣之具。谓吾国民根性劣败而惧终不免于淘汰者，实杞人之耳。”⁸⁹梁启超进而言道：“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其养成之也故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有功，其毁坏之也亦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为力。而生其间者，苟常有人焉发扬淬厉之，以增美释回，自能缉熙以著光

晶。而不然者，则积渐堕落，历若干岁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万国兴替之材，罔不由是。而已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⁹⁰

梁启超原先的以国民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意识在民初之后逐渐改变其认同方式。随着民初王权的瓦解，梁启超担心“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栗然惧也”。因此，1912年梁的《国性篇》中认为，国性是抽象的，但通过国语（民族本土语言）、国教（民族道德宗教）和国俗（民族文化习俗）表现出来。这篇文章，透露出民国以后的梁启超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是从原来的政治民族主义开始转向文化民族主义，第二，从文明的普世主义开始转向文化多元主义。这两个重要的转变从《国性篇》开始，到1918年访问欧洲撰写《欧游心影录》方最后定型。⁹¹

经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提说之下，加以旧传统风气之甚盛，“国性”论顿时变成了一个流行语，而且成了重建民初道德混乱、政治失序，以及国家存在与维护“国粹”的最重要、直接有效的前提和理籍。上一节提到的有关孔教论的论述中，就往往夹杂着“国性论”。在此可引用梁济的遗书可见一斑。在《桂林梁先生遗书》中，他言道：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⁹²

梁济自认是受梁启超“国性说”的影响，而开始构筑“国性”救国之说。⁹³在他看来，“国性”是立国之本，如果失缺了“国性”，国家也就无药可救了。他甚至解释说，他的自杀就是为了唤醒国人对“国性”沦落之关注，“欲使国性复光明于大多数之众”。⁹⁴据说他因此曾给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但没有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其子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⁹⁵

1913年，归服传统的严复重新考察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要素，也认为为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国性”在民族国家建立中是必不可少的：

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晋以降，五胡之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此虽易代，顾其彝伦法制，大抵犹前，而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独若美之墨西、秘鲁，欧之希腊、罗马，亚之印度，非之埃及，时移世异，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今之所谓墨西、秘鲁、希腊、罗马、印度、埃及，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此犹练形家所谓夺舍躯壳，形态依然，而灵魂大异。⁹⁶

在严复看来，名存而国性不再，即等于只有躯壳，灵魂则大异。因此，国性是一国之大本所在。然而，必需注意的是，严复的国性说，其实是要为自己在民初以后大力提倡的尊孔与读经作法立论。他进一步提道：“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岂非持孔子之教化为之耶！”“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⁹⁷他随后警告道：“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误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则谓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

⁹⁸

原本支持孔教的许恰荪也有“国性”重要性的认知。他在1914年的个人信件中指出，“挽近世衰道微，泰西个人功利等学说盛行，外力膨胀，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则东亚社会制度中坚之家族制，必为所冲决。此中关系甚巨，国性灭失，终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

颂言孔教，夫岂得已哉？”⁹⁹前面已经说过，列文森也指出，“国性”亦被康有为、陈焕章等提倡“孔教”者作为其倡议的前提。这其实透露了一个讯息，即清末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被分解了。实际上，在“中体”概念下，中国文化仍然被视为具有普遍性之意义，而非相对的概念。它的出现象征著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改变，接受“国性”的概念，等于承认了文化的相对性以及世界上各有“国性”。换句话说，作为“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文明的本质，具有绝对的价值。但当它成为“国性”时，它仅是相对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之价值。“视儒教为中国的国性这一浪漫思想剥夺了儒教自身的精髓：一个理性的假定，即无论何时何地，路就是路，而不仅仅是特殊的中国人的生活之路。”¹⁰⁰此言极中肯綮，深刻点出了在民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影响之进一步扩散与强化。

这种“国性论”之甚嚣尘上，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蓝公武也禁不住公开批评。蓝指出，

所谓国性者，又空泛而至难解者也。盖自古迄今，国之所以立，民之所以存，自必有其立之存之之道。当其时，凡可以使国与民立之存之者，皆莫非国性也。吾人国孰从而辨别之哉？故即集博学好古之士于一堂，而叩其所谓国性者，亦必纷纭异说，莫知适从。非国性之难言也，实国性之难辨耳。夫以难辨之国性，而饰以复古之理由，闻者已莫之能解矣。况其所举以为国性者，果为国性与否，又非吾人所可置信者耶。¹⁰¹

蓝公武的片语除了指出“国性论”之空泛之外，也说明他以为“国性”是难以捉摸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国性论”已成为复古论者的理由根据。前面说过，国粹话语在清末之时，时时参杂着“一国特有之精神”的说法，维护国粹的原因往往也正因为保存国家特性（国性）之所需。但这种逻辑也会随着民初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恰恰倒转过来，国粹之保护是因为他代表了“国性”。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三期里，另一位作者吴贯因发表了〈论国性〉一文，也意在驳斥那些借“国性”以提倡传统的分子。作者虽然文中所具体针对对象是提倡读经者，其时 1915 年正好正

在兴起由于复辟帝制而发起的读经热，但他也同样指向了 1915 年以后一系列国粹提倡者的“国粹一国性”逻辑。¹⁰²此文颇为重要，因为它对当时有关“国性论”稍作了总结与观察。

作者指出，“按国性之论，年来始炽。然民国元年之庸言报，梁任公先生亦著有国性篇一文。谓国性可改良，而不可蔑弃。盖因其时全国离心力发动大剧。故欲以是药之。然一面谓国性不可蔑弃，尚谓国性可以改良。故梁先生文中又谓，苟教义俗尚有与外界不能顺应者，必矫正之。是固进化论而非保守论也。不图今之守旧者，闻有国性名词，以为是可为复古论之张本，而大扬其波。”“吾惧其以是阻碍国家之进步也。故准据现在之国情，并参酌梁先生国性可改良之义，著为斯篇……”作者尝试说明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特质，而是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改良的。他进而指出，“一年以来，国性之论喧腾于国中，皆以为吾国自有吾国之国性，必当保存本来之性质，不宜事事模仿外国也。”¹⁰³事实上，这也深切说明了“国性”一词对国粹提倡者的立论基础的重要性。或许可以这么说，梁启超当时的“国性说”是指向一种国家建构的需要，但到了吴贯因所批评的时代（1915 年），随着时代环境的转变，“国性说”已经转变为一种保护“国粹”的挡箭牌，而“国粹”则成了“国性”所寄，是国家存在与否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国家意识已经被使用为一种“保存”传统文化的工具。

第二节：正反之间：负面的国粹与作为保护盾的国粹

民初以降，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康有为等人定孔教为国教之举动，以及孔教在一些保守人物的支持下企图写入宪法，这一系列连续接踵而来的事件，已经狭隘化了“国粹”思想及予人一种负面的形象，并促使另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正在酝酿一场新文化运动。从 1916 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及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开始，一股新思潮与重新评估传统遗产的思想正在酝酿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一代知识分子揭竿而起，大力提倡反对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等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¹⁰⁴《新青年》自 1917 年起，销量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千

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此与其反孔教反传统言论有关。1918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也是知识青年最激动的时期。

2.1 五四运动中的“反国粹论述”

转变了的国粹观与国粹论者之叙述几成了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心目中传统保守的代名词与箭靶。新知识分子把“国粹”、“国画”、“国医”等国字号视为负面名词。他们把不满旧传统之提倡转移到对“国粹”意象的丑化上。陈独秀就直接了当的说到：“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所以无中外古今之别也”。陈还进一步指出，凡有悖于科学理性，不管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¹⁰⁵他们把那些拒绝新文化，与拥抱旧帝制度有关的传统分子的国粹主义给予猛烈的批驳。另一五四运动健将鲁迅，在他的《随感录》中则写道：“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¹⁰⁶鲁迅对“国粹”的言论多集中于其杂文集《热风》一书中。¹⁰⁷从书中的评论看来，“国粹”明显已是作为“腐朽传统”的代名词被使用，这与清末时期作为一种新名词、新概念的国粹叙述有极大的不同。

在另一方面，陈独秀在提倡新文化运动刊物《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里，高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作为这场波澜壮观的重估传统运动的两面大旗。当时，他形象化的把“民主”叫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即 Democracy）和把“科学”叫着赛先生（赛因斯，即 Science），把这比做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在1919年1月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中坚定的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明确提出要拥护民主和科学，就要批判国粹和旧文学，也就是批判儒家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¹⁰⁸胡适也评道：“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

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¹⁰⁹钱玄同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中致词道，“咱们是现代的活人，应该创造现代的新思想，绝对的不应该因袭陈死人的旧思想！不但立国于今世，非革新思想不足以图存”，所以他疾呼“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¹¹⁰这也就是说，国粹在新文化运动的论述下，是与现代生活、民主及科学相矛盾的。这场运动迅速得到新知识界的欢迎，形成了无法遏阻的新思潮。因此步入1918年之后，知识界可说进入所谓全面反传统的时代之时，国粹论又有新的动向。即使连“南社”的一部分主力也改组“南社”为“新南社”，以相应新文化运动，他们此时也只是言“整理”国学（大概受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之影响）¹¹¹与文学革命，柳亚子甚至质疑“整理国学”之必要。¹¹²

这里有必要讨论五四知识界对“国粹论”的一些原则性思辨。对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并不认为失去“国粹”是一个亡国亡种问题。以鲁迅为例，他即认为：“要我们保存国粹，还得国粹保存我们”。¹¹³鲁迅不仅不担心“失去民族特质”，相反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特性”——国性/国粹论——的批判者。在鲁迅的著作里，对“国家特性”——国粹论者的批判之语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几例，就足以说明鲁迅对“国族特性”的态度。鲁迅在“五四”时期就不断地批判和讽刺一些国粹论者的“国族特性”的论调：他在《随想录三十五》首先分析了国粹论调中的国族特性，“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鲁迅紧接着就说，“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是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¹¹⁴鲁迅之所以激烈地反对国粹论和国族特性说，那是因为他与五四同僚拥有共识，即传统文化对国家的束缚和桎梏，弘扬国族特性必然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就难以融入世界潮流，变得更加保守落后。他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是极需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¹¹⁵他又指出：“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的生长；不然，

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且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¹¹⁶

鲁迅之言在当时也并非仅见。另一位五四健将胡适也不担心亡国亡种问题。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胡适不为自己传统的失落而担忧，相反他认为，不必担心中国本位文化的消失，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对他而言，凡是合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东西，就没有理由担心会失掉；而那些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即使淘汰掉也不值得可惜。在这种信念支配下，胡适认为，目前的任务根本就不是如何去“保护国粹”，而是先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国故”进行一番整理。¹¹⁷实际上，五四一代可说在进行着一场“反国粹论述”（counter-discourse）。他们已经把国家存亡与传统文化的相关性解套了。虽然实际上，五四一代与国粹论者之间共享着一个文化与国家存亡联系的逻辑，但五四一代反过来认为传统文化不扫除，国家就会亡，这与国粹派立场完全相反。他们同时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对于“中国”的理解却颇为不同。对国粹主义者而言，在文化观上，特别是民族文化观，实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五四一代来说，国家观念赋予他们的，反而是一种“反传统”、“反国粹”之冲动。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的“反国粹论述”在客观上，使得康有为、孔教会以及道德国粹论的声势在五四运动高唱入云的气势下相应的消歇或被掩盖了。他们似乎也退出了言说中心。在五四全面反传统横扫之下，传统各领域如国画、中医等也几乎无不幸免。这些领域的一些国粹论者面对汹涌而来的反传统以及反国粹主义之下，他们似乎躲进“国家”这个盾牌之下，各种以“国”字为前缀词的国字号运用与自我称谓更是尘嚣一时。1920年代之后，“国粹”一词主要为他们所接收，各传统领域借用“国粹”论述来捍卫与合理化自身绝对的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国粹一方面成为一些新知识分子眼中的“钉”，另一方面却又成为主张保护各个受冲击的传统文化领域（如传统画、中医等）的辩护凭藉，因为国粹是展现国家与“国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下文将就此加以叙述。

无论如何，我们有必要理解当时五四一代对国粹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字号持批判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提供我们至少一个当时者的观察，使我们可以揣测国字号兴起的原因。

2.2 1920年代“国”字前缀词族论述的兴起与稳定化

五四运动后不久，即1922年，鲁迅撰文批评当时上海的“国学家”现象，他指出，“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自命为国学家”。¹¹⁸确实，当时一些大学陆续开办“国学门”，似乎透露了国学研究已然成风。¹¹⁹翌年，学者顾实在为东南大学的国学院起草《整理国学计划书》中说：“自昔闭关一统之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迨海禁既开，稍知西方，于是有中西对举之名词，如中文西文、中学西学、中医西医之类是也。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于是国民、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今日学者间之有国学问题，甚嚣尘上，亦其一也。”¹²⁰顾文与鲁迅之观察相符，可以让我们至少窥视到1920年代初的“国字号”兴起情况，但他以为这是因为受“国家观念普及”影响所及则值得存疑。这是因为，尽管整个1920年代内忧外患频繁，当时国内经历军阀统治、国民党北伐与清党以及外患的日本侵略等，但总体未必比清末来得激烈，而况当时民族主义与意识之抬头，所造成的影响是以知识界“反传统”、“向西方求万灵药”为鹄的。因此在客观效果上，它是对“保存”传统与国粹论不利的。大体上，“国学”之流行，除了因袭着之前的国粹论述之外，一部分也是因为胡适等新派提倡“整理国故”之故。而“国学”之通行，也直接带动了其他国字号如国画、国乐等概念的出现。这些概念经常很自然的被纳入“国学”之中的一部分，因为就像书画、音乐这些概念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部分一样。曹聚仁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之间的关联：“可是，‘国学’一词，已经约定俗成，一直和‘国故’一同流传着，也就算了。依此类推，乃有国乐、国剧、国术、国医等名词，大家心中明白，这便是中乐、中国戏、中国武术、中医的意思，不待细说了。”¹²¹

数年之后（1929年），何炳松也有这样的观察与评语：“我国近来‘国’字的风靡一时，好象中国无论什么一种丑东西，只要加上了一个

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调子，现在不叫做小调而叫做‘国乐’了；卖狗皮膏药的勾当，现在不叫做走江湖而叫做‘国医’了；甚至前一个月上海四马路上的馄饨铺，亦要叫做‘国菜馆’了。这样类推下去，那么小脚、辫子、鸦片，等等东西，亦都可以叫做‘国脚’、‘国辫’、‘国烟’了。这不但弄得‘斯文扫地’，而且‘国’字竟变成一切妖魔鬼怪的护身符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所引出来的流弊么？”¹²²何文或许言过其实了，处处显得国产物都是混日子的骗人东西，但过滤了这层比较偏颇的意思之后，也使我们看到藉国家以保存固有文化的倾向。实际上。1920年代变化激烈，“国字号”称谓甚至进一步被体制化、结构化，如广东国画研究会、国医会、国医院之成立，再到1920年代末，随着以强调民族意识起家的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则国字号化倾向更为明显，如属于政治领域的“国府”、“国军”等的出现之外，官方文化机构诸如国术馆、国医馆也先后成立。总括而言，比起上一章所述及的清末国字号现象，1920年代之后的国字号现象更为广泛，而且基本已趋定型与稳定化，但也有一些“字号”基于各自的语脉而被淘汰了，比如“国教”、“国俗”之类的词句已经逐渐，甚至完全不见提用了。

通观而论，国字号已经成了一个保存或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方式。诚如宇文所安所言，文化一旦被有效的定义，也即给它划出一道疆域，它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稳固的遗产。¹²³既然说作为一种保护盾，即说明了它是处于一种被“排挤”下的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反传统的具体脉络，才能理解国字号兴起的切实原因。正是在反国粹与保国粹、传统与反传统以及批判与反批判之中，国字号才得以在1920年代兴起的。

2.3 压制与反弹：“国医”之正名

首先，我们先就中医的反应而论。左玉河认为，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如果要寻找一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之事件作为解剖标本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中西医之争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切入点。¹²⁴尤其是在近代

反传统与唯科学主义控制着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被视为“迷信”、“不科学”的中医自然难逃其噩运，因此从中医之近代发展中可看出许多中西文化冲突与思想史的意涵。

自从近代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医在医疗事业上的地位即日渐走低，其与西医之间此消彼长的进程就开始了，仿佛进入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正如上一章所揭示的，早在1904年国粹思潮兴起之时，中医界已自我称谓“国医”了，可说是最早经历国粹化与国家化的领域。中医地位的走低，自有其更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理论已被置疑。自1911年之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在中国知识界持续引发争议，而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亦相应的升级。不过，在整个进程中，必须注意的是，它是以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这与五四反传统运动一样。但中西医之间由论争发展到激烈对抗，主要还是自民国初期始。

民国元年，在万象更新之际，亦是教育界的“学制改新”时期，北洋政府为此陆续发布新的政策，其中竟把中医摒弃于新式学制之外，由此启发了中医界不断抗争请愿活动的开端。1913年1月，发生了所谓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竟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规定。这引起了中医界首次的请愿活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此项法规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与反弹，首先提出抗议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长余伯陶等人，该会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派代表参加。当时推举的代表也晋京请愿。¹²⁵

而正当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意欲废弃中医的同时，在中医学界之另一厢也就中医的地位和前途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主角是恽铁樵和余云岫（余岩）。余云岫早年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是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恽铁樵的同事，后来从事了西医，曾任上海医师公会会长。早在1914年留学日本期间，余就写《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完成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此书对中医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书中称：“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更对中医的“五行说”加以评击。《灵素商

兑》一书出版后，在中医界引起轩然大波。但追溯起来，1900年前后文化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都有这方面有所言论。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日本废止汉医思潮影响，崇尚日本通过维新走上强国之路，意欲效仿照搬。此后，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此起彼伏，都欲将中医置于死地而后快者。鲁迅、胡适基本上也都是持反对中医态度的，这已置中医界于不利的境况中。1915年江苏的袁桂生也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案交神州医药总会讨论。而且，余云岫否定中医的主张，是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支持的。恽铁樵读了此书后非常气愤，即撰写了《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著作，对余云岫的论点一个个地予以驳斥。¹²⁶恽铁樵与余云岫之间的这场论战，揭开了中医界为求生存、求发展而进行的更为波澜壮阔的斗争序幕。由于全国中医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由于中医在中国亿万国民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着持久与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北洋政府后期，政府对待中医药只能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了。

实际上，废止中医一案事关中医界“饭碗问题”，自然引起了他们作“殊死”抗争的局面。¹²⁷但是，他们却非常巧妙地将中医生存的问题转换为国家与国粹存亡的论述。中医界经历了多年的挫折，自然将其际遇归罪于西医界之从中作梗上。此后中西医界之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余岩曾不无讽刺道，中医界“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不知数理化，不知生物学，对于自然界之现象，无丝毫正确之智识。只识得焉哉乎也几个国文，……谈中国之医药问题，以保存国粹自命，如恽铁樵、王一仁辈，正所谓坐井论天，不度德、不量力者也。”¹²⁸其所针对的其实即已透露出了前章所论及的“中医”继清末“国粹化”之后的进一步深化其与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当时已有人指出中医借“国粹”为盾的倾向。一位作者王立才就直接指出，中医界“至于国粹云云，似为窃附于爱国之义”。然而他认为，“保存之大者、远者，在求种之不灭，国之不亡。若守旧不变，终必有国亡灭种之日，又有何力可以保存国粹”。¹²⁹这与前引鲁迅的“欲保国粹，必先国粹保我们”似乎相同之意味。从资料来看，此时中医界面对“被废弃”的反弹确实就是把中医“国粹化”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长余伯陶在〈本会呈请袁大总统保存中医中

药奉批书后》中提到，“今天天下之称大国者，一国又一国之政策，一国有一国之俗尚。政策不变，则国自存，俗尚不移，则种自保。”¹³⁰这种把“中医”与“俗尚不移，则种自保”联系起来的说辞，看来与清末的国粹论述无差。由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出版的《神州医药学报》上，还连载了包识生所发表的〈医药危言〉长文。文中认为，中医药之废除，除了不利于经济与习惯方面之外，也势将导致“国粹之沦胥”。作者认为，“中华医学，肇自农黄，可称地球之鼻祖”，但由于中医界“…医风日降，伪说横流，古人试验之精神失殆尽，只存影响模糊之形式而已，若能提倡而研究之，必有扁和之复出。”¹³¹因此，他认为政府废弃中医药，乃“因噎废食”之举，如果“数千年神圣之学说”被取消，则“此关于数千年强种保民”的“神州国粹，从此沦胥殆尽”了。¹³²在下一期的《神州医药学报》还有另一篇署名黄眉孙的文章，题为“论针灸为宜保存之国粹”。¹³³另一位作者陈欲业则在〈论欲振兴医学、保存国粹，首宜流通医籍〉中建议神州医药总会，为了保存中医国粹，应搜集医学古籍，然后加以刊发，以流通中医学。¹³⁴这些言说都尝试从中医是中国不可消失的国粹之角度上立论。

这样的论述在该刊中俯拾即是，它说明了“国医”概念与国粹概念的关联。实际上，一开始，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则反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以反制西医。在这场争论中，名称之争显然是论争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但是，医界毕竟是悬壶济世的，故尔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¹³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医馆成立之后，余岩曾为文质疑“国医”一词而引起争端，当中透露了一些有趣的意含，即一位名为曾觉叟的回应难得让我们可见及他们之间的国粹观与中国观。他质问余岩道：“即在于忘其为中国人...。既称我们中国则不应该摧毁本国之文化国粹，既摧毁本国之文化国粹，则不得不称我们中国。”余岩质疑“国医馆”名称不伦不类以及认为不可以“国医”称谓，他直斥“如余岩之言，必先去中国之名称而后，中国何不幸而有此丧心病狂之亡国妖孽乎！...即为中国人，自应称中医为国医，国体所关，岂容颠倒，此又天经地义...”。他认为，“国医，中国之文化国粹也，使中国而无医学之教育，无医政之建设则已，否则必属之国医，不特教育行政之权应归之国医，即西医亦应隶属于国医，必如此方不辱国体。”¹³⁶在国医界看来，“国医”一词使用得“天经地义”，因为这攸关国体，而且中医正是表率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国粹。

到了 1928 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中西医之争仍未得到解决。废止中医论者又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反愈演愈烈。在余云岫等人看来，中医不合乎科学，早该废止了。之所以迟迟未能废止，是由于没有贤明政府。一旦有了贤明政府，那么中医之厄运便会到来。¹³⁷其云：“夫旧医之宜废也久矣。所以延宕至今者，国无贤明之政府故也。”¹³⁸果不其然，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西医界人士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案又再被提上议程。1928 年全国教育会议上，余云岫留日同学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但在翌年 2 月卫生部召集之中央卫生会议上，余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并获通过。斯时斯刻，“废止中医”从一开始的理论上之主张，终于变成了付诸实施之措施了。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1、中字第十四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3、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4、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还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 19 年（1930 年）底止。

乙．禁止旧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¹³⁹

1929 年 2 月 26 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为之震动。全国中医药同业为之抗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¹⁴⁰“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等，可见问题的实质是在文化范畴，“国粹”成为他们诉诸求存的理藉之一。这显然因袭了清末中医界的思路，只是这一次更为全面了。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 40 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会上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并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 3 月 17 日。

1929 年 3 月 11 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 8 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通电云：“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尤，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¹⁴¹到了 1929 年 3 月 17 日那天，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则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¹⁴²从他们的标语可见，中医药明显被“国粹化”，“国粹”一词成了中医界捍卫自身权益的其中一个方式。相应的，余岩也回应以中医为落伍之国粹：

（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

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¹⁴³

无论如何，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 15 省 132 个团体的代表共 262 人。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并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也议定 3 月 17 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即称为“国医节”。

这里顺带说明，废止中医一案，其实不仅仅使中医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与中医密切关联的中药界也同样面临“饭碗问题”，“国药”一词也油然而生。他们意识到，一旦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定废止中医，“则功在人群之国医，一旦灭亡，利溥全国之国药，永久废弃，从此泰西医为救命主，为西医作推销员，此中利害得失，不辨自明。”故在反对“废止中医案”之抗争中，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上海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申明：“今中央卫生部在卫生会议席上，竟将取缔中医药的提案，悍然提出，如果一旦成为事实，则中医药界既告绝迹，而我数百万药业工友之生计，将何以堪？”故该团体号召药业工友，“为保持数千年遗传的国粹着想，为民众的生命安危着想，为我们的生计着想，我们应该一致地起来，竭力反抗”，并表示“敢率领全沪数千药业的工友，愿作保持国粹而争生存的先锋，誓死反对中央卫生部取缔中医药的提案。”¹⁴⁴

3 月 20 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 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其请愿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不能废止中医之理由：1、中医有治疗实效：“窃中国医药，确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故医药之起源，先由经验得其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确是实际也。”2、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学术：“夫禁绝中医药之学业，其罪犹劣，禁绝本国学术之发扬，其罪实大。”3、废止中医将影响社会稳定：

“且全国中医之数，十百倍于西医，内地竟有数百里而不见西医西药者，一旦悉废中医，患病者势必坐以待毙。”其请愿具体要求为：“明令撤回余岩等禁锢中国医药学之议决案，一面令行教育行政机关将各地私立中医学校督促指导，择其办理较完善者，准予其立案，加入学校系统。”¹⁴⁵

由于中医界之强力抗争及请愿活动，最终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因此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被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 10 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控制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教育部布告云：“各国通例，医士之培养年限较长，必须毕业于大学或专科，并在医院经过相当时期之实习者始准开业。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宜科学为基础，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宜符名实。此项传习所既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行政机关立案。”¹⁴⁶因此，又引发了 1929 年 12 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¹⁴⁷1929 年 12 月 1 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出席者计有 17 行省以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 233 个团体，457 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12 月 7 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全国医药总合于 1929 年 12 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当时的国府主席蒋介石之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加强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也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

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中西医界之争，在激烈的对峙、冲突之后，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妥协与调适。中医界谋自身科学化的同时，西医界也注重研究中医药，以发明中医新理，提高中国近代医学的水准。30 年代之“科学中医化”运动，不仅仅是中医界单方面努力之结果，也与西医界之推动密切相关。¹⁴⁸

从以上中西医论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分析中医在抗争中言论所透露的意涵。其实，正如王一方及邱鸿钟在〈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医为了迎击科学“长矛”的两块“盾牌”一曰“我是国粹”，二曰：“我也是科学，而且正为进一步科学化而自我更新”，¹⁴⁹这是相当深刻的观察。且说前者，20 年代初，“孔家店”被“砸烂”，传统文化受到挑战，中医界当以“国医”相称，以表示其国家医术的正统身份，类同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戏。1928 年“废止中医提案”起草时还颇为顾忌，于是把它改称为“旧医”，暗喻落后，必须被淘汰。但是，一部近代史，国粹的声望日益疲软，甚至被人视为必须提请国家给予政策性保护的孱弱科目。国粹的命运之不济，其他国字号自然也遭殃，这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最基本的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¹⁵⁰

大概是受到废除中医案之影响，笔者个人从资料中看到，一些中医组织酝酿为中医“正名”。1929 年 3 月，上海中医学会会议还通过“规定中医为国医以正名称案”，理由是“我国医学仍在国内，不必用中字以与西学为别。用国医为妥。若“国文”二字可证明之。”¹⁵¹该会并呈请全国大会通过，以通电全国更改之。前述 1929 年 3 月 17 日“国医节”之议定或是此正名运动的成果。把这条议案置放在 1920 年代中医所遭遇的“被排挤”的脉络下看，其动机是非常清楚的，即为了把中医置于“国”字之下，以作为保存及争取中医地位的保护伞。1920 年代末可说是中医“国家化”的稳定期，它也开始步向制度化的时期。1927 年，上海成立“中国医学院”。它曾于 1928—1929 年间发起召开全国中医学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为近代中医教育诞生第一部中医教科书迈开重要一步。

在中西医界内火爆的论争时，整体知识界的国粹派人物似乎“隔岸观火”。熟悉中医的章太炎则在私下参与讨论。章太炎一贯认为，中医不

可废，但他也将被视为迷信部分的中医理论剥离其理论系统。他秉持其文化相对的立场，认为中西医乃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对于当时的争论，章认为“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章指出，中医不需要依附于官方学制，而应该往医疗实践中取得“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以建立自己的信心。¹⁵²1929年，在中西医冲突最为激烈之时，以“国医”命名的上海“国医学院”成立，章太炎为院长。章太炎手订“发凡起例”，这是第一次现代体制，是中国国内第一次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1930年，北平中医界名宿共倡创办的“北平医药学校”于1931年改名为“北平国医学校”，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今墨任副院长。

另一方面，承前所述，1930年3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旋又颁发了一项训令，令中医必须把他们照顾病人的设施称为“门诊部”而不是“医院”，并称他们的培训机构为“学社”而不是“医学院”。中医药界有感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呈请政府设立“国医馆”其实说明了两层含义：即一，把“国医”一词建制化；二是，已经不是要求中医“国家化”而已，而是要求“国家机关”之保护了。他们最终得到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等人的有力支持，结果于1930年5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设立国医馆提案。¹⁵³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正式宣告成立。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¹⁵⁴从中医组织之“正名”到“国医馆”之创立过程标明，这是一个建制化过程，即“国医”称谓从最初为民间团体所使用到最终为官方所接受。

2.4 美术革命潮中的“国画”

根据一般的艺术史家的看法，几乎可以用“萧条”两个字来概括清末民初中国画坛的景象。¹⁵⁵当时大部分的著名画家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去世了，只有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家和后起者以及岭南派的“二高一陈”

（即高剑父¹⁵⁶、高奇峰¹⁵⁷和陈树人¹⁵⁸）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画坛有了生气。身居北京的画家大多恪守着“四王”¹⁵⁹的衣钵，没有大的突破。但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洗礼的中国画画家，则开始仿照西方的模式开办新学校，倡导“美术革命”，对古代绘画重新加以评定，贯穿本世纪的关于创新与保守的争论就此开始。¹⁶⁰其实，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的发展与演变，同样是自19世纪末开始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之下，有关“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之其中一个小局部。西方文化的传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要不要接受西方艺术，或是怎样接受西方艺术，以及怎么样保持本土艺术的面貌，皆成了上个世纪中国画家思考的主要议题。

基本上，从戊戌变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谓的改革中国画的论述，大体是认为中国画“衰败极矣”、“不科学”、必须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之，或主张“融合中西”，尤其是对“元四家”以来“文人画”的否定、声讨“四王”正宗（娄东、虞山派）的声浪更几乎成压倒之势。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近世衰败论——认为中国近世甚至元、明、清以来的中国画坛已衰败至极；罪归文人画论——衰败的根由乃守旧，乃仿古，乃文人画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的画学正宗；文化梳理论——既需要梳理中国美术传统，又需阐明欧洲美术变迁趋势；中西融和论——中国美术的前途唯在输入西画写实主义，合中西而建画学新纪元；为人生而艺术论——倡导表现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为人生和民众的新的艺术。¹⁶¹其总体趋向体现着上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的精神，并以此精神试图改革传统中国美术的观念。美术革命的锋芒所向无不涉及整个中国美术前途，但对于中国画而言，又具体集中于关于文人画的评价和中国画是否需要融和西画的讨论。

改革派对传统持反思或反叛态度，并且选定传统的文人画为革命对象。但是，中国画在当时所受到的攻击并不是孤立的，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相关。例如，在民国初期，当时形成尚不到二百年而且正处于发展高峰期的京戏，是往往与中国画相提并论、被绑在一起受鞭笞的。¹⁶²迨至1930年代，传统绘画也未列入学校教育课程中。¹⁶³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美学家吕澂，画家高剑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在清

季之时，康有为即认为，士大夫作画“势必自写逸气以鸣高”，“此为别派则可，若专精体物，非匠人毕生专诣为之必不能精。中国既摈画匠，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¹⁶⁴到了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他更直接以正宗“王画”为美术革命的突破口：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像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重大障碍。¹⁶⁵

康有为、陈独秀诸人都以“写实主义”为标准。当康、陈等人士哀叹中国画学之衰败的同时，也都提出了引进西画写实主义和融和中西画学以改革中国画的主张。康有为一方面提出了“以院体画为正法”的复古更新的主张，同时又提出了“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的期冀。¹⁶⁶陈独秀则更坚决地认为必以西画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

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这是什么理由呢？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抄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¹⁶⁷

如果说康、陈以西画的写实主义为唯一的参照系对文人画的过激批判是时代的选择，却也不能不指出他们在美术史的意义上对文人画武断否定的偏颇，他们起码没有正视文化的继承性，也没有正视文人画的美学价值。¹⁶⁸所以，他们的观点必然地遇到了传统派尤其是在文人画自身基础上前行的画家们的反对。

在面对“科学”、“写实”主义的价值审判之压力下，传统派画家必然需要极力寻找出路，以合理化传统中国画的存在价值。但他们大多已经意识到“变”是大势所趋，不过他们反对无视传统而轻言艺术革命，反对厌故喜新，主张“依据古人之法，穷变而通之”。¹⁶⁹旧派的陈师曾更发

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力陈文人画之历史、特征，称颂文人画格局之谨严，学养之深醇，认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¹⁷⁰其观点正是对文人画衰败论和不科学论的反驳。但是历史的情势已经发展到不得不正视中国画存在的一个敏感问题，即中西艺术的关系，这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借洋兴中的改革思潮由物质层面进入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入表现。

171

自康有为和陈独秀先后喊出改革文人画之后，此后许多有志气、有才华的画家都呼应了他们的呼唤，而且比他俩的激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美术革命”强有力地动摇了传统画作，也将“文化认同”问题引入美术领域。美术革命运动对民族传统美术的否定、对西方美术的认同，激起了民族传统美术的强烈抗拒。许多新派画家基本上主张以西方的观念与方法改造中国绘画。徐悲鸿仿佛沿续了前一世纪“西人以器胜”的思想，认为中国之物质不如西洋之物质可尽术尽艺，此物质既指绘画材料，亦包括“穷造化之奥颐繁奇”的西画写实造型手段，并因此提出了“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融和论。¹⁷²林风眠更明确主张：“中国现代艺术，因构成之方法不发达，结果不能自由表现其情绪上之希求，因此当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而期形式上之发达，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¹⁷³在整个西学为优的社会思潮中，引入西画写实主义与方法以改革中国画的造型意识的融和论成为那个时代一股强劲的潮流。

但与此同时，传统阵营的画家则相应的，在革新派的画家进行“美术革命”的探索之时，在各地起来反对他们的做法。在几个大城市，他们陆续成立了社团，并以自己的行动和创作来维护传统中国画的理念，并参与到与革新画家的论战中去。¹⁷⁴虽然艺术的起落并不一定与政治的兴衰成正比，但是历史上一些国家分裂、混乱的时期，却往往为艺术的脱茧蜕变提供契机，民初北方画坛正是在皇权体制崩溃，民国时期的政权数易，历经袁世凯主政、北洋军阀专制与军阀轮流执政的混乱局面下，从而激发出丰沛多元的变化。¹⁷⁵首先，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尊孔的国粹论之出现之际，文化艺术领域同样涌动“尊孔复古”的思想潮流。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城市，遗老遗少多以“传统”、“国粹”相标榜，似乎以此“对

应”革新派所谓“新旧”之界分。政治对中国画家的影响也表现在画家的公职身分上，当时北京画坛许多画家都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公职，而他们的艺术生涯自然与当时政治人物有所联系，也正由于职务之便，得以藉此推展艺术活动、施展其艺术理念。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公职者：北京画坛领袖金城（1878—1926）¹⁷⁶，上面提到的北京陈师曾（1876—1923）、传统派大家姚华（1876—1930）则都曾经分别任职教育部与邮传部。此外余绍宋（1883—1949）民初时期担任过司法部次长，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陈汉第、叶恭绰、凌文渊、陶瑢等人都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公职。

177

他们组织画会社团，极力推崇以“四王”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鄙弃西洋画为不伦不类。美术领域“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通过对待“西洋画”与“中国画”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金城对“国粹”的提倡身体力行，1918年他因为在政府任职，所以可以说服大总统徐世昌从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利用部分，与陈师曾、周肇祥发起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提出了“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的口号。¹⁷⁸传统派的画家们大多强调古意或书卷气，言变者则主张立足于传统自身的基础。如林纾¹⁷⁹之言：“画贵求肖古人，尤以能变古人，方为名家。”¹⁸⁰金城则痛斥“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认为绘画无新旧之说，“厌故善新，为学者所最忌”；亦主张“依据于古人之法，穷变而通之”。¹⁸¹在对当时东西方文化论争中提到的“弃旧求新”反传统议题，在金城著名的〈画学讲义〉中可见精采辩论。¹⁸²

世间事务，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代蔑有，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无新，新即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温故知新，宣圣明训。……总之作画者欲求新者，只可新其意，意新固不在笔墨之间，而在于境界。

习画而欲矫古人之意，憾眩世人，以为新创，此实沽名钓誉之徒，不足以言学，更何足以言画。如无所依据，遂可谓之特别，则儿童之胡乱漫涂，亦可谓之特创大家，有是事哉！有是理哉！¹⁸³

本文可说是中国画“新旧论争”的重要文献。它驳斥了新旧之说。论新旧，它着眼于“温故知新”，在求新与师古之间则强调师古人。金城并对于民初极力崇拜外国画，而同时又对中国画极力摧残者，视为一般无知识者。他提出：

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者流，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腴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无愧乎？¹⁸⁴

金城所言，让我们看到中国画同样被“国粹化”了。与前述姚华、陈师曾、余绍宋三位留学日本的“学者型”画家相比较，金城捍卫“国粹”立场更为彻底，其家世、留学、从政背景也不同。¹⁸⁵简言之，新美术运动对于民族传统美术的否定、对于西方美术的认同，激起了民族传统美术的强烈抗拒。因此，“保存国粹画”就成了当时美术领域的主流话语。¹⁸⁶这又一次印证了“借国家之盾以保存传统途径”在民初的现象。

前面提到，作为一种抗击“反中国画”的举动，自民初开始，北京中国画界就开始结社。通过结社，“国画”一词开始通过结社之命名而被制度化了。比如1914年，古物陈列所于北京成立，并在1919年内设国画研究室，以培养出优秀的中国画人才。1918年，为了回应主张改革的新派画家，犹如前面所提及的，北京的著名画家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在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组织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目标的“中国画研究会”。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画研究、观摩、教学活动。1926年，金城的去世使得研究会分成了两个组织：一个是以金城的儿子金开藩为首的湖社，另一个是以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两个画会各出版一个刊物：《湖社月刊》和《艺林月刊》。1926年12月，金开藩与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和同门子弟二百

余人，另组湖社画会，也注明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并广泛联系南北方画家，招生传授画学之外，分期分地举办展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画家尤其南方画家聚集于此。北京以传统派画家居多，往往被称为国粹派的大本营。实际上，北京的画家在意识到变革趋势的同时是更加尊崇传统功力尤其崇尚文人画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宗旨即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合于保存国粹，与时代进化”，他们也为传承古法作出了很大努力。

在广州，由于与上海同为较早开放的口岸城市，洋画亦随伴海风而来。尤其粤地是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之故乡，更是孙中山发动民族革命之据点，对广东画坛的趋向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初，伴随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广东出现了以革新传统绘画为己任的“岭南派”，代表人物是号称“岭南三杰”的二高一陈，即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二高兄弟及陈树人都直接参与民族革命实践，极力促动中国画艺术朝现实与大众的方向转化，在技巧上上承居廉撞水撞粉之技，又通过留学日本采其新派画渲染气氛、刻划质感之技，遂成一折衷东西、融会古今之“革命画派”。¹⁸⁷他们自谓折衷派或“现代新国画”，后人称之为岭南画派。岭南画派的现代新国画观由于太拘于写实并接近于日本画风，而遭到当地传统派画家的激烈对抗。广东的传统派画家在20世纪初年以梁于渭和居廉为代表，而直接与岭南画派抗衡的则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画家，该会曾多达三百人，并在香港设有分会，其代表性人物有潘致中、赵浩公、邓尔疋、苏曼殊、卢振寰、邓芬、卢子枢、黄般若等。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南社中人，如苏曼殊即是。

这里有必要对“国画研究会”之成立过程稍作说明。它的前身为“癸亥画社”。1923年黄般若、潘致中、赵浩公、卢振寰、姚粟若、罗良斋、邓芬、卢子枢、黄君璧、何冠五、李瑶屏等画家在广州组织“癸亥画社”，以复兴中国画术为目的。1925年“癸亥合作社”才扩大为“国画研究会”，并连续出版《国画特刊》、举办展览，以维护艺术的民族性等理由批评岭南派的观点和作品。实际上，学界对这一个有宗旨、有传承、有成绩的画派，向来少人加以研究，连如何命名这一流派都付之阙如。根据这一画派的精神体现和理论宗旨而论，它可说是清末民初国粹思

潮在绘画领域上的延伸和结晶，有论者称之为“国粹画派”。¹⁸⁸国粹思想的首要提倡者邓实、黄节其实都来自广东，而潘致中是联接广东艺术家与国粹派思想家的关键人物。他早年即与国粹派健将黄节、邓实、黄宾虹有很深的情谊，与黄节更有共同办报的经历。他们彼此志趣相投，对内排满复汉，对外保汉变洋，其政治观、文化观皆在于此。因此，国粹派的文化成果，就意外地延伸并结晶于绘画艺术上。它在上海的硕果，就是黄宾虹，并形成一大流派；在广州，就是国画研究会。¹⁸⁹此外，南方传统派画家们还集结为其他各种各样的社团，如“以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研究艺术启人雅尚之心为宗旨”的艺观学会。¹⁹⁰显然的，这些画社都把中国画寄诸于“国粹”之发扬上，循此而来的，即有“国画”一词之大量被使用。但必须指出的是，犹如“国粹论”之繁复一样，个人各家既使共同使用“国画”一词，但各自的阐释又不完全一样。

依据刘曦林，“国画”、“国粹画”皆指能与“西画”、“洋画”、“西洋画”相对应、相抗衡的绘画。¹⁹¹但观诸上述倾向于保存传统画的活动与各项组织的宗旨，保存“国粹”显然成为他们的目的，而且是保存“国画”的依据，从此可看到国粹概念沿袭至画界之现象。因此，不见得如刘曦林所说的，“国画”、“国粹画”等词纯为“西画”、“洋画”、“西洋画”的相应词。依据水天中的研究，“中国画”有其语境和意义的微妙变化，从“中国的绘画”广范的意义，到明清转变成“中国画”的特殊意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讲求“国学”、“国故”的风潮影响之下，以“国画”代替“中国画”。¹⁹²确实，在艺术领域方面，西方艺术之进入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中心主义的最后放弃，他们干脆使用“中国画”——这一概念经常很自然地纳入“国学”之中的一部分，就像“书画”这一概念是传统学术的一部分一样，¹⁹³“国画”从此而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清末国粹派仍未“完成”的命名（只称国光，未称国画）则至此终于出现了。从资料看来，“国画”一词显然较晚出于“中国画”与“国粹画”。“中国画”是在上世纪初开始被人们使用，而“国画”的出现应该是于1910年代（如前述的北京古物陈列所于1919年设立了“国画研究室”），而盛行于1920年代，这应当与当时流行的“整理国故”有关，也印证了前引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

所作的一系列国字号陡然而起之观察。各地美术学校从 20 年代起，陆续设立了国画系（科）和国画课。从那时起，“国画”一词逐渐有取代“中国画”之势。但就如水天中所指出的，这两个不同的称呼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省略，“国画”不是“中国画”的简化。然而水天中所谓的：

由“中国画”变为“国画”，其背景是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国医学会这个组织建立于清朝末年，原称医学研究所，民国元年被改为中华医学联合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改称中华国医学会。1927 年底，蔡元培草拟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提案中，明确规定艺术大学设国画院、西画院……“国画”正是和“国语”、“国术”、“国乐”、“国历”、“国剧”、“国花”一样，先后由中国的进而成为中国国家的。¹⁹⁴

这里仍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国家意识的高潮期是在清末民初之时。水天中所指的，“当时国画革新论战的一些文章里，这种观念表现得相当明显，传统绘画从这个新名词里，得到一个有利于攻防的地位。”¹⁹⁵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但是以国名来贯名，必然包含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民族的审美倾向在内。

这里值得注意“癸亥画社”于 1923 年成立时，他们向广东省署申请立案的呈文表明的宗旨：

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其国始能以常存。国畫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将为印度之续。某等有见于此，用是联合同志，设立斯社，以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为宗旨。¹⁹⁶

1926 年，“国画研究会”又在向广东省教育厅的立案呈文中表示：

见异思迁，数典忘祖，国粹之沦亡，不绝于缕，此关心国故者，所为咨嗟太息而不能自己者也。抑之一国之美術，为一国精神所默寄，非徒以表示国治之隆坊，正以考察国民之特性。¹⁹⁷

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应“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¹⁹⁸此种从国粹立场出发，以“存亡接续”、“国粹”、“发扬吾国之国光”自任的态度，尽管再三申明“虽曰‘復古’，仍以启发新意为重”，与“岭南派”画家大声疾呼“艺术革命”，主张“艺术是无国界，是世界的”¹⁹⁹有极大的不同，但却明显上承清末国粹派的思路。因此毫无例外的，“国性”也同样成为“国画”界申明中国画存在的基础，以及不可否定的理由。

“国画研究会”从1920年代成立直至30年代末，主要活动时间达十余年，会员人数则达数百人，广东不少地方也设有“国画研究会”分会。“国画研究会”的活动吸引了像黄宾虹这样国学底蕴深厚、曾参加国粹派的画家参加，将影响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他们提倡在传统上下功夫，与画家顾麟士、馮超然、王伟、吴湖帆、黄宾虹等人在上海成立的“艺观学会”遥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美术界“反西化”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黄般若主编的《国画研究会特刊》上组发潘致中、李凤公、张谷雏、黄宾虹等人的有关中国画的文章，系统地阐发了从传统立场发展国画的观点。他们借重当时流行的“东西文化差异”的言说，强调国画的独特性，以抵制“西化”思潮。有的文章则以“注重表现”、“张扬个性”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兴起为例，试图证明文化艺术“东优西劣”或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其中黄宾虹显然延续其清末国粹观，他说：“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²⁰⁰他又说：“画有民族性，虽因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²⁰¹作为一代山水大家和史论家的黄宾虹在此指出了两点：即一、“笔墨”最见中华民族性；二、“笔墨”会因时变异，但其内在精神——民族性当不轻移。由于黄宾虹个人国粹派的背景，加以个人在画坛的影响，自然对“国画”之流传有直接的助力。1925年，黄般若在〈表现主义与中国绘画〉、〈剽窃新派与创作的区别〉等文章中，则对中国画陷于“穷途之叹”表示“失笑”，主张以西方

写实主义与印象主义來改造中国画，是“吾国多数之思想界最大的谬误，则为昧于近代各国画学之趋势，以为西方画学仍在写实主义之下”，“近代东方画学是否失于学理，西方画学是否羈于自然，趋重于精神是否为艺术之大障碍，此问题实为最有研究之价值。”²⁰²此种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颇有国粹学派等人的特色，说明了国画与国粹提倡者之间有着共同的逻辑以及相同的思想背景。

实际上，从资料窥知，直到 1920 年代，仍然可见清末国粹派“神州国光”的“隔代传人”。据史喻鑫的〈国粹月刊导言〉中透露，1922 年一位名为钱季寅创办了“中国书画保存会”，主要集中于保存“金石书画”。“金石书画”四位一体，这实际上是国粹学派所谓“国光”的再现。²⁰³从〈国粹月刊牟言〉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书画保存会”的目标其实更广大，它提到“国粹所包至广”，但系于该会范畴，只及金石书画。“他日营业拓展，篇幅增加，凡关于国粹，如昆曲、围棋，以及琴谱、剑术等，均可次第搜采”。²⁰⁴钱季寅在“会务报告中”的〈本会经过记略〉中则指出，创会目的是“国粹谋保存，艺术某提倡，文化某发扬”。他们一直激励征求、搜求，然后出版“金石书画”，²⁰⁵颇似清末国粹派出版《神州国光集》的做法。

另外，傅抱石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国画界人物。作为一个美术史家，他有着极为丰富的著述，从 22 岁（1925 年）写出十余万字的《国画源流概述》开始，其对中国画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建树，足以影响几代人。他虽不保守，主张斟酌采纳某些外来的艺术与方法，但一方面他却有极强烈的民族艺术主体性的信念。²⁰⁶就是他，在康、陈、徐等人认为中国画非以西法改掉不可的理论发表之后不久，1929 年写成《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傅抱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对中国画学深厚的认知和对中华民族深厚的情感，大声疾呼，他写道：

中国绘画实是中国的绘画，中国有几千年悠久的史迹，民族性更是不可离开。兴兴替替，盛盛衰衰的一页一页，并不可不毫加注目。过去是将来参考的“线”，虽不一定这条线不变，痕迹总是足以追求足以搜检。所以中国的绘画，也有它的“线”。所以中国的绘画

也有特殊的民族性。较别的民族的绘画，是迥不相同！正是中国绘画的一切，必须中国人来干。²⁰⁷

他对“民族性”这一理论问题有很深入切实精辟的认识，可说是在民初“国画”面对危机下的反应，其理论在中国文化民族性构造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第三节：小结

民国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以及政治变迁互动的深入，尤其是传统文化进一步解体，用于正当性论证的“国粹”词汇意义也有所变化，国粹叙述以另一种“面目示人”。它不再是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凭藉，而是各种不同目的的传统保存者借以维护传统的说词。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国粹”所蕴含的“国性”、“国家所特殊拥有”的意含，来强调与彰显中国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与道德”。换言之，国字号运动是以整个传统文化之危机作为其场景的。这一方面，使各种传统文化领域，如绘画、武术、医药等有了更合理化的论述，另一方面也促使传统文化可以得到国家机关的认可，比如中医界就主动争取政府设立“国医馆”。但比较起来，国民政府更主动参与武术界的“国家化”，也更积极成立“国术馆”（见上一章有关“武术”一节）。大体上，在1919年以后，由于反传统运动达到高潮，在备受到压抑之下，传统文化与遗产因此被进一步国家化了，也因此各词汇进一步被使用，这造成国字号的制度化与稳固化。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国字号”却相应的退出历史舞台，如康有为的“国教”、梁启超的“国俗”以及流行一时的“国文”等，在1920年代之后逐渐为时人所遗忘。

诚然，由于被冠以“国”字，即意味着它必须具有“民族性”或当时称为“国性”，这就注定国字称谓必然对被框进国家的各文化起了规范作用。这里，自然涉及诠释、保存、发掘某种传统特性的过程，即以传统为本位，来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比如1920年代，当各色事物被纷纷冠以“国”字时，戏剧界也讨论过“国剧”问题。²⁰⁸他们首先接触到的就是

“什么是国剧”，熊佛西、余上沅等人认为，中国人所作，演给中国人看的戏都是国剧，话剧、歌剧、非歌非话的剧，都可以称之为“国剧”。²⁰⁹由此可见，国粹化的显著意义在于使得中国在步向现代化之路时，民族性至少不被遗弃。这也为后来者留下一个文化民族性、民族史学叙事的参考系谱。

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也与其他文化领域一样，面对西乐的强力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音乐家们同样表现思索如何使中国音乐立足的问题。一位名为郑觐文的作者即言对西洋音乐的引进“忧之有年”，对“徒习外风，以移易国性”感到痛苦和惋惜。为此，他主张成立“大同乐会”，以“发明雅乐之真理，提倡雅乐为宗旨”，要“复兴雅乐，保存国粹”。²¹⁰“国乐”一词之使用也在1920年代大为普遍。这或许也与上述国字号的使用与流行有关，但也可能与1920年代初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27年，刘天华等创立“北平国乐改进会”，也同样强调民族本位与民族性在音乐中的位置。在《我对本社的计划》一文中，刘天华写道：“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²¹¹若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他在张友鹤先生所写的国乐改进社《发刊词》中加笔道：“吾人一方面为黄帝之子孙，不能继续发扬家学，固无以对数千年来之先哲；一方面为人类一分子，仅能食西人造成之果，而不能贡献我先哲造成之果于人类，亦何面目与他国之人握手为俦哉？”，“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²¹²

这一时期在“国乐”理论上另外一位较大影响的为王光祈（1892—1936）。王光祈除多有中国传统音乐的论著外，还有《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等多种介绍西方音乐的论著，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洋各国的实际音乐生活、音乐思潮、音乐发展史及音乐作品。关于如何发展中国音乐，他认为必须整理古代音乐、搜集民间歌谣以及从中抽出代表民族特性的定理，以创造可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引导民众思想向上以及畅舒民族感情的“国乐”。

²¹³

从他们的“国乐”定义看来，民族性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王光祁在其中国音乐史中有一段话：“吾国国乐进化，除律吕一事外，殆难与西洋音乐进化同日而语。但吾人既相信“音乐作品”和其他文学一样，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居，则吾人对于“国乐”产生之道，势不能不特别努力。国内虽有富于音乐天才之人，虽有曾受西乐教育之士，但是若无本国音乐材料以作彼辈观摩探讨之用，则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乐家”而已，于“国乐”前途仍无何等帮助。而现在西洋之大音乐家，固已成千累万，又何须添此一黄脸黑发“西洋音乐家”呢？”²¹⁴他致力于中国音乐之探索，正是为了创造一种具有民族性的“国乐”。

国性 / 民族性的思考也展现于国歌的拟定上。民国初年，在讨论国歌的厘订时，即有这样的说法，“凡世界各国，苟具有独立资格者，莫不有一定之国歌。或取辞勇壮，或赋性庄严。其国固有之光华精采，即可凭借声音，广为传播。其重要实与国旗相等。……夫国家之所以能永久存立于世界者，其国民必赋有一种之特性。我国地居东亚，有四万万之人民。数千年之历史，以黄帝神农之裔，受周公孔子之化，其国民性之醇厚博大，世界莫可比伦。然则，制作国歌，当一本诸吾国固有之国粹，而无待于剿袭雷同也。”²¹⁵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期间，大力倡导美育教育，因此于1927年设立音乐学院，萧友梅为校长，其中第一次列“国乐”为四大列别之一。1932年，蔡元培、陈立夫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设立国乐馆（属教育部），以“整理国乐案”，为提议“整理国乐，宣传党化”。²¹⁶

简言之，经过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打击，传统面对极大的困顿。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期，由于各种原因的促使，传统学问又有了复兴的迹象。当时政治上需要传统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为了争得正统的地位和合法性，这些军阀差不多都在鼓吹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性，这既是为了与正在形成重要势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相抗衡，也是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一个手段。尤其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之后，文化复兴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北伐成功的国民党，可说是以“民族主义”起家的，国字号与它可说渊源极深，²¹⁷但必须指出的是，它并不是“文化

民族主义”形态，其“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爱国主义”，以提供他们政治合法性之资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政治性的“国字号”时为国民党所使用，如“国府”、“国军”等。这也就是为何“国医馆”、“国术馆”会得以成立的背景原因之一。前面提到的“整理国乐案”，后面一句“宣传党化”其实即说明，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家机关越趋尝试利用民间与知识界长久以来出现的“文化国家化”现象，作为其政治上的利用。国民党的执政为国字号的得以制度化与建制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也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一方面把孙中山的思想视为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学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另一方面强调，要恢复民族精神，要使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要先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他的真实目的清晰可见，当然是想以儒学控制人心，重建秩序，以维护其一党的政治统治。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考虑，蒋介石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这种政治、思想背景下，这都似乎有助于各“国字”号的发生与稳定化，因为国字号之使用即使动机与之不同，但却与传统复兴思潮分享着相同的文化逻辑与因果关系。

¹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页227。

²同上，页289。

³见《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715。引自卢毅：《〈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页1—2。

-
- ⁴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8。
- ⁵参见汪荣祖：《章炳麟与中华民国》，收《章太炎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版，页63。
- ⁶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页312。
- ⁷《太平洋报》，1912年5月3日、5月27日、7月5日。见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页279、283。
- ⁸姚光：《〈国学保存论〉跋》，见同上，页289。
- ⁹鲁迅（唐俟）：〈国粹〉，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后收于〈鲁迅随感录三十五〉，《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卷一，香港：文学研究社，1957年，页382—383。
- ¹⁰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总68期。
- ¹¹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427。
- ¹²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9。
- ¹³李秀领：〈“新政”的替代物——革命〉，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局，1995年，页269。
- ¹⁴毛丹：〈文化变迁与价值重建运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页293—294。
- ¹⁵见《孔教会序二》，《康有为政论集》，页740。
- ¹⁶〈中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学发展史》，见<http://www.cdyz.he.cn/yuwen/book5/kongmeng/sucairuxuefzs.htm>。
- ¹⁷见《袁世凯特定教育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35-41。
- ¹⁸杨格（Ernest P. Young）：〈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页174。
- ¹⁹但实际上，袁世凯由于顾虑及民间反对“国教”之舆论，他因此并没有接受立“国教”之建议。这是它与孔教提倡者的基本差别。见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之“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页409。另参见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议〉，《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2期，1984年（民国73年），页18。此外，袁世凯帝制与孔教会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一些论者认为，如果孔教会的目的是“恢复儒家道德以维持秩序与立孔教为国教”的话，袁世凯似乎只支持前者，因为这可能有利于其统治。但在孔教会方面，则他们并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相关讨论详见前引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议〉，页17-19。

²⁰详见张光芒：〈论民初时期思想界的传统选择——兼及康有为思想的转变〉，刊于《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

²¹《袁世凯颁定教育宗旨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1991年，页30-31。

²²详见〈中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²³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467-468。

²⁴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王轼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330-332。参阅黄岭峻：〈道德危机与清末民初政治现代化的失败〉，原载《时代专题》，2002年11月。见“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211/0211151002.htm>。

²⁵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载《大中华》，第1卷，第2期，1915年2月20日。

²⁶黄岭峻：〈道德危机与清末民初政治现代化的失败〉，原载《时代专题》，2002年11月。

²⁷梁漱溟编：〈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27年。

²⁸黄道炫：〈梁济和王国维：新世纪的解读〉，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0月号，总第31期。可参见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页205-226。

²⁹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890-891。

³⁰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1914年4月），收于《康有为政论集》，页842。

³¹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³²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页842。

³³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康有为政论集》，页 733。

³⁴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页 842。

³⁵列文森：《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页 162。

³⁶引自同上注，页 163。

³⁷可参阅张卫波：〈论民国初年陈焕章的尊孔思想〉，刊于《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页 57-61。

³⁸陈焕章：〈明定原有之国教并不碍于信教自由之新名词〉，《民国经世文编》，第 39 册，上海：经世文社，1914 年，页 18。

³⁹毛丹：〈文化变迁与价值重建运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页 299。

⁴⁰引自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议〉，页 10。

⁴¹《与陈重远书》，《孔教十年大事》卷二。

⁴²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见《评孔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页 29。

⁴³庄士敦著（原文译为约翰斯顿）、杨锦森译：〈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原载于英国《十九世纪报》，1913 年 2 月），刊于《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12 号，1913 年 6 月 1 日，页 4—10。

⁴⁴梁启超：〈国民浅训〉，见梁启超著、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页 190-191。

⁴⁵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⁴⁶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见《大中华杂志》。

⁴⁷同上注。梁启超所指摘的“附会”现象，或可从一位作者苕碧所言得到印证。苕碧言道：“儒家之学即教育学与政治学也；道家之学即哲学也；阴阳家之学即步算学也；法家之学即法律学；名家之学即伦理学；墨家之学即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纵横家之学即交涉文学；杂家之学即各种应用学；农家之学即种植学；小说家之学即喜剧悲剧之学也。彼西土名人旦夕讲求夸为绝学者，何一非吾中国二千年前所阐发无遗者耶”；“西学之学，始实皆窃吾周秦诸子之绪论发挥而光大之”。因此“学无中外，贵在适宜，如周秦诸子之学皆足与西学相

印证，吾能博采兼收互为发明，则成一完全之学术不难矣。”见苕碧：〈广司马谈六家要指〉，《学艺杂志》，1912年第1期。

⁴⁸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见《大中华杂志》。

⁴⁹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刊于《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⁵⁰同上。

⁵¹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亦见《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页175。

⁵²同上，页177。

⁵³见《希社丛编》，第3册，1914年（民国3年）。

⁵⁴韶海：〈何谓国粹〉，刊于《进步杂志》，第3卷，第1号，1912年11月。

⁵⁵同上。

⁵⁶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1912年第1期。

⁵⁷董东苏：〈国粹〉（九月二号本会夜校演说速记稿），《环球》，第1卷，第4期，1916年11月15日。

⁵⁸见侯鸿鉴：〈国学、国耻、劳动之三大主义〉，《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6期，1915年6月25日。

⁵⁹章奎森：〈论国学名义及其重要〉，《文星杂志》，第3期，1916年1月6日。

⁶⁰同上。

⁶¹同上。

⁶²倪羲抱：〈国学杂志序〉，《国学杂志》，第1期，1915年3月。

⁶³张显菊：〈国学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47。

⁶⁴同上。

⁶⁵倪羲抱：〈论爱国为研究国学之本〉，《国学杂志》，第2期，1915年5月14日，页1-3。

⁶⁶详张显菊：〈国学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页349。

⁶⁷同上。

⁶⁸同上。

⁶⁹张绍宗：〈中国学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页176。

⁷⁰见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收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565—667。

⁷¹杨念群：《中国现代化史》，页140。也见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黄福庆译：〈戊戌变法与湖南省〉，《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⁷²刘人熙，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他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⁷³详见《船山学社与弘扬国学》，

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whzdu/t20030808_1180.htm。

⁷⁴同上。

⁷⁵同上。

⁷⁶同上。

⁷⁷详见同上注。

⁷⁸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⁷⁹有关五四运动发生的来龙去脉，可参阅周策纵原著、杨墨夫编译：《五四运动史》，台北：龙田出版社，1984年。

⁸⁰有论者认为梁启超是“国性论”的始作俑者，这论点显然有误。见张艳国：〈国性论、国粹论与文化的排孔开新〉，刊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页44。

-
- ⁸¹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15。
- ⁸²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
- ⁸³梁启超著、王德峰编选：〈国性篇〉，《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页152。
- ⁸⁴同上。
- ⁸⁵同上，页153。
- ⁸⁶见同上。
- ⁸⁷同上，页152。
- ⁸⁸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页126—127。
- ⁸⁹同上。
- ⁹⁰同上。
- ⁹¹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 ⁹²梁漱溟编：《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27年。
- ⁹³见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页219。
- ⁹⁴同上。
- ⁹⁵见〈五四的前夜——悼梁济之死〉，“国学经典文化教育社区”网，<http://www.hzkindy.com/simple/index.php?t1233.html>。
- ⁹⁶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见《严复集》第二册，页330—332。
- ⁹⁷同上，页330—332。
- ⁹⁸同上，页330—332。
- ⁹⁹《三年四月十日信》（许恰荪致胡适信），于胡适：〈许恰荪传〉，《胡适文存》，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页551。
- ¹⁰⁰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160—161。
- ¹⁰¹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刊于《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 ¹⁰²吴贯因：〈论国性〉，刊于《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3期，1915年3月20日。

¹⁰³同上。

¹⁰⁴见周策纵原著、杨墨夫编译：《五四运动史》。

¹⁰⁵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¹⁰⁶鲁迅，《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卷一，页395。

¹⁰⁷鲁迅：《热风》，《鲁迅全集》，卷一。

¹⁰⁸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8年。

¹⁰⁹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收于《胡适文存》，第1集，第1卷，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页533。

¹¹⁰钱玄同：〈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1925年9月5日演说〉，刊于《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1期，1925年（民国14年11月），页12。

¹¹¹胡适在1919年提出“整理国故”。他认为：“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见〈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页532—533）。到了1927年，胡适又写《整理国故与打鬼》对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作了进一步的辩护。他说整理国故，“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见《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第3集第2卷，页105）易言之，胡适等新派所从事的“国故”研究动机与章太炎、刘师培等前国粹派众人所提“国故”研究目的不同。前者是着眼于“打鬼”，而国故乃‘烂纸堆’，后者则还坚持清末国粹派的立场，即着眼于国故中的民族意涵。这意味着，“国故”一词并不能区别两者之间的思想差别，他们虽共用“国故”一词，但各自眼中的“国故”意义却不同。有关整理国故运动，此不赘述。请详阅雷颐：〈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开放时代》杂志，总第138期，2000年七月号。

¹¹²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页580、581、583。

¹¹³鲁迅：《随想录·三十五》，《鲁迅全集》，卷一，页382。

¹¹⁴同上。

¹¹⁵同上。

¹¹⁶鲁迅：《随想录·三十六》，页 384。

¹¹⁷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¹¹⁸鲁迅：〈题记〉，页 370。

¹¹⁹参阅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页 36-38。

¹²⁰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提出：《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癸亥四月），《国学丛刊》，1：4（1923 年 12 月），页 121-127。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页 394。

¹²¹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局，1995（1986），页 3-4。

¹²²何也指出，“觉得近来国人对于国学一个名词，或者误会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义，来做许多腐化的事情”。他认为，“国学的国字，显然表现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的精神。这不但违反我国先贤所主张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精神，而且亦违反西洋学者所主张的‘知识无国界’那种学术公开的精神”。他进而批评道，“高高标起国学两个字，一面表出我们据为私有的狭量，一面表出深闭固拒的态度”；如此下去，“不但我国学术有永远陆沉无法整理的危险，而且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见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 卷 1 号，1929 年 1 月，页 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的文化态度，即他个人是坚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被称“中国本位派”。他是 1935 年 1 月 10 日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4 期）发表著名宣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十教授其中之一。以其背景竟也批评当时的藉“国字号”保存文化之现象，显示这现象的严重性。

¹²³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页 336。

¹²⁴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 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页 77。

¹²⁵详见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页 272。

¹²⁶吴中云编：〈世纪回眸：中医百年沉浮录〉，《中医文化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51。

¹²⁷实际上，以当时国民政府只维持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其政策之执行力是否可以贯彻，仍是疑问。何况，在现实层面而言，当时西医人数也远未具备全面代替中医的条件。但客观现实上，中医的反应却如此激烈。

¹²⁸余云岫：〈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社会医报》，第18期，1928年6月9日。见<http://bbs.hbvhbv.com/index.asp>。

¹²⁹王立才：〈卫生自由谈〉，《环球》，第1卷，第3期，1916年9月15日。

¹³⁰余伯陶：〈本会呈请袁大总统保存中医中药奉批书后〉，《神州医药学报》，第2年，第4期，1914年（民国3年4月15日）。

¹³¹包识生：〈医药危言〉，《神州医药学报》，第2年，第7期，1914年（民国3年6月15日）。

¹³²同上。

¹³³黄眉孙：〈论针灸为宜保存之国粹〉，《神州医药学报》，第2年，第7期，1914年（民国3年7月15日）。

¹³⁴陈欲业：〈论欲振兴医学、保存国粹，首宜流通医籍〉，《神州医药学报》，第3年，第1期，1915年（民国4年1月15日）。

¹³⁵张鸣：〈旧医，还是中医？——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于《读书杂志》，2002年6月，页137-138。

¹³⁶曾觉叟：〈阅余岩对焦馆长为拟定国医条例告国人书商榷之纠正〉（一），《国医旬刊》，第7期，1935年（民国24年3月5日），厦门，页5。

¹³⁷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页80。

¹³⁸〈余岩对旧医反响之表示〉，于《申报》，1929-3-17。引自同上注。

¹³⁹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页280-283。

¹⁴⁰实际上，除了付诸“国粹论述”之外，中医界也以当时（1920-1930年代）流行的“购买国货运动”与思潮作为支持他们斗争的凭藉。近代中国国货运动是20世纪初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提倡者以为，中国危机亦在于无形的列强经济侵略，因此鼓吹购买国货，抵制洋货。中医界也把“西药”

视为“洋货”，认为消灭“中医药”即是“经济侵略”。笔者从资料所得，就有当时人所撰两篇有关国货与中医废止案相关的文章：失鸣的〈提倡国货声中与废止中医中药〉及少和的〈由提倡国货联想到废止中医药〉（均见于《医药学报》（原见《国民新闻》），第1卷，第4号，1930年4月）。然而至今，这方面之探讨似乎未见。至于有关“国货运动”的相关探析，可见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以及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¹⁴¹〈药业团体联合会之宣传——上海特别市药业团体联合会之宣言〉，于《申报》，1929年3月14日。引自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页84。

¹⁴²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页285。

¹⁴³见《大公报》，1919年（民国18年3月17日），引自张鸣《旧医，还是中医？》，《读书》，2002年6期，页137-138。

¹⁴⁴〈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于《申报》，1929年3月16日，引自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页85。

¹⁴⁵〈医药代表请愿书〉，《申报》，1929年3月21日。引自同上注，页87。

¹⁴⁶〈教育部布告中医校改称传习所〉，《申报》，1929年4月29日，引自同上注，页88。

¹⁴⁷见同上注。

¹⁴⁸同上注，页88-89。

¹⁴⁹详王一方、邱鸿钟：〈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载《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20卷第3期，页49。

¹⁵⁰同上。

¹⁵¹见《上海市国医学会十周年纪念刊》，1932年11月，页63。

¹⁵²分见章太炎的〈中国医药问题序〉、〈章太炎全集（第8卷）前言〉，见邓文初：〈“失语”的中医〉，《读书》，2004年3月号，页134-135。完整版见〈“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总第168期）。

¹⁵³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页291。

¹⁵⁴有关“国医馆”的历史，可参阅吴中云编：〈中央国医馆始末〉（《中医文化谈》，页135—148）及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页290—322）。

¹⁵⁵ 详见《近代绘画概述》，于“中国画家网”，<http://www.chinesepainternet.com/zghhs4.htm>。

¹⁵⁶高剑父（1879—1951），名伦，以字行，广东番禺人。年少家贫，曾于药店学徒。14岁时曾跟随居廉学画，后在澳门习西画法，1905年留学日本学画。1906年参加同盟会，任广东同盟会会长。1925年后，辞职创办“春睡画院”，教授和鼓吹新国画的探索，并曾到南洋及欧美等地举办画展。后又创办多所学校及任多校教授，培养大批人才。著名画家黎雄才、方人定、关山月、杨善深、黄独峰等都是其弟子。代表作有作于40年代中期的《竹月》（私人收藏）等。

¹⁵⁷高奇峰（1889—1933），名翥，字奇峰，高剑父五弟。1907年赴日留学，回国后与其兄一起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工花鸟禽兽画，善画猛禽、猛兽。其画重气势和情境，借鉴现代日本画技法，画法粗放豪迈。弟子有黄少强、赵少昂等。

¹⁵⁸陈树人（1884—1949），名韶，别号葭外渔子，广东番禺人。高剑父好友。曾在上海创办《时事画报》等，宣传新思想，倡导美育，宣传国画革新。擅长山水花卉，尤工木棉花，作品多倾向于温厚沉静，华润清新，与二高有所不同。代表作品有藏于广州市美术馆的《红棉图》轴、《鼎湖飞瀑图》轴等。

¹⁵⁹“王画”指清初“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翬（石谷）、王原祁。

¹⁶⁰详见《近代绘画概述》。

¹⁶¹见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原载《百年中国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见于“TOM在线网站”，<http://arts.tom.com/Archive/2001/10/26-48072>。

¹⁶²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上），《美术研究》，2000年，第4期，页48。

¹⁶³俞剑华：〈中小学图画科宜授国画议〉，上海《国画月刊》，第5期，1935年，页110—111。

¹⁶⁴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上海：长兴书局，1918年（戊午二月）印刷发行。引自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

¹⁶⁵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¹⁶⁶见《文人画之价值》，转引自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

¹⁶⁷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

¹⁶⁸详见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

¹⁶⁹同上注。

¹⁷⁰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原载于《绘学杂志》，第二期，1921年。转引自同上注。

¹⁷¹详见同上注。

¹⁷²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原载《绘学杂志》，1920年6月1日。

¹⁷³《东西艺术之前途》，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0号，1926年10月。

¹⁷⁴详万青力：〈对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历史思考〉，《民初十二家——北方画坛》，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8年第5期，页6-12。

¹⁷⁵同上注。

¹⁷⁶金城，曾负笈英国。自修之余，自学绘画。宣统时曾被派赴法国、美国考察法制，并留心海外美术。光绪末年起，在上海、北京等地任职，1913年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不久当选众议院议员，后又任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工花卉、人物，尤精于山水，所作山水笔墨清秀，严谨有致。（可参阅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页95-97。）

¹⁷⁷见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

¹⁷⁸吕澎：〈中国画的产生〉，“视觉文化研究”网，<http://www.art218.com/new/culture/history/200510/607.html>。

¹⁷⁹林纾（1852—1924），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工诗文，以意译外国小说闻名。早年擅花鸟，晚年居北京后致力于山水画，多工细渴笔，近似戴熙。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理安山色图》等。

¹⁸⁰《春觉斋论画》，转引自《文人画之价值》。

¹⁸¹金城：〈画学讲义〉，连载于《湖社月刊》。后收录于余安澜编：《画论丛刊》，台北，华正书局，1984：10，页698-747。

¹⁸²同上。

¹⁸³同上。

¹⁸⁴同上。

¹⁸⁵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上），页48。

¹⁸⁶陈瑞林：〈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与广东画坛新旧之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3月号，总第24期。

¹⁸⁷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

¹⁸⁸罗韬：《杂拌小集：重新认识国粹画派》，2005年2月23日，见“金羊网”，<http://gd.sina.com.cn>。

¹⁸⁹同上。

¹⁹⁰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

¹⁹¹刘曦林：〈古今转换与过度〉，《近百年中国画选 1893—1993》，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页19-31。

¹⁹²按水天，中辛亥革命后，“中国画”这个词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但在绘画分类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民国初年的新兴知识界，常按毛笔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画、炭画……这样划分（如1911年汪航生《南洋劝业会教育观》关于中等学堂图画课内容的记述；1919年北京女子职业学校图画科课程设置）。1917年，“国粹画”、“中画”这些名称也被人们使用着（1919年，北京政府的国民会议通过北京美专系科设置，“准本科设中画、西画、图案三系”；1921年，上海天马会成立时，决定研究事项为“国粹画、西洋画、图案画……”）。详见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中国现代绘画评论》，山西：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页54-57。

¹⁹³吕澎：〈中国画的产生〉。

¹⁹⁴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中国现代绘画评论》，页54-57。

¹⁹⁵同上。

¹⁹⁶引自卢辅圣主编：〈现代中国画史的岭南派及广东画坛〉，《岭南画派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页38。

¹⁹⁷《国画特刊》第 2 号，1928 年 8 月，转引自林木：《20 世纪中国画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265。

¹⁹⁸同上。

¹⁹⁹方人定：〈国画革命问题答念珠〉，广州《国民新闻》，1927 年 6 月 26 日。引自陈瑞林：〈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与广东画坛新旧之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 年 3 月号。

²⁰⁰黄宾虹：《黄宾虹论画录》，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 年，页 133。

²⁰¹同上。

²⁰²黄般若：《黄般若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年，页 21-25。

²⁰³见史喻鑫：〈国粹月刊导言〉，《国粹月刊》，卷 1，第 1 期，页 2。

²⁰⁴鸿父：〈国粹月刊弁言〉，同上。

²⁰⁵钱季寅：〈本会经过记略〉，同上，页 15。

²⁰⁶何怀硕：〈论傅抱石〉，于伍霖生编录、何怀硕编校：《傅抱石画论》，台北：艺术家，1991 年，页 99-101。

²⁰⁷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29 年作），上海：南京书店，1931 年出版。

²⁰⁸有关“国剧运动”的研究，可详胡星亮：〈论“国剧运动”的话剧民族化思考〉（北京《文学评论》，1998 年第 3 期，页 87-96）以及王青、苏新连：〈留学生与“国剧运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3 期，页 12-16）等文。

²⁰⁹见余上沅编：〈序〉，《国剧运动》，上海：新月书店，1929 年，页 1-9。

²¹⁰郑觐文：《雅乐新编初集·绪言》，1918 年 11 月。引自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页 441。

²¹¹刘天华：《我对本社的计划》，原载《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 年 8 月。引自〈刘天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银杏花音乐网”，<http://www.dj2588.com/Index.html>。

²¹²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原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 年 6 月。引自〈刘天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参见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页 438-439。

²¹³见王光祁：《欧洲音乐进化论》，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页46—47。
参阅周凡夫：〈王光祁的音乐思想初探〉，《中国新音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6年，页100。

²¹⁴同上。

²¹⁵〈国歌与国民性〉，刊于《音乐杂志》，卷1，第1号，1920年3月，页1。

²¹⁶“蔡元培、陈立夫提议设立国乐馆案及国民政府批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328-330。

²¹⁷胡适在这方面很早就看出，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有深入、有见地的剖解。他从历史角度指出，“但那时（清末）国内已起了一种‘保存国粹’的运动。这运动有两方面。王先谦，叶德辉，毛庆善诸人的‘存古运动’，自然是完全反动的，我们且不论。还有一方面是一班新少年也起来做保存国粹的运动，设立‘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开‘神州国光社’，创立‘南社’。他们大都是抱着种族革命的志愿的国粹保存者。他们极力表章宋末明末的遗民，借此鼓吹种族革命；他们也做过一番整理国故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他们的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他们的领袖人才，除了邓实、刘光汉几个人之外，至今成为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柳亚子，陈去病，黄节，叶楚伦，邵力子……诸先生都属于这个运动。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中自始便含有保存国粹国光的成分。”（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11月19日。

第六章

结论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向的是一个巨变的局面。由于西方列强及其所携带而至的强势文化之浸透，使得中国之存亡乃至其固有世界观及传统文化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于是乎，出于一种救亡的焦虑与意识，国族主义“想象社群”的语境迅速形成，社会力量与文化资源得以急速地凝聚、调动，中国思想界也因此经历了转折。任何“巨变型”的思想转折，都必然存在一些沉淀着的内在原因，而中国近代思想出现的变迁，其答案当然也要往这种深处去追寻。本文即尝试藉着当时人之心理倾向与问题意识，来探索这个危急关头之际，在知识界出现的国粹思潮与文化国家化现象。

从 1895 年甲午战败以后到 1900 年代初期的知识界言说可以窥知，一种对中国存亡、文化特性/认同的焦虑非常显明的溢于言表，而且起初其中主要是由国粹论者所表现出来的。正如柏林所指出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便是一个社会至少需要在其一些比较敏感的成员间，依据一些普遍起着统一作用的因素——如语言、种族起源、共同的历史（真实的或想象的）——形成自身的民族形象，或至少是一个民族胚胎。这些观念与情感，在受到较好教育、社会和历史意识较强的知识界之间，较为清晰，而在大多数民众的意识中则要模糊得多，甚至全然不存在。而正是这些人的自觉努力，形成一种社会或政治力量。¹因此，国粹运动可说是中国人追求文化认同与现代国族建构历程中的重要一部分。然而，这种思想倾向的智识来源相当复杂，但概要言之，首先正如许多研究所昭示的，“国粹”一词及其概念是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于 1902 年借自日本，并把其引入中国特殊的社会脉络之中。之所以如此，乃因日本国粹论恰好提供了其中国同道们一个强调“民族国家特性”的范式。其次，日本

国粹论述与甲午战败之后在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亡国灭种焦虑存着某些契合之处。这场国粹运动的另一个关键思想语境是国粹主义者已经开始响应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与建立汉民族国家之主张，清末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抽象的“国家”概念一步步与“清廷”分开来，属于一种汉族国家意识的思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国家意识在深沉的救亡意识驱动下，同他们所经受的传统“亡天下”观念下的“文化至上主义”影响又相互联系，所以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属于“文化”的国族主义立场——国粹主义。

与其他相关研究稍微不同的是，本论文认为：“国粹”概念之出现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时其他流行着的相关词汇与概念之间前后或互为激荡而成的，如“国魂”、“国于天下，必有与立”等。1904年12月，藉着上述“危亡论述”以及国家观念兴起所提供的历史动力，一群持守国粹论者凝聚一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与《国粹学报》。得助于当时沉重的亡国灭种忧思与欧化之风狂热吹起的势头上，“国粹”主张开始潜滋暗长，并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成为晚清中国文化发展与汉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从国粹论自身内在的论述看，这个过程最初大致是围绕着诸如“国魂”、“国学”、“种性/国性”、“种族/民族”以及“欧化主义”等关键词展开的。这些关键词提供了他们一种理论与分析语言，用以讨论或建构种族、文明、国家以及民族认同，以解决排满需要与在现代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矛盾与困扰。这个展开的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二方面的基本原则。即一，大力提倡保存国粹与种性/国性之间的关联，以为国家存立的前提在于文化的保存，而且这个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中心。因此，原本潜隐下去的汉民族力量一举迸发了出来。他们展开了中国历史记忆复原与文化阐释的活动，同时也积极地进行汉民族国家建构运动。国粹运动和汉民族国家运动两者是互为表里、互相关联的，因为，中国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复原，正是中国汉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和主体力量。因此，吊诡的是，清末这场国粹运动尽管其所倡导的“国族”有着不容否认的“现代性”色彩，但对其自身国族的表述(representation)，却几乎指向渺远的过去。所谓“光复民族”、“召唤国魂”等等激扬人心的口号与运动，因此如火如荼的展开来了。

二，一般而言，某一历史时期中的强势文化常常会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体现，而作为一种回应，以弱势文化守护者自命的人则往往习惯于强调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种种东西文化观来看，所谓欧化（西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之楷式的论调不绝于耳，而诸如“本土化”、“传统文化”、“保持文化特殊性”之类取守势的观念，总与发展中国家或西方世界中相对弱势的国家“形影相吊”。晚清国粹学派正是如此，面对欧化的大势，他们急欲追寻自身民族的独特性和本原性，一方面以此作为排满建立汉民族国家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以此作为中国融入世界，让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一个拥有自我而独立的一个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国粹中人坚持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相对性，并超越了当时因“天演论”而盛行的直线式进步观，认为一民族文化不能以落后、先进来区分。毫无疑问，国粹派中人试图通过文化，即提倡国粹的方式作为中国人寻找一个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以解决当时的中国文化特性/国家认同的焦虑。事实上，没有本土的主体性，如何可能健康而积极地去开展与世界的关系、面对世界？诚然，在当时所谓“欧化”的时代里，什么是中国的国族性呢？为此，国粹派主张对传统文化不断追寻和回溯，因为只有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才能确立自身独特的国族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接受“国粹”这一观念，其实也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承认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不同、与它平等的“文化实体”之存在，以前那套天下/外化的天下观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当这样的文化观又与正在兴起的以“国家”为单位、为关怀中心的意识相结合，这非逼出一系列国字号不止，中国化或国家化固有的传统文化于焉出现。本论文的研究显示，从“国魂”、“国粹”开始，清末已出现其他国字号至少有“国光”、“国医”、“国史”等词。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从文字资料交叉阅读证成，各国字号的出现，很大部分原因是派生自清末国粹论述及其以“国为名”的命名范式。一些国字号之较早出现，与国粹派思考“国粹之所寄”有关，如“国史”、“国文”即被认为是最能彰显“国粹”而生。过去很多研究皆从大格局看国粹思潮，即从宏大叙述的知识界着眼，²而忽略了更小格局下的国粹论述，即各传统文化的专业领域中医界、武术界等的论述，以及两者之间的论述联系、流通与互动。

清末国粹主义者所强调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之论述：“一国自有一国特有的精神”——与西方“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民族国家理念相近，这成了往后当中国文化，不管是传统戏剧、水墨画、医药、武术等领域面对西方冲击与反传统浪潮时，自我防卫的“保护盾”与凭借。他们尝试自我“国粹化”，以国家特质的角度合理化自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国粹主义这一现代国家观与民族国家建构论述，可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化文化遗产的称谓与运动。这一进程当然未必呈线性发展，但大体维持着一种逻辑的联系。各国字号所开展出种种后续，同样内蕴繁复，值得深究。

近代中国文化国家化历程甚长，其间背后的中国语境也变化不少。文化国家化虽有其一条国家意识与国家建构脉络分明的主线，但在不同的时间，随着不同的语境置换，对不同时期的国粹论者，都有不同的意味。具体情况随着时间的转移，国家化也有不同的实际内涵。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国粹论述即发生转折，而步向另一个阶段。至今，一般学者甚少注意辛亥革命之后的国粹论述。本论文认为，大体上清末国粹派以民族革命已大功告成，所谓的汉族国家似乎已经建立了起来，从而逐渐淡出思想论述的中心。从国粹思潮自身的演进历程与革命运动相关联的角度来看，革命之后，它确实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章太炎初刊《国故论衡》时，已取较中性的“国故”而舍“国粹”一词了，国粹派其他健将如黄节、邓实等人亦不再着眼于国家存亡与国粹关系的言说。他们似乎不约而同的集中在知识层面之活动，所重转为“学”，不似民国之前具有浓烈的国族存亡的思辨意义。这其实已经透露了国粹思潮的逐渐转折。

民国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以及政治变迁互动的深入，尤其是随着“普遍王权”之崩解的结果，传统文化进一步解体，用于正当性论证的“国粹”词汇意义也有所变化。当时兴起的孔教与道德救国基本上接收了“国粹”概念。至此，国粹论不再是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凭藉，却比较为各种不同目的的“传统主义者”借以维护传统的说词，因此国粹论尽管仍然持续，但以另一种“面目示人”。换言之，革命之前的国粹论述之保国意味与国家建构意含较重，而革命后则是国家建构意含较轻，纯粹保卫传统价值与文化动机较重。他们以“国粹”所蕴含的“国性”、“国家所特殊

拥有”的意义为前提，强调与彰显中国不能失去儒教与传统道德观。然而，正由于他们“立国教”动机以及与民初帝制、复辟的暧昧关联，使得“国粹”概念成为众所矢之的对象。

在近代思想上，整体而言，清末国粹思想所奉行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方面并未取得实践上的成果与意义。正如余英时所观察到的，“很意外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有畅遂的发展。他认为，其中原因极其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反传统思潮愈来愈激化，至“五四”时代已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³确实，由于反传统声浪之大以及其他复杂的历史缘由，以传统文化为其内涵的文化民族国家建构因此无以为继了。尤其是在反传统论述中，为了追求现代化而把国粹论述中所坚持“国家特性说”给解套了。国粹论述至此往往只能成为一种处于被动下，任人作为“保护盾”的幌子。在政治体制方面，尽管清末或民初的国粹及各国字号论述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但它仅是一种文化价值追求，对政治与国体并无实质的作用，而且国粹论者对此也没有太多相关的具体提倡（他们的政治主张大体与革命派分不开）。然而诚如余英时所言，中国文化悠久这一事实仍然蕴藏在绝大知识分子的胸中，⁴而在国粹与国字号论述下，至少它所导出的强调民族主体性思路却在各个文化领域仍得以承续下来，包括了中国画、医药、武术、戏剧、音乐、学术等等。客观上，这不得不归功于提供传统文化保护盾作用、主张“一国自有一国特质”的“国字号”论述的意外收获。

实际上，“国粹派”所建构的固有典范汇同了民初特殊的政治与社会语境，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国字号势波。尤其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由于反传统运动达到高潮，在备受到压抑之下，传统文化与遗产被进一步被贯名“国家的”，各国字号词汇进一步被使用，而最终得以制度化与稳固化。在各传统领域的人士而言，凡加上一个“国”字者，即意味着它与国家存立系有特殊而基本的关系，似乎即掌握了“国家”这一无可否定的象征性资本，从中获得保存的合法性理据。“国字号”里头的“国”俨然已成标签。既然已成标签，或由于虚悬于象征的意味，而不免沦为思想论争的工具，“国家”也仅仅是工具。⁵这与清末国粹派汲汲于国家建构有着许多差距。更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传统一派

诸如胡适、鲁迅等人同样持守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这与国粹派提倡者享有共识），但对于“中国”的理解却颇为不同。对五四一代而言，他们不认为国粹与国家存亡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认为世界化比保存国粹更重要。但在国粹派而言，在文化上，特别是民族文化，实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多歧性质与内涵之繁复，不能一言以蔽之，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要言之，一系列“国字号”名词并非一个本质性的存在物，更非凭空出现之物，而是具有一个形成与沉淀之过程的。国字号可说始于1900年代第一个十年里，但真正盛行于1920年代，并在1928年随着以民族主义为立论的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逐渐被建制化与稳定化。间中历经二、三十年，它才进一步被稳定化与制度化，成了大家“习而不察”的基本而普遍名词。19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日军进逼，中国的国家危亡日益严峻，国家观念的重要性益形显露，其思想说服力与号召力大大增强，国字号应当也有新的发展，但这已非本论文之论旨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国字号兴起之际，一些“国字号”却相应的退出历史舞台，如康有为的“国教”、梁启超的“国俗”以及流行一时的“国文”等，在1920年代之后逐渐为时人所遗忘或淡失。实际上，最早使用“国”字为前缀的文化词汇当可追溯自康有为的“国教”论。早在1898年，康即言“教者，国所以立……教存则国存”，并建议光绪帝“明诏设立教部，令行省设立教会讲生，皆传祀孔子以配天，并行孔子祀年以崇国教”。⁶只是大体上，国教论不太适合中国的语境，因为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大多数拥护儒家的传统人士并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⁷因此它很早就随着康有为创立孔教失败而失落了。然而，又为何中国传统文学没有被称之为“国家文学”、“国家诗歌”等词汇呢？这或许是因为文学已经被涵盖于“国学”或“国文”之中，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的疏忽。

这里还衍生另一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假若没有“国医”、“国画”等这类国字前缀名词，那么其所指涉的中医药、绘画等传统文化领域与遗产的发展又将如何？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这里要说的其实是，究竟“国字”称谓是否对各领域文化起了任何正面意义。水天中曾提出一道问

题颇值得思考。他指出，许多画种都以工具材料为分类依据，因此“50年代以后，在原有的类别基础上增加了宣传画、连环画、壁画、年画……”，而这些画类却都和“中国画”并列。他认为，这进一步缩减了中国画的活动天地。⁸确实，以“国家”来框住特定“文化”，确实造成了定义上的含混，就如钱穆批评“国学”一词一样。

但在客观上，以中国近代这一部不断“激进化”（余英时语）的历史而言，当它们把自身与“国”紧扣一起时，确实是产生某些正当性。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被冠以“国”字，即意味着它必须具有“民族性”或当时称为“种性/国性”，这就注定国字称谓必然对被框进国家的各文化起了规范作用，而或多或少的激起了各领域对各自民族性的思索。这里涉及了一个诠释、保存、发掘某种传统特性的过程，即以传统为本位，来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

依据一般西方的社会学研究，文化一旦被有效的定义（如被国有化），也即给它划出一道疆域，它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稳固的遗产。但与此同时，它即被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物体，它已经既不是可以参与的有机体，也不再是一个中介。⁹不过这样的论述却未必适用于此处的情境。这是因为，在本论文的研究范畴的中，国字号尤其是在国粹派所开启的民族文化主体论述中，并未完全排斥欧化。他们实际上非常强调在民族主体之上，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尤其在民主、科学价值已经成为近代的主流话语。“国医界”就是如此，在一方面以“国字”号自居之外，另一方面也积极回应科学化的主张。以“国剧”为例，当1920年代各色事物被纷纷冠以“国”字时，戏剧界也讨论过“国剧”问题。但是，他们接受西方的表演形式，但首先也接触到“什么是国剧”的问题。熊佛西、余上沅等人认为，中国人所作，演给中国人看的戏都是国剧，话剧、歌剧、非歌非话的剧，都可以称之为“国剧”。¹⁰由此可见，国粹化的显著意义在于使得中国在步向现代化之路时，民族性至少不被遗弃。这也为后来者留下一个文化参考系谱。

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也同样面对西乐的强力冲击。“国乐”一词之使用也在1920年代大为普遍。这或许也与上述国字号的使用与流行有关，但也可能与1920年代初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刘

天华、王光祈等音乐界人士同样强调音乐民族性的保存。从他们的“国乐”定义看来，民族性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¹¹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中有一段话说：“吾国国乐进化，除律吕一事外，殆难与西洋音乐进化同日而语。但吾人既相信“音乐作品”和其他文学一样，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居，则吾人对于“国乐”产生之道，势不能不特别努力。国内虽有富于音乐天才之人，虽有曾受西乐教育之士，但是若无本国音乐材料以作彼辈观摩探讨之用，则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乐家”而已，于“国乐”前途仍无何等帮助。而现在西洋之大音乐家，固已成千累万，又何须添此一黄脸黑发‘西洋音乐家’呢？”¹²

从以上例证可以断言，国粹学派与各国字号对后来的强调文化民族性主张有着实在的联系与启示。实际上，在近代各种思潮中，不论是完全拒斥西学者，或要求全盘西化的西化派，还是各式各样的折衷派，莫不站在一个一元的文化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但是，国粹思想却强调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没有高下优劣可分，“其味各有不同，而皆可于口”的态度表现的正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考量。可以说，国粹运动继往开来的观点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原型，其所提出的问题意识与文化主体原则下启1930年代及以后的“文化本位”论。¹³有关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与中国文化该如何建设等问题其实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社会各界。围绕对这个社会文化大课题的解答，中国社会各界展开了长期的论争。国粹论述的影响其实超越了本研究时间下限，1930、1940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者即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1930年代以降的“本位文化”论者是基于地域差别而强调文化“特殊性”以及本国文化的“特征”，这种近似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化立场与国粹学派的一贯主张，显然没有二致。因此，如对晚清“国粹派”的缘起与文化观有一基本了解，无疑会增进对“本位文化”论的理解。此中的肌理，可看余英时在论述《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¹⁴余英时即认为，钱穆一生所从事的民族史学，正是受清末国粹派文化救亡意识之影响而来的。我们可以说，“国粹”论可说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它为近代中国知识界有关民族与文化关系的思索提供了启示。

中国国字号之形成，交织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各种政治、文化、社会等复杂的因素与线索。但实际上，各种由“国”字构成的词汇在清末民初可说都是新名词，这点已为当时人所指出。而正如前面已所说的，这些国字词族不仅仅是一个个词汇那么简单，他其实亦包涵了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国家意识与对传统文化价值之倾向，还贯穿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各项社会运动，如清末的国粹运动，1920年代的国医节、新国画运动与国剧运动等，这些新词被一次次的高喊与推动之下，加之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建制化结果，这都有助于“国字号”新名词族的流传，并强化了这个名字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张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结编织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¹⁵因此，要认知各种近代新思想，测量其社会化程度，就不能不从总体上考虑这些新思想所包涵的各种重要的新词汇、新概念的形成、传播和社会认同问题。因此，这些国字号的产生、变化和它的影响，其实提供了我们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现象一个难得的进路。¹⁶实际上，自清末以来，国字号在很长的时期内业已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关键词。在客观上，国家意识以及民族性在建国中的重要性，以及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已经通过这些新名词之流传而深化了。换言之，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这些近现代新名词及其所携带的思想、概念，从而体现了中国人对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认知。

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对近代中国历史造成的重大变迁，特别是有关民族、国家和文化三个面向的认同变迁趋势，一直贯穿着国族性和现代建构的交融和冲突。至今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放弃国族性、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国族性和现代性是一种价值的悖论，既是理智的悖论，又是情感的悖论。但是，国族性是绝对需要的，是判断何谓“中国人”的一项重要认同指标，因为没有民族性就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点。丧失了国族性，现代性的意义也势将大打折扣。事实上，对章太炎而言，所谓的“国族性”者，甚至也不是需要不需要的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生俱来、欲舍去而不得之物。总而言之，以民族文化定义“中国”之为“中国”这一思路，正是国粹派在上个世纪初所开启出来的。

¹柏林 (Isaiah Berlin) 著、冯克利译：〈民族主义〉，《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页 413-414。

²这里的所谓“宏大叙述” (grand narrative) 的知识界是指，以大格局的视度对国家问题发言的知识圈。这些人即如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人。

³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页 29。

⁴同上，页 30。

⁵此处也引出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议题，即过去学界比较着重于民初政治与党派对“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的操控，而忽视了文化界对“国家”作为一种象征资本的研究。前者之研究可参阅罗志田：《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等书。

⁶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康有为政论集》，页 283。

⁷参阅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之“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家思想”，页 407。

⁸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与变化〉，页 57。

⁹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页 346。

¹⁰余上沅：〈序〉，见氏编：《国剧运动》，页 1—9。

¹¹见周凡夫：〈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初探〉，《中国新音乐史论集》，页 100。

¹²同上。

¹³“文化本位”论之具体主张体现在王新命等十教授于 1935 年 1 月 10 日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4 期所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和同年 5 月 10 日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8 期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两文中。

¹⁴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中国文化》，页 19-29。

¹⁵详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 年，第 4 期，总第 166 期。

¹⁶同上。参见王汎森：〈“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页 149-164。

参考书目与资料

一、史料文献

- 《大中华杂志》，卷1—卷2，1915年1月（民国4年）—1916年12月（民国5年）。
- 《中央国医馆一览》，中央国医馆秘书处编，1934年。
-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编辑小组，1987年。
- 《中国新报》（1906—1907年）。张玉法主编：《清末民初期刊汇编》（5—7），台北：经世书局。
- 《女报》，第1号，1909年（宣统元年元月）。
- 《上海市国医学会十周年纪念刊》，1932年11月。
- 《云南》，第13期，1908年4月28日。
- 《文星杂志》，第1—4期，1916年。
- 《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第25卷第24号，1904年（光绪30年正月25日）—1928年（民国17年12月25日）。
- 《民报》，第1—26期，1905年10月—1910年2月。
- 《学艺杂志》，第1期，1912年。
- 《希社丛编》，第3册，1914年（民国3年）。
- 《医药学报》，第1卷，第4号，1930年4月。
- 《绍兴医药学报》，1—30期，1908年—1909年（光绪34年—宣统元年）。
- 《国术周刊》，第11、12、13期合刊，1935年。
- 《国学杂志》，第1—10期，1915年—1916年。
- 《国粹月刊》，创刊号（卷1，第1期），1929年1月20日。
- 《国粹学报》，1905年2月—1912年2月。
- 《政艺丛书》，1902年（光绪壬寅）—1907年（光绪丁未）。
- 《神州医药学报》，第2年第1期—第3年第1期，1914年—1916年（民国3年1月15日—民国4年1月15日）
- 《觉民》，第6、8、19期，1904年（甲辰年）。

- 《环球》，第1卷，第1-4期，1916年5月15日-1916年11月15日。
-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5号-1904年2月25号（癸卯十月二十七日—甲辰正月十日。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12，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影印。
- 《浙江潮》，第1-10期，1903年。
- 《清议报》，23.12.1898-21.12.1901。
- 《教育杂志》，卷1-卷2，1909年。
- 《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 《新民丛报》，号1-96，1902年2月8日-1907年11月20日（光绪28年1月1日-光绪33年10月15日）。
- 《新世纪》第20、27、44、58、81-100、118-121号，1907-1910年。
- 《新译界》（1907年）。张玉法主编：《清末民初期刊汇编》（1），台北：经世书局。
- 《警钟日报》，第1-5册，1904年。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影印。
- 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1991年。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715。
- 邓实编：《美术丛书初集》，第一辑。
- 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 伊见思：〈体育研究社略史〉，《体育丛刊》（北京）创刊号，1924。
- 刘师培著、李妙根编选：《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 1996年。
- 许同莘：《张文襄年谱》，上海：商务印书局，1947年，页208。
- 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北京：群学社，1927年版。
-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香港/北京：三联书局，1962—1977年。
- 余云岫：〈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社会医报》，第18期，1928年6月9日。见<http://bbs.hbvhbv.com/index.asp>。
- 吴汝纶：《东游丛录》，《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 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82年。
- 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原载于《绘学杂志》，第2期，1921年。
- 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8年。
-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
- 陈焕章：〈明定原有之国教并不碍于信教自由之新名词〉，《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
- 何炳元：《论中国急宜开医智》，刊载《医学丛编》，1909年。
-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
-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
- 严复著、王毓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 宋恕著、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
- 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 苕碧：〈广司马谈六家要指〉，《学艺杂志》，1912年第1期。
-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郑觐文：《雅乐新编初集·绪言》，1918年11月。
- 俞剑华：〈中小学图画科宜授国画议〉，上海《国画月刊》，第5期，1935年。
-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11月19日，《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
- ：〈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收于《胡适文存》，第1集，第1卷，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页527—534。
- ：〈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第3集第2卷，页103—106。
- ：〈许恰荪传〉，《胡适文存》，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页548—556。
- 高凤谦：〈论保存国粹〉，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1909年（宣统元年六月）。
- 侯鸿鉴：〈国学、国耻、劳动之三大主义〉，《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6期，1915年6月25日。
- 病武：〈军国民教育之草案〉，《南风报》，“讲演”，第2期，1910年（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
-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载《绘学杂志》，1920年6月1日。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章太炎：《章氏丛书》，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
- 章太炎：《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 章太炎、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
- 章太炎著、徐复编：《尙书详注》（19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菊池熊太郎：〈国粹主义 no 本据如何〉，载《日本人》杂志，1888年11月18日号，页96。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
- ：《饮冰室全集》，香港：天行出版社，1974年。
- 、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 梁漱溟编：〈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27年。
- 鲁迅：《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卷一，香港：文学研究社，1957年。
- 韶海：〈何谓国粹〉，刊于《进步杂志》，第3卷，第1号，1912年11月。
- 曾志恣：《乐典教科书·序》，载《江苏》，1903年，第6期。
- 曾觉叟：〈阅余岩对焦馆长为拟定国医条例告国人书商榷之纠正〉，《国医旬刊》，第7-8期，1935年（民国24年3月5日）。
- 黄般若：《黄般若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页21-25。
- 黄宾虹：《黄宾虹论画录》，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
- 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29年作），上海：南京书店，1931年。
-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 〈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教育杂志》，第1年7期，1909年（宣统元年六月）。

二、现代中文论著

- 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论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2期，页1-15。
-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
- 马里乌斯·詹森：〈第六章：日本与中国革命〉，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上），《美术研究》，2000年，第4期，页44-52。
- ：〈对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历史思考〉，《民初十二家——北方画坛》

- ，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8年第5期，页6-12。
- 干春松：〈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干春松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ganchunsongwenji.htm>。
- 于省吾：〈释中国〉，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三卷，页1515-1524。
-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年。
- 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黄福庆译：〈戊戌变法与湖南省〉，《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 ：《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 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中国现代绘画评论》，山西：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 王一方、邱鸿钟（对话）：〈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载《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20卷第3期，页47-50。
- 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争论背景〉，见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亦收于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594-615。
- 王东杰：〈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1期。
- ：〈欧风美雨中的国学保存会〉，《档案与史学》，1999年5期。
- ：〈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5期。
-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收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页1-94。
- ：〈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收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页209-232。
- ：〈“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收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页441-480。
-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

- 史研究所集刊》，第 11 期，1983 年。
- 王先明：〈关于晚清的“旧学”与“新学”〉，载于《天津师大学报》，2003 年第 3 期。
-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1992 年版。
- ：〈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刊于《当代》，第 91 期，1993 年，页 40-49。
- ：〈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大陆杂志》，90 卷 6 期，1995 年 6 月。
-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8 月，页 1-18。
-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页 149-164。
-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页 165-196。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 ：〈“起源”的魔力及相关探讨〉，刊于台北《语言暨语言学》，2.1，2001 年，页 261-267。
-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 年 6 月号，总 77 期，页 77。
- 王青、苏新连：〈留学生与“国剧运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3 期，页 12-16。
- 王春霞：〈“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 年 10 月 31 日。
- 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1935 年版。
- 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1902-1950〉，收于《纪念钱穆先生

- 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00年。
- 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总第168期）。
- ：〈“失语”的中医〉，《读书》，2004年3月号，页127-135。
-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邓铁涛、程之范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
- 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刊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页33-43。
- ：〈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收于陆晓光主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557-586。
- 卞崇道：〈日本现代化与日本哲学〉，刊于《文化：中国与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 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页221-232。
- ：〈辛亥革命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951-975。
- 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998-1020。
- 叶瑞昕〈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辛亥革命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文化自新意义〉，“近代中国网”，<http://www.china1840-1949.com>。
- 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页77-90。
- 甘英：〈宋恕与山东省图书馆的创建〉，刊于《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年第4期，页85-87。

- 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冯客(Frank Dikotter)：《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卢毅：《“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页39-44。
- 卢辅圣主编：〈现代中国画史的岭南派及广东画坛〉，《岭南画派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 刘小林：〈论清末国粹主义思潮〉，见<http://book.peopledaily.com.cn/gb/paper18/24/class001800001/hwz164841.htm>。
- 刘天华：《我对本社的计划》，原载《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年8月，〈刘天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银杏花音乐网”，<http://www.dj2588.com/Index.html>。
-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局，1999。
- 刘贵福：〈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1860-1881。
- 刘理想，〈试论清末民初留学运动对中医发展的影响〉，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月，第5卷第2期。
- 刘曦林：〈古今转换与过度〉，《近百年中国画选1893-1993》，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页19-31。
- 刘曦林：《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1901至2000年的中国画》，刊于<http://arts.tom.com>网站，2001年10月26日，<http://arts.tom.com/Archive/2001/10/26-48072>。
-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学部〉，《历史研究》，2000年3月，页80-91。
- 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份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 许地山：《国粹与国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66年。
-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 ：〈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原发表于台湾大学主办“中国现代性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2004年5月22日。现见“思与文网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641>。
-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局，1995年。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00—》，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
- 许章润：〈民族的自然言说〉，刊于《读书》，2001年12月。
- 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出版社，2003年。
- 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见《评孔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页29。
- 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孙隆基：〈从“天下”到“国家”——戊戌维新一代的世界观〉，《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页33-40。
-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3期，页68-79。
- 仲维光：《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见“当代中国研究”，于<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70207&total=57>。
- 朱维铮：〈神州常夜谁之咎〉，《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国故论衡》校本引言〉，《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清末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 朱法源：〈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册），第22期，1993年6月，页325-356。
- 郑国民：《小学国语教学方法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基础教育网”，http://bpzx.com/subject/chinese/html/010604/2000_12/20001229_261.html。
- 史颖君：《我国国语运动之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1月）
- 伍霖生编录、何怀硕编校：《傅抱石画论》，台北：艺术家，1991年。
- 吕澎：〈中国画的产生〉，“视觉文化研究”网，<http://www.art218.com/new/culture/history/200510/607.html>。
- 汪丁丁：〈学术中心何处寻〉，《读书》，1997年7月。
- 吴中云编：〈世纪回眸：中医百年沉浮录〉，《中医文化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
- 余上沅编：《国剧运动》，上海：新月书店，1929年。
- 余安澜编：《画论丛刊》，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第10期，页698-747。
- 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页17-32。
-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 张卫波：〈论民国初年陈焕章的尊孔思想〉，刊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 张汝伦：〈救国与建国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09-244。
-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总68期。
- ：〈旧医，还是中医？——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于《读书杂志》，2002年6月。
-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台北《政治学报》，1（1971）。
- 张艳国：〈国性论、国粹论与文化的排孔开新〉，刊于《史学月刊》，2003年

- ，第11期。
- 张光芒：〈论民初时期思想界的传统选择——兼及康有为思想的转变〉，刊于《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
- 张灏：《再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第45期，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2月。
-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沟口雄三著、林右崇译：《做为方法的中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
- 陈方正：〈民族主义的剖析：起源、结构与功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
-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
-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597。
- 陈志让：〈第七章：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之“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358-455。
- 陈瑞林：〈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与广东画坛新旧之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3月号，总第24期。
- 杨天石：〈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载《新建设》，1965年2期。亦载氏著：《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上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页300-318。
- 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杨际开：〈章炳麟为什么要“反满”〉，刊于《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 。
- 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杨格（Ernest P. Young）：〈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张玉法主

- 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
页174。
- 伯纳尔（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姜义华等
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页445—470。
- 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
时报出版社，1999年。
- 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央研究
院近史所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1994年，页91-130。
- 李妙根编选、刘师培著：《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
- 李孝悌：《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于《清末
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0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 李国祁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事业，
1980年。
- 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李建军：《晚清至“五四”的中国“图书馆”与“启蒙”话语传播》，于“对
话网”，<http://www.dialognet.net/Article/HTML/388.html>
。
- 李洪岩：〈晚清国粹派史学〉，北京《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
- 李敖：《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原登在《文星》，第61号，1962年
11月1日。
- 李朝津：〈论清末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的交替——章太炎民族史学的形成〉，刊
于《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页1-37。
- 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年。
-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
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页1-77。

- ：〈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33期，2000年6月。
- ：〈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12月，页685-733。
- 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1988年。
- ：〈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页145-179。
- 汪家熔：〈辛亥革命前国粹派的出版活动〉，湖北编辑学会主办，《出版科学杂志》，2004年第6期，见http://www.cbkx.com/2004-6/685_2.shtml。
-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72年。
- 杜赞奇(PrasenjiDuar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周凡夫：〈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初探〉，《中国新音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6年。
- 周佳荣：〈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教育图书出版社，1999年，页156-157。
- 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任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1980年。
- 周策纵原著、杨墨夫编译：《五四运动史》，台北：龙田出版社，1984年。
- 林木：《20世纪中国画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 林志宏：《社会和情感的交互作用：清末民初文言与白话地位的逆转》，“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http://202.76.36.61/conference_publication/rs_3/42.htm。
-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 ：〈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页205-226。

- 卓文义：《民初之国语运动》，台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年。
-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刊于《近代史研究》，2001年5月，页1-20。
-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总第295期，2005年5月，页89-101。
- 郑大华、邹小站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 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刊于《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
-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刊于《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页59-94。
- ：《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
-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 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 罗滋（Jessie G. Lutz），〈中国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之反基督教运动〉，刊于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集，台北：联经，1981（1990）。
- 罗韬：《杂拌小集：重新认识国粹画派》，2005年2月23日，见“金羊网”，<http://gd.sina.com.cn>。
- 洪丁福：《德国的分裂与统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
- 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至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

- 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姜义华：〈论章太炎的国家学说及从政实践〉，刊于《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5月，页75—82。
- 姜新立：〈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
- 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刊于《学术研究》，1999年8月，页25—38。
- 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42-259。
-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胡星亮：〈论“国剧运动”的话剧民族化思考〉，北京《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页87-96。
- 柏林(Isaiah Berlin)著、冯克利译：〈民族主义〉，《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 柳无忌、殷安如：《南社人物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柳明奎：《中国国语运动发展史》，台北：台湾师大国文所硕士论文，1961年6月。
- 胡逢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 郭少裳：《西方的巨变，1800—1980》，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3年。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 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载《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刊于《历史研究》，1996年5期，页30—45。
-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
-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近代学术传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刊于《历史研究》，2002年3期，页29—41。
-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四，时代出版社，1950年6月版。
-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收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上海：三联书局，1988年。
- ：《国学概论》（193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徐蓝：〈从民族国家到世界秩序——读《西方的巨变》〉，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页133-136。
- 章开沅：〈论辛亥国魂之陶铸——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二〉，《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4-42。
- ：〈“排满”与民族运动〉，《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4-67。
-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章开沅学术论文集》，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49—163。
-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稿》，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 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局，1988年。
- 曹世铨：《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局，1995年（1986）。
-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盛邦和：〈复兴与国粹〉，见“世纪中国网”，
<http://www.cc.org.cn/old/pingtai/021211300/0212113017.htm>。
-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刊于中国史学会编，《

- 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页921-950。
-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期，1997年，页263-285。
- 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2期，1984年（民国73年），页197-224。
-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页181-214。
- 黄岭峻：〈道德危机与清末民初政治现代化的失败〉，原载《时代专题》，2002年11月。见“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211/0211151002.htm>。
-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2000年。
- 黄绣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亡运动的四重奏：保国、保种、保教与国粹保存运动的齐鸣（1842-1912）》，于《白沙人文社会学报》创刊号，2002年10月，页317-378。
- 黄道炫：〈梁济和王国维：新世纪的解读〉，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0月号，总第31期。
- 黄锦树：〈魂在：论中国性的近代起源，其单位、结构及（非）存在论特征〉，刊于《中外文学》，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号，页47-68。
- 维克多·李·伯克（Victor Lee Burke）著、王晋新译：《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War-making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上海：三联书局，2006年）
- 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与意识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 萧琼瑶：《清末民初国粹思想研究——以国粹学报为中心》，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6月。

-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葛尔纳（Ernest Gellner）著、李金梅，黄俊龙译：《国族与国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台北：联经出版，2001年。
- 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广州《开放时代》，2001年1月。
- 傅乐诗（Charlotte Furth）著、廖仁义译：〈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
- ：〈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197—230。
- 著，周婉窈译：〈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心世界〉，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404—444。
- 鲁迅：《热风》，《鲁迅全集》，卷一，香港：文学研究社，1957年。
- 谢灼华：〈序〉，《湖南图书馆百年志略》，“湖南图书馆”，
http://www.library.hn.cn/bngq/bnzl/bnzn_x.htm。
- 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1985，页8。
- 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翻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 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1984年，页36—43。
- 詹玮：《吴稚晖与国语运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 雷南（Ernest Renan）著、李纪舍译：〈何谓国家？〉，《中外文学》，第24卷，第6期，1995年11月，页4—18。
- 雷颐：〈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开放时代》杂志，总第138期，2000年七月号。
-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

谭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武术的进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页116—127。

黎志刚：〈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页99—118。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霍布斯邦编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霍布斯鲍姆著（Eric J. Hobsbawm），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语文教育百年大事记〉，原载《资料卡片杂志》，2004年，第11期。

〈中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学发展史》，见
<http://www.cdyz.he.cn/yuwen/book5/kongmeng/sucairuxuefzs.htm>。

《船山学社与弘扬国学》，

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whzdu/t20030808_1180.htm。

〈五四的前夜——悼梁济之死〉，“国学经典文化教育社区”网，

<http://www.hzkindy.com/simple/index.php?t1233.html>。

《近代绘画概述》，于“中国画家网”，

<http://www.chinesepainternet.com/zghhs4.htm>。

三、英文论著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Chang, Hao.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Crossley, Pamela Kyle. "Chaos and Civilization: Imperial Sources of Post-Imperial Model of The Polity", 《思与言》, 第36卷第1期, 1998年3月, 页119-190.
- Diko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 Hurst and Co. Ltd., 1992.
- Duara, Prasenjit.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0 (July., 1993), p1-26.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James.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1969.
- Hobsbawm, Eric.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Ranger, T. and Hobsbawm, E. e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brey, Patricia.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Brown, Melissa J.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 Fitzgerald, John.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3 (Jan., 1993).
-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ogel, Joshua A. and Peter Zarrow, eds. *Imaging the People :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 Foucault, Michel.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in

-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by Bouchard, Donald. tr. by Bouchard, Donald. and Simon, Sher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pp.52-53.
- Furth, Charll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Laitinen, KauKo.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Curzon Press, 1990.
-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 Press, 1968.
- R. Reynolds, Dougla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chneider, Laurence A.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Limits of Change :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ed. Furth, Charllt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7-89.
- Shen, Sung-chiao. and Chien, Sechin Y.S. "Deiliiting China : Discourses of 'Guomin' (国民)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in Late Q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 The East Asia Experience*, ISSP, Academia Sinaca, Taipei, may 25-27, 1999.
- Townsend, Jame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 No.27 (Jan., 1992).
- Unger, Jonathan.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 Y. : M.E. Sharpe, 1996.
- White, Hayde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 Baltimore: The John

-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ong, Young-tsu.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Oxford Univ. Press, 1989.
- Wong, Young-tsu.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right, Mary.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63.
- Yu, Ying-shi.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annroth, Karl Molin, Ragnar BJOR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 Walter de Gruyter, 1944, pp.
- 島田虔次著、Fogel, Joshua. (tran.), *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 (Standford Univ. Press, 1990)